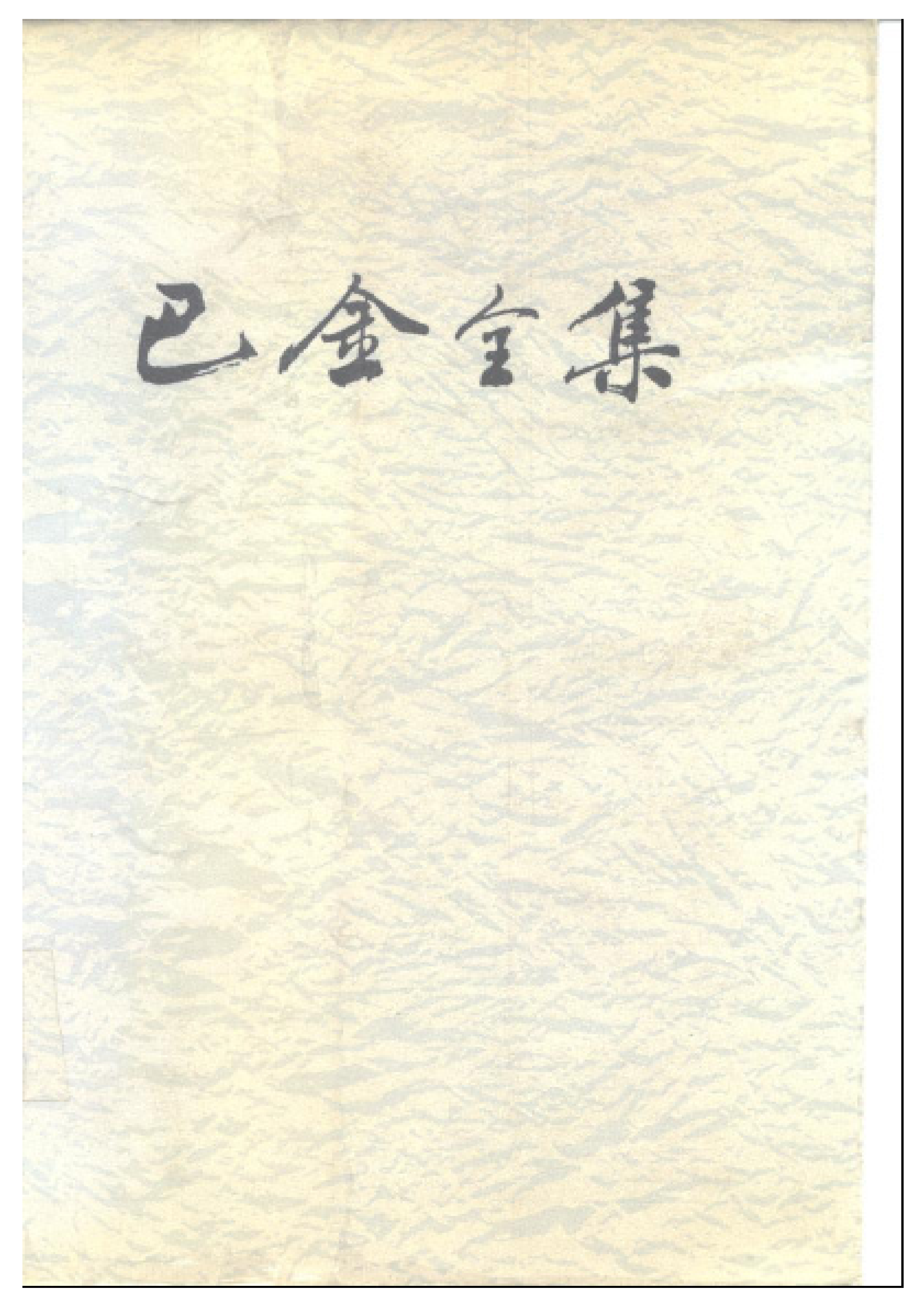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936-0/Z·6
定价 6.95 元

目 录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保卫和平的人们

谈契诃夫

大欢乐的日子

慰问信及其他

《慰问信及其他》，一九五一年七月平明出版社出版。

我是来学习的*

——参加“文代大会”的一点感想

我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却发见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七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我不曾见过，可是它们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我看到的全是诚恳的、亲切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脸。我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七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1949年7月17日。

忆鲁迅先生*

从北平图书馆出来，我迎着风走一段路。风卷起尘土打在我的脸上，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站在一棵树下避风。我取下眼镜来，用手帕擦掉镜片上的尘垢。我又戴上眼镜，我觉得眼前突然明亮了。我在这树下站了好一回，听着风声，望着匆忙走过的行人。我的思想却回到了我刚才离开的地方：图书馆里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那地方吸引了我整个的心。我有点奇怪：那个小小的房间怎么能够容纳下一个巨人的多么光辉的一生和多么伟大的心灵？

我说的是鲁迅先生，我想的是鲁迅先生。我刚才还看到他的手稿、他的信札和他的遗照。这些对我也是很熟习的了。这些年来我就没有忘记过他。这些年来在我困苦的时候，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感到疲乏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我常常记起他那些含着强烈的、分明的爱憎的文章，我特别记得：十三年前的两个夜里我在殡仪馆中他灵前的情景。半截玻璃的棺盖没有掩住他那沉睡似的面颜，他四周都是芬芳的鲜花。夜很静，四五个朋友在外面工作，除了低微的谈话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文学》创刊号。

声外，再也听不见什么。我站在灵前，望着他那慈祥的脸，我想着我个人从他那里得过的恩惠，我想着他那充满困苦和斗争的一生，我想着他对青年们的真诚的爱，我想着他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想着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华北、阴云在中国天空扩大的时候离开我们，我不能够相信在我眼前的就是死。我暗暗地说：他睡着了，他会活起来的。我曾经这样的安慰过自己。他要是能够推开棺盖坐起来，那是多么好呵。然而我望着望着，我走开，又走回来，我仍然望着，他始终不曾动过。我知道他不会活起来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像立誓愿似地对着那慈祥的面颜说："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你会活下去，活在我们的心里，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的心里。"的确，这些年来他的慈祥的笑脸，和他在棺盖下沉睡似的面颜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记忆。在困苦中，在绝望中，我每一想到那灵前的情景，我又找到了新的力量和勇气。对我他的一生便是一个鼓舞的泉源，犹如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

又是过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北京考大学，住在北河沿一家同兴公寓。因了病我没有进过考场，在公寓里住了半个月就走了。那时北海公园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去过别的地方。在北京我只有两三个偶尔来闲谈的朋友，半个月中间始终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我

早就读过了它，我在成都就读过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的《狂人日记》和别的几篇小说。我并不是一次就读懂了它们。我是慢慢地学会了爱好它们的。这一次我更有机会来熟读它们。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后来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诗集《野草》，更热爱地熟读着它们。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我有意识和无意识地学到了一点驾驭文字的方法。现在想到我曾经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这第一个使我明白应该怎样驾驭文字的人。拿我这点微小不足道的成绩来说，我实在不能称做他的学生。但是墙边一棵小草的生长，也曾靠着太阳的恩泽。鲁迅先生原是一个普照一切的太阳。

不，他不只是一个太阳，有时他还是棵大树，就像眼前的树木一样，这树木给我挡住了风沙，他也曾给无数的青年人挡住了风沙。

他，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已经去世十三年了。每个人想起他，都会立刻想到他的道德和他的文章。这是他的每个读者，每个信从者，每个研究者都永远记住，永远敬爱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宝物。这些用不着我来提说了。今天看完了关于他的生平和著作的展览会出来，站在树下避风沙的时候，我想起来：

这个巨人，这个有着伟大心灵的瘦小的老人，他一生教导同胞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他预言着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

国的到来，他为着这个前途用尽了他的心血。他忘了自己地为着这个前途铺路。他并没有骗我们，今天他所预言的新中国果然实现了。可是在大家、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却不在我们中间露一下笑脸。他一生诅咒攻击中国的暗夜，歌颂中国的光明。而他却偏偏呕尽心血，死在黑暗正浓的时候，等到今天光明的中国到来，他这个最有资格看见它的人却已经永闭了眼睛。这的确是一件叫人痛心的事。为了这个，我们只有更加感激他。

风一直不停，阳光却更灿烂地照在街上，我已经歇了一会，我得往前走了。

1949年10月11日。

一封未寄的信*

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朋友们要我在大会上讲几句话，他们叫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我逃走了。我不会讲话，站在台上我讲不出一个字。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因此我不愿拿我的缺点折磨别人。那天离开会场以后，我走在街上，忽然起了抑制不住的感情的波动，我想写点东西，我想写一封信，我心里有许多话，需要找一个机会痛快地倾吐出来。我要写，我应该写。可是我一直没有功夫写。到八月初，我就回到上海来了。工作占据了我的时间。可是在偶尔不拿笔、不翻书、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我会想到那一封未写的信，会想到那些我打算写信问候的朋友。想到他们，我就有一种负债未偿的感觉。未写的信常常来折磨我。我现在更了解"欲吐为快"的滋味了。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把那封信写出来，不是为那些受信的人，而是为我自己。好比一个人在无意间受到了别人的恩惠，他当时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觉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文汇报》。

示一点谢意，也不过是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对别人并无好处，对施惠的人更说不上报答。今天信写出来了（自然还是照当时的口气写的），可是我无法抄到那许多受信人的确实地址，便求《文汇报》副刊的编者给我一小块地位，发表这一封未寄的信。

朋友们：

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或者从没有读过我写的东西，或者刚刚知道我的名字，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认识你们，我认识你们的亲切、诚恳的面貌，我认识你们的简单、朴素的服装，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虽然你们中间有的人我还是初次见面，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我说我认识你们，虽然你们中间也有几位是我多年不见的老友，虽然我也曾听见别人讲过一些我并未见面的友人们的故事，可是我得说一句老实话，只有在最近，我才更清楚地认识你们。由于你们，我看见了一个那么广泛的文艺活动，由于你们，我才知道有人用笔做了那么多的而且那么直接生效的工作。我说用笔，还不是正确的叙述，这减少了你们工作的艰苦，你们中间，有的人用的是血，用的是生命。譬如说《第七连》的作者①，《随粮代征》的作者②，以及那许多我一时记不起他们的真实姓名来的。……他们为着崇高的理想（建立一个自

① 即丘东平（1910—1941）。

② 即高咏（1920—1942）。

由、平等的新中国的理想)，贡献了自己的年轻的生命。他们的血灌溉了中国的土地，却来不及看见从这土地上开出来的花朵。

而且由于你们，我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七万人上下的文艺军队。

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在一个大会场里我们像弟兄一般地在谈笑、讨论，我们每天见面，我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同样地拿着笔做武器。可是来到这会场以前以及离开这会场以后，我们却生活在多么不同的地方！而且我的笔蘸的是墨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却用笔蘸着血在工作。你们消耗的是生命，是血。在你们的脚经过的地方，你们都留下一点一滴的血。所以，在你们的脸上，血的颜色就少了，你们已经把你们的血分给别人了。

我们同是文艺工作者，可是我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你们却把文艺带到了山沟和农村，让无数从前一直被冷落、受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辉，得到它的温暖。我好像被四面高墙关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你们却仿佛生了翅膀飞遍了广大的中国，去散布光明。

你们是年轻的，从出生的年月计算，你们的确是年轻的。然而看你们额上的皱纹，我知道你们已经走过很长的艰苦的道路了。看你们的安静的微笑，我知道你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了。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回顾"的。倘使有人拉住你们回头看一眼丢在后面的"过去"，我想你们仍然不会为那些你们抛弃了的富贵荣华起一个惋惜的念头。你们中间有不少的人

真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民间去”的俄国青年那样抛弃了富裕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去冒险、去尝艰苦，把自己的命运跟广大的同胞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你们比他们幸福，你们也许经历了更多的艰辛，可是你们看见了你们工作的成绩、你们理想的开花。而八十年代的俄国青年则在监狱中和放逐地上憔悴地默默死去。

比起他们来，你们固然是幸福的。然而这幸福却是你们用了多大的代价换取来的啊。就是在感到幸福的时候，你们还是带着微笑地在忍受艰辛。而且前面还有更艰苦、更繁重、更危险的工作在等待你们。我知道你们不怕艰苦，不怕危险，你们只怕没有把工作做好。你们每个人都是把几个人的责任放在一个人的肩上。你们在不可能做事的环境中做出了许多事情：你们在中国撒遍了文艺的种子，不，可以说放遍了文艺的光辉。你们给一般在黑暗中生活惯了的人指示了一条光明的路，你们把疯瘫的人扶起来，你们鼓舞起懦弱者的勇气，你们使愚昧的人了解生存的意义。你们安慰寂寞的心灵。你们用歌把人们的心连在一起，你们用戏教育了他们，你们用知识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你们用善良和诚恳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你们给那班需要爱的人带来爱，使那班摧残爱的人受到打击。你们在每个地方留下爱的记忆，也带走爱的记忆。你们却从没有替自己取得荣誉。许多做别的工作的同伴都得到机会去更好地、更大地发挥他们的力量，你们却一直坚守着你们的岗位，切实地、安心地做你们自己的工作。在这样地继续工作的中间，你们有的人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变成了强壮的成人，有的

人由成人走到了中年。而中国的新生的力量也跟着你们的年岁一天天地成长。你们从没有在什么工作上写下你们的名字，你们也从没有在什么地方夸耀过你们的功绩。

我一口气写了这几张信纸，我的手累了，我需要放下笔吐一口气。我想休息。可是说起休息来，我更不能不想到你们：你们常常是不知道休息的。你们常常恨不得把一生的光阴在一个短时间里用尽，只为着想把工作提早完成，即使在并不顺利的环境里，也是这样。然而中国是那么大，任务又是那么多，一个任务接连着另一个，剥夺了你们的休息时间。你们的坚强的心支持了你们的身体，你们的牺牲精神克服了各种的困难。为了万人的将来，你们忽视了个人的现在。为了万人的安乐，你们放弃了个人的幸福。你们的身体瘦弱了，可是你们的精神更强健了。你们知道你们并没有白活，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各处都需要你们。这一点安慰、这一点鼓励，你们接受了。可是你们拒绝了其它的享受、其它的酬报。

在大会中我听到了关于你们工作的报告，在大会以外的晚会中，我看到了你们的工作成绩；在将近一个月的直接和间接的接触中，我知道了你们生活的详情。对着你们的没有英雄气概的外貌，我说不出我心里的感动和敬爱。你们是那么平凡、那么朴实、那么纯真，而且那么谦虚。从外表看，你们彼此间似乎没有什么分别，除了身材的长短和年龄的差异。其实不单是你们彼此间，就是你们同别的穿制服的人站在一处，在外表上我也看不出你们和他们的差别。唯其平凡，你们更能得到别人的敬爱；唯其朴实，你们才能够把你们自己的命运

跟全中国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唯其谦虚，你们在做过了那么多的工作以后还能够保持你们的纯洁。你们是不会骄傲的，你们是不知道骄傲的。

可是今天我却感到骄傲了。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我才觉得做一个文艺工作者是一桩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会已经完毕，分别的日期似乎也已决定，你们就要走了。任务在催逼你们。你们要回到你们的部队、你们的农村、你们的工厂、你们的机关去。你们要回到你们从那儿来的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去（你们有的还要跟随部队打到西南和华南去）。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去，回到你们的工作同志那儿去，是的，还有几万个工作同志在等待你们。他们等着你们回去告诉他们北京的消息、新的消息。他们等着你们回去跟他们一块儿进行新的工作、新的任务。工作需要你们，人民需要你们，新中国需要你们，新时代需要你们。

我在这最后说到的“你们”，是连你们的几万个工作同志也包括在内的。他们是跟你们一样的有着献身精神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曾，而且一直在为着新中国流血流汗。作为新中国的人民的一分子，我要求你们把我的问好和祝福带给他们。

1950年1月在上海。

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

关于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印象、感想和回忆，我已经写过几篇短文，而且也读过了朋友们写的更多、更好的文章。《大公报》的编者要我在《国际问题》版上发表意见，我没有独到的见解，也缺乏分析的能力，所以我不再写印象或感想，我借这个地位发表我的《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那是我到华沙之前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中写成的，这里所说的“西方作家”，是指那些没有参加“和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良心的作家。在华沙我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因此也没有把这封公开信发表。

今天我拿起笔对你们说话，我是以一个中国作家的资格，你们的同行的资格发言。我的话不单是说给你们和你们的读者听的，我也说给那些没有读过你们著作的人，和那些受了欺骗准备充当炮灰的人听。

我从中国来。这个国家在从前被西方人当作谜一样看待。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曾经发过灿烂光辉的文化。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大公报》。发表时题为《给西方作家的信》。

这个国家有着广大的山明水秀的国土和众多的刻苦耐劳的人民。但也就是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几千年来受尽了封建制度的剥削、榨取，一代一代地在专制独夫的残暴政治下面憔悴死亡。他们忍饥受寒，像牛马似地劳动，换取他们的简单的生存，但是他们也从没有失去斗争的勇气。反抗的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燃起来。殉道者的血不停地流着。终于到了这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烁金熔铁的烈火，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一个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产生了。

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都市，有人称它为罪恶的都市，有人称它作冒险家的乐园。一只一只的远洋轮船，载来一批一批的冒险家。他们利用这里的廉价的劳动力，开办工厂，制造商品，争取广大的市场，并且组织发行网推销他们从海外运来的剩余物资。他们在这里建造了高楼大厦，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上海的人民呢，却蜷缩在寒冷的小屋中、摇动的搁楼里，睡在高楼前的人行道上，挤在苏州河边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的工人为了微少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合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一百年来的成就。然而在今天这一切都像梦魇似地消失了。上海也跟中国的别的城市一样落到了人民的手中。人民革命的洪流把帝国主义留下的肮脏的污泥冲洗干净了。新的上海产生了。在所谓车水马龙的繁华市街上出现了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宫。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者，推翻了反动的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只是为着一个和平的企图：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而且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同时也给世界留下一个榜样：一个古老的民族怎样新生。

作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宣传和平，我认为我的任务是把人类团结得更紧密。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我们比谁都更爱和平，更宝贵和平，更需要和平（在我们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中就有不少光辉的非战的诗篇）。因为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找到建设的机会，而且我们是经过长时期的战争之后才得到和平的。

但是现在和平受到威胁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不让我们享受和平的幸福，不给我们以和平建设的机会。他们的国防线已经移到我们的台湾，他们的铁蹄已经踏到我们的东北边境。我们的城市被轰炸，我们的人民被扫射。在太平洋的彼岸，那个被称为总统的人正发出"战争的恐惧掩盖了人类的希望"的侵略叫嚣，拿原子弹和氢弹来吓唬世人。似乎大残杀马上就要发生，大毁灭立刻就要到来。在今天，的确有一片大的乌云盖在人类的希望上面。落在朝鲜土地上的千万吨炸弹便是对世界文明的严重威胁。朝鲜人民的苦难激动着全世界人民的良心，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已经成为事实，而且不断地在扩大。

然而人类的希望像一颗永恒的星一样，乌云掩不住它的

光芒。特别是在今天，和平不是一个理想，一场梦。它是万人的愿望。它已经有了团结在一起的八万万的保卫者，不，这还只是一部分的数目。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人民中，没有一个人不爱和平，没有一个人不恨战争。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跟他的同胞、跟他的邻人和平相处，没有一个人不希望用他的智慧和他的劳动来共同创造新世界的文明。渴望战争想从战争得利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我们称这些人为战争贩子。他们用种种的花言巧语把天真的年轻人骗上战场，杀害善良的人民，毁灭和平的城市，替他们开辟广大的市场，奴役弱小的民族。侵略者的王国就是用无辜者的白骨赤血造成的。他们不断地用种种方法扩大它，巩固它。他们想拿我们祖先累世的劳力所创造的文明作代价换取他们宫殿的金顶，完成他们万世不灭的霸业。

但是他们的幻想是不会成为事实的。我们不会让他们成功，全世界人民也不会让他们成功。他们要扩大、巩固他们的王国，我们要摧毁他们的王国。我们用文字，用语言，用事实，用行动来摧毁它。

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团结人类，促进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撇开思想、宗教、语言、肤色的差异，只要是善良的人，只要是爱和平、爱人类的人，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创造新的世界文明而奋斗。我们有责任使受骗的人们睁开眼睛，我们有力量救出即将充当炮灰的年轻的生命，我们更有把握看见侵略者的王国的崩溃。

"拿我的王国换一匹马，"驼背的英国的暴君理查三世到

了败亡的时候，曾经这样地狂叫过。可是他终于失去了他的王国，也失去了他的生命。有一天那些新的暴君也会发出同样的绝望的叫声来。在败亡的时候暴君们是多么地无力，他们的王国就成了不堪一击的纸糊的东西，连一匹马也换不到了。

我还记得我动身到华沙来的时候，我的五岁的女孩依恋不舍地拉住我的手不肯跟我分离。我爱我的女孩。每个父亲都爱他的儿女。年轻的一代的确是可爱的。我们这一代已经受够苦难了，可是我不愿意看见孩子的小眼睛上有一滴泪水，我不愿意让谁伤害一根年轻的头发。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美的将来。为着年轻的一代我们应当贡献我们的精力和生命。倘使我们能够在和平的斗争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倘使我们能够为年轻的一代争取到和平，我们可以说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尽了作家的责任，尽了人的责任了。

1950 年 11 月初在西伯利亚国际列车中。

两封慰问信*

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我说过有许多感情是用文字表达不出来的。现在我拿起笔给你们写信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是一个多么笨拙的人了。我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表示我对你们的敬爱。你们勇敢的、年轻的和平战士！你们是为了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放下自己的工作，拿起枪，挂上手榴弹，跨过鸭绿江，站在朝鲜兄弟们的身边，跟他们一块儿用自己的血肉去抵挡美帝侵略军队的疯狂的进攻。但是你们胜利了，你们从野蛮的残酷的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了一大片受难的土地，救出了无数受苦的朝鲜人民。你们胜利了，你们用实际的行动使侵略者认识了和平力量的强大，让他们在世界人民的眼前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无耻无能、残酷嗜杀的真面目。我这管无力的笔写不出光辉的史诗来歌颂你们的英雄事迹，而事实上你们的国际主义的友爱精神和反抗侵略的辉煌战绩已经活在朝鲜人民的心里，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并且也活在世界人民的心里，用不着我这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群众文艺》第五卷第四期。

支笨拙的笔来表扬了。当我说到世界人民敬爱你们的时候，我并没有说一句虚伪夸张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平壤解放的消息传到苏联的时候，我们正在莫斯科。十二月七日那天在餐桌上苏联朋友把《真理报》上的记载翻译给我们听。接着便是全体起立干杯、欢呼、拍掌的热烈场面。我们是在为你们的胜利干杯、欢呼、拍掌。苏联的朋友们也在为你们的胜利干杯、欢呼、拍掌。因为你们的胜利也就是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胜利。一个苏联朋友举起杯来说，他建议为你们干杯，因为你们已经给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一个很大的教训，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有了不小的贡献了。其实不只在苏联，在全世界中都有人不断地在为你们的胜利干杯。当战争贩子们正在普遍地叫嚣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时候，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却向全世界人民发出庄严的号召：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和平，而且就是在大会进行的中间，得到了你们最先起来响应这个号召的消息。曾经有过一次全体代表起立以最大的热情为你们欢呼。你们的行动给新中国增加了更多的光荣，你们的行动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更大的保障。全世界的母亲会感激你们，因为你们保护了朝鲜的孩子和母亲；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会感激你们，因为你们打破了战争贩子的好梦，阻止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今天你们在严寒的雪地上露营的时候，全世界中有许多家庭正围着炉火在谈论你们。他们的欢乐中有你们，他们的谈笑中有你们，连他们的安适的梦里也有你们，因为正是你们在保护他们的这一份和平生活。你们也许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实，可是我应当把它们告诉你们。我不在这里

提说我们的感激，因为跟你们隔得远的人都是这么亲切地在想念你们，何况你们的同胞，你们的兄弟姊妹，跟你们在一个国土里生长，跟你们讲同样的一种语言的我们！我不知道这封信在什么时候会到你们的手中，但是请你们接受你们的一个同胞的永久不变的关切、感谢和祝贺。

1951年2月4日。

致朝鲜人民军

你们也许不了解我的语言，但你们一定了解我的心意。你们，我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们。我没有到过你们的国土，我也没有目睹你们的痛苦和你们的欢乐。但是你们的一切对我也并不是陌生的。我从波兰带回来的一本纪念册中还有朴正爱的签字。我们跟她同车从莫斯科到华沙。从她在大会的发言里我知道了你们所遭受的一切。你们的苦难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你们的勇敢也获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在朴正爱的身上我们认识了你们民族的精神。在那个穿着一身白衣的矮小女人的身上我们看见的是：朴素，诚恳，谦虚，和蔼。她平常很少发言，脸上始终带着沉默的微笑。可是在她登台的时候，她的狮吼般的雄辩的演说使得八十国的代表吃惊、佩服。谁都禁不住要问自己：在这个谦虚的中年女人的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那么多的力量？你们正是这样可亲、可敬、可爱的战士！我们曾经为你们的胜利欢呼过，也曾为你们的挫折痛苦

过，现在又为你们的更大的胜利庆祝了。而且我们这两个民族已经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道路巩固了两个国家的友谊，共同的战线和共同的敌人加强了两个民族的团结。看见我们的志愿部队跟你们在一块儿并肩作战，反抗侵略，保卫和平，谁不欢欣鼓舞呢？你们是值得骄傲的，因为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着你们，全世界的希望也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把美帝侵略军赶下海去的日子快到了。全朝鲜的人民等着你们跟他们一块儿去重建被敌人毁坏了的家园。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来，而且我们也要帮助这一天早来。你们的最后胜利是无可怀疑的了。让我在这里祝贺你们。

1951年2月4日。

给苏合作同志*

今天整理书桌，我无意间翻出从波兰带回来的纪念册，在那上面又看到你和另外四位朋友的名字。今天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我跟你们分别整整有四十天了。可是看到你们的颜色不同的签名，我又想起了我们在国际列车中的最后一夜，想起了那个热烈的告别晚会，想起了我和丁同志在车上你们房间里跟你谈到早晨三点钟的情景。十二月十八日早晨三点钟，火车已经在奥特波尔站停了许久了，四个先下车的苏联同志中间有两个匆匆地上车来，你们三个人谈了几句话就提着行李带走带跑地下车去了。我和丁同志说过，你们五个人把我们从莫斯科一直送到奥特波尔，我们至少也得送你们进车站去。奥特波尔车站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一个多月以前我们曾经在车站的餐厅里耽搁了七八个钟头。可是这一天火车并没有停在月台旁边，我也不知道车站离这里有多少步路。天色阴暗，车外不见亮光。你们从左面下车，我也跟着从那里下去。地上积着雪，我担心会滑倒，迟疑一下，才敢跳上车去。你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我在后面唤你们，你们没有站住，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苏联知识》第一卷第十二期，发表时题为《给苏合作先生》。

你们三个黑影子却转过火车头不见了。你们也许没有听见我的唤声。你们也许听见了故意走得更快。但是为什么在你们送我们走了七天之后，不让我送你们走五分钟呢？

我失望地回到车上去。我们的车终于开往满洲里去了。我躺在卧铺上，我的心很热，友情使我浑身发热不能睡眠。最近三个星期的生活情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一想到你们的面貌，一想到你们的声音，我就禁不住在暗中微笑，这是愉快的微笑，这是感谢的微笑。

火车奔跑似地向满洲里驶去。车头就只拖了我们这三辆卧车和一辆行李车，其他的车厢都跟你们一样留在奥特波尔过夜了，你们没有出国护照，不能把我们送到满洲里。可是为了免去我们换车的麻烦，你们让火车破例地把我们一直载到满洲里车站。满洲里就在前面。我们是一刻比一刻地离国境更近了。同时我们又是一刻比一刻地离你们更远了。因此我不能不一刻比一刻地更想念你们，更怀念过去三个星期中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西伯利亚的生活，跟你们在一块儿过的生活。

我是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的。我是第一次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的。你们可以想象到我的脚第一次踏在俄罗斯的黑土上，我是多么地兴奋。可是在你们这里我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客人。你们的一切对我都是非常亲切的。连西伯利亚的雪，贝加尔湖的水，莫斯科的“红场”，列宁格勒的“冬宫”……都像是跟我常见面的老友。我知道列宁墓前有着经常不断的参拜的行列，我知道“瓦西里·勃拉任纳教堂”旁边还保留着蒲加

切夫在那儿成仁的古刑台①，我知道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红星彻夜发出照耀世界的光芒，我知道列宁格勒那个树立彼得大帝铜像的广场上一百二十五年前发生过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壮剧。……你们那里的一切，一切……我全在书本上念过了。我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知道莫斯科的麻雀山和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涅瓦大街是什么样的地方。不仅是我，几乎所有的当时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地关心着，热爱着你们国家里的一切。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这些光辉的名字，他们的作品三十几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读者的亲密伴侣。对于一切向上、有为的青年，莫斯科是一个革命的圣地。

现在我居然活到了这一天，我居然踏进了我这半生的梦里故乡，我居然亲眼见到了你们的产生出、培养出无数伟大人物的俄罗斯黑土。我参拜朴素而庄严的列宁墓，瞻仰一代伟人的慈祥的遗容，还是在我们初到莫斯科准备动身去波兰的时候。我们还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工艺博物馆，也游览了富丽堂皇的地道车站。单靠那短短的一天半中的见闻，我们也就明白了整个苏联的精神：把全国力量放在和平的建设事业上面，全体人民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共产主义稳步前进。

我们带着这样的印象跟苏联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一块儿坐着“和平列车”向着同一个目标——华沙前进了。②

① 农民革命的领袖蒲加切夫虽然是在红场上被处死刑，但是不是就在这个刑台上死去，我也记不清楚了。

② 我们到华沙去参加十一月十六日在那里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两个星期以后我们从华沙回来，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上会见了你们。我还记得那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你们几位的流利的中国话使我们吃惊。叶洛非也夫同志，我早在茅盾同志的《苏联见闻录》中认识他了；马特可夫同志在上海住过，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杜布洛斯卡娃同志，这个刚从北京回国的金发姑娘在任何时候脸上都挂着微笑。他们三位后来还陪我们去过列宁格勒。罗米诺夫同志记得六七年前他在桂林跟我一块儿吃过马肉米粉。还有你苏合作同志，你的中国名字和你那副宽边眼镜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更使我们惊奇的是你写中国字写得好。看到你的签名，人会以为你是一个中国人。此外，还有几位不会讲中国话的朋友跟你们一块儿来招呼我们，把我们送到旅馆去。又是那个漂亮的“莫斯科大饭店”，一切都跟我们上次离开时完全一样。你们也在三楼上留了一个房间，作为招待我们的“总部”，每天都有人住在“总部”里面。

我们的三个星期的生活就这样地开始了。在这里要找到比我们感到更舒适的客人，恐怕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受着丰盛的款待，很像一些贵宾，但是我们又不受礼节的拘束，可以自由地出入，畅快地谈笑，跟你们在一起丝毫感不到宾主的差别。住在这里，我觉得就像住在自己家中一样。然而就是在自己家中也不见得会有这么多的人随时对我表示关切。而且你们似乎下了决心要把你们的丰富的宝藏尽量地分给我们带回家去。

谢谢你们给我们安排的那些日程。我们应该向你们道歉

的是，我们因为国内工作关系，不能够照你们的意思在莫斯科多住几天。但是就在这短时期的停留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东西，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有几位同路的朋友说，"我们的收获实在是太多，我们得想法好好地消化它，利用它。"一个劳动模范看见机器就两眼发光，连声赞好，口里讲个不停。在莫斯科我们真可以说没有浪费过一分钟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我们到过了不少的地方。在高尔克村的"列宁故居"里，我们更深切地认识了一个伟大革命家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在雪封了的林荫道上，我仿佛看见列宁带着和蔼的笑容牵了小侄儿的手散步的情景。在由私人别墅改作戏剧艺术博物馆的"阿斯坦基诺宫"中，我们看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剧院的规模①，也了解了俄罗斯戏剧艺术的发展。在那些华美精巧的房间里，我们欣赏了农奴出身的天才艺术家的成绩②，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无穷无尽的农奴们的血迹泪痕。在"特列杰雅科夫美术馆"中，在列宁格勒的"冬宫"中，我们参观了一个文明大国的美术宝藏。在"冬宫"美术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成为世界珍品的达·芬奇的一张圣母像。在"特列杰雅科夫美术馆"里，我们看出了俄罗斯美术发展的道路。从许多现代的巨幅油画中，我们体会到苏联人民拥护领袖热爱祖国的感情。在"红军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苏联军队在卫国战争中的辉煌的胜利和他们解放东欧国家的英勇的战绩。许多国家大城市

---

① 据说十八世纪欧洲的剧院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个，另一个在瑞典。

② 建筑师和演员全是农奴。每年有一百个舞剧和歌剧的节目全由农奴演出。在一个玻璃橱中，我还看到农奴们念过的意大利文法和法文剧本。

中红军纪念碑的模型便是感激和友谊的信物。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希特勒的军旗含羞地躺在地上，柏林元首府屋顶上的铁鹰裂成两半倒在旗杆旁边。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最先在柏林国会大楼屋顶上飘扬的苏联军队的第五号红旗①。在“全苏建设长期展览会”中，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建设的美好的远景。即将完成的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的模型，给我们说明了苏联工程师在建筑术上的奇迹。发光的彩色大莫斯科建设图，帮助了我们了解苏联人民为着改变大自然面貌而进行的大工程。莫斯科河跟伏尔加河连接起来，解决了大莫斯科的水源问题。各种建筑材料的陈列和建筑过程的图表与模型，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三个半月里面可以完成一幢四层的楼房，五个月里修好八层的大厦。在“斯大林汽车工厂”里面，我们看到了最新式汽车的全部制造过程。一切都组织得那么好，计划得那么好，配合得那么好。没有一分钟浪费掉的时间，每个人，不论是男工或女工，都站在自己岗位上专心地干自己的工作。厂房是那样高敞，设备是那样完善。光荣榜，挑战书……表示出来高度的生产热情。文化宫、托儿所、疗养院说明了对于工人的文娱活动、身体健康与生活福利的重视。工人夜大学、技术学校、技工学校、斯达哈诺夫学校等等的创办，不断地提高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在汽车工厂附设的规模宏大的“文化宫”中，我们更看清楚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美国工人的孩子在街头流浪的时候，苏联工人的子弟却在课堂里、剧

① 据说当时进攻柏林的苏军部队共有旗帜九面，这第五号的红旗在柏林国会大楼的屋顶上插了二十天，后来才由飞机运回莫斯科。

场里、音乐厅里、阅览室里学习、研究，发展他们的艺术才能。……我们看到的确实是太多了。还有列宁格勒的米高扬食品工厂，它以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完成了生产计划，在一年里面获得了两次的奖金。还有列宁格勒的皮鞋厂，它在卫国战争中列城被围的时期内，始终没有停一天工，虽然厂址离前线不过十一公里，而敌人又向工厂投过三百七十个炸弹。办公室里有两种勋章说明工厂的光荣的历史：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此外再加上一面红旗奖状。我们看到的确实是太多、太多了。

然而这也只是一部分。我们还跟你们一块儿去过其他的地方。是的，我们到过金碧辉煌的"大剧院"，我们到过富丽堂皇的"红军剧院"，我们到过简单、朴素的"高尔基艺术剧院"，我们也到过漂亮、大方的"柴科夫斯基音乐厅"。这些剧院演出的舞剧有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和根据普希金的诗篇改编的《青铜骑士》与《泪泉》①；话剧有契诃夫的《三姊妹》；历史剧有现代剧作家的《海军上将的旗帜》；歌剧有格林卡的《伊凡·苏山宁》。有着七层座位和金色包厢、红色帷幔的"大剧院"更是我们常到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听到了人民演员米哈伊洛夫和克鲁格李科娃的歌声；看到了乌兰诺娃和加博维奇，谢米诺娃和康德拉托夫，斯特鲁奇科娃和拿泡里的舞姿，欣赏了柴科夫斯基和阿沙也夫的音乐。常常是你或者马特可夫同志给我们解释剧情，说明演员们艺术上的成就，或者在休息时

① 《泪泉》：即《巴里齐沙烈喷泉》。

间里陪我们在廊上散步。在这里我陶醉在苏联艺术的最高的表现中，跟社会主义国家的健康的人民一起欢呼，一起拍手。再没有比在你们这个舞台上所表演的更健康的、更高的艺术了。也再没有比你们的人民更爱好艺术的了。在莫斯科没有一个剧院没有一夜不客满。每一夜节目终场的时候，人们总不肯马上离去，许多人站在自己座位前面疯狂地拍手欢呼，常常站到十几分钟，使演员们出场谢幕八九次。就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那种热烈的情景仿佛还在我的眼前。他们在为米哈伊洛夫欢呼，在为乌兰诺娃欢呼，在为谢米诺娃欢呼，在为斯特鲁奇科娃欢呼（可惜我没有看到列别新斯卡雅！），你们的人民热爱自己的艺术家，你们的艺术家也了解人民。从欢呼和谢幕的情形看来，你们的演员和人民早已打成一片了。不仅在"大剧院"里是这样的情形，就是在"高尔基艺术剧院"里看契诃夫的"精细的心理剧本《三姊妹》"① 的时候，在"红军剧院"里看复杂的多幕历史剧《海军上将的旗帜》的时候，在"柴科夫斯基音乐厅"里看苏联民间舞蹈的时候，我也看到这同样的热烈的情景。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能够欣赏这样高度的艺术的成就，而且你们也知道怎样热爱它们；你们是慷慨的，因为你们毫不自私地把它们介绍给全世界的人民。

从你们那里我们得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还不说生活上的关心、照料。我从没有遇见过这么大量、这么周到、这么亲切的主人。今天望着纪念册上你们的签名，想到那三个星期的生活，想到莫斯科的停留和列宁格勒的参观，想到

① 引用苏联 S. 包各玛少夫的话。

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中的长途火车和奥特波尔的最后一夜，我更要想到你，想到你们，想到你们的人民。有些感情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有些事实是用文字说不完全的。今天在这里我能够用什么话来说明你们对我们的好意和我们对你们的感激呢？我能够用什么文字来说明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呢？

我想象得到你的回答。你们的回答一定是这样：在这方面语言和文字都是用不着的了，因为你们爱我们，我们也爱你们。这是不错的，在列宁格勒的“国家剧院”中，我们就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个晚上我们几个远方来的客人被你们的青年包围着，他们对我们微笑，跟我们握手，请我们签名，送我们礼物。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的地址，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话，但是我们已经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爱的语言，友谊的语言常常是简单的，共同的。两个民族彼此相爱，这就是一切了。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是很自然的，很牢固的。

那么，倘使我这封信没有把我的感谢的诚意表示出来，倘使你在这里找不到对你们的友情的适当的回报，还得请你原谅我，因为最深的感情是语言和文字所表达不出来的，而且中苏友好合作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我永远忘不了你的中国名字：苏合作。①

1951年1月27日。

---

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里又见到苏合作同志了。他担任着秘书长的职务，在座谈会上向我们介绍了研究所的工作情况和计划。他还是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后来我们离开莫斯科回国的时候，他还赶到飞机场来送别。（一九五九年五月注）

他们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里*

我曾经在一本西班牙的画册上题过这样的几句话：

> 死并不可怕，为理想死更不可怕。今天他们把我们牵到刑场去。可是明天会有无数的人尊崇地念着我们的名字。我们用自己的血灌溉了理想。有一天这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

今天我重读着它们的时候，我的眼前浮现了五个年轻人的面影，五张嘴都开着，他们提高声音在讲话，他们要全中国的人民都听见他们的最后的声音。这是二十年前二月七日夜间死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广场上的五位作家。我不认识他们，我也没有跟他们见过一面，虽然我早已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作品我读得极少。我跟文艺界接触，还是一·二八以后的事。以前我只是关在亭子间里写文章。所以他们的壮烈的死讯，我知道得比较迟。除了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以外，我还读过一篇叙述他们殉难时的情形的短文。我记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得那是发表在一本文学刊物上面的。那篇文章里面，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在一个漆黑的静夜里，当那些人被带出来明白自己就要受刑的时候，他们的手被紧紧绑住不能动弹，但是他们忽然大声叫起来："共产党万岁！"然后是一排枪声，便一切复归于静寂。这情景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古今来多少为理想牺牲性命的革命者在成仁就义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理想的胜利，而且对于这胜利他们始终是抱着坚定的信仰的。所以就是在临刑的时候，就是在黑暗的静夜里，就是在寒冷的广场上，就是对着那些向他们瞄准的枪口，就是对着刽子手的凶恶的脸，他们仍然没有丝毫的惧怕或悲伤的感觉，因为他们看见了未来的胜利的远景。他们看见了这个远景，所以他们能够用那么有力的声音传达给别人。柔石、胡也频、白莽、李伟森、冯铿五位烈士的情形就是这样。当他们在那个广场上用响亮的声音叫出他们的信仰的时候，他们一定想到了今天。唯其想到了今天的胜利，他们才能够安慰他们的爱人民、爱祖国的心，才能够从容地死去。他们的信仰并没有错。今天的事实证实了它。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的理想已经开始实现了，他们不能够活着看见翻身的中国人民的笑容，这只是我们这些生存的人的遗憾。但在他们却是没有遗憾的，因为他们的血帮助了今天的胜利。其实他们并没有死去，他们仍然活着，今天不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同志在想念他们，在谈论他们，连许多不认识他们的人也在尊崇地念着他们的名字，敬重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事业。而且他们不仅活在翻身的中国人民的笑容里。

他们也活在每个站起来的中国人的心里。新的中国会永远存在，他们也跟其他的革命烈士们一样，永垂不朽！

1951年2月23日。

后　　记

我把这本小书叫做《慰问信及其他》，只是因为我想把它献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我应该写一千封信、一万封信来感谢那些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只为了使同胞们活得更好的战士。但是话语是没有用的，要是我不把自己的心献出来，要是我不用行动来证实自己的话语。

我说过：最深的感情是语言和文字所表达不出来的。轮到我写信慰问我们的志愿军的时候，我的笔就显得多么地无力了。我一直记着陈沂副团长说过的那件事情。志愿军中有人问过他，国内的同胞还记得他们不。他们听说同胞们并没有忘记他们，便高兴万分。平淡的话语中露出了最深的感情。他们为着同胞牺牲一切，所以就是在冰天雪地或一片废墟的异国战场上，他们仍然想念着我们。对着这样深厚的同胞爱，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报答呢？读者们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我不在这里饶舌了。

《慰问信》在这小书里只占了很少的篇页。但是感激和慰问的精神却贯串了全书。我写这《后记》的时候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早晨两点钟，也可以说是二十七日的深夜。窗外正张开死一样的静寂的网，夜是像墨一样的黑。然而在

朝鲜的战场上，这应该是我们的战士活动的时候了。在我们睡的时刻，他们睁着眼睛，只为了使我们睡得更好。那么就是在梦中我们的心也会跟他们的心在一块儿跳动吧。没有人能够忘记他们，全中国人民都会尽最大的力量支援他们，使他们早日胜利归来！

巴　金 6月28日。

华沙城的节日

《华沙城的节日》，一九五一年三月由平明出版社初版，同年八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新版，共印行三版（次）。

华沙城的节日*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们站在华沙胜利广场上临时搭成的检阅台上。台前是穿着各种服装的游行队伍，队伍中飘扬着各种颜色的旗帜，高举着面貌不同的大幅画像。充满着信心的、年轻的、欢乐的歌声接连地朝台上扑来。我们的眼光接触到的尽是带着兴奋、愉快的表情的脸。人们笑着，谈着。人们欢叫，唱歌。不认识的人彼此招呼，相对微笑。我真想跟所有的人握手，也觉得所有的人都想跟我握手。今天是一个节日，是全世界人民的节日。

我们是从二届世界和大的会场赶来的。我们的车子绕了好些路，到迟了，我们下了车走过一段路，进了群众大会的会场，走到台上的时候，正看见西蒙诺夫从最高的一级台阶下来。他的小胡子上面还留着微笑。我知道他要去参加另一个宴会。我们也在拥挤中上了最高的一级台阶。我的背靠在木栏杆上。一些昂起的人头遮住了我的视线，但是它们挡不住响亮的欢呼声。游行的队伍正在高叫"和平"。这个波兰字Pokój（博孤伊）已经是我们十分熟习的了。我们可以很自然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文艺新地》第一卷第一期。

地叫出它来。而且不单是我们，所有的从八十个国家来的代表都亲切地叫着它，它成了我们的共同的语言了。

我抬头看天。天空不暗，但也不十分亮。一轮灰白的圆月挂在天空，像蒙了很厚的面纱一样。好几股探照灯的白光往上射出，仿佛要划开天幕似的。突然一个震耳的响声在我背后响起来，我刚回过头去，就听见了第二个、第三个响声。一粒火星在空中裂开了，变成无数彩色的小花散落下来。接着第二粒火星又散下另一把颜色不同的花朵。火星从四面升起，花朵向四处落下。半个天空被它们照亮了。

我用两只手握紧栏杆，脸向着天空，一粒火星刚刚裂开，一大把绿色、红色和金色的小花朝着我飞过来，自远而近，由小而大。我不自觉地伸出一只手去：我以为我会接住它们，但是一瞬间它们就不见了。接着又是另一把火花，蓝色的、金色的，它们像童话中的小仙人似地冉冉下降。我的眼前满是金光，我的耳里充满年轻有力的欢呼声。有不少的人在拍掌。我也拍手。这是一个大欢乐的日子，一个节日，全世界的节日，华沙城的节日。

今天整个华沙城在欢笑，在庆祝这个节日。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今天闭幕了，胜利地闭幕了。初步的工作完成了；世界和平得到了保障。华沙城和它的七十万市民对和平有了不小的贡献。的确今天应当是华沙城欢笑的日子。

今天，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夜晚，我，一个从中国来的远客，看见了新的华沙在欢笑。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可是我也知道它的故事。我也记得它的那些痛苦

的日子。然而我们活在今天。今天是伟大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当华沙城被政府的官员们抛弃、它的市民起来抵抗德国纳粹军队围攻的时候，和平的市民得到由前线败退下来的散兵们的帮助，跟那些比他们强过一百倍的敌人战斗了两个星期，他们放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电灯，炮弹和飞机炸弹像暴雨似地落在他们的身上。当那些英勇的战士们咽气的时候，当那些没有抵抗力的女人和小孩含着眼泪看纳粹军队踏着废墟进入华沙城的时候，会有人想到今天么？

一九四三年四月，华沙城犹太区(Ghetto)内剩余的三万犹太人明白他们没法避免德国纳粹匪徒们为他们安排好的命运，他们愿意死得更勇敢、更光荣，他们起来跟纳粹匪徒们作战的时候，他们用少数的武器(手枪和长铳)抵抗德国的机关枪和飞机炸弹，他们坚持了三个星期，一直到纳粹匪徒把全区的房屋炸光、烧光，在最后的一天，当最后的三个战士用波兰国旗裹住自己的身子、站在燃烧的六层大楼的屋顶上准备跳进烈火中去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今天么？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抵抗中，华沙城被烧毁百分之十，这一次又给毁掉百分之二十五了。华沙城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底还有三十五万九千多犹太居民，在一九四二年五、六月犹太居民的数目更增加到五十四万①。曾经繁盛一时的犹太区(包括那条世界闻名的柴门

---

① 这五十多万人(其中有一部分还是从别处“输送”来的)以后陆续地被送进了“集中营”和“毁灭营”，到了一九四三年犹太区的人口是大大地减少了。三万人的数目是《波兰在废墟中重建》一书中的数字。华沙城的人口总数在战前是一百三十万。

霍夫大街在内）现在成了一片死寂的废墟，除了一座犹太英雄纪念碑①以外，就只有绿草和瓦砾了②。

一九四四年八月，苏联军队逼近华沙的时候，城内的居民拿起简单的武器，在市街中堆起障碍物跟野蛮的德国军队作战。这次起义的失败引起了华沙城的大屠杀和大毁灭。在两次战斗中保留下来的华沙城的完好部分，又给破坏了百分之七十六。全波兰唯一的纯粹哥特式的建筑物——圣约翰大教堂，和藏着音乐家萧邦的心（那是放在一个坛子里的）的圣十字礼拜堂以及许多博物馆、戏院、图书馆全消灭了。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七日的晚上，当一群波兰女人被纳粹匪徒抓来，叫她们蹲在街中堆成一座活的障碍物来抵挡波兰志士们的枪弹的时候，当一个母亲对她的女儿说："要是我给打死了，你得记牢：你不要流一滴眼泪；你不要悲伤难过，你得保持波兰女人的尊严。不要在他们面前露出你的软弱"的时候，那些女人会想到今天么？③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的早晨，当一个波兰人和他的全家被德国党卫军④的屠户们赶到街中、自己受伤躺

---

① 犹太英雄纪念碑：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建立，是法国籍犹太雕刻家拉帕坡尔（Daniél Rapaport）的作品。犹太起义志士的领袖是约瑟·勒瓦尔托夫斯基（Jozef Lewartovski）。

② 这以后犹太区的废墟便做了纳粹屠户的刑场。我把当时波兰地下组织得到的报告选译两则在下面：

"（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五月二十九日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五百五十个男人被带出监牢，在犹太区的废墟上枪毙了。这次行刑使用机关枪，从早晨八点钟一直继续到下午一点。我们在牢里听得很清楚。"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今天枪毙了四十二个男人和九个女人。里面一个女人已经有了九个月的身孕。"

在地上、看见他的妻子被枪杀、两岁的孩子被人像狗似地刺死的时候，当他假装死去、屏息不动、让纳粹匪徒站在他的胸膛上的时候，他会想到今天么？⑤

所有这些人，这些英勇地战斗死去的人，这些无辜地被屠杀的人，这些在悲痛中被敌人折磨而死的人，以及从这里，从

---

③ 受害人口供第一百一十七号："……我们的背朝着起义军，我们有的跪着，有的蹲着，德国人躲在我们后面，有的伏在地上，有的单腿跪着，他们从我们的头上朝克尔侧里场开枪。我们一共是二十三个，大都是年轻女人，还有两个小孩。战斗一共进行了两个钟头，在这时间里面我们的感觉真是很难形容出来的。我们都准备死，而且大声念了祷告。枪弹在我们的头上和耳边飞来飞去。德国人的枪声几乎要把我们的耳朵震聋了。然而好像发生了奇迹似的，枪弹只打中了德国人。当第一个德国人中枪倒下去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要是我给打死了，你得记牢：你不要流一滴眼泪；你不要悲伤难过，你得保持波兰女人的尊严。不要在他们面前露出你的软弱。'只有小孩哭得很伤心，而且非常害怕……。"

④ 党卫军：简称SS，原先是希特勒的卫队，希特勒上台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四年纳粹清党之后，它在特务大头目希姆莱统率之下，权力逐渐增大，等到一九三六年希姆莱掌握了全国的警权，党卫军就成了德国的实际的主人，后来又成了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各国的实际主人。管理集中营，也是党卫军的工作之一。

⑤ 受害人口供五十七号："我住在W区E街第八号。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早晨十点钟一个党卫军支队和伏那索夫的部下闯进来了。他们把我们从地下室赶出来，把我们带到S公园附近。我们正走着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开枪，我的妻子当场被打死了；我的孩子受了伤，哭着要他的母亲。接着一个伏那索夫的部下走过来，像杀一只狗似地把我的两岁的孩子杀死了；然后他又跟几个德国人一块儿走到我面前，他站在我的胸膛上，试试看我是不是还活着。——我假装已经死去，害怕我也会给他们杀死。有一个凶手拿走了我的表；我听见他又在上子弹。我想他要开枪打死我，可是他却向前走了，他以为我已经死了。我就这样从早晨十点钟，一直睡到下午九点，亲眼看见了更多的暴行。……"

华沙城被押送到集中营和毁灭营①去，死在毒气房里，身子被烧成灰，脂肪用来制造肥皂，头发用来织成床毡②的人，不管他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论他们是犹太人或者波兰人，他们一定会想到今天！他们一定会相信今天！今天的欢乐跟他们的痛苦是分不开的。今天在华沙城欢呼的人也一定没有忘记他们。连我这个坐了十多天的火车，从遥远的中国赶来的陌生的客人也怀着感激的心情在祷祝他们的安息。

今天，不论在台上或在台下，不论在家中或在街上，不论在工作或在休息，波兰人是应当骄傲的，华沙人是应当骄傲的，因为今天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波兰，都在注视着华沙。今天从八十个国家里来的代表在这里看见了人们战胜战争的奇迹。

就在几个钟头以前，我参加了赠予和平奖金的典礼回到大会会场去的时候，在大汽车中，一个波兰女子指着窗外一所高大的建筑物对我说："这也是在很短的时期中修建起来的，外表上跟从前毁掉的建筑物完全一样，我们保存着华沙城的旧图样。我们要把德国人破坏了的华沙完全照原样地修复起来，而且要添上以前所没有的新东西。这就是我们波兰人对法西斯匪徒的答复。"③这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可是她昂起头、眼睛发光的时候，却现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

① 毁灭营就是真正的杀人工厂，在奥斯威辛。

② 这是《波兰在废墟中重建》里面的叙述。用人皮做灯罩，则是党卫军的一个女头目科赫(E. Koch)干的事。科赫是德国布痕瓦尔特（Buchenwald）集中营的负责人，她自己曾经用人骨头做了一个台灯，灯罩是拿人皮做的。

她说的确实是真话。在短短的五年中间波兰人重建华沙的工作就完成了百分之五十。另一个波兰人曾经告诉我，苏联军队解放华沙的时候，旧华沙城内简直找不到一所完好的大建筑物(只有在对岸布拉加区还有些可用的楼房，但墙上也布满了枪洞、弹痕)，可是今天华沙已经有了全欧洲最大的出版、印刷的工厂，可以容纳三千人的宽敞的临时会场了④。哥伯尼⑤安适地坐在波兰科学之友社的门前，美丽的西隆斯基—董布罗夫斯基大桥横架在维斯拉河上。新的纪念碑建立了，这是红军纪念碑，它立在一个宽大的广场上，表示着苏波两国人民的深厚的友谊。新的公园开放了，这是华沙青年团团员用自己的手建造，来纪念他们的殉难的同志们的。新的工厂成立了，波兰已经由农业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大道。宽敞舒适的工人宿舍完成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工人们用自己的血汗重建了华沙，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劳动的果实了。

重建起来的华沙虽然保存了以前的面目，但已经不是旧的华沙了。新的华沙一天天地在生长，劳动者的手不断地在

---

③ 有人说，一个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加拿勒托(B. Canaletto, 一七八〇年死在华沙)喜欢画华沙的市街和建筑物，现在人们就根据他的画来重建华沙。我在美术馆中见过许多幅他的作品。

④ 这是"波兰文字之家"(Dom Slowa Polskiego)，也就是二届世界和大的会场。在华沙出版的《和平》(画册)上有这样的话："尚未装置完毕，而将成为欧洲最大印刷厂的'波兰文字之家'，在五天之内被改为一个漂亮的大会会场。"(录中文原文。但英、法、德、俄、意、西、波七种文字的说明都是"三天之内"。)

⑤ 指波兰天文学家哥伯尼(N. Kopernik, 1473—1543)的铜像。

工作，机器声整天不停，到处都在建筑大楼。全华沙的人都在忙碌地工作。他们在跟废墟战斗，现在他们可以站在高楼大厦的屋顶上，望着那些夹杂在新建筑物中间的断瓦颓垣，骄傲地对自己说："我们战胜了。"波兰人用和平的建设战胜了战争的灾祸。

波兰的友人告诉我们：苏军解放华沙以后，曾经从苏联运来五百所活动房屋，送给华沙的居民。它们就装在我们住的国会旅馆的斜对面。这是一些木造的平房，四周还种了些花树，旁边是一条林荫道。就在昨天，大会闭幕的前一日，下午三点钟的光景，我和一个中国朋友沿着这条路散步。天下着微雨，但户外的空气使人感到舒适。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忽然听见一些小孩的脚步声和笑语声。我们转过身去，正看见六七个带书包的小孩迈着快步迎面走来。他们带着满脸的笑容，招呼我们："和平"（博孤伊），接着就递上纸和铅笔请我们签名。我们给他们全写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笑着说声"谢谢"，满意地转身走了。他们先后地走进那些木屋里去了。这些可爱的波兰的孩子！我们每天在旅馆的门口，在大会会场的门口，都看见这样的孩子。他们总是带着天真的笑容拍着手，高呼"和平！"，也高呼"斯大林！"，高呼"毛泽东！"。

的确，波兰的孩子是热爱和平的，华沙的孩子是了解和平的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饱尝了战争的灾祸。一个波兰母亲在大会中说过："在波兰有六百万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死在战争里面。至今还有一百五十万的孤儿在哀哭他们的父母。"波兰人为和平付过了这么高的代价。他们决不会让那些宝贵的

血白流。他们有决心来保卫和平，也一定有力量来保卫和平。而且这些孩子很快地就会长大起来。

华沙城今天在欢笑，因为它今天看见了八十个国家的人民保卫和平的决心。它也知道了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它绝不是孤立的。今天的确是华沙城的节日。全世界的人都记得英费尔德① 教授的话：

> 对波兰，对全世界，华沙都是一个象征。
>
> 华沙是怎样重建的呢？不错，新的墙是用砖和水门汀建造的；然而重建华沙的真正材料，却是波兰人民的和平意志。

1951年1月在上海。

① L.Infeld(1898— ？)，波兰物理学家，生在克拉科。一九三九年起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教授。在波兰解放后回国。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一 “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景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①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习了。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小说》第五卷第一期。

① 奥斯威辛：(Oświecim，波兰人读作窝西威安齐门)，波兰南部的一个小城，在克拉科的西面，人口约一万二千。波兰被三国瓜分后，奥斯威辛跟克拉科一样也成了奥国的领土(它的德文名字是 Auschwitz)，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时才把它收回。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① 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

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

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

---

① 也有人说数目是四百万。这里的五百万是根据达为多夫斯基教授（Prof. Dawidowski）率领的调查团的专家们的计算，又据奥斯威辛火车站的一个职员斯旦纳克（Mr. Stanek）说，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这三年中间一共有三百八十五万囚人由铁路运到奥斯威辛来。但早在一九四〇年德国纳粹就在奥斯威辛创设集中营了。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 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不少的痛苦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搀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

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

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住”。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沿着电网，像鬼影似地耸立着一些瞭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弗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

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三 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

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

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

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①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欧洲各国的纸币，这都是无辜的死者留下来的。他们从欧洲各国被骗到这里来，死在毒气房内，身子给烧成灰，埋在土坑里，洒在沼地上，抛在维斯拉河或索拉河中了。一个纪念犹太人受难的房间里，在那朴素的纪念碑前面有人奉献了大束的鲜花，碑的上方用犹太文写着：“要牢牢记住”。纳粹的一个头目赫斯曾经招认过：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从欧洲各国来的犹太人被毒死

① 纳粹撤退时，来不及运走留在仓库里的女人头发一共有七吨。这里只陈列了两吨。

在奥斯威辛—布惹秦加①。布惹秦加离奥斯威辛有三公里，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也就是它的连号。毒气房和焚尸炉都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们在纳粹屠户们逃走的时候，全被炸毁或烧光了。我们看到一张焚尸炉的照片。在那个厅子里一共有十五个焚尸炉。每三个连在一起，炉门紧闭着，看起来好像是新式工厂里的设备，据说在这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一共有四个。②有一个时期，这四个地方整天不停地烧着火，二十四小时里面烧毁了一万二千具尸首。但是毒气房每天却杀死更多的人。来不及的时候，屠户们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个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烧毁。我们在陈列室里看见了一个参加这种工作的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③偷摄的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女囚人脱光衣服准备进毒气房时的摄影，另一张摄出在土坑里烧毁尸首的情形。

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另一个年轻的同伴对着成堆的金丝发流眼泪。"我再没有见过

---

① 布惹秦加：(Brzezinka)，它也有一个德文名字 Birkenau。

② 第一焚尸所是旧式的。纳粹屠户们本来还要建造第六焚尸所，可是后来发见在空地上挖坑焚尸比较省钱，便不再添造焚尸所了。

③ 大卫·席木勒维奇：这是一个在 Sonderkommando（特别队）工作的希腊籍囚人。他的姓名是 David Shmulevich。《德国人在波兰的罪行》第一卷（英文本，1946）中把他的姓名误写作 David Grek，但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同书的法文本中则改正为"一个叫做大卫的希腊人"了。三张照片都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里偷摄的。

比这更残酷的情景了。”第三个人说。这时候阿来克斯站在我们的旁边，昂起头，用坚定的声音给我们解说这一切可怕的情景。的确我们应该学学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示弱。

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陈列室，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有什么东西压紧了我的心，我只想长长地吐一口气。

“这是十号，这是专门拿女人当作试验品的地方。”说明员指着那道关闭的门说，阿来克斯为我们把他的话译成英语。“在这里面经常关着一百五十个女人①，纳粹的医生和教授们就用她们来做各种医学上的实验，每一个女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手术，最后的报酬是枪毙，或进毒气房。那些实验都是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在这所房屋里头，被宰割的女人的尖声哀叫始终没有断过。”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看过这样的一段记载：“在营里进行活人实验的主要负责人是德国妇科专家格劳倍格教授(Prof. Glauberg)。他和他的一个柏林的同事做这种实验工作，目的在发明X光透不过的新的物质。格劳倍格特别是一个有生意眼光的人，他是受着德国化学工业的委托来工作的，他每一次实验了一个女人，便可以从德国化学工业那儿得到一大笔款子。他向集中营买了一百五十个女人来做这种实

① 一说是“五百个女人”。

验。这些不幸的女人被放在一种特别的手术台上。然后用一个电的注射器把一种又浓又厚的、像水泥一样的东西塞进她们的阴道里面去。这种残酷的手术是借着X光来控制的。过后便开始了照相。这些不幸的女人痛得在台上翻来扭去，满身都是鲜血。每一个女人在三四个星期里面要经过这同样的手术三次到六次，这以后她们就害着子宫炎、卵巢炎、腹膜炎和输卵管发炎等等的病。”

这不过是“科学”实验的一种罢了。一百五十个女人只是一个小的数目，她们只是一个专家的实验品。在奥斯威辛，这样的专家是相当多的。此外有一个沙木尔医生①的助手制造了一种专门给女人阴道内部照相的器具。这也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每次照相要花一个钟点，而且不只照一次。我再举出一个名字，那是柏林的教授舒曼博士(Dr. Schumann)。他专门从事不生育的试验。他自己关在一间铅的小屋子里面，管理着X光的强度，和照的时间的长短，把强度的X光集中在女人的卵巢上，一共要照五分钟到一刻钟。在这手术之后许多女人都吐得厉害，死去的也不少。要是她们能够活过三个月，舒曼博士还要在她们身上施行一次手术，割掉她们的一部分的性器官，拿出来仔细研究。经过这些手术以后，要是人还能够活下去，那么连强壮的女孩子也会变成外貌衰老的女人。其实对她们，活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本记载德国罪行的书里面就有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那些女人经过了几次的实

---

① 沙木尔医生：(Dr. Samuel)，是营里的一个囚人，他是一个德国籍的犹太人。他被迫担任这种科学实验的工作。

验，经过了一次的大手术以后，就不能再用来作实验品了，于是把她们直接送到布惹秦加的毒气房去。”

男人们也同样地被选出来作“科学实验”的实验品。不过他们的“刑场”也许不在这个地方。

我用憎恨的眼光望那红墙，望那关闭的门，我疑惑地想道：“这会是真的么？那些医生，那些教授，他们不也是人，即使他们生在纳粹的德国，活在纳粹的德国？人对待人能够是这样的残酷？”但是我马上就记起了一本叫做《人造地狱》① 的书，那是德国布痕瓦尔特集中营的一部有系统的记录。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有所谓“病理学部”，那里面就有不少的专家在从事尸体的科学的研究。而且活剥刺花的人皮作为展览的珍品。那些靠着法西斯养料生活的纳粹专家可以做出任何残酷的事情。我想到这里，突然打了一个冷噤。

“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两万六千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

① 《人造地狱》：一名《集中营的制度》，著者是倭根·柯刚(Eugen Kogon)。

“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 Jasinski)的二十七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号房的号牌上有一行波兰字，意思是“死屋”。“这是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头的情形可以跟历史上最可怕的监牢相比。”当我的脚踏上门前台阶的时候，我听见说明员的这样的解释。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想到了席吕塞尔堡。但是纳粹特务们的残酷超过了专制的帝王。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席吕塞尔堡，还有不少的囚人活着出来，用他们的著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而这里却是一所名符其实的死屋，没有一个囚人能够活着走下这个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却昂着头进去了。

审判室里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室里的陈设保存着原来的样子。据说在当时一点钟里面可以审判六十个人。这里有好些监房，房里缺少流通的空气，纳粹特务们像堆沙丁鱼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冻和饿之外，他们还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囚人。我们到了地下室，在那儿看见一个小小的房

间，水门汀的地上只有一个小木桶，没有床，没有桌椅。这个地方经常关着三十个囚人。那扇木板门现在永远开着，上面留着许多人的名字。我认出一个用绿墨水写下的苏联战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谢米诺夫①。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勇气再去辨认别人的笔迹。在这扇木门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对我们讲话。他们要我们给他们证明他们并非白白死去。我记得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的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个维也纳的电影制片家汉伯尔（Hamber）因为是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纳粹特务们虐杀了。他的兄弟亲眼看见了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见证人都不敢说一句真话，但是弟弟汉伯尔却勇敢地说："我知道我会为了这次的控告死去。不过将来，这些罪人也许会想到有人控告他们，便不敢那么大胆妄为。要是这样我就不会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里面。但是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他的话至今还鼓舞着全世界爱和平的人。在这木门旁边就立着一个像杀死年轻的汉伯尔的地牢那样的东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门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们的骨灰早已跟波兰的土壤混合在一块儿了。波兰人不会忘记这些从欧洲各国来的殉道者。古老的波兰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这中间也曾得到他们的血的灌溉。

离开木门走不到几步，我就到了地牢。同来的朋友们都看过这个"东西"，而且陆续地走开了。我正朝着地牢走去的

① 那个人的姓也许不是谢米诺夫，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时候，一个朋友迎面过来，对我摇摇头痛苦地说："这么一个小地方，要站四个人！真可怕！"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粹特务们这样处死的。

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

另外还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们叫做"死屋"。它们是那些被挑选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纳粹屠户们在奥斯威辛的大门口大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谎话，可是在集中营里却遵守着一个规律：只有能够劳动的人才有权生存。因此虽然营里也有医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却不断地让人带出去杀害。这种办法在奥斯威辛就叫做"挑选"。它使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医院。于是党卫军的医生们就扩大了这种挑选的行动。他们开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间挑选病人，他们并不检验身体，只凭个人的印象，只凭囚人的相貌，断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身体虚弱的囚

人一看到医生们到来，立刻昂头挺胸，努力避免现出生病的样子。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个维也纳人保罗·克吕格尔(Paul Krüger)只因为身上有一个盲肠炎的旧伤疤，就被选中了。看了营里留下来的统计表，我们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十四个月中间，单是在布慈秦加的验疫营一个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个人中选死亡，刑场就在二十号房的外科手术室或者在二十八号房。杀人的利器是注射针。中选的人坐在一把类似牙医用的椅子上，两个囚人捉住他的两只手，第三个囚人拿着他的头，并且用毛巾缚住他的眼睛，然后纳粹屠户用一根长针刺进他的胸膛。被害的人并不马上死去，他只觉得眼睛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另外那几个帮忙打针的囚人便把他带进隔壁一间屋子，让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里还可以活二十分钟。那个叫做克勒尔(Josef Klehr)的党卫军班长对这种注射很感兴趣。要是他觉得医生们挑选出来的囚人太少，他还要自己出去找寻。

十七号的号牌上写着"囚人生活"。这里有文字，有照片，有图表，有数字，有图画，有实物，有雕像。我看见了威颜木夫(Wiejmów)画的八万囚人点名图。点名是囚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而且一天还不只点一次名。在一张图表上我看到"十二点至一点——点名"，"三点半至四点半——点名"的句子。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背回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情景也由一个画家布南特胡伯尔(Jerzy Brandhuber)表现在

图画中了。一个房间里陈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孩子们被强迫跟父母隔离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气房的。而在集中营里生的婴孩，纳粹的医生会注射毒药杀死他们。一个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个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儿，这是拉衣诺黑(H. Raynoch)的《母与子》(Matka Dziecko)，母亲搂着孩子，用一只脚跪在地上。她只有极短的头发，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男人。这正是集中营的惯例：每个女人被带进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好好地保存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毡的原料。在集中营成立的初期，女人还可以在奥斯威辛住一个时候，到后来毒气房和焚尸炉接连地建筑、扩充，女人们一下火车就让人直接送进了毒气房，"剪发"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尸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时完成。营里有专门的"牙医"来拔去死人嘴里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个囚人被强迫来担任这种工作。我把《母与子》看了许久。我想着：这个母亲是在保护她的孩子，不肯让人们把他送进毒气房吗？这个母亲是在搂着孩子向人们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吗？我了解她的感情，因为我也有过母亲，而且我也有着孩子。那么我能够说出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想着什么吗？"至少让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说过了这样的话。但是母亲和孩子全死了，也许病死在营里，也许毒死在毒气房中。纳粹杀死了无数的母亲和孩子，纳粹给波兰带来毁灭和死亡，给世界带来毁灭和死亡。他们定下了大的计划：要杀尽犹太人，使波兰人绝种，把吉卜赛人完全消灭。然而新的世界从废墟中产生了。波兰人仍旧活着，并且

活得更勇敢；犹太人仍旧活着，吉卜赛人也仍旧活着。而希特勒和他的匪帮的骨灰却不知飘到那里去了。

阿来克斯立在一个玻璃橱前面。橱里，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刺号码的工具，”阿来克斯愤恨地说。“每一个人来到营里，带的东西给抢光以后，手臂上先给刺一个号码，然后照三张相，自然是穿着条纹的囚衣照的。我们都是这样地开始了集中营里的生活。这里全是我们的生活的说明。”他掉过头把房里的一些画和一些图表指给我们看。

的确，一种受难的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白色的墙壁立刻消去，时间马上倒退。我仿佛听见乐队在奏乐。我仿佛看见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经过大门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他们在傍晚才回来，有的淌着血，有的弯着背，有的还用木架抬着同伴的死尸，有的把死尸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尸放在小车上推着，这时候也有乐队奏音乐在门口迎接他们。这乐队也是由囚人组织成的。后来当人们成群地走向毒气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乐队“欢送”他们。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晨四点钟起床，至于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点名”之外，还有“体操”和“运动”。举起双手跳舞，光着脚在石子地上跑，练习一秒钟脱帽行纳粹礼，这就是“体操”和“运动”。他们的整个上午的时间就花在跑和跳上面。凡是没有跑多久就跌下去的人，立刻被处死刑。十二点钟开始“点名”，需要四十五分钟，“点名”以后，有一刻钟喝汤的时间，就只有一点汤！阿来克斯告诉我们说，一碗汤给五

个人喝，而且这些人早晨六点钟只喝过一点冷咖啡。喝了汤就得开始唱歌了。他们被强迫着唱他们不懂的粗俗的德国歌。要一直唱两个钟点，唱得不好，就被罚蹲下去唱，或者被打得伏在地上，脸碰着地。三点到六点半又是“体操”的时间。这以后又是“点名”，这次“点名”要花两个钟头。在整天的疲劳和饥饿之后，他们只得到一点面包和一点香肠（有时是果酱和黄油，星期六是干酪，但真正是一点点）做晚餐。有的囚人却必须一直在寒风里站到天明，还不能放下手来。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饮食！所以一个一百六十五磅体重的波兰女人（第四四八八四号）在营里住了一年半以后，就减少了一百一十磅的体重；一个三十六岁的荷兰籍的犹太女人（第A二七八五八号）在营里住了半年，被苏联军队救出的时候，她的体重只剩了五十磅。这样的情形是很多的。陈列室里面挂得有这种瘦得没有人样的活尸的照片。还有一张纳粹医生自己照的四个男孩的裸体照。我们中间没有谁敢走到前面去，仔细地看它一眼。这些小孩已经不活在世界上了。但是就在现在，那四对眼睛里，还射出来饥饿的光芒。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四个孩子的鬼魂。

其实在奥斯威辛，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最坏的。那些被关在“饿牢”里面的囚人还得羡慕他们呢。“饿牢”里监禁的是那班逃走时被捉住了的囚人。人很少有机会从这样的“地狱”里出来。可是有一次一个囚人居然活着走出了“饿牢”，而且把他的见闻告诉了世人。他这样说：“门一打开，人便闻到一股可怕的腐尸的气味。等到我习惯了黑暗之后，我看见一个角落

里有一个囚人的尸首，他的内脏都给拉出来了，另一个人的尸体半靠在他的身上，这也是一个囚人，他手里还拿着他从他那死了的同伴的身上挖出来的肝。他正要吃这肝的时候，就死掉了。”① 这样的事是任何人的脑筋所想象不出来的！

另一所房屋的号牌上写着“人民的谋杀”。在这里我们看出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布置上所花的心血。这是纳粹暴行的总清算。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总结帐。许多的引证，许多的照片，许多的图表……给我们说明了：国社党（纳粹）的成立，它的背景，它的组织，它的发展和它的罪行；也说明了：希特勒的历史，他的野心，他的阴谋，和他的征服世界、屠杀人民的“奋斗”②。在这里我们知道了是谁帮助了纳粹的发展，是谁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是谁支持了“第三帝国”的建立，是谁让德国重整了军备。在那几个帮助希特勒建立王国的大资本家中间，我看到了美国的亨利·福特和英国的H·狄特丁的名字。而且前些时候在西德被美国占领军释放了的奥斯瓦特·波尔将军③ 正是奥斯威辛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有图表和文字说明他的罪行。

罪行多得没法计算，每一个数字都是用许多人的血和许多女人和孩子的泪写成的。这简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的被毁灭的家和被残杀的生命。一张大幅的图表上写明：纳粹把十八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政治犯和战俘集中在奥斯威

---

① 《德国人在波兰的罪行》第一卷里面有着这样的一段话。

② 希特勒著了一本叫做《我的奋斗》的书，暴露了他的征服世界的野心。

③ 奥斯瓦特·波尔将军：（Oswald Pohl），党卫军的一个大头目。

辛，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死去。这十八个国家是挪威、苏联、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在残余的档案中人们还发见囚人的更多的国籍：英国人、美国人、瑞士人、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还有中国人。中国的什么人呢？怎么会落到纳粹的手里去？说明员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

罪行的确多得没法计算。屠杀之外还有抢劫，这是大规模的强盗行为。奥斯威辛的一个党卫军军官弗立兹·柏格曼(Fritz Bergmann)曾经说过从奥斯威辛的犹太人那里拿走的贵重物品价值十亿马克。这些物品都是送到德国国库去了的，其实它们的价值要超过柏格曼的估计多少倍。纳粹另外又修建了三十五个特别的仓库来分类储藏和包扎他们从囚人身上抢来的别的赃物。后来在他们仓皇撤退之前，他们把二十九个仓库连里面的贼赃一块儿烧得干干净净。在剩下的六个仓库里面还有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件整套的男人衣服，八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五套女人衣服，五千五百二十五双女人皮鞋，三万八千双男人皮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张毛毯和别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上面还保留着出品商店的商标，所有被希特勒征服的欧洲国家的名字都鲜明地印在那里。在营里的残余档案中人们看到纳粹党卫军的班长奈痕巴赫(Reichenbach)的报告，上面记载着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月十五日这一个半月里面，一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二十二套小孩的衣服和内衣，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套女人

的衣服和内衣，二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套男人的成套衣服和内衣从奥斯威辛运到德国去。这真是历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抢劫了。

除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外，我们在陈列室的白色墙壁上还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全部血腥的记录。这些罪行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了，殖民地上的屠杀，争夺市场的战争，大规模的轰炸，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过的。对有色人种的迫害，对劳动者的无情的榨取，对争自由运动的残酷的镇压，对未开化民族的有组织的“歼灭”……这些我们也听说得太多了。上海南京路上的屠杀，四川万县城的被炮轰，……这些都是我们身受目睹的。上海的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完备的帝国主义罪行的展览会。但是今天上海也已经站起来把一百年来压在它头上的魔鬼赶走了。整个中国也已经站起来把帝国主义的魔鬼赶走了。所以站在那些梦魇般的照片的面前，我们可以昂起头吐一口气，而且可以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它们。

最后的一所房屋给人带来安慰，带来希望，带来光明。门前也有一行波兰字：“保卫和平的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看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扩大。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串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这里都有大幅的照片和图表来说明它们。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这里也有照片和图表来表明它们的辉煌的成就。连两天前刚刚在华沙闭幕的二届世界和大的照片也已经有系统地陈列在

这里了。那些善良的面孔，那些热烈的情景，它们在我们的眼前显得多么亲切。我们可以叫出许多熟习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说出许多动人的详情。我们从那里来，我们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场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诚的心，今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它们。"和平战胜战争"，我们在华沙天天听到这一句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管希特勒和他的党徒怎样在波兰组织了四个大毁灭营，三个大集中营带毁灭营，四十四个小集中营，十五个输送营和无数的劳动营，用种种方法来杀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焚尸炉①中烧毁了将近一千万人的尸体②，但是结果希特勒自己也死在柏林的一个地下室里面，一部分的纳粹党徒被绞死在纽伦堡的绞架上，连曾经到过奥斯威辛视察、核定了扩充计划的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也不得不服毒自尽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没有毁灭和平，倒是和平的力量毁灭了它。希特勒并不曾灭亡波兰，他反倒促成了波兰的新生。

这个博物馆叫做"几百万人的毁灭"。但是我看完了整个的博物馆以后，我对人类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它反而加强了。几百万人并不曾白白地死去，他们的纪念也在保卫世界的和平。

四 真正的杀人工厂

从集中营出来，我们又坐上那两部大汽车，到布惹秦

① 这是说在波兰的七个毁灭营中的全部焚尸炉和焚尸坑。

② 这只是一个估计。

加去。

布慈秦加毁灭营又被称为奥斯威辛第二，因为纳粹先在奥斯威辛设立了集中营，后来才在它附近的布慈秦加添设了毁灭营。毁灭营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杀人工厂。我们已经在奥斯威辛看过了它的焚尸炉的照片和毒气房的模型。现在我们又到真正的杀人工厂来了。

奥斯威辛是一个潮湿的盆地。它那满是沙粒和小石子的地面就一直没有干的时候。它四周有好些鱼池，水是死的，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常常发出恶臭来。这是一个传染疟疾和伤寒症的好地方。布列斯劳①大学教授陈加（Zunker）奉命化验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饮水，他给希姆莱上的报告中说，在奥斯威辛用的水连漱口也不相宜，而且连用一次都不行。毁灭营建筑在布慈秦加的沼地上，地理环境不会比奥斯威辛好一点。有人说布慈秦加原是一个养马的地方，但我看那里的潮湿有毒的空气对马也不合适。房屋是在一九四二年新建的，以后又陆续扩充几次。房屋的形状跟马房完全一样。我已经看到了照片：一个男人房间住五百四十人，一个女人房间住一千人。它们比马房还不如。没有窗户，没有光亮，不通空气，地是潮湿的土地。我又见过一张照片：许多条魔手似的铁轨通过毁灭营的大门一直向各个焚尸所伸过去。

可是整个毁灭营如今就只剩了一些破烂的监房。那许多条铁轨，那堂皇的门面完全看不见了。我看过一篇记载，知道

---

① 布列斯劳：它的波兰名字是伏洛次瓦弗（Wroclaw）。

第一座旧式的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改做了防空洞①。第四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烧掉了。第二和第三焚尸所的设备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纳粹匪徒拆下来搬到另一个集中营去，建筑物也被炸毁了。第五焚尸所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夜里纳粹撤退的时候烧光，连墙壁也炸掉了，今天我们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毁灭营，却只看见一片荒凉。

包含着毒气房和焚尸炉的焚尸所是建筑在地底下的，以前人在这里可以看见整天冒烟的烟囱。现在我的脚踏在焚尸所的顶上，我只觉得我在一条年久失修的水门汀路上走着，我只觉得我在一间倒塌了的仓库顶上走着。我俯下头，便看见

---

① 一九四一年夏天，纳粹屠户们开始在奥斯威辛试用毒气杀人的方法。地点在十一号房的地下藏煤室。被害人是二百五十多个病人和六百多个战俘。等到这些人全部进去以后，纳粹屠户们就用土把地下室的窗户全盖上，然后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党卫军打开毒气罐，把毒气倒在地上，就锁上门走了。第二天下午党卫军上尉帕立奇(Palitsch)戴着防毒面具打开门进去，看见还有少数囚人仍然活着。于是他们又放了毒气进去，锁上门，过了整整一天，再进地下室去看，所有的人全死了。以后便在第一焚尸所附近修造了第一间毒气房。面积一共是七十八方码。房门都是不漏气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洞孔，就由这里放进毒气来。这以后毒气杀人的方法更"进步"、更扩大了。在这年秋天在布惹秦加树林中一个农家小屋里成立了一个原始的毒气房，叫做"地下室一"，又在一又四分之一公里外另一个农家小屋里成立了第二个原始毒气房，叫做"地下室二"。到了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希姆莱视察以后，便开始建筑四个现代化的包含着毒气房的焚尸所，由艾尔福城(Erfurt)的 J. A. 托福公司承造，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就完成了。

第一个小规模的焚尸所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在奥斯威辛完成了，那是奥国军火库的旧址，起初纳粹的屠户们把他们杀死的人的尸体全埋在布惹秦加附近的树林中。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尸体腐烂，发出有毒的恶臭，使得纳粹的屠户们不得不把那些"万人坟"挖开，将残余的尸体弄出来火化。因此他们才有建筑大规模的焚尸所的计划。

裂缝和铁筋。我可以把一只手伸进缝里去，但是我却没法使那些炉子和那些房间在我们的眼前重现，让我们详细地知道它们怎样吞食了那五百万无辜的人民。有些地方还挂着花圈，鲜花给荒地添了一点“生”意。大概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哀吊他们的死者。人是杀不尽的，每个死去的囚人都有亲友！

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看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

我默默地望着它们。它们刺痛我的眼睛。可是我却不能把头掉开。“它们也曾经是跟我一样的活人啊！”这个念头折磨着我，一直到我跟朋友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又去参观监房。那些破烂的房屋使人觉得它们是荒废了的养马处。房里没有一样东西让人想到在这里曾经住过了上千的人。在这里没有图片，没有模型，也没有任何的陈设。我们看到的不论男监或女监，全是些盖着屋顶的空地，男监和女监自然是分开地设在两处。毁灭营的面积一共是一百七十五公顷，所谓“希姆莱城”(Himmlerstadt)就在这里，当时它是一个繁盛的奴隶城和死亡城。现在就只剩这些破屋和纵横交叉的电网了。从许多文件中，从见证人的叙述中，从焚尸所的残迹上，我们知道德国屠户们曾经企图消灭他们的罪行的一切痕迹。可是现在那无数的白色骨粒就在向世人控告他们。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它们告诉了世人：法西斯主义究

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天色仍然阴沉。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波兰的冬天的日子是相当短的。我们不会在这里久留了。火车还在站上等待我们。阿来克斯在催我们走。我把告别的眼光投在这一片荒凉的"墓地"上。我想起那几百万被杀害的生命，我想起几年前在这里的生活的情景；我想起那些人，他们被纳粹到处追来赶去，在欧洲各大城市里飘流，最后被骗到这里来，德国政府说是送他们到波兰和南俄去就业，可是一下火车他们就让人送进了毒气房，东西全给抢光，身体变成了焚尸炉中的灰土；①

①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犹太人在精神与肉体两方面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和侮辱，在经济上又遭受到种种的勒索和敲诈，而且被强迫着在欧洲各城市搬来移去，找不到一个安定的地方，所以听说在波兰和乌克兰有各种工作留给他们，他们便很容易地给骗到奥斯威辛来了。《德国人在波兰的暴行》里还说："盖世太保（Gestapo即纳粹特务）甚至跟希腊籍的犹太人签订了购买乌克兰小租地和商店的合同。其他的人也得着允许去交换那班关在英国的德国战俘，所以他们一到奥斯威辛马上就问：到英吉利海峡还有多远。他们动身来这里的时候，别人劝他们把工作衣服和一切贵重的东西全带在身边，并且告诉他们说，他们在他们的新家里也需要这些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做他们自己那一行生意或那一门职业。因此奥斯威辛就成了各种工具、医疗器械和其他的有用的、值价的东西的大仓库了。每次火车到了奥斯威辛，停在集中营支线的站台上的时候，犹太人全被赶下车来，他们的行李堆在站台上，另有一队由囚人组织的特别工作队来把这些行李搬到一些大仓库里面去，这些仓库叫做'加拿大'，这个名字还是囚人给它们起的，因为它们里面的贮藏品是太丰富了，后来集中营的行政当局也就正式采用了这个名称。同时党卫军的医生们便到站台上来，在那些新到的犹太人中间挑选了少数适宜于做工的年轻人，而其余的人就立刻被送到毒气房去处死了。所以最先被害的人就是病人，老年人，怀孕的女人，拖儿带女的女人。倘使焚尸所一时容纳不了这许多人，他们就让人关在营里，作为一种储蓄品，不在囚人名册中登记，只要等着焚尸所一空，他们就给人送去毒死。……"

我想起那些人，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尽侮辱，在纳粹的工厂里耗尽他们的体力，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焚尸所；我想起那些被拆散的家庭，父亲眼看着儿女，丈夫眼看着妻子被人从自己的身边活生生的拉开，带进毒气房去，自己却不得不为那些杀死他们亲人的仇敌工作卖命①。我又想起那个整日不断的进毒气房的行列：从别处送来的那些命运已经决定的人直接由火车运去；从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囚人被党卫军押着徒步走去；身体虚弱不能走路的囚人便由卡车载去。我想着，想着，我知道那详细的情形：从火车站月台（就是我们下车的那个月台吧！）到毒气房中间还有一段路，这路永远被囚人的行列连接着，因为人们得等待毒气房里出清尸体。路中间还有卡车来往，专门搭载那些从铁路来的老、幼、病、弱的人。路旁两边的沟里站了许多纳粹党卫军，用机关枪对

---

① 一〇二一六〇号囚人崔汗诺威次基(Ciechanowiecki)后来供称，一九四三年三月九日从巴黎附近运来一千两百个犹太人，集中营里只留下一百四十，其余的全送到毒气房去了。另一个囚人谢拉马·德拉公(Szelama Dragon)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到奥斯威辛，同来的人一共是两千五百，可是只有四百人进了集中营。其余的全给毒死了。

根据布惹秦加的B2营里一个区的统计数字，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这一年中间，一共到过七十六次装运囚人的火车，可是只有七千二百五十三个人留在营里，其余的两万四千六百八十八个人都给送进毒气房去了。所有的女人和小孩全没有留下。

一个叫做雅可布·戈登(Jakob Gordon)的囚人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到奥斯威辛，他们一共是三千六百五十个人，可是只有三百四十五个人留了下来。其余的人连戈登的妻子，他的四岁半的儿子，他的七十三岁的父亲和六十四岁的母亲在内，马上就进了毒气房。

着他们瞄准。一个党卫军大声对囚人说，他们身上太脏，必须进浴室去洗澡消毒，才可以到集中营里居住。囚人们进了焚尸所的天井就被赶进“化妆室”去，在那房间的门上人用德文写着“洗浴与消毒室”（Wasch und Desinfektionsraum），也附得有别种文字的译文。在“化妆室”里还有记着号码的挂衣钉。纳粹党卫军还嘱咐囚人要牢牢记住那些挂衣钉的号码，以后取回自己的衣服可以方便许多。脱完衣服，他们又被带到一个走廊上去，这就是通毒气房的走廊了。毒气房里已经生过了焦炭盆。这热气可以使狤化氢更容易蒸发。这时候纳粹党卫军就露出了真面目，用棍棒打人，支使狗咬人，强迫两千个囚人挤在一个只有二百五十方码的地方。毒气房的天花板上也装得有淋浴的“莲蓬”，可是从来没有水从那里流下来。天花板上另外开得有四个特别的洞。门一关上，房里的空气也被抽出去了，毒气（狤化氢）① 就从那四个洞里放进来。毒死这一个房间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钟，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减少为十分钟。等到门再打开时，死者都现着一种半坐的姿势。尸体是淡红色的，身上现出来红的和绿的点子，有的人嘴上带着白沫，有的人鼻孔流血。许多的死尸睁着眼睛，许多的死尸紧紧搂在一起。大部分的人都堆在门口，只有少数人留在毒气洞底下。……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啊！我

① 毒气罐是党卫军的医生用画着红十字的车子运进来的。有一种开毒气罐的特别钥匙。放毒气和放毒以后关上洞口的盖子，这一类的工作是一个纳粹特务担任的，他当时戴上了防毒面具。

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对着这荒凉的几百万无辜的死者的“墓地”，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然而我能够默默地走开吗？我迟疑着。

就在这个时候阿来克斯来给我帮了忙。他走过来催促地说：

“快走！别的代表团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到克拉科去。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立的钢铁工业。我们正在那里建筑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我们波兰人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们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跟着他走了。

我们又坐大汽车回到火车站去。在那里有着成群的波兰青年捧了鲜花在等待我们。我记起了一个亡友的遗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

古城克拉科*

从奥斯威辛到克拉科，我们只坐了两个钟头的火车。在这么短的距离以内，我看到了两个世界。毁灭营里的金黄头发和白色骨粒一直压在我的心上，压得我快要透不过气来。但是突然间，火车停在克拉科车站上了。

鲜花、旗帜、亲切的脸和欢乐的声音来迎接我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伸过来许多温暖的手。我一点不觉得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的确，克拉科对我并不是陌生的，不单是因为在车站外面我看到了无数的充满友爱的笑脸，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它的传说。我在华沙还看过波古斯瓦夫斯基①的名剧《克拉科人和山地人》(一七九四年)，我喜欢那些姿势优美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发表时题为《克拉科》。

① 波古斯瓦夫斯基：(W. Boguslawski，1760—1829) 被称为"波兰戏剧之父"，他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个演员。《克拉科人和山地人》一名《假想的奇迹》，描写了克拉科的风俗人情，当地人的恋爱和结婚，又写了克拉科人和山地人中间的隔膜和最后的和解。据波兰人自己说："这个戏充满着进步的倾向和政治上的讽示，大大地鼓舞了当时华沙的革命的空气。"这个戏是一个四幕的通俗小歌剧，戏里有许多支歌，由意大利音乐家司特番尼(J. Stefani)作曲。

跳舞和颜色鲜艳的衣裳。

在大饭店三楼过道上一个玻璃橱里，陈列着三格美丽的玩偶，都是些穿克拉科民族服装的少女。就在这一层楼的一个房间里，我坐在宽大的圈手椅上，望着屋角那个方形的棕色大火炉，这是陶器，上面布满了花纹，应当是相当古老的东西了。我抽着从华沙带来的波兰烟，我想起了克拉科的古传说：在瓦威尔山脚下，有一条龙，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它伤害人命，毁灭地上的财富，成为那个地方的大灾星。有一天，一个叫做克拉克(Krak)的人杀死了它，替人民除了大害，人们为着表示感激，就拿他的名字做了城名：克拉科(Krakow)。

这个城市的确有长久的历史，它还是在第十世纪建筑起来的。而且作了将近三百年的波兰京城，到一六〇九年华沙才成为首都。有着将近六百年历史的克拉科大学，曾经一度是东欧文化的中心，现在它还是南部波兰的最高学府。克拉科不比华沙；它被苏联军队解放得快，没有遭受到纳粹的大破坏。所以这个城里还保留着一些美丽的古建筑物，例如圣玛丽亚教堂，那个哥特式古教堂（十四世纪后半期）的两座钟楼还在向世人讲一个悲惨的故事①。较高的那座钟楼的尖顶上到今天还戴着一顶金王冠。

一个阴暗的早晨，我和我们代表团里那位气象学家出了旅馆，朝圣玛丽亚教堂走去。我们把那个穿过金王冠向着天

---

① 传说当时修建这两座钟楼的匠人是两弟兄，其中有一个更聪明，更勤快，他先修好了钟楼，引起了他的兄弟的妒忌，因此被谋害了。（见N·希尔的《波兰和波兰的问题》）

空伸上去的黑灰色尖顶望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到市场去。天开始下着蛛丝一般的细雨。这市场也应当有很多的年岁了。从那个圆拱门里不断地有人进出。门前是一个广场（这也不是近代的大广场），广场上，离市场不远的地方，稀疏地摆了些小小的卖花摊。成群的鸽子飞来飞去，它们安闲地在广场上散步，没有人赶走它们，它们也并不因为人们走近而自相惊扰。广场外一边是电车轨道。电车驶过的闹声也扰乱不了那些小生物的闲情。这是一个多么安静、和平的环境！

“还有时间，我们到那里去看看，”朋友提议说。

“好。我们的确到了古老的欧洲城市了，”我这样回答。

我们走过电车道，上了广场。雨已经住了。几个波兰老太太穿着朴素的衣服，包着头布，坐在花摊前面。我们走过一个花摊，老太太亲切地对我们微笑。连鸽子也不把我们看作陌生人，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结伴游戏。一只白鸽从对面高高屋顶上飞起来，它叫我想起那个别在我的上衣领口的和大纪念章：眼前这个小生物起飞的姿势很像现代大画家毕加索的和平鸽。鸽子正是这个和平的古城的象征。

我们走进了市场。在圆拱顶下面，两旁陈列着货摊。挂的，摆的，堆在一块儿的全是克拉科的土产，那么多的精致的手工业产品。这里是纸做的提包，那里是雕花的木盒。这里是各种样式的木头的烟嘴、烟盘，那里是表现本地人民生活的男女老幼的玩偶。这里是色彩鲜明的克拉科城徽，那里是花朵般的别针。雕刻着本城风景的镜匣摆满一个摊子。装饰着彩色雕花封面的纪念册叠成高高的一堆。谁买一个镜匣，一

个木盒，或者一本纪念册，那个中年的售货人就当着他的面，用一把雕刀在底面刻字，那只受过训练的快手可以马上刻出“克拉科”和年月日，或者任何人的姓名来。

我到这个市场来过三次，后面两次是陪朋友们来买东西的。市场并不大，就只有这个笔直的长廊。那一头也是一个出口，人也可以把这里看做一条过道。早晨和下午逛市场的人并不多。到傍晚许多人都来了。我们团里的人来的也不少。我们不是一块儿来的，我们是分组来的，五六个人一组，有的先逛了百货公司，有的先去了文化宫。百货公司和文化宫都在这附近。可是我们在这市场里“碰头”了。在这里我们成了好奇心的对象。不论我们停留在哪里，总有一群年轻人跟着我们，围着我们。有的同志被看得脸红，也有许多同志用微笑去回答那些亲切的注视。“没有关系，让他们多看看吧，”有人提议回旅馆去，我就这样说。因为朝我们这边射过来的眼光全是和善的、友爱的眼光。“中国人？朝鲜人？”他们用波兰话问道。“中国人，”我回答，于是一个传一个，到处在说“中国人”。

我想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在巴黎乡下一个地方，许多法国孩子跟在我和一个朋友的后面大声嚷着：“中国人，中国人！”那种侮辱的声音使我脸红许久。可是今天我听到了亲切的、友爱的声音。“中国人”不再是跟“胆小”、“无耻”、“贪利”、“无能”等等连在一块儿的字眼了。在这里，在波兰，“中国人”的意思只是“从远方来的亲爱的弟兄”。以前在波兰，尤其是在克拉科，是不容易看到中国人的。现在波兰人从报纸和书本上知道了许多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

我们在克拉科的第一个晚上，听到了这里的第二十二次交响乐演奏会。在休息时间里我们也受到听众的包围。好些人临时出去买了说明书来，请我们在上面签名。坐在我前排的一个年轻女人会讲几句法国话，她掏出她的工作证，请那个坐在我右面的朋友写上三个中国字。整个的休息时间都在“签名运动”中过去了。没有得到签名的人，都露出一点惋惜的表情。在克拉科，似乎每个波兰人都热诚地欢迎他的从远方来的中国的弟兄。

我们在克拉科就只住了这么一个夜晚。第二天的午夜我们搭原车回华沙去。睡在那个陈设着古老的大火炉的房间里，我做了一夜的怪梦。我在梦中挣扎得厉害，终于带着叫声醒过来。这天上午在集中营和毁灭营里看见的一切，一直没有离开我……那些头发，那些照片，那些假手假脚，那些小孩的皮鞋。……

但是第二天早晨从市场散步回来，我已经摆脱了那些阴影。在楼下大饭厅里用早餐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朋友们的愉快的谈笑。那时候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参观克拉科的新建设，那个被称为“Nova Huta”① 的钢铁厂和它的那个照社会主义计划建筑的工人宿舍了。

我们分坐在两部大汽车里。汽车缓缓地穿过克拉科的古老的市街，驶出城去。车子在泥泞的道路上颠得并不厉害。波兰友人在车中对我们解释新波兰的建设情况。我注意地听着

① “Nova Huta”：新的炼钢厂。

他的话，不觉得窗外的树木或田地早已完全消失了。汽车停下来，另一部车子已经停在我们的前面。

汽车门打开了。可是阿来克斯不让我们下车。只有他一个人下去。在一座红砖砌的大楼的门前竖立着一个布告牌，就在这布告牌旁边，他正在跟三个波兰人谈话。过了一会儿，他陪着一个人上车来了。

“他是这里的一个工程师，他来给我们解释这里的一切情况，”阿来克斯说，他把这个颊上留着须根的中年人介绍给我们。在招呼或握手之后，工程师坐下来。接着车子就往前开动了。

路的两旁全是一样的红砖砌的大楼，它们都是新建筑的，有的房屋还没有拆去前面的架子，有的窗口或屋顶上还有人在工作。它们并不是紧密地靠在一起的，两座大楼的中间还有一段距离。的确一个新的城市在空地上建筑起来了。

汽车缓缓地前进（它比先前驶得更慢了），工程师也用平静的声音给我们解释在这一大片空地上发生的事情。他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用英语翻译，再由一位同志译成中文。

这个新城是去年（一九四九）六月动工的，参加建筑工作的人一共是一千五百：五百个工人和一千个青年。先造一百五十所房屋。有七十八所房屋快要完成了，里面有六所这个月底就可以使用。每所大楼可以住二十家人，每一家有两间或三间屋子，另外还有厨房、洗澡房和地下洗衣室。每十五所大楼算一个区。每个区里面有一个小医院，产科医院，百货公司，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还有一个大的洗衣所，还有图书馆，

文化宫，书店，电影院，俱乐部。整个新城一共有四十八平方公里，预备住十万人。建筑计划预定在六年里全部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工人城，因为这里住的全是钢铁厂的工人。我们还要筑一条三十公尺宽的公路，”工程师带着满意的笑容说，“在新的波兰，工人可以过着好的生活了。可惜时间不多，而且路又烂，我们今天不能够去参观钢铁厂。钢铁厂里头另外有托儿所。”

工程师又谈到建筑新城的情形。他说：“在波兰一个熟练的建筑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可以砌一万九千块砖。可是最近在这里有一个青年打破了这个纪录。现在在这里工作的人数已经增加许多，熟练工人的数目加到三千，青年也加到了六千。预计明年会有五万人参加工作。在学校念书的青年暑假期间到这里来工作。毕业学生便可以正式参加。乡下来的工人中间有不识字的，每天还有两个钟头学习文化的时间。以后还有学习技术的时间。”

我们中间有一位女同志问起这里有没有女工参加，“有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就是女同志造的，”工程师回答。

我在汽车里看完了这个在建筑中的工人城，不由得想起十九世纪初期那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的理想。加贝的“意加利”① 和傅立叶的“法南市”② 只是一些过去的善良人

---

① “意加利”：(Icarie)，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加贝(E. Cabet, 1788—1856)的理想国。

② “法南市”：(Phalanstère)，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 Fourier, 1772—1837)的理想中的共产社会的组织。

的幻想，但是现在它们被人具体地、科学地而且更合理地实现了。在这里我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光辉。

汽车准备驶回克拉科古城的时候，工程师跟我们握手告别下车去了。我们感谢他的详细的说明和诚恳的态度，我们也感谢他让我们看见了克拉科人民的伟大的成就。他跟我所见到的每一个波兰人一样：朴素，结实，富于信心，而且充满朝气。他们全爱他们的新国家，并且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要把他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好。

我们的汽车一直驶到王宫门口。这是好几百年以前的波兰故宫了。建筑的规模并不大。在三国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个地方落到了奥国侵略者的手中。宫里国王的宝座也早被搬到维也纳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复国时也没有能把它找回来。据说在纳粹占领克拉科的时期中，这个放宝座的大殿便是纳粹头目的电影室。现在墙壁上还留着好几个方形的小洞。

宫里冷得很。墙上挂的许多王族男女的画像都现出冷冰冰的面孔。连光滑的地板也射出逼人的寒光。跟那个充满生气的工人城比起来，这里简直成了高贵的囚牢了。

我从这里回到旅馆，已经是午后一点钟了。我又坐在老式圈手椅上面，我又望着那个棕色大火炉，我又想起克拉科的古传说，那个毒龙的传说，然后我又想到正在建筑中的社会主义的新城。这时我忽然记起了两天前在华沙读到的书里的一段话：

不管战争的毒龙怎样吼叫，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克拉

科的城郊建设了一个欧洲最大的炼钢厂。当我们想到会有千万吨生铁不断地从那个新工厂的熔解炉中流出来，给我们炼成千万吨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笑了。……

这就是克拉科人对战争毒龙的答复。每一个克拉科人都记得他们的光荣的城名的来源。他们骄傲他们有过杀死毒龙的祖先，他们自然也会承继他的光辉的事业。

1951年1月在上海。

《灰阑记》*

我们在克拉科看了一个中国戏，就是瓦吉斯瓦夫·多布洛渥尔斯基(Wladyslaw Dobrowolski)教授改编的《灰阑记》。多布洛渥尔斯基教授是当地的一位汉学家。他也许能念中国书，可是他不会讲一句中国话。他的大皮包里面有一本日本话字典，是袖珍本，我只看见那深蓝色的封面，却没有看清楚上面的字。当时他把书从皮包里掏出来，在我们的眼前晃一下，便又放回去了。听见他说这是日本话字典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别的书。

多布洛渥尔斯基教授是一个诚实而有趣的人。他会讲英国话，而且讲得很快。他说话时总是现出匆忙的样子，好像要立刻把所有的话讲完就走开似的。我们到克拉科那天，在旅馆里休息了半点多钟以后，到楼下集合，准备去参加音乐会。那时他到旅馆来了。我们许多人都在楼下。他向我们自我介绍一番，我们就成了熟人。这种情形在欧洲是常有的。而且他来邀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去看他改编的戏《灰圈》，他说这是中国的故事，是一个叫做包拯的官的故事。他给了我们几张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文汇报》。

波兰文的戏单，戏单上没有“本事”，只有“演员表”以及编剧、导演、装置、服装各方面负责人的名字。封面上印了一幅魁星的画，注明：根据中国的民间木刻。戏在国立青年剧院上演。原作者是十三世纪的中国剧作家 Li Hsing Tao。

我们看了戏单，又听了他的简单的故事说明，大家都想不出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有人笑着说：“这不过是包公案罢了。”又有人问那位教授戏是从哪一天起上演的？问话的人也许还以为这个戏是专门为着我们演出的呢。回答是：已经演了七十几场，很受观众欢迎。我们没法抽出较多的时间跟多布洛渥尔斯基教授谈话，因为汽车在门外等着我们，音乐会也在等着我们。

第二天晚上八点钟我和两个朋友参加了当地作家的小规模的座谈会，从文化宫赶到青年剧院时，场子里灯光已经暗下来，正奏着音乐，幕还没有升起。多布洛渥尔斯基教授热烈地欢迎我们，把我们安置在很好的座位上。另外还有六个中国代表比我们先到，他们是直接从旅馆里来的。我们代表团里面好些人对包公案不感兴趣，而且就在这晚上十一点钟，我们得赶到火车站搭原车回华沙去；有些身体差一点的代表需要在旅馆里多休息一忽儿。

幕终于升起来了。布景相当简单，但也不讨厌。我们看见了女主角张海棠的家庭，她的母亲和她的哥哥；然后是那个花钱讨了她去作小老婆的马员外。他们全说波兰话，服装和动作跟我们离得很远，生活也跟我们离得很远，虽然故事是我们熟习的故事。

一个会讲法国话的波兰人坐在我旁边，他给我解释剧情。要是没有他的解释，我看序幕就会莫名其妙。但了解了序幕的剧情之后，即使没有他的说明，我也可以明白整个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了。

第一幕演完换幕的时候，多布洛渥尔斯基教授过来跟我谈话，他从大皮包里掏出一本书来给我看。这是一本旧的波兰书，里封面有长长的一行中国字："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李行道著"。波兰文译者是颜·威卜勒尔(Jan Wypler)。"我就是根据这本书改编的。"他匆匆忙忙地说，我还没有时间对他发表我的意见，场子里的灯光又灭了，他连忙站起来回到后一排的座位上去了。

故事并不复杂，我可以毫无遗漏地把它重述出来。一个姓马的员外讨了歌伎张海棠做小老婆。张海棠在马家生了一个男孩，颇得丈夫宠爱，因此引起了太太的忌妒心。太太私下跟县衙门里的赵师爷相好，反倒在丈夫面前讲海棠的坏话。有一天海棠的在外流浪的哥哥张林来向海棠要钱，海棠听了太太的话把她的衣服首饰托太太交给哥哥拿去变卖。太太出去却对海棠的哥哥说，海棠不肯帮助他，这衣物是太太自己的东西，就用这个方法离间了他们兄妹的感情。等到丈夫回来，太太又对丈夫说，海棠把衣物给了情人。海棠受了丈夫的责骂，也无法辩解。丈夫气得生病，太太跟赵师爷商量好了，把毒药放在药碗里，叫海棠拿去伺候丈夫吃药。丈夫死去以后，海棠立刻被太太赶出马家。海棠向她讨还自己生的五岁的小孩，太太反而说孩子是她生的，并且到县衙门去控告海棠毒死丈夫。

县官苏顺是一个糊涂虫，他相信赵师爷的话，把海棠屈打成招，押到开封府去定罪。但是在押解途中，海棠遇见了她的哥哥张林，终于把真相对他说明白，兄妹间的误会消除了。张林正在开封府当差，便带着妹妹和那两个押解的公差一块儿到包公那里去告状。包公审案的方法很简单，他把马太太、赵师爷和马家小孩都找来了。他叫人在公堂上画了一个灰圈，叫小孩站在圈里面，要两个女人同时过去把小孩拉出圈来。他说谁把小孩拉出来，谁就是小孩的母亲。她们拉了两次，小孩都让太太拉走了。包公叫人打海棠。海棠辩说，她不愿用力拉她的孩子，害怕会折断他的手臂，就是将她打死，她也不肯把孩子拉出灰圈。包公明白了谁是小孩的生母，便逼着真正的罪人认罪。

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这的确是道地的民间故事。我在将近三十年前也曾读过李行道的《灰阑记》(我的大哥有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元曲选》)，但现在已经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不过我相信多布洛渥尔斯基教授改编的本子跟原著不会相差多少，只除了那些在幕与幕之间的插曲。那些插曲完全是改编者加添的，跟原戏并无关系。它们全是些古怪的跳舞，有的是从印度来的，譬如敬神舞；有的是从不知什么地方来的，例如“茶礼”之类，有的在跳舞之外还有歌。总之这完全不是中国的东西。其实几个插曲在这里都是多余的，实在没有增添它们的必要。我把这意见对我旁边坐的那位波兰友人说了。他似乎是副导演，或者是剧院的一个高级职员。他要我多多发表意见，但是我没有多少空时间。因为在休息时间里，有一

个女画家过来客气地要求我允许她给我画像。我自然允许。我在这里受到尊敬，只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从中国来的代表。

关于插曲，波兰友人接受了我的意见。从赵师爷的脸相和装束看来，他应当是一个过去的日本武士。波兰友人对这问题的回答是："照我们欧洲人的看法，这种脸相是属于撒旦型的。我们想象中的魔鬼脸就是这样。我们认为用它来表现坏人是再适当不过的了。"他说得不错，欧洲戏里面的魔鬼的脸相果然是这样的。"不过这不是中国的东西啊，"我这样说，"而且包拯的脸被画成了铜像一样的脸，他说话的神气也不像是一个人。""是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尊敬中国，我们想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可是我们没有材料，不但没有现代的材料，连过去的材料也没有。我们好不容易地弄出这样的一个戏来。我们当作一件严肃的工作在做。我们只好从波兰的书本里找寻种种有关中国的材料。可怜的是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到过中国，没有一个人会写中文，说中文，念中文。我们更不知道十三世纪的中国人做什么动作，穿什么衣服。"他诚恳地说。停了一下他又接下去问一句："你觉得演员怎样？"

"演员么，重要的演员都不错。张海棠演得非常好，她的感情是真的，这的确不容易。我看见好些人哭了。"我也诚恳地回答他。这是真话。张海棠真的在台上流了眼泪。在台下有好些波兰女人掏出手帕在擦眼睛。似乎全场的人都在用严肃的眼光看戏，而且在那些跟他们目前生活相差得很远的风俗、习惯、装束和动作中看出了人类的共同的感情来。尽管包

公坐在那里像一尊铜像，说话时连手也不动一下，尽管那个糊涂县官把两只手插在衣袖里一跳一跳地走出来，尽管赵师爷像一个打败了的日本武士或者穿着东方文士衣服的魔鬼撒旦，尽管县官升堂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些连中国人也不认识的中国字，尽管改编者在原剧中间加上那些古怪的插曲，我看完这个戏，我也受到了感动。张海棠的命运抓住了我的心。我觉得她是我们自己中间的人。她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中国人，不管她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而且她的衣服也并不比我们在自己的古装戏里面见到的更难看，或者更不像中国女人的服装。

这个戏已经演了七十几场，而且似乎还要演下去，倘使我们不帮忙波兰友人找到新的可靠的材料的话，这个戏似乎要永久地演下去。在我们几个看过戏的代表中间，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个人对这戏是抱有好感的，虽然我不赞成那些插曲。但是有一点我却无法否认：要了解现在的中国，看这个戏是没有用的。它至多不过让人知道早在十三世纪，中国就有这样的好戏罢了（在当时说自然是好的）。

散戏时我在走廊上看到《灰阑记》的大幅广告，有着这三个中国字，可是把“灰”字写成了“炭”。而且三个字都像是从小孩的笔下写出来的。我回头把它们望了几次。

是什么东西支持着这许多工作人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面完成了这么一件困难的工作呢？是什么东西鼓舞着这几个演员给那些对他们是非常陌生的脚色添了生命呢？是什么东西把成千成万的克拉科市民拉到青年剧院来聚精会神地

看几百年前的东方古国的“悲剧”呢？

从旅馆到火车站的途中我一直想着这些问题。其实它们是容易解答的。而且当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站在走廊上望着窗外那些挥动的手，我更带信心地对自己说：我找到解答了。

是的，这要不是出于对新中国的敬爱，还能够是什么呢！

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一

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本来决定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英国的设菲尔德(Sheffield)召开，因为设菲尔德是一个钢铁工业的城市，又是英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在战争贩子们普遍地嚷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时候，在那里召开和平大会，是再适当不过的了。

召开和平大会自然是一个和平的企图。可是英国政府却想尽千方百计，阻挠破坏，扣留请帖(筹备会发往中国的三十七件请帖都被扣留了)，割断电话，甚至出动了海陆空三方面的人员，阻止各国的主要代表进入英国国境。因为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国家彼此间已经废除了签证的手续，我们中国人去英国要事先得到护照的签证，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到英国去，就用不着经过这种手续。法国代表、世界和大的秘书长拉斐特(J. Laffitte)已经飞到了伦敦，可是他刚刚下飞机还没有走出机场，就被英国的军警拦住，接着就被逼迫搭原机回巴黎去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第二届世界和大的印象》。

了。意大利代表，世界和大的副主席南尼(P. Nenni)也是到了英国又被赶走的。苏联代表法捷耶夫、爱伦堡、西蒙诺夫和别的许多人，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大部分的中国代表都没有得到英国的签证。英国政府不敢公开禁止二届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它只好假造一些别的理由。它说设菲尔德城容纳不了两千多个客人，没法给那许多代表们找到适当的住处。可是立刻就有七百个工人出来说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家让出给代表们居住。英国政府又说："你们不能使他们住得舒服，你们更没有好的饮食招待他们。"那些工人马上答复它："那没有关系，我们正可以让他们看见我们英国工人住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可是英国政府还是不肯让和大的代表入境。在这种情形下面，二届世界和大实在无法在英国顺利召开，所以和大执行局临时决定把大会延期三天，并且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因为波兰人民一致热烈地欢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到华沙来。

十一月十一日早晨我们在莫斯科得到了这个消息。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到华沙去。从莫斯科到华沙，我们要坐一天半的火车。我们当时倒有点替华沙和大的负责人担心。要在短短的五天半的时间里面布置一个两千多人参加的大会，解决两千多个客人的食、住、行的问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华沙是一个受战争损害最大的城市，德国侵略者把华沙城大烧过三次，被毁的房屋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整个旧城几乎全烧光了。

但是我们到了华沙，在大汽车中看见灯火辉煌的市街，在

现代化的招待所里看见波兰友人的亲切、愉快的脸，那些充满了自信的年轻的脸，我就放心了。波兰人已经在华沙的复兴工作中完成了奇迹，他们一定会完成更多的奇迹。

大会果然在十一月十六日晚上七点半钟如期开幕。一千七百五十六位代表，一千多位来宾、旁听者、记者和工作人员有了一个宽敞的会场，从八十个国家里来的两千多个客人有了舒适的住所。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新的奇迹发生了。这是那许多波兰工作人员用勤劳的工作换来的。他们不休息、不睡眠、整日整夜地工作，居然在五天半的短时间里做完了一般人在五个月内做的事。

二

大会一共开了七天，到二十二日下午七点左右闭幕。会期延长了一天，因为一、发言人数加多；二、政治委员会中讨论《致联合国书》这个重要文件的时候，代表们踊跃发言，一直到早晨四点钟才得到一致的协议。据说政治委员会主席南尼耐心地坐了十二个钟头，没有走动过一次，也没有露出丝毫的倦容。

大会之外还有七个小组会。政治委员会便是七个小组会中最重要的一个。它负责起草大会的两大文件：《告全世界人民书》和《致联合国书》，其他六个小组会的决议的要点也得包含在它们里面。小组会与大会同时举行。小组会由各国代表团自由报名参加，人数多寡不等。小组会会场不在一处，有的

在大会的饭厅，有的在电影室。有时我们开完小组会，还可以回去参加大会。而且小组会常常是在大会进行的中间举行的。我因为参加文化交流委员会，错过了听朝鲜代表朴正爱发言的机会，也没有看见中国代表们举起她、送回主席台去的动人场面。我只看见她站在主席台的长桌上受人欢迎的照片。

小组会使用的语言，有法文和英文两种。文化交流委员会开了第一次会，就跟经济合作委员会合并了。主席是法国代表香伯龙(R. Champeiron)，他可以讲英文，不过他也请了一位印度女代表来担任英文译员。有些代表不懂英、法文，只得临时邀请一两位懂他们的语言而又会讲英文或法文的代表给他们帮忙。有时英国或美国的代表讲话，也由这位印度女代表翻译成法文。她是一个模范的工作者，常常译到口干声嘶，她的脸上仍旧带着笑容。有一次一位墨西哥代表讲话，由一位阿根廷代表译成法文，而这位印度女代表又用法文译了一遍，直到别人笑着提醒她不该用法文来译法文时，她才明白自己的错误，改说了英国话。苏联代表团中参加文化交流委员会的有作曲家萧斯塔柯维奇和电影导演普脱伏金和别的两位。普脱伏金还是这会的副主席，他提出了很好的关于文化交流的具体的建议。后来他又被推举为起草决议的三人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大会发表的关于文化交流的决议中就采用了他的意见。

大会开得很成功。出席大会的代表是那样地多，发言的人也有一百二十位。每一个代表发言，同时有八国话的翻译，

谁只要懂得中、俄、英、法、德、波、意、西八国语文中的任何一种，戴上耳机就可以听懂全体代表的发言，不感到丝毫的困难。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种族和阶级。他们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平战胜战争。在华沙城内许多高大建筑物上面都挂着红底白字的波兰文标语：和平战胜战争。这正是每个到华沙来的代表所想的、所相信的。

这是一个团结、和睦的大会。从大会的全体代表来说，大家都是团结的、和睦的。单拿中国代表团来说，我们也是团结的、和睦的。十月三十日我在北京东站上火车时，我连许多中国代表的名字也叫不出来，可是在华沙，我们相处有如兄弟姊妹。

这次的大会跟一九四九年巴黎一布拉格的大会不同，是一个行动的大会。上次的大会表示了保障和平的愿望，说明了保卫和平的必要。这次的大会讨论了、决定了行动的方法。这次的大会给全世界人民证明了一个事实：和平的力量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可以给世界争取到和平的。所以许多在上次巴黎一布拉格的和大开会时候迟疑等待的人现在都加入到和平的阵营里来了。一千七百五十六个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政治思想不同的正式代表一致通过了大会的重要的决议。这些文件可以说是大会的最高的成就，而且是和平运动的纲领。大会还选出了一个世界和平理事会。这是保卫和平的最有力的领导机构，也就是世界人民的最高的议会。二百二十二位理事都是世界各国的有代表

性的人物。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定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它的力量超过联合国，它的任务也要超过联合国。联合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的宪章，成为杜鲁门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大西洋联盟的附属品了。联合国内并未包含全世界的国家，而世界和平理事会却得着全世界人民的拥护。

这次的大会澄清了那些错误的"等待"和"妥协"的观念。大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用行动保卫和平。两大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反抗侵略。因为在朝鲜已经发生了侵略的战争，朝鲜的人民成千成万地死在美国侵略军队的炸弹下面。和平不仅受到威胁，和平已经受到了打击。要是在这个时候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还不起来保卫和平，那么他们便会遭受到战争的灾祸。所以朝鲜人民的坚强抗战和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英勇行动，得到了大会全体代表的热烈的支持。大会谴责了美国军队在朝鲜的罪行，并且主张组织国际法庭追究麦克阿瑟的责任。大会还通过了合理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和促使美军停止侵占台湾的决议。大会甚至申诉了弱小民族的痛苦，谴责了对世界和平有极大威胁的殖民政策。大会的确是在非常坚实的基础上建筑和平大厦的。

三

这是一个热情的大会，友爱的大会。有人描写正式大会的第一天说："这是一个感情的日子，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微笑，充满了信心……"的确，我们坐在中国

代表席上偶尔掉头四顾的时候，我们看见从世界各地方来的亲切、诚恳的面孔，我们的这种信心更加强了。

那一天实在是一个叫人不能忘记的日子。当主席约里奥一居里宣读他的报告(大会的第一个报告)的时候，整个会场都注意地听他讲话，静得简直听不见一点别的声音。临到他走下讲台时掌声像雷似地响了。代表们全站起来，用掌声和欢呼送他回到主席台上去。老戈登夫人也在这个上午发言，她的颤抖的声音仿佛就在每个人的心上响着。我们的心都给她的话抓住了。她最后说："让我们努力工作，我们要使母亲们以后不会再为她们在战争中被杀害的儿子哀哭了，我们心里以后也不会再有仇恨了，那时我们的心只知道为着幸福与进步养育我们的孩子的快乐。"响彻全会场的掌声表示了人民一致的感动。的确，谁又不曾做过母亲或孩子呢？谁又不曾经历过过去的痛苦，憧憬过未来的幸福呢？

突然间大家的眼睛亮了。会场中出现了虹彩：这是彩色的衣服，波兰的少女们到会场里来了。她们穿着一百年前的衣服，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的服装。在这儿我们看见了整个的波兰。一群穿着色彩绚烂的古装的女子围着一个黑衣的妇人，这是一个波兰的母亲，她来向代表们诉说波兰女人的痛苦和波兰女人的愿望。

她没有流泪，但她的话语却是用多少年的血泪换来的。她说：

"我们波兰女人知道得很清楚，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代表里面没有一个女人不曾失掉她的亲人。在波兰有六百万

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战争中死亡了。现在还有一百五十万的孤儿在哀哭他们的父母。难道牺牲、流血和受苦还没有够吗？”

“我们从这里回家去的时候，我们坚决地相信大会会找到有效的方法保护波兰的母亲和孩子，以及全世界的母亲和孩子，不再遭受到另一个战争的灾祸。”

一个女子带着满捧的鲜花走上了讲台，她说：“我们刚收到从尼斯送来给代表们的花。尼斯到华沙有很长的路。可是那个城市的居民爱和平，因此我便把这些花送给华沙城，为着它对大会的代表们的殷勤的招待。”

“博孤伊！博孤伊！博孤伊！”少女们的清脆的、愉快的声音叫起来，别的人声跟着高呼，响成了一片欢乐的歌声。声音稍停，接着爆发起一阵轻快的拍掌声，好像一大群鸽子突地拍着翅膀飞起来一样。的确，鸽子飞起来了。那是印在和平围巾上面的白鸽。少女们把围巾投向各个代表。我们很奇怪，这么多的围巾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飞着，飞着。得到它的人，女的立刻把它包在头上，男的拿它去围头颈。一切动作都是非常自然的。人们彼此以诚心相见，有如一个和睦家庭里的兄弟姊妹。

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未来世界的远景。

可惜这远景却是在另一些地方的人看不到的。美国代表阿卜好斯(W. Uphaus)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旧金山的小女孩听见她哥哥讲过原子弹的恐怖以后，对她母亲说：“妈，我们可以不可以到一个没有天空的地方去？”

我们不要笑这个美国小女孩，我们应该诅咒那些战争宣传者，他们多么残酷地伤害了纯洁的孩子的心灵。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单是为了孩子，我们也应该起来保卫和平。

后 记*

收在这个集子里面的五篇文章，只是我的“波兰杂记”的一部分。关于波兰，可写的东西应该不只这么一点。可惜我只在那个国家里住了短短的两个星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会场和戏院里面。但是我爱波兰，我爱这个在战争中受害最大，而解放后又复兴得最快，并且已经由农业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大道的新波兰。同时我也爱那许多充满朝气的把我们当作弟兄看待的波兰友人。这几篇“杂记”都是在深夜里写的。当我执笔构思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波兰生活的回忆来搅乱我的思想，常常有一些热烈的友爱的场面来搅乱我的思想，我觉得自己驾驭不了我的这管笔，我不能把那许多应该写的东西一下子全写出来，于是我索性放下笔，让我畅快地在回忆里去重过那两个星期的生活。每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总是装满了那些带着亲切的微笑的脸孔：阿来克斯，达吉安娜，布拉诺瓦，还有一些我一时叫不出名字来的，更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脸孔全是我熟习的。就在这落着雪的上海的正二月的寒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九日《文汇报》附刊。发表时题为《序〈华沙城的节日〉》。

夜里，那些波兰友人的脸孔也给了我温暖。它们不仅暖了我的心，也暖了我的笔。靠了它们，我写完了《华沙城的节日》，写完了《古城克拉科》，写完了《灰阑记》；靠了它们，我也写完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的，跟那些亲爱的友人一块儿欢笑，是容易的；然而要是没有他们的温暖的友情，要是没有新波兰的欢乐的声音，我怎么能够摆脱这鲜血淋淋的记忆，我怎么能够写完这人类受难的记录呢？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里，我不仅写了我亲眼看见的，我还写了书本上详细记载着的。我已经写得很多了，但是我写得还不够详细。真正发生过的事比我所看见的，比我所写的更惨，而且惨得多。有些中国读者也许不肯相信这一类的事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书本上就记载着：起初有犹太人从集中营逃出来，告诉他的一些同胞：纳粹匪徒怎样在集中营和毁灭营里杀人，叫他们不要相信纳粹匪徒的大谎话，听话的人反而疑心他在撒谎。他们终于顺从地给纳粹匪徒骗到集中营和毁灭营去，等到他们发觉受骗的时候，自己已经被关在毒气房里，蜻化氢开始从天花板上的洞孔里灌进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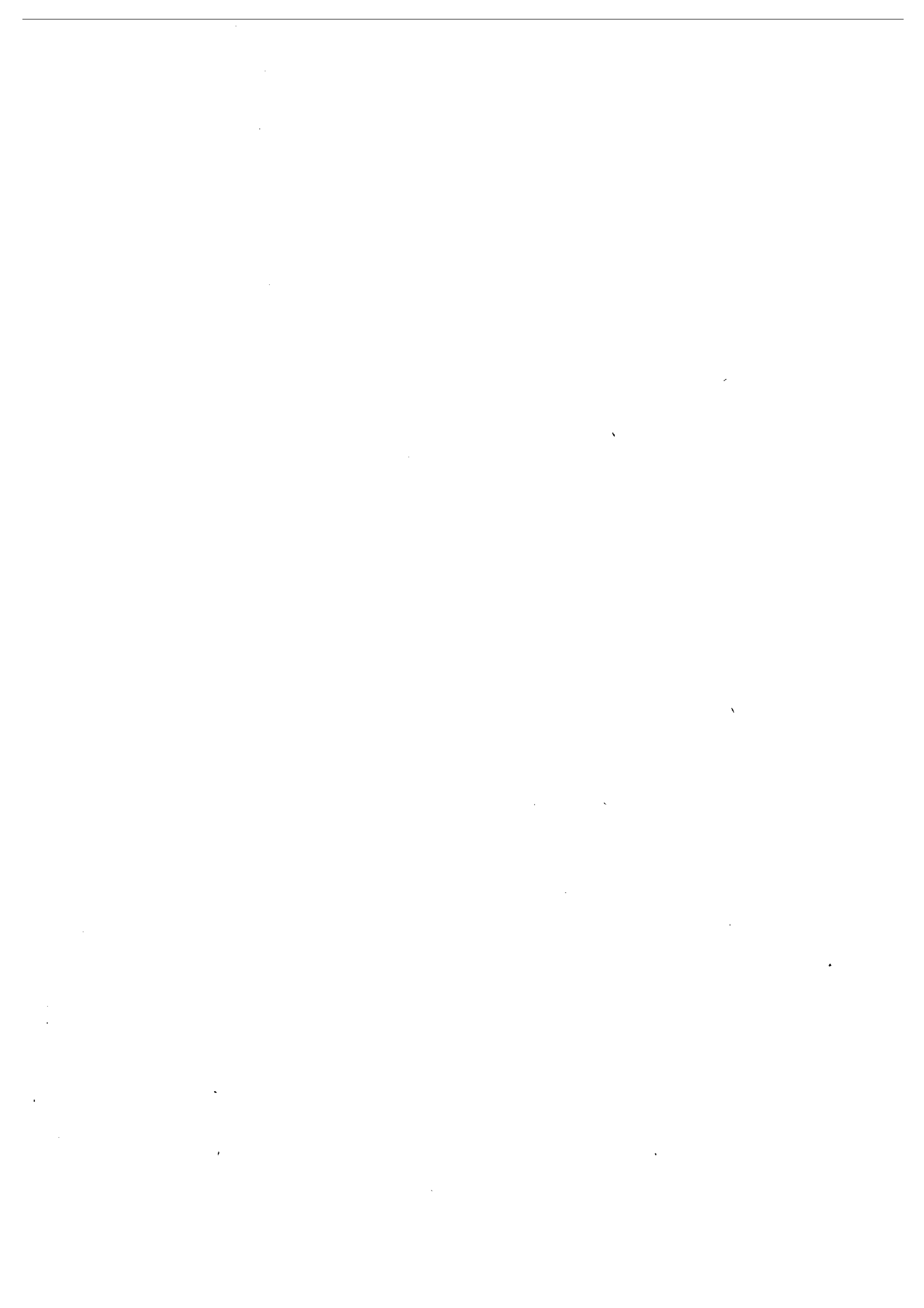
关于集中营和毁灭营，可写的材料实在太多了，因为它们是和法西斯主义分不开的，它们的故事里面也包含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的历史。我还想写一篇《布痕瓦尔特的故事》，那就是整个德国集中营制度的历史了。

"杂记"的第五篇是根据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长路的通车里写好的初稿改写的。二届世界和大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篇简略的介绍文章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我应该写一些更有

系统的东西来介绍这个团结的、和睦的、热情的、行动的大会。

提到二届世界和大，我就想起那一个星期中紧张的、兴奋的生活，我更忘不了那些时候跟我在一起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我手边一本纪念册上还留着他们每个人的亲笔签名。这是友爱的纪念。望着这些名字，我没法制止我的感激之情。我说过跟他们相处有如兄弟姊妹，话里面并没有虚伪、夸张。他们在各方面给了我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在学习上指导过我，在生活上照料过我。在冰天雪地的火车中，他们的友爱给了我更多的温暖。对他们我找不到适当的感谢的话，让我把这本小书献给他们每一个人吧，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友谊的信物，而且在我的每一篇拙劣的"杂记"里面都有他们的面影，是他们跟我在一块儿生活过这些日子，经历过这些场面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跟八十个国家的一千七百多位代表在一块儿拍手欢笑，并且高呼"保卫世界和平！"

巴　金　2月11日夜2时半。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一九五三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同年七月再版。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正午以前见到了志愿军的彭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三反办公室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屋子，却只在靠门的这一头，在低矮的石顶盖下，悬了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橡木板凳。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明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候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

来的。没有挂任何勋章，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地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失了。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了。我们刚坐定，他又带笑说："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我们中间的三个女同志也笑了。他问我们："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们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我们是坐车过江的。"他带笑地纠正说："不，还是跨过的。"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他开头就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能吃苦，能忍耐。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榨取了几十年，现在又遇着像美帝国主义这样强大残暴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在苦难中，因敌机轰炸，有不少的人没房子住，也有缺粮饿饭的，我们应当尽力援助他们。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从朝鲜人他又谈到美国的侵略军。他说："过去我们看惯了日本兵的暴行，美国军队的残忍凶狠只有超过日本兵。所以朝鲜人是那样普遍地恨美国侵略军队。现在他们居然不顾一切用起细菌和毒瓦斯来了。苏联科学家说我们科学家用种种方法要扑灭鼠疫，消灭害人的细菌，美国人反而在各处撒播病菌，这是丧失了人性。我们的战士说：'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会让这些蚊子苍蝇吓倒？'"他的明亮的

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摘下军帽放在桌子上，他的光头上一些很短的白发在电灯下闪光，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使我们记起前一晚上丁处长告诉我们的小故事："彭总在这次'三反'中把烟也戒了。他说：'我假定还活十年，戒了烟，这十年中间也可以替国家节省一笔钱。'"单是这个小故事也可以说明他对祖国的深切的爱。这样鲜明的爱与憎更能够吸引人。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像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们的眼底。大部分的同志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拿右手摸了摸嘴，然后把手放在膝上，继续谈起来。他用关切的口气，用具体的例子说明抗美援朝对祖国的关系，谈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作战的经验，谈到几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分析帝国主义阵营中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阶级中间的矛盾，然后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前途。我们记牢了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反地，敌人始终把我们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判，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痛了。在谈判中间他们还不甘心，又发动秋季攻势，结果还是吃了亏，伤亡十二万人，才又谈起来。现在敌人是进退两难：要打，他们得不到胜利，没有出路；要和，大资本家的暴利又没有了，经济危机也要来了。我们却不然：和，本来是我们愿意的，我们就是为了和平才来作战的；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是越打越强。"听着他的浅明的详细的反复的解

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这一切越是明显。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被他的话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迟。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我只看见眼前的这一个人。他坐得那么安稳，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渺小的。"他甚至谦虚地说："我也常犯错误。拿我一生中做过的事来说，我不过是像毛主席所说的'功过各半'。"他一直从容地谈下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他都谈到。生动，深刻，具体，全面，他就这样地给我们谈了三个钟头。他最后一次把左手从椅背上拿下，挺起腰来说："我的话就完了。我是漫谈，恐怕文不对题。以后再找人给你们谈。"到了这时我们才吐了一口气，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接着他听见宋副司令员跟我们讲话，最后讲到"欢

迎"时，他在旁边接下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是欢迎的。"这一句话使我们的心激动胜过千言万语。我们能够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的感激的心情呢？甘主任在闲谈中对我们说："彭总这句话里头有很深的感情啊。"甘主任是了解我们的。他又说："人都有感情。战士的心是很细致的。有的战士背着炸药让自己生命跟敌人坦克同归于尽，他并不简单。他是有深厚的感情的。牺牲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样的感情，我们不应该让它埋没，我们有责任把它表扬出来，让祖国人民知道。"甘主任是个爱发笑的人，可是这时候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他很激动，他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有感情的人，接触到这样伟大的心灵以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够交出个人的一切吗？……

晚会结束后，我们走出洞来。雪落得更大了。汽车把我们送回到宿舍的山脚下。我们冒雪上山，好不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雪花满天，冷气扑面，我埋头看山下，只有一片白雪。没有一个人家漏出灯光。夜并不迟，北京时间不过九点光景。在祖国的城市里应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吧。孩子平静地睡在床上，母亲安静地在灯下工作，劳动了一天的人也得到了休息。是谁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兄弟邻邦的国土上保卫着他们的和平生活呢？祖国的孩子们是知道的，祖国的母亲们是知道的，全中国的人民都是知道的。孩子们梦中的微笑，母亲们脸上满足的表情，全中国人民幸福的笑容就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他们的指挥员彭德怀将军的感激的表示。

我们向全世界人民控诉*

不管中朝人民怎样词严义正地声讨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美国侵略军仍然毫无顾忌地继续使用残杀人类毁灭文明的细菌武器。我们在朝鲜前线工作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沉默。我们有责任写出我们在这个受难的、英勇的国土上的见闻，诉于全世界人民的良心。我们向全世界人民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要求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这种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进行了九个月的开城—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并没有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希望，给朝鲜带来和平，这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帝国主义者不愿意和平，他们千方百计拖延谈判，阴谋破坏谈判，扩大侵略战争。为了实现这个阴谋，他们现在又在谈判期间用这种凶残的毒计杀害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世界人民应该注意这个在今年一月开始的滔天罪行。今年一月下旬美国侵略军开始在朝鲜的土地上投下大量的带有各种细菌和病毒的昆虫和鼠类。这两个多月来美帝国主义者一面教他们的发言人用花言巧语抹煞事实，企图欺骗世界人民，一面继续在朝鲜

---

* 本篇于收入《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前未全文发表过。

各地散布病菌，甚至把带病菌的蚊子、苍蝇、蜘蛛、跳蚤投在中国的领土。美国的一个战争贩子克利西将军在一篇文章里公开地告诉世界人民：鼠疫、伤寒、霍乱等病菌是比炸弹、炮弹更便宜的武器，用这种“最小的代价”就可以消灭人民，占领完整的城市和工厂。这是刽子手的真实口供，这是对世界人民的极大的威胁。今天投掷在朝鲜各地的东西，明天也可以在欧洲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出现；美帝国主义者今天用来杀害朝鲜人民的武器，明天也可以被使用来杀害全世界的人民。我们并非夸大事实恐吓世人，也不是无中生有，虚言控诉。我们亲眼看见美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国土上布置的阴谋毒计。我们看见在零下十七度的雪地上产卵的带病菌的小苍蝇，我们看见被投在高山上的成堆的死鱼，我们看见从雪地捉来的成千的跳蚤，我们看见带鼠疫杆菌的死鼠，我们也看见美国飞机投掷下来的各种类型的细菌容器……还有那许多带霉菌的树叶，包在纱布里的鸡毛，带病毒的乌鸦和喜鹊，带细菌的苍蝇、蚊子、猪肉、狐狸，以及其他不容易说出名字来的奇怪东西。这些真凭实据，说明一件事实：美帝国主义者不仅想灭绝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人民，他们还想使生长在这个国土上的植物和牲畜一起死亡。他们把自己比作散布瘟疫的恶神，想用枯骨来建造自己的胜利宝座。

现在不是孤立主义的时代，今天也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候。一个地方的火灾，倘使不及时扑灭，就可能延烧到另一个地区。一个城市里发生的瘟疫，倘使不及时消灭，也可能传染到另一个城市。欧洲人应该保留着关于黑死病的痛苦的记忆吧。

整个文明世界为了消灭瘟疫，不知花费了多少人的精力。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今天在朝鲜，不过是一个开端。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威胁。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粉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斗争，也就是为了保卫世界的文明，保卫全世界人民的幸福，这个斗争可能是艰苦的，但是它一定会得到胜利。

我们亲眼看见并且参加了这个斗争，我们应该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提出警告：要是你们不愿意退回到远年黑死病的时代中去，你们就得紧密地团结起来，制裁全人类的公敌、发动细菌战的战犯——美国侵略者，斩断他们的血手。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细菌战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责任。现在是你们来尽责的时候了。

最后，作为在朝鲜前线工作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我们感觉到更有责任跟朝鲜的文艺工作者站在一起，向全世界的作家和艺术家提出要求：要求你们立即起来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要求你们用你们的文学艺术的武器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细菌战的罪行，用你们的良心激动全世界人民的良心。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文明，保卫全世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

1952年4月1日。

平壤，英雄的城市*

离开平壤的那个傍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在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的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言语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嘶车载着我们缓缓地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颓垣，经过那些穿着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的门前，我们的嘎嘶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我们看见了不久以前被敌机打坏的卡车，火还在燃烧，可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来往的车辆在这条公路上飞奔。我激动地想起了那一首歌：《飞吧，英雄的小嘎嘶！》。就是这些嘎嘶车一直在敌机的威胁下跑遍了朝鲜的前方和后方的。

我们在平壤一共停留了四天，我们跟朝鲜的朋友相聚也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一日《人民文学》六月号。发表时题为《平壤》。

就只有这四天。我们进入朝鲜境内已有半个月光景，可是在这短短的四天里我们认识了整个朝鲜的面貌，我们更贴近地接触了朝鲜人民的心。我们在朝鲜人民中间只看见一个决心：争取抗美战争的最后胜利；只看见一种爱：爱他们的领袖，爱他们的英雄，爱他们的朋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在平壤，在这个一片废墟的城市中就充满着这种爱，充满着这种决心。从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将军起一直到在瓦砾堆中挖一个大坑盖一两间小屋住在那里面的朝鲜老太太，都对我们表示了这种爱和这种决心。这是朝鲜人所共有的，也是任何力量毁灭不了的。

在一个朴素而庄严的客厅里，金日成将军坐在我们中间，他用流利的中国话跟我们谈了一个钟头。他亲切、扼要、而充满信心地对我们说明了共和国的情况和未来的远景。他着重地讲到三点。他说："一，朝鲜解放时间虽然不长，可是人民已经感觉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这个制度对自己切身的关系。朝鲜人做过三十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隶，深感到亡国的痛苦，两相比较，绝不愿意再做美国的奴隶。二，朝鲜人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一直在斗争着；那个时候并没有自己的军队也能斗争，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军队，还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党，所以更要奋斗。三，朝鲜人民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立的，有世界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援助。中国人民还派遣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因此朝鲜人民对战争的最后胜利更有信心。"金日成将军把头稍

微向上一扬。他的年轻的丰满的圆脸上露出微笑，笑容中有一种任凭什么力量都不能够转移的坚定的表情。"人民始终有克服困难的信心。政府也有这样的决心。我们对前途有把握。和，我们很高兴；战，我们也不怕。"他用一些数字和一些事实来说明朝鲜人民克服困难自力更生的过程。谈到美帝国主义进行的细菌战，他愤慨地说："我们的老百姓说：'你有办法丢，我们有办法扑灭。'朝鲜人民有办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金日成将军又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说了一些话之后，又说："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关系非常好。人民对志愿军感情很好，朝鲜人把志愿军叫做自己的军队。这是人民的意见。"他用友爱的眼光扫了我们一眼，好像在看自己家庭中的人一样，这眼光比话语表示了更多的意思。谈到后方的斗争时，他忽然兴奋地说："朝鲜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金日成将军说了我们的心里的话。

向金日成将军告辞出来，我坐在文化宣传省奇副相的汽车里，我没法把那些使我的心激动的话告诉奇副相，他不懂一句中国话，我不会做手势，我只有带笑望着他。我想对他说：有这样一个人在领导你们进行斗争争取胜利，你们一定会得到胜利。

在牡丹峰地下剧场里，我们欣赏了朝鲜的古典名剧《春香传》。我们走下一百七十五级台阶，进了这个现代化的剧场。美国飞机在平壤的夜空盘旋的时候，我们同几百个朝鲜友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注视舞台上古代朝鲜妇女的英雄的形象。不受威胁、不为利诱、宁愿忍受苦刑把青春断送在监牢里的少女

春香，正是朝鲜的英雄的妇女的象征。

然而《春香传》究竟是过去的传奇了。到过朝鲜的人，在这个美丽的国土的任何一个角落上都可以看到现代朝鲜妇女的英雄形象。要是你在泉边井畔站一个钟头，你会看见朝鲜妇女接连不断地来取水，她们有的头上顶一个水罐，有的背上缚一根扁担，挑两个水桶。她们同样地穿着船形的鞋子，穿着颜色鲜明的衣裙。要是你在乡村里逗留一些时候，你可以看见朝鲜妇女背着小孩在田里劳动，在公路上挖土修路，你会看见穿红着绿的妇女在茅屋门前三四个人一起用非常简单的方法在纺线。许多脸上涂着污泥的少女在矿山里工作，更多的脸上常带笑容的妇女在工厂里劳动。要是你到过平壤的工厂，比方说国营纺织厂或者烟草工厂吧，你看见就在敌机炸毁的瓦砾和断墙中间，许多女工怀着那么高的生产热情在劳动，她们脸上那种带信心的笑容，她们那双动作快速好像永不休息似的手会引起你的惊讶和赞美。那些得过共和国功勋章的劳动英雄会直率地、诚恳地告诉你她们的英雄事迹，不管她们中间有的年纪不过二十，有的已有三十九年的工龄而且被人称为"阿妈妮"①。你还有机会看见地下的纺织厂，也有机会看见地下的工人托儿所。那些天真的小孩在地底下对你微笑，向你招手。他们不会讲许多话，不会要你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不能见到阳光。但是你会从那些穿白衣的保姆的和善的面容上了解许多事情。

---

① "阿妈妮"：朝鲜话，"母亲"的意思。

你不必到别处去找英雄，也不必去找新奇的事实和带传说性的非常的人。你也用不着去翻读关于朝鲜妇女斗争的记载，论牺牲自己和成仁就义，你在朝鲜妇女中可以找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可是你不能放过这数不清的到处皆是的坚守在后方生产岗位上的朝鲜妇女。她们有着同样的平凡的面貌，同样的乐观的表情。据说朝鲜妇女能忍受痛苦，她们在最伤心的时候也不哭。的确那个春香在受笞刑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就没有哭过一声。就是这样的朝鲜妇女使得平壤城，使得全朝鲜的后方都有了生命和战斗力量。在地下的商场里，她们亲切地招呼顾客。在十字路口，她们站在岗位上吹着哨子挥动指挥棒指挥交通。在瓦砾堆中她们用几根木头、几块木板和两扇门窗在搭建住房。而且是她们用跳舞，用歌声，用笑语来迎接了朝鲜的春天。要是你弯下腰走进一个一半藏在地下的朝鲜的家庭，那个坐在炕上的朝鲜老太太会用笑容来欢迎你，会告诉你她对中国人和志愿军的爱、她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恨，从她的嘴里你听不到一句诉苦的话。她不像是住在一片废墟的中间，她倒像是住在一个光荣的胜利的城市里面。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就在看见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在平壤市的一个地下食堂里，我们的一位女同志举起酒杯来，建议大家为英雄的朝鲜妇女干杯。这是很有意义的祝杯。在这个食堂里工作的也有朝鲜的妇女。这是地下室，上面有一所很漂亮的大剧场，但已经被敌机完全炸毁了，只剩下一个堂皇的门面在向人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

在这个食堂里面，我们有过一些令人难忘的愉快的时间，

在这些时候主人李同志总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李同志是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的副委员长，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主人。他到过中国，至今还怀念着北京。他那很有风趣的谈话通过翻译还能够显出它的特色。他让我们认识了许多朝鲜友人，他还为我们安排了文艺界的座谈会。

文艺界的座谈会是在文化宣传省内举行的。这是一所被敌机炸坏了的大楼，可是文化宣传省一直在这里工作。我们在这里的一间相当宽大的屋子里，同朝鲜的文艺工作者见面，听他们报告他们的斗争经验。我们无拘束地谈着，仿佛是一些久别重逢的亲人。我感动地对他们说："……昨天我跟李同志坐车穿过平壤，看见了被美国飞机炸毁的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的会所，李同志指着瓦砾堆对我说那是十二位同志牺牲的地方。他的一句简单的话给我说明了朝鲜文艺工作者的艰苦的英勇的斗争。朝鲜的文艺工作者不仅用笔，而且用血写成了伟大的诗篇。面对着这种英雄气概，我感到一种严肃的心情。朝鲜的文艺工作者是值得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敬爱的，而且你们有权利要求全世界有良心的作家和艺术家来参加你们的斗争。前晚我们在美国飞机造成的一片废墟中间的地下剧场里欣赏了朝鲜的古典名剧，昨天我们参观了被敌人破坏了的牡丹峰上的中央博物馆，在那个在地下工作的文物保存委员会里我们还看到准备将来重修的古建筑物的图样。事实证明了是谁在保卫文化，谁在毁灭文化。朝鲜人民进行的战争是保卫文化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你们一定会得到胜利的。"

飞奔的嘎斯车突然停下来，驾驶员下车去，把车头的伪装

取开了。车子不打灯，在月光下继续向前奔着。这辆嘎嘶车载着我们走了不少的路。它先前把我们带到朝鲜人民军的部队里去，现在又从那里把我们送回招待所。我们在人民军的军团部里停留了六个多钟头，听了军团长和战斗英雄们的生动的报告。英雄事迹是说不完的，可惜时间限制了我们。许多次热烈的握手，许多次友爱的眼光的注视说明了两个民族中间的深厚的友谊，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话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因为在这些英雄里面就有一些人曾经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流过血和汗。看到朝鲜人民军的英雄，我不禁想起了金日成将军的谈话：今天共和国的英雄就是那些"认识到自己在祖国与人民面前所负的神圣的任务而且很好地执行了这个任务"的和平战士。在每个英雄的笑容上我都看到了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

嘎嘶车继续在山道上奔驰。敌机时不时地从车子的上空掠过，我们只听得见它的声音。在我们的四周，只有山和树，只有溪水和砂石。我们看不见车辆和人群。我们的车子早已走出平壤的郊区，正向着一个安静的角落驶去。我伸出头去看后面，什么也看不见。别了，平壤，这英雄的城市。

4月12日追记。

在开城中立区*

我站在"为朝鲜和平而牺牲的姚庆祥烈士"的墓前，望子男山下。在深绿的松树中间露出盛开的粉红桃花，一汪浅水旁边有几棵抽芽的杨柳，有几块新绿的麦田，对面山脚下村子里走出来两三个穿白衣的朝鲜女人。我把眼前这一片和平的景象望了好一会。这雨后的田野使我想到了祖国的江南的春天。虽然今天早晨还飘过一阵雪，可是在朝鲜三八线上的开城，春天毕竟来了，即使它来得迟，但它终于来了。昨天我还在小学校的操场上看见将近两百个小学生的快乐的笑容，听到他们年轻的歌声。就在这个操场上我也看到开得很好的朝鲜的迎春花。

朝鲜是花的国土，春天到来的时候，满山满野开遍了颜色鲜明的花。可是美国侵略者却用尽方法把这个美丽的国土变成一片虚墟。一个多月来，我经过不少的朝鲜的城市，就难得看见一间整齐完好的屋子。这里却是一个例外。在这里，在我眼前出现了和平的村庄，而且在那一边，在我刚才来的那个地方还有着典型的朝鲜风味的美丽的房屋。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人民日报》。

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就是全世界人民时时刻刻注意着的开城。开城，这个美丽的朝鲜的古城市，和美国侵略军占据的南部的汶山一样，是朝鲜停战谈判中的中立区。朝鲜停战谈判就是在这里开始的。现在的会场区板门店也还是在这附近。白天走出市区，我可以看见悬在板门店上空的四个银色气球。夜晚站在住房的廊上，我又看到那圆柱似的探照灯光笔直地高耸在天空。这几天我住在朝鲜老太太的家里也常常听见飞机声，美国飞机经常飞过这个城市的上空。美国侵略军侵犯中立区的事件也不只有过一次了。但比起时常受到美国飞机盲目轰炸和扫射的朝鲜北部的其他城市来，开城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姚庆祥烈士的墓碑面对着山下的和平景象。就在这墓碑的背面，我读到这样的一段话："……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姚庆祥同志奉命到开城中立区担任军事警察，保卫会场及双方代表团的安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九日在板门店附近巡逻时，遭美李侵略军预伏在该地的武装部队的非法袭击，壮烈殉职。"这一段碑文就说明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所采取的无诚意的态度。姚庆祥烈士牺牲在中立区内，牺牲在执行庄严的职务的时候，他的遗体还躺在这里保卫和平。十个月很快地就要过去了。谈判的会场由开城的来凤庄搬到板门店。全世界人民的眼光正集中在板门店的几个帐篷上面，希望侵略者能够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接受中朝人民的公平合理的和平条件，停止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暴行。可是今天美国侵略者还继续在用一分钟、半分钟、四十秒钟的会议来拖延谈

判。而且就在谈判进行的中间，他们在这个中立区以外的朝鲜土地上投掷大量的带有各种细菌和病毒的昆虫，开始了以屠杀朝鲜人民为目的的细菌战。不但这样，连这个中立区的土地也曾遭受过美国炸弹的损害，而且连做过谈判会场的来凤庄今天也还留着美国炸弹造成的伤痕。去年十月十二日十二岁的朝鲜孩子姜永敦还在会场区的附近流尽了他的年轻的血。

姚庆祥烈士的血并不是白白流了的。今天他睡在这山腰，他好像还睁着两只眼睛在监视着破坏和平的敌人，他时时刻刻都在警告我们，要我们提高警惕。

我走下山来，向左边的路上转过去，便看见一所烧毁了的大建筑物。我走过城内中心区，到处都是瓦砾堆，在城内我不容易找到一所完好的房屋。这一带地方我来过不止一次。先前看见的和平景象不过是中立区的一面，另一面便是这无数的向人们诉说着美帝国主义暴行的断瓦颓垣。朝鲜人民就在这些瓦砾堆中生活。在正午的时候，市场上还出现了空前拥挤的热闹景象。现在人们都坐在家里休息了。

我也回到了我的暂时的“家”。刚在炕上坐下来，我就听见了轰隆的炮声。这声音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每个夜晚，每个早晨我都听见它。美国的大炮又在向我们的阵地发射。这种早晚不断的炮声使我永远记住一个事实：我们的战士不仅时时刻刻在警戒着，而且他们在保卫着这里的和平。他们在保卫着这个四处埋伏着战争的中立区。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者在谈判的初期，曾经要过这个城市。我们说：“你有力量

你来拿吧。”可是他们没有力量拿到开城。不管他们每天每夜不停地向这个中立区外我方的阵地发炮，不管他们每天每夜把成吨的钢铁倾倒在我们的阵地上，不管他们用什么战术向我们的阵地进攻，可是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前进一步。而我们的战士呢，战士们的勇气和信心以及他们的乐观主义的精神使得每个到过前沿阵地的人都受到了感动和鼓舞。他们都是像姚庆祥烈士那样的英雄，他们下了决心要保卫世界和平，打退侵略者，立国际功。有了他们才有这里的特殊的和平景象，而且有了他们也一定会有最后的真正的和平。因为和平不是靠等待得来的，和平是靠人民的力量争取来的。

1952年4月10日开城。

朝鲜战地的春夜*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散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凉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

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在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见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我留心去听，只听见在说某某同志怎样。我知道是在表扬一个同志，是战士们在开会。

我在山头站了好些时候。我听着传到我耳朵里来的一切声音。这些声音对我已经不是陌生的了。我想着，想着，我想到了先前我坐在洞子里矮桌前面在日记本上写下的几句话："营参谋长看见洞口塌了，马上叫了班长和几个战士来，他自己先动手，花了三刻多钟的功夫冒着雨把土铲走了，又在洞口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文学》八月号。

支了两根木柱。几个人浑身湿透了，脸上还带着微笑。我真愿意多看这些年轻的、健康的、淳朴的脸。”最后的一句不仅写出了我当时的心情，也写出这一个半月来我的全部的感情。这一个半月来在朝鲜的土地上，就是这样的脸给了我更多的温暖和更大的勇气，也就是这样的脸鼓舞我走了更多、更远的路。我在每个地方都看见这样的脸，每张脸都用亲切的微笑来接待我。这些脸对我已经是很熟的了。我好像很早就认识他们。我指的是志愿军的战士，祖国人民称他们做“最可爱的人”，他们的确是最可爱的：不仅他们的内心，就是他们的面貌也可以打动人，吸引人。

在夜色笼罩的山头上我想到志愿军战士们的笑脸，我的脸上也浮出了微笑。炮声突然响起来，接着是一个吹哨似的声音，然后又是一下巨响，好像炮弹从我头上飞过落在山沟里一样。其实炮弹并没有打过山头，它在我背后山下面就爆炸了。可能有破片落在这附近。我把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的那股圆柱似的探照灯光看了两眼，探照灯光映在我的眼里已经很淡了。我往下走十几步，到洞口小小平台上去看那个年轻的岗哨，他仍然挺起胸膛站在那里。我走到他面前，第二个炮弹又打来了。他看见我，脸上露出了笑容。“敌人又在打炮了。”我说。他带笑答道：“敌人今天休息了半天，现在又忙起来了。这两天还算打得少一点。其实他就是把山头打平了，也毁不了我们的工事，何况他们就没有一炮打到这座山上来过。”我们这样地谈起来。但谈不了几句，话题就转到祖国的建设情形上面了。在朝鲜前线，敌人炮弹的威胁下，战士们时

时刻刻在想念祖国，他们尤其关心祖国的建设。有一天早晨我走过一个小坡，坡上一个战士跟我谈话。他的第二句话就是："祖国现在建设得更好吧。"又有一次我和一个战士闲谈，他说到"等我们回到祖国的时候，祖国一定建设得好得不得了"。我便问他："你想祖国吧？"他笑笑，说："想。"我再问："你想回国吗？"他摇摇头："不想。没有打退美国鬼子，没有消灭敌人、完成任务，我不想回国。"接着他又说："祖国人民对我们太关心了，祖国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把最好的东西都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有努力消灭敌人来报答祖国人民。"

在这个山上有不少从四川来的年轻的战士，他们爱祖国，也爱他们的家乡。他们的谈话中时常流露出这样深切的爱。他们中间有三个参加了一个月前的一个出击的小战斗，立了功。跟我谈话的岗哨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因为身体比较差一点，起初没有得到参加战斗的允许，后来经他坚决要求，上级才答应让他参加担架班。他跟着班长一起上前线，班长牺牲了，他却立下功劳。这一个年纪不过二十岁、有着孩子面孔的战士，在冲过敌人炮火封锁口时表现了无比的勇敢。另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广东战士，脸上一直带笑，乍看他简直是一个孩子。可是他也在这次的战斗中成了英雄，还抓回来一个俘虏。他带笑地告诉我们："那是李承晚的伪军。他乖乖地跟了我来。他还说：'过去我们受了长官的骗。如果早知道志愿军是这样的好军队，我早就过来了。'……"在朝鲜战场上，勇敢是极平常，极普遍的。志愿军里面就很难找出一个胆小的人。不论是参加战斗，挖工事，摸地形，抓俘虏。……不论

是指挥员和战士，不论是卫生员，护理员，通讯员，炊事员，不论是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和驾驶兵，每一个人都表现了英雄气概。好几个驾驶兵一面开车一面跟我谈过去的情况。一个说："只要人在车就在。"另一个说："现在敌机不敢像去年那样猖狂了，"接着他讲起他怎样在敌机扫射下完成任务的故事，最后他说："除非打死我，就莫想叫我的车子停下来。"的确，任何力量都不能够摧毁志愿军的决心。他们从来不曾在任何困难、危险前面退却！就在我住的这个防空洞口，战士们写着这样的红字："……不管手上打血泡，日夜劳动不休息。挖工事石头硬，没有咱们决心硬。"在另一个前沿阵地上"钢铁英雄洞"的洞口贴着一张横条："一人吃苦，万人享福。"一个参加过五次战役的战士对我说："现在跟去年的艰苦情况大不相同了。现在我们一点儿也不苦。其实就是吃苦也不算什么，我们宁愿吃任何苦，只要祖国人民知道，我们也就不觉得苦。"他说得那么自然，他的身子站得那么稳，脸上甚至露出笑容，眼睛里发射出爱的光芒。这双眼睛正朝着祖国的方向，好像在望祖国。像这样深切的爱在战士们中间也是极普遍的。战士们不仅爱祖国，爱祖国人民，爱他们的领袖，爱自己的家乡，他们也爱朝鲜老百姓，爱这里的土地，爱他们在这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爱他们亲手挖成的工事。据说这样的工事被敌人称为"土造的马奇诺防线"。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我们可以说：好些朝鲜的山都让我们的战士挖空了。交通沟里到处都插着路牌："英雄路"、"前进路"、"国际路"、"青年路"、"保卫世界和平路"……每个班有每个班自己挖的洞

子，一个比一个整齐、美观，炮兵的比步兵的更讲究，洞口都有新扎的牌楼、红星、对联、横条，和其他的装饰。我见过一个“安全厨房”，里面有很干净的锅灶和碗橱，门口贴上对联：“煮好饭菜热又香，英雄出征上战场”。上面一张横条：“讲究卫生”。另一个前沿阵地的“安全厨房”里面还有一口井，井上有一个木盖。在这样的厨房里谁也找不出来一只老鼠或一个苍蝇。有一天敌人的炮打得厉害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班的“安全食堂”里看见两个广东战士在包饺子。指挥所、铁匠炉、俱乐部、安全厕所……每一个洞都有它的特点，在每样东西上面战士们都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敌人的千万发炮弹也没法摧毁我们的前沿阵地，我们的战士们在这里安下家了。一个在最近一次小战斗中立了功的东北战士说：“工事挖得好，可以消灭敌人，保卫祖国。看见‘老乡’（指朝鲜老百姓）的房子给敌人打坏，自己挖工事再累也不觉得累了。”的确，为了加强他们的工事，战士们一直手不停地在挖着，为了提前完成任务，他们甚至把自己吃的油节省下来作点灯用，因为没有亮，他们没法在洞子里挖下去。战士们不仅为他们自己挖防空洞，他们还抽出时间来替朝鲜老百姓挖防空洞。前沿阵地附近老百姓的房屋时常被敌人的炮弹打中，老百姓受了伤，战士们把他们抬来给他们包扎治疗。在一个连部里连指导员告诉我们：就在这一天上午一个朝鲜少妇回娘家去看她的父母，才知道房屋在三天前中了敌人炮弹，她的父母给埋葬在里面了。她没法在那里多停留一刻，敌人的炮弹打得太厉害了。她跑到我们的交通沟里躲了好一阵子，等到炮声稀少的时候才走回她

的夫家去了。我们的战士甚至节省自己的食粮来帮助附近的朝鲜人民，一个从热河来的中年炊事员在炸花生米的大油锅前面感动地告诉我一些动人的事情。前些时候在一个兵团的政治部里我还听见一位首长建议节粮帮助附近的十二户人家。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从志愿军的司令员一直到炊事员，上上下下都有着同样的爱和同样的心。志愿军在哪里，爱就在哪里开花，而且花开得像朝鲜满山的红花那样多。我还记得一个新从连队回来的军文工团副团长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个连队接到调防的命令，战士们虽然不愿意离开自己花了一万八千多个工挖好的工事，可是他们离开阵地时，并不说一句抱怨话，他们还叫出："来得痛快，走得痛快；走到哪儿，挖到哪儿"的口号。为了欢迎接防的友军，他们在动身前还打了一些柴，挑了水来把水缸装满，有些战士甚至留下礼物和诗句："东方发红天快亮，兄弟分别在山岗。兄弟虽然不一样，同样意志杀美狼。""毛巾上面绣着卫国又保家，慰劳同志把汗擦。从今接守阵地后，多打胜仗多把俘虏抓。""礼物微薄不可言，希望大哥不要嫌，阶级弟兄感情厚，祝你们英名万古传。"唯其把阶级的弟兄爱得这样深，才把阶级的敌人恨得那样切。我们的战士并不是好战分子，他们的恨是从这种阶级的友爱上产生的。战士们真诚、直率，可是他们的心很细。他们都是有深厚感情的年轻人。……

一下比先前任何时候听见的声音更响的炮声忽然从后面猛扑过来，好像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头上的空气推动了一下，接着是一个震耳的爆炸声。我背后坡上的砂土簌簌地落下来。

我的思路被打断了。过了两三分钟，我顺口向那个年轻的岗哨问了一句："你怕不怕？"他没有回答，却短短地笑了一声。过了一忽儿他才说："哪怕他美国鬼子钢铁再多，他也把朝鲜的山打不平。"接着他加上一句："他更不要想打坏我们的洞子！"后来他又说："我们不轻易发炮，我们一发炮就够他受的！"

我睡在洞里，半夜被炮声惊醒了。我起来到洞外去，在平台上看见另一个年轻的岗哨。"刚才炮打到哪儿？"我问他。"多半打在山后头。今天下午八连下面老乡的房子给打中了。看见老乡房子给敌人打坏了，我就是气，我恨不得马上打死几个敌人。"他讲完，接着又问我："现在几点钟了？"我看了看手表，把时间告诉了他。他歇了歇，忽然说一句："祖国人民听不到这样的炮声……"话并没有说完，一个提枪的战士走过来，打断了他。是换班的时候了。两个战士互相敬了礼，那个跟我谈话的岗哨交了班，提着枪缓步朝山下走去。嘴里低声哼着《歌唱祖国》的歌子。我知道他们警卫班的洞子在山腰。

我默默地站在洞口的小小平台上。我抬起头望着灰蓝色的天空。敌人的大炮又沉默了。蛙声时断时续。朝鲜山上的春夜相当冷，可是我的心很热，我激动得厉害，我不想回洞里去睡。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我的心中搅动，有许多感情在那里翻腾，它们要往外倾吐，我恨自己不是一个有才能的歌唱家，我恨自己没有一枝写史诗的笔。我需要唱出这一个半月来堆积在我心里的爱，我需要写出这一个半月来堆积在我心

里的爱，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祖国的人民。啊，祖国的人民，我能够用什么话让你们全知道你们应该知道的这许多事情呢？我能够用什么话让你们知道像花一样地开放在朝鲜的遍山遍野的对你们的热爱呢？我能够用什么话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幸福呢？你们的确是幸福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你们的同胞在这个遥远国土的山地上忍受艰苦，甚至用他们的血肉来保护着你们的和平生活，而且就在这个寒冷的春天的深夜，还有人在想念你们，因为没有炮声惊扰你们的睡眠而感到安慰。我的眼光一直在望着祖国的方向。我出神地望着那些在祖国见惯了的星星。我望着，我望着。我的心始终静不下来。我好像在天空中看见了一根用爱结成的绳子，它一直朝着祖国的方向伸过去，伸过去。我忽然觉得祖国一下子就近在眼前了。在朝鲜的山上我好像听见了祖国人民说话的声音。深厚的爱缩短了国土的距离。朝鲜前线战士们的心和祖国人民的心结合在一起了。这时候祖国人民一定在做着欢迎他们的英雄们胜利回国的梦吧。是的，一定的。我们新从祖国来的人知道祖国人民的心。祖国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的英雄，祖国人民没有一个不用最大力量来支援他们的英雄。用爱结成的绳子不单是朝祖国的方向伸过去，它也是从祖国的方向伸过来的。这根绳子是敌人的炮弹所毁不了的，它早就存在了，为什么我以前不曾注意到呢？……这样一想，我觉得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祖国人民已经知道了我想告诉他们的一切。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那许多个别的英雄的姓名，但是他们更喜欢用一个总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英雄：“最可爱的人”。

他们做得对，因为整个志愿军中没有一个不是“最可爱的人”。所以我也不在这里提说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1952年5月4日在开城前线。

一个模范的通讯连*

二十二岁的二等功臣

不管美国侵略军怎样残酷地把千万吨的炸弹投在朝鲜的土地上，他们却没法阻止春天的到来。今年春天，朝鲜的乡村里庄稼还是长得很好。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的美国飞机一定也看得见这一片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吧。在一个月夜，就在这样的麦田中间，在一个朝鲜老大娘的家中，我们坐在炕上，听一个模范的通讯连队的三排副谈他的英雄事迹。

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从前是热河省大阁县一个放羊的孩子。现在他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某部通讯连的二等功臣。他盘着腿坐在我对面，我和他的中间有一张朝鲜式的小圆桌。他有一对发光的眼睛和一张紫红色的脸。他的声音不高，讲话也不多，但脸上容易现出激动的表情。他讲起他去年二月入朝时在大火中经过阳德的情况："闻到烧焦的人肉气味，听见老乡们的叫喊，好些战士掉了泪，说要替朝鲜老百姓报仇。"但讲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就说得很简单。我们已经从别人口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新观察》第十三期。发表时题为《在志愿军的连队里》。

中知道他救火受伤的事。在五次战役以前，有一次敌机打着老百姓的房屋，他和全班人冲进烈火中去，在敌机扫射的威胁下，救出老百姓的衣物。他还和七、八个同志爬上火将要延烧到的屋顶去拔草救火，隔断火路，九间屋子保全了六间；他的腿上烧坏了一块肉。五次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是通讯连里的电话员。当时他那个班里守总机的只有他和正副班长三个人。班长生了病，他为了照顾班长休息，自己连续守总机守了两天三夜，白天他还要挖防空洞。到了战役的第二阶段，他已经很疲劳了，有一天刚架好电话线，他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同志们把他抬进洞去，用土法急救，放了血，才醒过来。他休息不过一个钟头，又继续工作，背着单机，跟着部队前进。第二天他又背起了总机，不管爬山越岭，三十七斤重的总机老背在他的身上。连长叫他休息，他始终不肯休息。他夜里守机子，曾经晕过去两次。可是电话铃一响，他又马上醒过来，咬紧牙关坚持着，接通电话。他两天没有吃东西，身体十分疲倦，但是他一想到上级讲过："电话是首长的耳目。完成任务主要靠通讯。……共产党员要克服一切困难，带头完成任务。"他便有勇气坚持下去了。他保证了在战斗中联络没有中断，完成了任务。

他用简单的话，讲完他立功的经过。要不是我们时常发问来引起他的较长的说明，那么他还会讲得更短。他的脸上露出谦逊的微笑，好像他做过的只是一些极平常的、不值得多提的事情。一个从师部里来的同志问起他的父母。他的回答很简单，而且是停了几次才讲完的。他这样说："我父亲在我

十二岁就死了。我母亲也走了。家里就只有伯父。……我父亲在的时候，借了别人四十块银元，他死了，没法还这笔债，我母亲走了，才把债还清，把我父亲埋了。”我明白他是在说：他母亲为了还债，为了葬他父亲再嫁了。“我不知道我母亲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是怎样死的。他在地主家干活。离我们家远。地主叫人来说我父亲死了。”他的笑容收敛了，他的话吐得更慢，好像每个字都很沉重。他时而把头埋下，时而抬起头仰望着今天刚装好的电灯。两片厚嘴唇略微张开，轻轻地吐气。刚才发问的从师部里来的那个同志也沉默了，用力地在抽烟，我也难找出一句适当的话。

“像这样的痛苦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这一切都跟着旧社会死亡了。”师部里来的同志在小圆桌上弄灭了烟蒂上的火，叹了一口气说。

“对。”年轻的副排长应了一声。

“前途是很光明的，”师部里来的同志又说。

“对，”副排长又应了一声。我也接下去说：“的确，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对，”副排长第三次应着。他移过眼光来看我们，他点着头，带着信心地微笑了。

光荣的连队

三排副是通讯连里面第一个来和我们谈话的人。他的微笑给我们的心带来更多的温暖。等他翻过小山回到了二里外

的工作地点总机班的时候，我们也扭灭灯睡在炕上了。我整个晚上都在想他——想他的过去的痛苦，想他的英雄事迹，想他的更光明的前途。我觉得从这一个人身上我已经看到整个连队的光辉的全貌了。

在我们的屋子里小圆桌上面放了一份连队的功臣表。三排副是这个连队的唯一的二等功臣。但他在连队里也并不是十分突出的人物。功臣表上一共有三十七个名字，从连长起，立三等功的人有二十八个，立两个三等功的有八个。据说评了功上级还不曾批下来的有四、五十个人。那么可以说连队里有一半的人都是功臣了。除了个人立功外，这个连队里有整个班立了功的，而且整个连队也立了一个三等功，还受到志愿军政治部的表扬。

第二天清早，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在六点半钟的光景，我们走在麦田中间的小路上，遇见了连长、指导员和别的几位干部。连长和指导员在我们来到连队之前就跟我们见过面谈过话了。三等功臣郭连长已经过了三十岁了，他有一张农民的脸和一个粗壮的身体。连队里每个战士都称赞他的朴素的作风，说他遇事抢先干。他像慈母似地爱护每一个战士，有时还在夜间给战士们盖被子。战士们提到他的名字，脸上就浮出笑容。他是一个不爱讲话、喜欢做事的人。他讲话的时候，他那诚恳的态度使人觉得他似乎要把整个心吐出来给你看个明白。好几个战士对我说，前几个月为了帮助朝鲜老百姓，他首先发动大家把萝卜叶子拾起来弄碎调和着面粉吃，节省下粮食来送给老百姓。指导员到这个连队不过

半年光景，可是他熟悉而且爱护模范连队的光荣传统。关于这个连队他跟我们谈得不少。朝鲜老百姓也很喜欢他。我听见一个朝鲜老大娘编歌子唱着称赞他。

跟这两个人在一起，我会想到整个连队的干部。他们的身材、面貌、口音、出身也许不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段历史，可是他们有着同样的过去的作牛马的痛苦生活、现在的英勇的战斗生活和无限光明的前途。他们有着同样的紫红色的健康的脸，同样的淳朴的微笑，同样的对祖国的热爱。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

有一个黄昏，在集合点名之前，一个班的战士们在他们住的那一家的院子里，轮流地替朝鲜老大娘舂米。他们一面工作，一面用半中半朝的话跟老大娘谈笑。我也在那里。老大娘对我说："他们跟我儿子一样。"我笑着，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傍晚。

星期天的傍晚，我又到这个地方去，战士们刚刚点名回来，正在开一周总结会。班长在讲话，他先表扬了几个同志的优点，接着又批评一些同志的缺点。班长的话还没有讲完，有人进院子里来说，现在有任务要这个班派两个人出去。班长还来不及开口，就听见四、五个声音接连说："我去！我去！"班长指定了两个人，他们拿起枪来挂在身上，就急急地走出去了。其余的人又静下来继续开会。不论是通讯班或电话班，每天出差的人都是很多的，并且都是愉快地出去而且更愉快地完成了任务回来。每天都有人冒着敌人炮火到前沿阵地去。

我的住处离这几个班最近，在战士们休息的时候，我就听见从那里传来的歌声和口琴声。在午睡的时间里，时常有一些战士到麦田里替老百姓拔黑穗。有一天刚过了正午，我们翻过山从总机班回到这里来。我看见一些战士躬着腰在麦田里拔黑穗，便走到他们中间去参加这个工作。我旁边一个战士对我说："今年麦子长得好。"他已经拔下一大把，黑粉染黑了他的手。我的袖子上、手上也满是黑粉。后来我回宿舍洗手的时候，他也回来洗手。这个二十一岁的战士跟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前一天他跟我们谈到他过去的生活。他讲话的时候很激动，总是把眼睛朝上面看。他告诉我们，他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的父亲嘱咐他："不要糟蹋老百姓。"他说："入朝行军时候腿有毛病，个人反正坚持着走……'你想当初入党时候怎么说的。'……痛就痛嘛，个人反正要走。"他因为群众工作做得好，已经评了一个三等功，不过上级还没有批下来。他说："看见四五十岁的老大娘哭，个人心里也很难过，就像看见自己父母哭一样。"他给我们看过他父亲最近从河南家乡寄来的信，信里有这样的话："今年家里粮也够吃，我在家中一切事情都很如意。自你参军后，去年八月间你妻生一女，名叫翻妮，现在五、六个月了，吃得也非常胖，很快活。你听说也很高兴吧。……为父所嘱，只要你好好学习文化，打倒美帝国主义，就是你的任务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也受尽了压迫，可是翻身以后，却有了美满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我们把信还给他，问道："你看了你父亲的信有什么感想？"他没有笑，把信揣在怀里，仍然用他那激动的声音说："非等到美帝国主义

完蛋，朝鲜人民得到解放，个人不回家。只要还有一个人受到压迫，个人就不回家。"他识字不多，讲话时咬字也不准确。紫红色的圆中带扁的脸似乎突然发亮起来。面对着这样的英雄气概，我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他说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话，他说出了整连战士的胸襟，他说出了我们志愿军英雄们的伟大的抱负。

"中朝亲如一家"

连部里有两面锦旗，是连队两次调防的时候，两个村子的老百姓送给连队的。一面较小的绿色旗上有一行红字："爱护朝鲜人民的好榜样"；另一面粉红缎子的贴着绿纸剪成的字："中朝亲如一家"。这不是两面普通的锦旗，它们是朝鲜人民用自己的心做成的。简单的字句的后面隐藏着无数的感动人的故事。我们花了一个星期的功夫，还不能够把那些故事一个一个地全找出来。的确如一个战士所说，那样的故事是说不尽讲不完的，而且是一直不断地在产生的。我们抄录了许多数字，数字看起来单调、枯燥，可是每一个数字包含着无限的热爱和感激的眼泪。二排长告诉我们两个故事：有一天一个班的战士们在吃晚饭的时候，看见一个朝鲜老大娘头上顶着一口大锅在路旁休息，她满身大汗，在那里喘气。战士们问班长："老大娘顶着锅到哪里去？"班长叫联络员去问一下，才知道她要到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战士们便向班长要求：下午没有事情，可不可以由他们出一两个人给老大娘把锅

送去。班长向上级请示，得到了上级的准许。两个战士抬了大锅把她送到家，到傍晚才回来。战士们说："朝鲜的老大娘就跟我们自己母亲一样，看见她吃苦，我们心里难过。"

一个战士上了课回来，看见一个老大娘头上顶着尿罐去浇菜，他就抢过尿罐，一罐一罐地端到菜地上，一勺一勺地浇到菜上去，他一口气浇了一亩半的地。有人问他："你不嫌脏?"他答道："老大娘跟我母亲一样。家里没有劳动力，我们应该帮助她，我们能嫌脏吗?"

这只是两个极普通的故事，无数的故事中间的两个普通的故事。二排长感动地说："朝鲜老大娘对我们实在太好了，真是就跟自己的母亲一样。有一个战士打柴火的时候给蜂螫了，老大娘含着眼泪给他用酱敷。老大娘对我们的病号照顾得很好，真是比我们自己照顾还周到。"

可是朝鲜的老百姓又怎样讲我们的战士呢？有一次一个朝鲜老大娘含着眼泪摸着我们战士的肩膀说："我七十多岁了，没有看到像你们这样的好军队。你们对朝鲜人民实在太好了。"

我亲眼见过好些动人的场面。我们到连队那天，正遇见三、四十个老大娘、老大爷来参加连队的庆功会和军民联欢会。他们大部分是连队的旧房东，从十多里外的村子走来看他们的熟人。大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一个老大娘在战士们面前一边唱歌，一边跳舞。歌词和舞姿中所表现的都是战士们为她做过的事情：挑水、打柴、舂米、割稻、春耕……。她唱着跳着，忽然掉下眼泪来了。还有一个老大娘，她的丈夫让李

伪军杀死了，两个媳妇让美国侵略军抢走了，儿子参加了人民军，她现在跟一个小孙儿在一起生活。会开完，告辞回家的时候，她眼里含着泪珠，紧紧握着我们战士的手，不肯放。她走不到一里路，又转回来找我们的战士。就是这些朝鲜女人，金日成将军所说的“英雄的妇女”，敌人杀死她们亲人的时候，她们都没有流一滴眼泪。她们从来不在敌人面前显露丝毫的软弱。可是跟我们的战士分别，她们却制止不了自己的泪水。有一天我们和连长、指导员带了一个联络员到她们的村子去，我们刚到村口，几个老大娘就跑过来迎接我们，握着我们每个人的手久久不放。不管我们懂不懂，她们只顾热情地说着朝鲜话。临走的时候，一个老大娘对我们说：“你们回到中国，请告诉志愿军战士们的母亲，不要为她们的儿子担心。她们的儿子爱我们，我们也爱她们的儿子。朝鲜人和中国人是一家人。志愿军叫我们做‘阿妈妮’，我们也把他们当儿子看待。他们待我们比我们的亲儿子还好。我们永久忘不了他们的好处。”我频频地点着头，除了朝鲜话的“哥马西米达”① 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们出了村子以后，我的眼前还晃动着白衣白裙的朝鲜的中年妇女和老大娘的身姿，我的耳边还响着她们的那些热情的话语。的确我们战士们的母亲应当骄傲她们有着这样的儿子：她们的儿子在朝鲜战场上培养了这么多、这么深的爱。

---

① “哥马西米达”：谢谢的意思。

阶级弟兄的友爱

离开这个连队的前一天，我感到留恋。吃过晚饭，我们沿着我们部队自己修筑的公路散步，遇到一排长、二排长和三排副。他们和我们一道散步，散步回来，在我们住的那间屋子的过道上，我们六个人围了两张桌子坐着，又谈起这个连队的事情。

“我知道你们‘团结友军’的工作也很有成绩。”一个同志说。

“是啊，”二排长回答说。二排长是革命军人委员会的主任，连队这一方面的成就他知道得最清楚。他接着说：“友军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啊。战士们都知道，团结就是力量。例如我们头一次调防，友军快来接防的时候，战士们都说我们准备得越好，友军来了困难越少，杀敌的力量就越大。他们打胜仗，也就是我们打胜仗。大家轰轰烈烈地准备着接待友军的工作：搭了三个马棚，两个伙房，打了一万九千多斤柴，七百斤喂牲口的草；还把防空洞普遍加大，重新作好伪装，晒好铺草；怕友军没有家具用，拿炒面箱子来做菜盆饭盆；烧好了炕，铡好了草；还分别成立招待组，招待友军。总之，我们不让友军感到一点困难。表现了革命大家庭的友爱团结。我们每回换防都是这样做。不论完成本身任务、做群众工作、团结友军，我们连队都有光荣的传统。每个战士，不论老战士、新战士，都一样地爱护这个传统。干起工作来，干部跟战士一样

地热心。做群众工作、做团结友军的工作，常常是支部作出决议，党员带头干，团员做模范，群众抢着干。而且我们不做哑巴活，不盲目地瞎干，我们始终不忘记及时表扬和及时批评。”他歇了歇，“就拿这回给老大娘打这个井的事情来说吧，一提起要给老大娘打井，好多人都抢先报名。”他说着掉过脸把院子里一个一丈多深的圆坑望了望。这个坑是从昨天起挖的，三个年轻的战士每天清早来挖一个钟头，再挖三、四天就可以把打水机埋好了。这一家只有一个老大娘和她的三十多岁的媳妇和一个还在吃奶的孙儿，那个老大娘总是用感激的眼光望我们的战士。二排长又往下说："大雨天上山打柴火，大家也是抢着报名。这班年轻小伙子一身都是劲，干起活来总是有说有笑的。"说到这里，二排长的脸上浮现了微笑。他的内心的快乐的笑，引起了我的笑，引起了大家的笑。我们深深感到生活在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中的幸福。

离开通讯连已经三个星期了，可是我的心还时常回到那些人中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面貌和那些声音。我时常不由自己地想到那个叫翻妮的小女孩，那个长得很胖的小女孩。我知道在祖国的广大的乡村里，像翻妮那样的小女孩是很多很多的。她们出生在和睦的家庭里面，她们长得胖，很快活。她们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也不曾得到父亲的抚爱。但她们是最幸福的年轻的一代。她们会在幸福的环境里，慢慢地长大起来，她们有一天会知道在她们还不会讲话走路的时候，她们的父亲在那遥远的邻邦的国土上，怎样地流着血和汗，保卫

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她们会感激她们的父亲，而且会觉得有着这样的父亲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为了那许许多多的小翻妮，我简单地写下我的一个星期中的见闻。

1952年6月6日。

起雷英雄的故事*

两个多月以前，我在志愿军某部的团部里见到前一天刚从敌人阵地上起起来的“平台雷”。那是一个长方形的东西，撞针和雷管都取下来了，只剩下三个小洞孔。铁路工人出身的副团长把地雷拿在手里，向我解释它的性能。他没有跟我们多谈地雷搬家的故事，因为这在前线已经成了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东西倒很巧妙，拉也会响；踏也会响。可是不管它怎样巧妙，我们的战士总有办法制伏它。”副团长带笑说。他一谈到战士们的功绩，脸上就现出快乐的微笑。我当时曾这样地想过：要是我能够见到一个大破敌人地雷阵的英雄，那是多么地好。

最近我转到另一个部队来。这个部队在起雷这方面有着很显著的成绩，单是起雷的英雄就出了几个。我听过二等功臣杨明凯和廖文亮的生动的报告。但人们谈得最多的，是一等功臣姚显儒同志的英雄事迹。我来到这个部队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熟悉姚显儒同志大破美军地雷阵的故事了。那时他刚离开部队去接受朝鲜政府颁发的二级战士荣誉勋章。我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中学生》九月号。

兴奋地等待着跟他见面的机会。

我在他当班长的那个连队里住了五天，也曾跟他班里的七个战士谈过他的事情。那七个从农村出来的新战士，现在都成了起地雷的能手。他们的教师就是他们的姚班长。他们谈到班长，就像谈到一个亲密的朋友，声音里含着爱，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一个四川战士说："班长是个乐观的人，他喜欢笑，从来不发脾气。"另一个四川战士说："班长跟大家团结得很好，他说，年纪大的是他的哥哥，年轻的是他的弟弟。公私分得清楚。干工作时很认真，平时有说有笑。晚上放哨回来，要把大家床铺都看过，怕大家没有盖被子。"一个贵州战士说："我过去在班里很落后，他帮助我进步。"一个山东战士说："班长喜欢别人提意见，喜欢讲战斗故事。"那个跟我同来的文工团的同志告诉我："姚显儒同志今年二十六岁，身体结实。长方脸，亮眼睛，宽肩膀。"在那个连里，每天我都听见有人提到他的名字，讲他的事迹。我觉得我熟悉他就像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回到师部以后，第二天早晨，我正在政治部里对一个新来的朋友谈姚显儒同志的英雄事迹，坐在旁边的宣教科长插嘴说："姚显儒同志就在这里，我找他来跟你们谈谈吧。"不等我们答话，他马上就把姚显儒同志找来了。身材不高不矮，长方脸，亮眼睛，宽肩膀，满脸带笑，胸前挂着抗美援朝纪念章，朝鲜的军功章和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在我们面前他站得多么稳，全身都充满着力量。

我们几个人同时坐下来。他坐在我的对面。我望着他，

不觉想起了他那个班里战士们的谈话。“好，我谈吧，”他对我们笑了笑，就开始谈起来。他在我们中间就像跟一些熟人在一起，他谈得很自然，没有一点拘束，但是朴素、谦虚，就像在谈一些极寻常的事。话讲得快，却又十分清楚，声音里有感情。有时候话触到他的内心，我觉得他的眼睛里闪起了泪光，但是他并没有流泪，连嘴角的微笑也没有收起。

他对我们谈他的过去。他谈到他小时候在甘肃省他家乡地主家里放羊，过旧历年地主家请客，他端酒打碎了杯子，挨了打让人赶出来。过去的痛苦太多了，他不愿意回想它。他参加抗美援朝来到朝鲜以后，朝鲜人民的灾难激动了他的良心。面对着无数的断墙颓壁，他发过誓要替朝鲜人民报仇。但是在他跟着部队突破临津江以后，他还没有参加大的战斗，就让敌人的飞机炸弹炸伤了左脚。他还记得他躺在担架上让人抬着经过一个地方（他说，大概是九化里吧），在一个朝鲜老太太家里休息。老太太做饭给他吃，当他是亲人一样地照料他。那个时候，美国飞机活动比现在厉害，天一明，他就给人抬到山上去了，是一个同志和老太太照料他上山去的。就在这一天，老太太的房子中了炸弹燃起来。他们下山的时候，老太太的最小的女儿，一个十三岁的姑娘，已经烧死在房子里头了。老太太疯狂似地嚷着哭着，直往火里扑，人没法拉住她。“我爬进去，她衣服都烧着了。我拉她出来。她起初还在挣扎，后来她知道是我，知道她一动，我伤口就痛，她便不动，让我抱住她拉出来了。我走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哭着不肯放，送我走了几里路，她要我养好伤回来的时候一定去看她。那是四月底的

事，可是等到我九月里回到部队来，我却没法看到她了。”

说到这里，姚显儒同志停了一下，他那流畅的话语忽然中断了。他埋下眼睛。我望着他，吐了一口气，我想把压在我心上的东西吐出来。这时有一个同志过来说：“姚显儒同志，你休息吧，不要讲了，你昨晚上才发过疟子。”我接着说：“那么以后再谈吧，反正以后还有时间。”“不，我不累，”他抬起头来说，“现在不要紧。我谈，我就谈。”他的感情升高到这个程度，我们没法阻止他。在那诚朴的农民的脸上，我注意到一种使人感动到流泪的表情：深的爱，深的恨，深的感激，深的怀念凝结在一起，给他的朴实的面貌增加了一种搅动人心的光辉。我知道这时候在他的眼前还晃动着那个白衣白裙的朝鲜老太太向他摇手告别的身影。

“听说你在起雷以前，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连长还找你谈过话，是吗？”一个同志问道。

“对，”他点点头，嘴角上又现出了微笑。“以前听说侦察连的同志出去摸地形，踏响了地雷，挂了花，又听说有别连的同志起地雷碰响了，吃了亏。那个时候大家拿地雷没办法，我也为这个事情发急。我想我们就会让这些小小的怪物制住吗？想来想去，晚上总睡不着。”

我早就知道这桩事情。那个文工团的同志对我讲过他晚上睡不着觉，常常起来在外面走，有时间他就去望敌人埋地雷的那座山，研究地形。连长知道他睡不着觉，以为他有什么问题，找他谈过几次话。他虽然没有对连长讲出地雷的事，但连长知道了他的思想情况，也就比较放心了。

“二月十二日那天晚上我们小组出去侦察出击敌人的道路，连长对我说：‘八班长，你要爱兵啊，敌人埋得有地雷。’我说：‘连长，你放心。’我心想，我正要找那个吃人的怪物。”姚显儒同志笑着说，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愉快的表情。“我们晚上出去，等到天亮，敌人也没有来。我跟张振江在一块儿。罗兆财、路世文他们掩护着我们。那天飞着小雪，我在前头走，我首先发现地雷。我知道就是那个东西。它就放在地面上，铁丝拴在撞针上，铁丝很细，跟细线一样，白天也看不大清楚。我轻轻地挨到铁丝，看看那个怪东西，心想：我不惹你，看你拿我怎样！你想吃我，我就躲开你。我躲开它走了两步。心想：不对，我不惹它，别的同志会吃它的亏。我先在这里作个记号，回头再来解决它。我想想这也不对，要解决它就得早解决。我回头叫张振江找绳子来预备拉响它。张振江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找到了吃人的怪物，我不让它吃我，我要先惹它。’张振江说：‘班长，你不要拉响地雷，会暴露目标啊！’我想，张振江说得对，不能拉响它，可是总得想办法制伏这个怪物。我们不能够让它吓倒。敌人会安它，我们就会起它。总得有个人来起它。心想：我等了它好久，今天碰到机会，不能白白放过。我睁着两只眼睛望着它，心想：你这样一个怪物，我就对付不了你？我又想：人家刘光子一个人活捉六十三个俘虏，我姚显儒就不能制伏一个地雷？我越看越着急，难道我还怕死，不能为祖国、为人民立功？不能给朝鲜人民报仇？我有了主意，叫张振江站得远远的，小心看着我怎样对付这个怪物。我说：‘要是我牺牲了，你要接受我的经验，另外想办法来解

决它。'"他拿起洋磁茶缸喝了一两口水。我看见他额上冒出了好些颗汗珠。我感动地说："你累啦，休息一忽儿吧。""不，我不累，"他接下去说，"我用嘴咬断铁丝。我小心地端起地雷，慢慢走回到我们交通沟口放下来。我叫张振江好好看着我，我什么也不想，一心望着面前这个东西。我要惹它，心想：要是碰响了它，我马上把它推下沟里去。我试一下，轻轻地把撞针向右边一转，它动了。我有了信心，接着再转它一下，一共转了三下，就把撞针取下来了。接着把雷管也取下来了。心想：我把你老虎的爪子、牙齿都弄掉了，现在还怕你吗？我高兴地抱起它，我说：'张振江，你看着，我把吃人的怪物制伏了。'我用力朝地上一扔。什么事也没有。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当天我就起了十二个平台雷。我还起了三个挂在树上的照明雷。张振江要我教他，他马上就学会了，当天也起了三个雷。以后别的同志也学会了。别的单位的同志也有起了地雷的。我也到别的单位去做过报告。大家都学会了起地雷。我们军里一共起了五万七千多个地雷。①我们把敌人的地雷埋在我们阵地前面，有时候还把它埋在敌人阵地上，让敌人自己去碰响它，吃它的亏。"

姚显儒同志用手帕揩掉额上的汗珠，又端起茶缸喝了两口水。他默默地望着我们，好像在说：我知道的我全讲了。这全是很寻常的事情，恐怕不会叫你们满意吧。

---

① 这一句话是我加的。这是军政宣教科长告诉我的一个准确的数目。（作者）

我感动地望着他这张带着谦虚表情的长方脸。他的英雄事迹中所表现的非凡的勇敢和智慧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坐在他的对面，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朴实谦虚的人，过去的放羊小孩，破了敌人的地雷阵，战胜了美帝国主义者所夸耀的近代武器的威力呢？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农村里出来的战士用生命来表现他的恨，证实他的爱，替朝鲜人民报了仇，为祖国人民立了功呢？我听见人说，他受勋回来，只想马上回到他的班里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回到他的战士们中间去。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分子，他得继续守住他的岗位，他得继续守卫着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保卫着朝鲜人民的独立和自由。

"姚显儒同志，"卫生员来叫他去打针。我们也应该让他休息了。他站起来，我握过了他那双温暖的有力的手，望着他的背影在门外消失，我忽然想起，我忘了问他一句话：你现在晚上还会不会睡不好觉？这似乎是一个小问题。可是它常常苦恼着我。我想，在朝鲜问题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以前，他很可能永远睡不安稳，他很可能整晚想着他能够用什么方法去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更大的胜利。

然而我也用不着为他的健康担心，他现在活得很结实，以后会活得更结实。

他最后讲的让敌人碰上自己地雷的话，那是廖文亮同志的事迹。廖文亮同志是另一个师里的起雷英雄。这个年轻的战士一共起了六十七个地雷。有一次他执行了上级给他的任务，把他从敌人阵地上起来的地雷埋在敌人的防空洞里头，第

二天晚上他到埋地雷的地点去检查，扛回来一只脚上穿皮鞋的敌人的长毛的大腿。

1952年7月16日朝鲜前线。

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说明我的兴奋，来表达我的感情。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忘记了自己的软弱，我觉得我渐渐变成坚强，充满勇气和信心。晚上我常常激动得不能睡眠，我老是觉得有无数的人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叫着："为了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前进啊！"一想到这个英雄的声音，我就没法制止我的感情的波涛。我还记得一个多月以前，我住在前沿阵地的防空洞里面，一天晚上我走出洞子，走到洞前那个坡上。敌人的大炮已经打得少了。淡淡的月光中，我看见远近的起伏的山坡和坡上的灌木。我朝祖国的方向望，望那些我看了几十年的星星。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班长走上坡来跟我谈话。他问我："还没有睡？"我说："我出来看看。今晚上倒很静。战士们都睡了吗？"他答道："早吹过熄灯号，都睡了。战士们活动了一天，也该休息了。他们都睡得很好。"即使我看不见他脸上满意的笑容，单单从他的口气，他的声音，我也知道他爱他的战士。我又说："你太辛苦了，战士们太辛苦了。"他笑了笑，说："为了祖国，这算什么？战士们情绪高得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文学》十月号。

很。每个人都愿意为祖国献出他最大的力量。他们都是小伙子，积极，乐观，不叫苦。真教人喜欢他们。”第二天大清早我又站在同样的地方，不过朝另一个方向看，我在看前面从浓雾中露出来的山顶。炮声、枪声、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了一片，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那个山头。我走下交通沟，在一个洞口看见昨晚见到的那个班长。他正在跟他的那班“小伙子”讲话。“小伙子”们擦了枪，弄好了伪装，坐下来，分小组谈他们每个人的作战计划，他们带着兴奋的笑容来迎接新的任务。然而在他们出发之前，胜利的消息来了：一个班的战士打退了敌人九次的冲锋，缴获了不少的武器；敌人伤亡四五十，还丢下一具尸首。在接连的三天里面，分守三个山头的三个连的三个班的战士打了三个胜仗：缴获一次比一次多，敌人的伤亡也一次比一次大。“小伙子”在几个钟头里面变成了祖国的英雄。的确是像班长说的那样，我们的战士为祖国献出了他们的最大的力量。

昨天晚上我睡在山沟中一间“土屋子”里面，两个钟头的月夜行车的颠簸并没有叫我感到疲劳。听见敌机在头上飞过的声音，我想起前几天在另一个地方得到击落敌机一架的消息时的兴奋，我更想到一个多月前，在前沿阵地上听说击落两架敌机时的高兴。我们的英雄粉碎了战争贩子夸耀的所谓空中优势，替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们报了仇。我听过在敌机轰炸扫射下对空射击的英雄们的报告，那种英雄气概到现在还使我感动。我走出我的“土屋子”。天空中挂着明亮的星星。四处都是大树的黑影，整个山沟好像是一个花园。敌机的声音

渐渐地消失了。夜很静。凉气透过我的衬衣。可是我的心很暖和，因为我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

每天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动我，有一种爱在我的心中燃烧。我常常恨自己不是一个歌手，不能用歌声把英雄的事迹传到全世界；我常常恨自己不是一个诗人，不能用诗篇使英雄的事迹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但是想到跟英雄们在一块儿生活的日子，我就充满了感激，为了我受到的教育，和我得到的锻炼。我的拙劣的笔写不出英雄气概和英雄事迹，我把它们全保存在我的心里，在任何时候我都会记住它们。就是在昨天那样安静的夜里，我站在"土屋子"前面凉气透衣的时候，我还想到那些名字，那些面貌，而且听到那些英雄的声音。

是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想到陈三，那个在五次战役中坚守临津江北岸某山头的"独胆英雄"。三十多岁的北方庄稼人，说话时声音平板，还常常埋着头，一张没有特征的脸上老是带着谦虚的微笑。可是当他在阵地上看见同志们有的挂花、有的牺牲、敌人的枪弹打破他的夹衣，他对副排长说"只要有我陈三在，阵地就丢失不了，你放心吧，给我送点弹药来"的时候，当他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自己两耳被震聋、听不见炸弹声、衣服给敌机扔下的汽油弹烧着脱不下来、他用手撕掉又继续战斗的时候，他显出了何等的英雄气概！他不仅守住阵地、大量地杀伤敌人，而且更往前进占领了对面的山头。

我还想到郭恩志，特功八连的英雄连长，二十几岁的冀中青年。这个参军八年、负伤五次、不肯复员的人民功臣，讲话

有风趣，一张带着坚决表情的脸上有一对闪露智慧光辉的眼睛。谈到过去的痛苦和母亲的时候，他难过得流眼泪。可是谈到战斗的时候，谈到他在阵地上对排长们说“我们共产党的事业是摧不垮、打不烂”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特别发亮，他激动得眼皮眉毛往上一耸，额上现出几条皱纹；谈到打垮敌人、敌人狼狈逃窜的时候，他又会骂着“兔崽子”哈哈笑起来。就是这个人，他在阵地上坚守了三天，指挥着战士打退敌人强大兵力的多次进攻，歼灭八百多个敌人，子弹打完，用石头打，最后突围出来，还组织伏击袭击小组穿插到敌人中间，继续杀伤敌人，自己却只有极小的伤亡。他就在这次战斗中第五次负伤，最近才养好伤从后方回来。就是这个人，他跟你在一起可以谈一天谈不完，可以成为你的熟朋友，你觉得他极可亲近，要是没有人讲起，你不会想到他完成了这样惊人的英雄事业。

我还想到特功八连的指导员苏文禄，最近得到朝鲜政府颁发的二级战士荣誉勋章的英雄。朝鲜某郡女性同盟的几位年轻女子，曾怀着崇拜英雄的心要求看一看他的风采。他是一个脸色黑黄的年轻人，不论在言语或相貌上都没有一点惊人的地方。然而这位特功八连的指导员却是一个有全面性的英雄。他在去年年底坚守八八·六高地的战斗中立了特功。他不仅把组织、动员、鼓动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还打得勇敢顽强。他一个人就使用了各种武器打击敌人，在情势最紧急的时候，显出了无比的沉着和非凡的勇气，在短短的两天中间，歼灭了六百三十多个敌人，使郭恩志的英雄连成了保卫开城的钢铁连队。全军的人都知道他的功绩，他自己却不愿在

人前多提，提起它，他就要想到他那些在阵地上牺牲的战士，他的亲密的战友。也许正是因为他时时想念英勇的死者，他的脸上才带着一种严肃的表情。

我还想到苏文俊班长的朴实可亲的年轻的脸和略微突起的颧骨。这个放牛孩子出身的安徽战士一辈子没有穿过毛线衣(在庆功会上他第一次得到了一件毛线衣)。从小时候起他就看惯了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匪帮的暴行。他讲起话来，声音非常柔和(可是他谈到过去的痛苦日子，他的眼里也发射出愤怒的光芒)，他谈到最近在后方休养，院方叫他"病好后回家生产"的时候，他说："我不肯，我向医院要求，我无论如何不行。"他说："我哭罗，"接着孩子似地害羞地微微一笑。他高兴了。他在一个多月前回到部队里来了。坐在他的面前，谁也想不到他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钢铁英雄。他在今年一月初坚守涧子山的战斗中负了五次伤不下火线，两天功夫杀伤了一百多敌人，守住了阵地。我应该用更多的文字来说明他的英雄事迹，即使我知道在这方面文字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他的两腿给打了两个洞以后，他还扶着交通沟打手榴弹，指挥战士打退了敌人。第二天敌人再攻，他的右臂给打伤不能动了，他还用左手继续打击敌人。他自己说："耳朵聋了，头也有点昏了。那个同志也牺牲了，剩下我一个人。敌人又上来十几个，我用手榴弹把他们打下去了。我的左臂也打穿了，我不觉得痛，我只觉得发麻。我顺着炮弹坑来回地爬，来回地打。全身是血，两只手尽是血和泥，看不见肉。当时我只有火和恨，心里烧得厉害。"他就这样顽强地坚持着战

斗，一个人坚守一面；一个连的敌人又冲上来，他半边身子靠着交通沟，用牙齿咬开手榴弹的盖子，连续投了七十多个手榴弹，打垮了敌人的最后三次冲锋，完成了任务。

我还想到最近回国见到毛主席的副连长王永章。这个印刷学徒出身的打坦克的英雄，有一副聪明的相貌和一对灵活的眼睛。他脸上永远带着笑容，语言十分生动，你跟他在一起很容易感染到他那愉快的心情。有人说他是冀中青年的典型，事实上他是新中国的一个战斗模范。这个爱说爱笑的年轻人在去年五次战役中还是一个排长，他带着他那一排人穿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打毁了敌人的七辆坦克、四辆汽车，歼灭了几十个敌人，活捉了五十九个英国俘虏。在立下了这样的大功之后，他回到北京见毛主席，在毛主席面前讲不出一句话，只是握着毛主席的手掉眼泪。他事后对人说，他没有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他觉得他对不起毛主席。英雄的心就是这样纯真，这样谦虚的！

我还想到起雷英雄姚显儒，这个年轻力壮的班长，为了征服敌人的地雷，替挂花的阶级弟兄报仇，许多夜睡不着觉。有一次他带一个小组出去侦察出击的道路和敌人的情况，到了敌人的流动阵地，冒着生命危险，用牙齿咬断地雷的拉线，扭下撞针，取下雷管，把敌人的地雷起出带回自己的阵地。他不仅自己起地雷，还教会同志们起，带动同志们起；不仅把地雷埋在自己阵地上，也埋在敌人的阵地上，用敌人的武器，杀伤敌人。这个十多年前甘肃省的放羊孩子，过去挨过不少地主的打骂，母亲讨过饭。可是今天他大破了美国侵略军的地雷

阵，为祖国人民立下了大功。我坐在他的对面，听他用激动的语调说“我又想：人家刘光子一个人活捉六十三个俘虏，我姚显儒就不能制伏一个地雷？我越看越着急，难道我怕死?!”的时候，望着他那张诚实、谦虚的长方脸，我觉得这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在搅动我的心，我又感到了革命大家庭中无限的温暖。

我接着就想起姚显儒提到的刘光子，去年五次战役中的一个战斗小组长。我听过歌颂他的英雄事迹的合唱和大鼓，也听到不少次他只手生擒六十三个俘虏的英雄故事。这个平时不会讲话、见着生人就拘束到连饭也吃不饱的绥远省庄稼汉，他会拿一支冲锋枪和一个飞雷跑到半山去追击溃逃的敌人。当他消灭了这批敌人正打算回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石碑后、山下面，还有一大群打乱了的敌人拿枪口对着他，在等着抓他做俘虏。就在他听见嘈杂声转过背来的时候，就在他一个人对付一百人必须在生与死之间选择一条路的时候，他在一刹那间表现了无比的镇定和勇敢，他端起冲锋枪扫射敌人，等到子弹打完，敌人扑上来捉他的时候，他大吼一声，在成群的敌人中间投下那个飞雷，趁着敌人血肉横飞乱成一团的时候，他再装上一梭子弹。他那四方脸、紫红脸膛、宽肩膀、魁梧身材的雄姿和他那吞日月、贯长虹的英雄气概使得那一群脱离了大队的英国皇家军失魂丧胆。除了逃掉一部分外，六十三个敌人全做了他的俘虏。他把他们编好队，一个人押着六十三个俘虏向着那两个在山头掩护他的年轻同志走去。

我又想到在后方医院休养的张渭良，一个被称为“坚强战士”的英雄。这个三十多岁的上海附近的翻身农民，为了保护

祖国的母亲和孩子，带着自己的兄弟来到朝鲜。他在执行任务时误踏敌人的地雷，身负重伤。他靠了完好的右膀和右腿，一个人爬行了十天九夜，从敌人的阵地爬回到自己的阵地。他爬过敌人炮火封锁线；他爬过铁丝网；他用牙齿咬断拉线起了三个地雷；他用三根木棍架在小河上把受伤的左腿和左膀放在木棍上，把完好的右腿和右手放在水里，过了一条小河。他的伤口溃烂，脓水外溢，苍蝇叮了他满身，蛆不住地往外爬。他勉强坐起来，用树叶赶开苍蝇，用小树枝挖走蛆虫。十天九夜他没有吃一点东西，只喝过很少的凉水。他不断地晕过去，醒转来又继续往前爬。他忍受雨淋日晒，整个背和屁股、两手两肘都磨出了血，他还是坚持着不断地朝自己阵地的方向爬去。到第十天他终于到了自己的"家"。他看见来接他的副排长，说了第一句话："我总算回来了。"他的鼻子烂了，脸瘦得不像人样，出气也很微弱。可是他没有哼过一声，脸上始终带笑。这个人，当他准备从敌人的阵地上爬回来、从裤袋里掏毛巾、抽出那根被打断的两寸长的股骨又放回去的时候，当他疲乏地躺在地上看着苍蝇吃他的脓血、蛆在他身上乱爬的时候，当他爬了五六天快爬上了一个山头被敌人发觉用机枪打他、他又滚下山去的时候，当他渴得没有办法嚼草茎取水的时候，他在想着什么呢？他想着他小心地保存在衣袋里的日记本上毛主席的照像么？想着革命大家庭中亲爱的阶级弟兄么？想着他家里年老的母亲和他从前因为没法养活而送掉了的亲生女儿么？他躺在病床上对一个文工团的同志说："我是代表中国人民出来的，我不能给中国人民丢脸。"看，就是这样无比坚强

的人！这样无比坚强的心！

我又想到李江海，那个把生命献给革命、献给祖国人民的烈士。我来得太迟了，我没法看见他的英雄的面貌，可是我读到了他在牺牲前写下的遗书。这个河北农民出身的二十四岁的机炮连副连长，在指挥重机枪对敌机作战打落敌机一架之后，和其他十位同志被活埋在一个洞子里面。洞口被敌机炸塌了。他曾经组织大家挖开洞口，可是刚刨开一层土，就碰上大石头，在前头挖的一个战士停止呼吸倒下，他和别的同志也感到死亡的逼近。他知道他们没有生存的希望了，便把大家唤到休息洞里去。他照料大家睡好在炕上，他也睡下来，铺好雨布，盖上大衣，枕着包袱，侧着身子，用手电照着，在一张通报的背面写下他的遗书：

> 丁连长，曹政指，张副政指：
>
> 我们为了祖国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们就是死了，也是为革命，为人民，为父母。这是光荣的。我们请你们给我们报仇，来消灭美国鬼，才是我们的希望。你们对(给)我们报仇！别不多说。祝我们革命胜利！
>
> 李江(海)

他来不及写完他的姓名的最后一个字就停止了呼吸。这个人在他感觉到死亡逼近的时候，他没有一点生的留恋或者死的恐怖：他想到的不是他个人的事情，却是祖国人民，却是他的战友，他的同志；他希望的是敌人的灭亡和革命的胜利。他有

着这样深厚的爱和这样坚强的信心，所以他能够死得那么从容，所以同志们挖开洞口看见他的遗体的时候，他的脸显得非常安静，就像在睡觉一样。他牺牲已经七十天了，可是现在我默诵他的遗书，用我的心去了解他的心，我好像受到一阵阳光的照耀似的。

我又想到李吉武，那个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烈士。那个三十多岁、近视眼、有胡子的忠厚老实人从小就卖到地主家里挨打受苦，他自己说是“旧社会把我打大的”，然而新社会叫他翻身做了一个新人。七十天前他带了一个小组参加保卫开城的一次战斗。小组的同志一死一伤，他一个人打退敌人几次的冲锋。手榴弹打完了，他又顺着交通沟拿了一箱手榴弹，打得只剩了两个，他被五六个敌人包围，他就拿着这两个手榴弹跑下去，跟敌人同归于尽，保住了阵地。后来卫生员看见他靠交通沟口站着，喊他，他不应，走近一看，原来他已牺牲，但是尸首直立不倒。他真像古代传说中的英雄烈士，死了还站在阵地上怒视敌人，守卫阵地。

我的思想不会中断，它一直在进行。还有无数的人，无数的名字……是我想不尽的——抱着为祖国人民争光的决心跳崖的八勇士，用一只手按住自己的打出来的肠子、一只手打机枪的侦察英雄蔡金同以及许许多多活着的和牺牲了的英雄人物。英雄的人物太多了，光荣的名字太多了。英雄们不断地在成长，英雄们不断地在产生。英雄的故事是说不尽、写不完的。

这里好像是美丽的花园，开放着满园的红花。这里好像

是秋夜的星空，密布着一天的繁星。星星就像英雄们的眼睛：它们照耀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一样照耀在祖国的土地上；它们保护着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也保护着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生活在这样勇敢坚强的人们中间，整天接触这样崇高、伟大的心灵，听到响亮的英雄的声音，永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推动我前进。英雄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是很响亮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是从千千万万的英雄的心中发出来的声音："为了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前进啊！"祖国永远在英雄们的想念中。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祖国，你是多大的力量啊！英雄们知道应当怎样为着你活着，怎样为着你死亡。英雄们为着你一直不停地在前进，祖国的一切儿女都一直不停地为着你在前进。今天我虽然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我却没有从祖国带来一支有力的写史诗的笔。但愿朝鲜战场上的英雄的事迹传遍祖国，但愿朝鲜战场上的英雄的声音响遍祖国，让祖国人民响应着这个响亮的声音，用同样的步伐前进吧！

1952年8月7—8日在朝鲜前线。

保卫和平，保卫朝鲜的母亲和孩子

一种严重的罪行在这个国土上进行了两年，而且一直在继续扩大。朝鲜的每一寸土地都染满了它的爱好和平的人民的鲜血。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作为在朝鲜前线的一个中国文学工作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我要求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十六亿人民起来制止这种违反人道的大罪，扑灭朝鲜的战火，保护朝鲜的母亲和孩子。我有责任替朝鲜的母亲和孩子讲话，因为我现在还在这个受难的英雄的土地上，跟朝鲜的母亲和孩子生活在一起。我看见了战争破坏的家庭和炸弹毁灭的城市，我看见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的苦难和斗争。

朝鲜，这个山青水秀的国家，这个优秀的热情的民族。到过朝鲜的人都赞美朝鲜人民勇敢、乐观、刻苦、耐劳。他们能歌，善舞，爱和平，爱生活；喜欢穿颜色鲜明的衣裳，希望过安宁幸福的日子。年轻的母亲背着孩子在田野工作，老年人拿着锄头在挖土筑路。工厂在冒烟，矿山在生产，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他们从没有损害过美国人的一根头发，也绝不想改

变远隔重洋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终日终年不休息地埋头生产，用自己的劳动建设祖国，只希望和平给他们带来幸福。朝鲜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是爱好和平而且需要和平的。

朝鲜人民不仅愿意跟他们的邻人和平相处，他们也愿意跟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和平相处。可是美帝国主义者毫无理由地侵占了朝鲜的国土，把千万吨的炸弹投在繁荣的城市和平静的乡村，侵略的军队用种种野蛮、残酷的方法屠杀和平的人民。我能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明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欠下的一笔血债呢？我能够用什么样的描写来说明那些千人塚万人坑的残酷景象呢？

朝鲜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激动了中国人民的良心，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意志。当朝鲜的妇女被凌辱、老弱被残杀、年轻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血保卫他们的祖国的时候，中国人民派遣了他们的优秀的儿女组织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并肩向前，用他们的血巩固了两个民族的友谊，打退了残暴的敌人，保全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中朝人民提出的和平建议。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希望在开城板门店的停战谈判中间，美国侵略者能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接受中朝人民的公平合理的和平条件，停止对朝鲜的侵略战争。

可是美国侵略者别有用心。他们不愿意和平。他们不仅千方百计地拖延谈判，他们甚至在谈判的期间使用各种阴谋毒计破坏谈判，并且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争，屠杀和扣留中朝的战俘。最近为了宣传他们的所谓“空中优势”，实施他们

的所谓“军事压力”，更加紧进行着对朝鲜母亲和孩子的空中屠杀。他们扬言要轰炸七十八个朝鲜的城市，但事实上连僻静的乡村也成了美国飞机攻击的目标。

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向你们叙说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伏在地上等待炸弹落下时的心情；我也没有必要用断腿裂肢、血肉横飞的惨象给你们带来痛苦。我读到平壤连续被炸的记载时所经历过的那些痛苦的不眠的夜，你们也许不会了解，因为你们没有看见那里的求生欲望极其强烈、脸上常带笑容的和平、善良、热情的人民。我只向你们叙述两件乡村里的小事：一个夜晚，美国飞机投下的照明弹挂在我的“地屋子”对面的山上，把“地屋子”门前照得像白天一样的时候，一个朝鲜母亲背上背一个孩子，手上牵一个孩子揭开“地屋子”的雨布跑进里面来，连说着：“飞机，真要命。”我应该用什么话去安慰这个朝鲜的母亲呢？另一个黄昏，我到几天前我去过的一个村子里。一个老人正蹲在自己的被烧毁的房屋前面，望着瓦砾堆出神。我跟他讲话，他许久都不做声。他茫然地望着我，眼光里有仇恨，有痛苦，还有别的我一时不能了解的东西。我知道敌机炸毁这房屋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和四个小孩当场死去，还有三个小孩负伤。想到那些爱唱歌爱跳舞的朝鲜孩子，我应该用什么话去安慰这个朝鲜的父亲和丈夫呢？我应该对受苦的、和平的朝鲜人民讲些什么话呢？

你们和你们代表的十六亿人民知道应该对他们讲些什么话。你们有力量安慰受苦的和平的朝鲜人民。因为你们有力量扑灭战火，保卫和平。是的，你们必须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

略战争，制止美国侵略者屠杀朝鲜人民的罪行，保护朝鲜的母亲和孩子。

朝鲜现在是保卫世界文明的最前线，朝鲜人民英勇地跟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努力保卫和平。他们坚决地跟美帝国主义者一切罪恶的侵略暴行作斗争，来保卫和平，来保护被伤害的母亲和孩子。保护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也就是保护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母亲和孩子。因为要是人们不在这个受难的土地上打退敌人，扑灭侵略者的气焰，要是人们不在这里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毒计，那么朝鲜的今天也可能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许多国家的明天，谁都知道美国飞机一向就轻视地图上的国境线。

我亲眼看见这里的苦难和斗争，我认为我有责任替那些住在地窖里，住在山脚下草棚中，住在简单的防空洞内，住在破旧的茅屋里的朝鲜的母亲和孩子说话，替那些冒着敌人炮火在邻近前线的田地上种稻种菜的朝鲜妇女说话，替那些在敌机威胁下在学校里念书唱歌的儿童说话。朝鲜人民不仅是为着自己的和平与幸福在斗争，他们也是为着全亚洲、全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为着全亚洲、全太平洋区域的人民的幸福。朝鲜的斗争是对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一个警告。现在不是隔岸观火的时候。大家必须起来及时把火扑灭，免得一个地方的火延烧到全个区域。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是不会忘记在苦难中的朝鲜的母亲和孩子的。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关心着在北京召开的这个会议。他们相信你们和你们所代表的善良的人民会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扑灭战火，保卫和平。那么让大家

撇开思想、宗教、语言、民族、制度的差异，紧密地团结起来，为着保卫朝鲜的和全亚洲、全太平洋区域的母亲和孩子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吧！

1953年9月15日

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

从连队回到师政治部的那天晚上，我跟刘主任闲谈连队里的一些事情。话题忽然转到另一个连队上面，我提起那个在敌机轰炸后埋在洞子里过了四十四个钟头的青年团员，他说："明天找他来跟你谈谈吧。"

第二天正午，我在屋子里看书。有人在敲窗门。我走到廊上去看。王科长带了一个年轻的战士来找我。不用介绍我就知道他是什么人。我请他脱了鞋进屋来，在炕上坐下。王科长借来一张小桌放在他跟我的中间，他就伏在这张小桌上，把他的姓名写在我的笔记本的第一页：赵杰仁。字写得端正，用笔也熟练。他也有一册《学习日记》，好几页上面都写满了字。他一定记下了不少的东西。

我坐在他的对面，注意地望着他。他一开口就露出笑容，露出一排白牙齿。他说起话来，我便知道他是广东人，问他，他原来生在新会县。我到过那个地方，可以跟他谈一些那里的事情，谈起来，更容易同他熟习。他讲话的时候，笑容就没有离过他的脸。他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年轻小伙子。我见到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文学》十一月号。

他好像见到一个老朋友。他不是没有特点。他有的是一般广东的青年战士的特点。聪明，活泼，乐观。身体也许不算太结实，但是意志非常坚强。这样的年轻人，我在连队里见过不少。我知道他会唱歌，因为我听说他埋在洞子里的时候，唱过《东方红》。我想他一定喜欢跳战士舞，问他，他笑着点点头。

这样随随便便地问着答着，我们很快地就相熟了。他抱着两腿坐在炕上，没有拘束地谈起他的故事来：

"八月八号那天下午四点钟，三架美国飞机在我们阵地上丢了弹。伙房冒烟暴露了目标，给敌机炸中了。我们的洞子离伙房不远，给震塌了。外边那个炕① 上有四个同志。我一个人坐在里边的炕上。我们都给埋在洞子里头。洞口封住了，洞子里头架的木头也掉下来了。可是炕上的土还没有塌下来。如果炕上的土也塌下来，我也就早完了。那个时候我正坐在炕上吃饭，吃了三口饭，洞子就塌了。我的碗也震掉了。腿上脚上都堆了些土，我站不起来。我只能够侧起身子躺在炕上。什么也看不见。我首先觉得冷，便伸手在墙上摸，摸到一件衬衣，取下来穿上，还是觉得冷，又伸手去摸，摸到了衣服，也取下来穿上，觉得好多了。我就安安静静地躺着。我不知道时候的早晚，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觉得肚子饿

① 我睡过这种"炕"。这种"炕"跟朝鲜的"炕"不同。朝鲜屋子里的"炕"类似日本屋子的"铺席"，不过下面可以生火罢了。这种炕颇像我们过去有过的一种神龛，不过比神龛大，比神龛深。一个小的炕上可以睡两个人，大的可以睡好几个人。炕上铺草袋、雨布或草。夏天里很潮湿，被子铺在炕上，过两天就发潮了。

了，我想找点干粮来吃。我又伸手到墙上去摸，起先摸到一块肥皂，后来又摸到另一个饭袋，里头还有两块饼干。我把饼干吃了。过了一阵我忽然觉得口渴得不得了。没有水喝。后来喝了两口自己的小便，才捱过去了。我静下来，就可以听见外面的声音。同志们挖土的声音也听见了。听见他们挖土的声音我就唱歌。可是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外边的那个炕在八号晚上十二点钟就挖出来了。四个同志都救出来了。我当时听得很清楚。"他歇了歇，拿起茶缸喝了两口水。

"你着急不着急？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十二点钟挖出来的？"我问道。

"那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我当时并不着急。我知道我的炕离洞口有六七公尺，挖起来很费事。所以他们挖了很久，挖了三天，挖到十号上午十点钟才把我挖出来。他们起先还以为我牺牲了。我一点也不着急。我相信同志们会把我挖出来。我听见挖土的声音就唱歌。听不见声音就睡觉。有的时候我还伸手到处去摸。我后来摸到一个水壶，又把我那个饭碗也摸到了。我拿饭碗敲着水壶。外面听不见这个声音。我唱歌，外面也听不见。可是我并不灰心。到十号上午我听见外面同志们在说：'听，快刨，还有声音！'我又敲碗，又唱歌。同志们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挖你出来。听见没有？听见了，就敲。'我又敲碗。他们讲话，我就不做声。他们不讲话，我又唱歌。我跟他们讲话，他们还是听不见。最后我听见外面的同志在讲：'看见腰了。'我很兴奋，就对他们说：'你们挖得太低了。你们挖高一点。'他们果然就往高处挖。刚挖通一个小眼，

我连忙用手去扒，想把眼弄大一点。可是土马上又塌下来，连小眼也看不见了。等到再挖出眼来，我就叫外面的同志递一把锹进来。我自己也从里头挖出去。挖通了。同志们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他们拿一条被子把我包住，一个同志背起我就跑，把我背到一个洞子里头，找卫生员来给我打了一针。我刚刚看见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觉得头晕眼花。等到打了针以后，我就能够站起来走路了……”

他孩子似地笑了笑，好像他叙述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我注意地看他的脸。黄色的年轻的脸上浮现出衷心快乐的微笑。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到过去的阴影。他的眼光朝我这面射过来。我们两个人的眼光遇在一起了。他的快乐，他的胜利的信心，他的年轻人的勇气传染了给我。我觉得有一股热力传到我身上。我的脸上也现出快乐的笑容。我真要快乐地大笑几声。

“你会唱很多的歌子吧？”我带笑问道。

“会，”他笑着点点头。“那两天我就唱三个歌子，反复地唱三个歌子。我唱《王大妈要和平》，是想到我们是保卫和平的战士，我们有力量打败美国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我唱《东方红》，是想到毛主席领导我们向胜利前进。我唱《歌唱祖国》，是想到祖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想到祖国的伟大，想到祖国的可爱。”

“你当时怎么能够这样镇静？这样从容？”我感动地问道。

他又笑笑，大声回答说：“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想到我自己。我的心很安静。我想我就是牺牲了，同志们也会给我报仇。”

“对，你想得对，”我点头说；接着我又问他一句：“你们现在还挖不挖工事？”

“还在挖。每天从六点起挖到夜两点。今天早晨三点钟我就从连部出发了。”

“那么你昨天晚上没有睡觉吧？”我惊讶地问。

“我不累，”他笑答道。

“你躺躺吧。现在时间还早，你休息一会儿。”我站起来把一个小背包递给他做枕头，接着又说：“我也躺躺。”

我就先躺下来。他也跟着在我对面躺下了。

“你是哪里的人？”他笑着，像对一个同年纪的朋友讲话似地问道。

“四川人。”

“我们连里四川人也不少。他们都是去年参加抗美援朝来的。年纪都很轻。干起工作来，劲头真不小。”

“你们广东来的战士不也是一样的？你今年不到二十吧？”

“说是二十，其实只有十九岁，”他调皮地笑了笑，“前年年底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只有十七岁，怕人家嫌我年纪小不要我，我多报了一岁。”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常常通信吗？”

“我家里有一个母亲，一个哥哥，一个兄弟。他们都过得好。我出国的时候寄过一封信。今年一封信也没有寄回去。”

“为什么不写信呢？你没有功夫吗？”我奇怪地问。

“我打定主意要立个功才写信回家，”他严肃地、坚决地说。

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霎霎眼睛，带笑地望着我，小声说："我们今天要打小仗了。"

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便不多问，只顺口说了一句："你参加吗？"其实这是多余的话。要是他今天有任务，他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不是我们连里的任务。我先前在营部才知道。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要求参加，上级不答应。不过我想，以后机会还很多。"

"对，以后有的是机会，"我顺着他的口气说。

他笑笑，把两只手伸上来，放在脑后，眼睛望着屋顶那根写着中国字的横梁，好像在思索什么似的。

"你睡吧，睡一会儿起来再谈也好，"我说。

"我不累，"他笑答道。

可是不到两分钟，他就闭上眼睡着了。他睡得很熟，睡得很安静，脸上还带着年轻人的微笑。

傍晚，我们的大炮向着敌人的炮阵地连续发射的时候，我们的爆破组炸毁了敌人的地堡的时候，我们的出击的小部队歼灭了敌人、顺利地占领山头的时候，赵杰仁同志正迈着年轻人的坚定的脚步走回他的连队去。我不知道他走到什么地方才听见我们的炮声。但是我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快乐的心情。胜利的消息在等着他。他不会因为自己没有直接参加这次的战斗感到遗憾。同志们的立功事迹只会加强他的立功的决心，

正如他的英雄气概也鼓舞了别的同志的战斗情绪。这次的胜利里的确有他的份儿。他在洞子里唱的歌声一定鼓舞了那些以无比的勇气冲上敌人阵地的战士。连我一个从祖国来的文学工作者也会长久地记住他的歌声，何况那些跟他一块儿生活、一块儿工作、一块儿战斗的战友！他只是我们无数的最可爱的人中间的一个。我早就从他的笑容里看到了今天傍晚的胜利，而且还看到以后的许多更大的胜利。

1952年9月6日在朝鲜开城。

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

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地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的日子的记忆。明天汽车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透过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离开这个战斗的国土，我没有向一些朋友告别，我无法使自己的心安宁。我不能够沉默地离开那些给过我不少帮助的朋友。我即使不能回到他们的身边，我也应该借纸笔来说明我的感激的心情，我更要把这感激带到我的生活中去，带到我的工作中去，让朋友们知道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也能够用薄弱的力量来报答他们的关怀和鼓舞。

今天是我留在这个美丽的国土上最后的一个完整的日子。窗外是阴暗的天，风吹动松枝，溪水带着单调的声音流过

* 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时题为《向朝鲜战地的朋友告别》。

山石中间。偶尔响起几声清脆的鸟叫。山沟里看不见一个人。这是我在朝鲜的生活中唯一的安静的日子。

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别的景象来扰乱我的思想，来拘束我的思想。我的思想自由地奔跑着。它跑过不少的地方，它跑到了我的每一个朋友的身边。我的思想完成了我的心愿。它让我跟我的朋友们一块儿度过这个访问朝鲜的最后的一天，它让我有机会向所有的朋友告别。

纸笔放在我的面前。但是我的笔追不上我的思想。在纸上我只能写出几个朋友的面貌，和几段告别的话。在心里我想的却是我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朝鲜战地上的朋友。

徐申同志：这四个月来我常常想到你，想到你脸上的笑容，想到你的响亮的声音。你谈到去年国庆节你归国观礼在天安门看见的景象，谈到在北京意外地见到母亲的情景，那时你多么地兴奋，你不止一次地哈哈大笑过。但是你听到美国侵略军在巨济岛上虐待中朝战俘的消息的时候，你又是多么地激动：你的眼睛发火，浓眉竖起，好像有毒虫在咬你的头，你不能安静地坐下来，你几次说你要把这个消息传达给同志们，要大家替战友们报仇。跟你在一起我什么时候都感觉到你那颗爱憎分明的心。你谈过你的过去：父亲让地主打成了残废，母亲挨过日本鬼子的刀，你自己几次冒着生命危险跟汉奸斗争。你这个热河省的年轻农民生就了一个坚强的性格。所以你抗美援朝参加志愿军以后，在第一次的战斗里就成了一个英雄。现在你的英雄事迹已经传遍了全军。不少的人知道你在去年铁原阻击战中坚守二三三点二高地的辉煌战绩。在六月一日

那天，在同志们打退了美国侵略军骑一师一个营兵力的两次猛攻之后，剩下你一个人在阵地上坚持战斗，除了手榴弹外，你还连续使用三种武器，打垮了敌人的四次冲锋，一个人杀伤了六十几个敌人，守住了阵地。当敌机在阵地上投汽油弹你用土扑灭你左膀上的火的时候，当排长被炸牺牲你流着泪发誓要替他报仇的时候，当你在炮弹连续爆炸的中间从一个炸弹坑爬到另一个炸弹坑去拿回牺牲同志的机枪的时候，当你第一次使用你从未用过的冲锋枪和机枪的时候，你的心情，我想我是了解的。你有一次自己说过："阵地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想：只要有我在就有阵地在。"你说得不错。你活着就得完成上级给你的任务，而且为了完成任务你准备献出你的生命。用自己的血来证实你的深切的恨和深厚的爱——你这种英雄气概，不仅教育了我，也一定会教育祖国的人民。到现在我还记得四个多月前的那个傍晚，你沿着田坎朝山上走去，频频地回过头来看我们，我们几次向你挥手。我一直怀着惜别的心情望着你翻过山岗，我真想唤你回来再跟你谈一夜的话！可是想到你的工作，想到你的充满血丝的眼睛，我又不愿意多耗费你的时间。我只希望还有机会跟你再见，而且看见你身体健康。果然在"六·二五"，你去参加朝鲜政府授勋典礼的时候，在九月的功臣代表大会上你作典型报告的时候，你的红红的脸，发光的眼睛和生动的语言全给人一个健康的印象：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这正是朝鲜画家画笔下的英雄，也正是本部队文工团同志们歌唱的功臣。有千万个像你这样的健康的和平战士守卫着朝鲜的前线，祖国的孩子们的幸福生

活才有了保障。让秋风把祖国孩子们的欢乐的歌声送到你和你的同志们的耳边吧，这歌声会引起你的衷心快乐的微笑，我知道你喜欢孩子，也许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陈超同志：孩子们的歌声一定会给你唤起不少痛苦的回忆，但也会给你带来温暖。因为你是一个女孩的父亲。旧社会使你跟你的孩子分开。新社会让你给你的孩子带来光荣。过去的痛苦日子不过是一场梦魇。你已经在新社会中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勋。你这个被称为"机智顽强，英勇沉着"的英雄战士，国寺峰阻击战中的独胆英雄，你和五班长守住最前沿的一个突出的山头，你在五班长牺牲以后一个人打退了敌人几次的冲锋，使美国侵略军不能前进一步。你熟悉《三国演义》的故事。你自己讲过你用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妙计，把自己的帽子和班长的帽子用树枝支在工事上，本人却躲到一棵大树后面，就在这棵大树后面你用两支冲锋枪轮流向左右两面扫射，打得两路敌人抬不起头来，不知道大树后面就只有你一个人。你打了六个钟头，终于守住了阵地。你这个四川省永川县的庄稼人，当你在去年国庆节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和受检阅的队伍的时候，当你参加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看见全体起立通过颁发抗美援朝纪念章的决议的时候，当你和徐申同志在今年"六·二五"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你在想过去三十年的受虐待的日子吗？你在想那个在你姐姐家中养着的女儿吗？你在想前沿阵地上防炮洞里的同志们吗？不，我知道，你在想幸福的今天和更幸福的

明天；你在想怎样杀更多的敌人，立更大的功勋；你在想为下一代献出你的一切。我知道你对我们的下一代有着深厚的爱，不仅因为你对我讲过你的女孩的事情，而且我还记得在北京学校里念书的几个小姑娘跟你通信，向你挑战，帮忙你学习文化的故事。你谈起她们的时候，不自觉地流露出父爱般的感情。今天在这静寂的山沟里，我仿佛还听见你的热情的语言，还看见你的紫红的脸膛，好像你就坐在我对面，神采飞扬地对我谈你的战迹和你克服困难学习文化的成绩，我还记得：那天你坐在朝鲜老百姓家的廊上摘下二级战士荣誉勋章给我看，章上现出一个英雄的雕像，像下有一行朝鲜字："为了祖国。"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你的时候，你含笑点头说："对，为了祖国。"你接着就谈起你的未来的计划和伟大的抱负。我相信你的计划和抱负都会实现，也祝它们早日实现。到了那个日子，到了你为祖国立下更大功勋的那一天，我要再到你的面前，听你用更热情的语言讲你一生中最美丽的事情。

曹邦国同志：我听你讲过三次你的战斗的故事。可是我一直记住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时、冒着小雨走下山去到一个朝鲜老大娘家中坐在廊上谈话的情景。你说你"不会讲话"，你的确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老实人。但是你这个从甘肃农村里来的副排长，去年五次战役中一个三十四岁的班长，你却完成了英雄的事业。你不仅勇敢顽强，打到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打到头部负伤、右臂负伤的时候，你还坚持战斗，坚守阵地，而且在本排接受任务以后你还在党小组会上提出"战斗打响前全力突击工事；战斗打响后坚决顽强地战斗"。在战斗进行的中

间你还跑到前面去观察敌人，建议排长怎样使用火力，打垮敌人的进攻。你们连续打退了敌人五次的猛攻，最后打到弹尽人绝、敌人上来捉俘虏的时候，你还用右臂端着冲锋枪拿左手勾机打死两个敌人，以后又用手榴弹打死另外的两个。你保住了阵地，也保全了自己。每次我看见你那黑红脸上谦虚的笑容，听到你那诚恳的谈话，看到你那些叫人感到亲切的农民的动作，我就会想：这样一个善良的中年人怎么能在铁和火的战斗中间显出叫好几百装备优势的敌人胆寒的英雄气概？怎么能在杀伤两百多个敌人之后，还保住了阵地？我常常想：当你们打垮了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把敌人打得“五零四散妈妈老子地叫唤”的时候，当你的头部挂花、你用手巾缠住伤口的时候，当你打得眼睛发红、嚷着“狠狠地打！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当两个敌人拿着枪对你瞄准、要你缴枪投降的时候，当负重伤的排长跳崖、你突然用冲锋枪打倒那两个敌人的时候，在你那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心里燃烧着的是什么呢？应该是永不磨灭的深厚的爱和深切的恨吧！祖国人民为了这个会感谢你，朝鲜人民为了这个会感谢你。那一天，我到阵地上去找你，没有见到的时候，我想象着你和同志们背着树枝从高山上走下来的情景，朝鲜的美丽的山岭也因为有着像你这样的打柴人显得更加光彩了。

杜振棠同志：关于你我已经写过几百字，在祖国也有人知道你的英雄事迹。你这个感情深厚的热河省的放羊孩子。你的真挚的微笑和恳切的语言常常牵住我的心。我想着你就想着那整个的连队，想着那个慈母似的郭连长和弟兄似的王指

导员，想着亲人一样的全体干部和同志，想着围绕在你们四周的勇敢、勤劳、善良的朝鲜人。我没有实践我的诺言：回到你们中间生活一个时候；但是我永远记住：通过你们的实际行动所表现的中朝友谊。我永远记住：你冲进烈火、冒着敌机轰炸、替朝鲜老大爷抢救衣物、上房拆屋、烧伤右腿的英雄事迹；记住你带病工作、翻山越岭、不吃饭、不休息、守住总机五天三夜、不让电话中断的英雄事迹。朝鲜的战场上有着很多像你这样的电话员，也有着更多的帮助老百姓工作的好战士。但是每当暴雨倾流、夜黑如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从连部翻过小山回到总机班的情景。我希望雨不要湿透你的衬衣，我希望沙泥不要使你滑跌。在分别四个多月之后你突然站在我的面前，依旧是紫红色的脸膛，依旧是发光的眼睛，依旧是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我握着你的手，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地高兴。为着你那一句“大家都好”，我应该感谢你。而且为着你给我带口信回去向大家问好，我更应该感谢你。

谭章学同志：我想不到那天会和你再见。可是以后我在会场里找你，想再跟你谈几句话，却始终没有见到你的面颜。我知道你在会场里头，可是在一两分钟的功夫，我怎么能够在那许多人中间找到你呢？你听到一等功臣刘四同志的英雄事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他的事迹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鼓舞，你比别人更了解刘四同志的心情，因为你们同样是英雄的高射炮手，同样是抗美援朝的人民功臣。他的经历也就是你的经历，他的痛苦和欢乐也就是你的痛苦和欢乐。当你听到刘四同志被汽油弹烧伤，阵地被烟火包围，大家努力扑火的时候，当你

听到刘四同志在战友牺牲后打落一架敌机替同志们报仇的时候，你一定想到了你自己的英雄事迹，因为我在三个多月前就听见你讲过有一次敌机在你们周围造成一片火海，四炮手牺牲，同志们把火扑灭，继续向敌机发炮；就听见你讲过你们用头三发炮弹打落了一架敌机。现在你们已经成了美国空中强盗的惩罚者，朝鲜和平人民的保护人。“以前是敌机来找高射炮，现在是高射炮去找敌机。”这句话所表现的敌我力量的消长，这句话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也可以用来说明你们为祖国人民立下的功勋。你们谦虚地说，这只是一点小小的功劳，那么让我在祖国等着你们的接连的喜报吧。

李平同志：我们分别不过一个月，可是你的面貌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功臣榜上没有你的名字，然而称你做“一个最可爱的人”，你应当毫无愧色。跟你在一起生活的半个月中间，我得到不少的益处。在做人和处理事情两方面，我都得向你好好地学习。作为一个副连长，你把战士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待。再没有人比你更爱兵了。要是战士受到一点委屈，你的脸上就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时常想起我跟你一块儿去看望病号的那几个黄昏，你多么殷勤地照料病人的饮食，关心病人的生活。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一个夜晚你花了半点钟以上的时间耐心地说服一个同志，我听完了你那些入情入理的话，跟你一块儿出来，雨丝凉凉地打在你和我的脸上，我想到你头天夜里带病视察工事掉在水坑里，今天一天吃不下饭的事情，当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说：“副连长，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听见你的疲劳的应声，我在暗中掉了眼泪。那些被雨冲塌的、被水

淹没的洞子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能够休息呢？你怎么能够想着你自己的疲劳、你自己的感冒的小病呢？我常为你额下那个时常流脓的小伤口担心，可是你总是带笑地说不要紧。你的亲切的笑容就像冬天的太阳那样给每个人带来温暖，使每个人在你的身边感到快乐。你这个二十六岁的热河省庄稼人，喜欢谦虚地说你没有文化。可是听你谈起话来，你懂的道理比别人懂的多，懂的深。你实在是一个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你为了这个时常感谢你的"先生"，一个负伤休养的指导员，你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前线背下来。他过去念过不少的书报给你听，让你更清楚地认识真理。所以你现在也帮助别人把这真理了解得更透彻，而且你更把这真理贯彻到你的工作中间，你的生活中间。我听见你对一个班长讲起祖国人民的支援怎样使你感动。你对我谈过你有完成上级给你的任何任务的决心。我仿佛看见了在你心中燃烧着的伟大的爱。我相信你的决心。愿祖国人民也知道你的决心，让他们用更大的爱来回答你的爱吧。

我写了一天，还写不完堆积在我心上的那些告别的话。窗外正刮着冷风，寒流突然来了。出发的时间就在眼前，不容我从容构思、从容落笔。而且感情到了最深的地步，也不能用语言文字来表达。……那么，让这些点子代替千言万语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吧。

1952年10月10—11日在朝鲜。

后　记

在朝鲜住了七个月，就只写了这么短短的十一篇文章。自然应该写的东西是很多的。至少我还可以写一本小书，而且我也打算写更多的作品。

但是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我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文工团宣传队的男女同志，我称他们做朝鲜战地的朋友，我愿意把我的第一本朝鲜通讯集献给他们。这本小书的题名是《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他们全配得上英雄的称号。

我说过我的拙劣的笔描绘不出他们的英雄气概，我甚至没有能力把我的一些粗浅的体会传达给祖国人民。但是英雄们的深厚的爱、深切的恨和他们的崇高的心灵、英勇的事迹早已飞越过这里的受难的河山而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这本小书中的文字也许可以给祖国人民唤起一些亲切感人的回忆，那么就请把它们看作从远方带回来的亲人的口信吧。

我对着面前这十一篇旧稿，离别的念头折磨着我。在英雄们的中间生活了两百天，这是多么大的幸福！离开朝鲜战

地的朋友就是舍弃这一份幸福。他们真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他们那里我感染了深厚的爱和深切的恨，更理解了“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这短短的两百天中间我过的尽是使人兴奋的幸福生活。为了我受到的教育和我得到的锻炼，我永远忘不了我的这些“良师益友”。我的感激会永远在我的心里燃烧。我不需要语言文字来描述我的惜别的心情。跟这本小书一块儿，我愿意献给他们我的心，五万万颗心中间一颗渺小的心。这颗渺小的心虽然不能给英雄们带来鼓舞和安慰，但它究竟是一颗燃烧着爱的心。我把它留在朝鲜，留在英雄们的中间，我愿意告诉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一个朋友：

“我爱你们，我爱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也爱朝鲜，爱朝鲜人民！”

这本小书可以给我的话作证。

1952年10月在朝鲜。

保卫和平的人们

《保卫和平的人们》，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衷心的祝贺*（代序）

第二届文代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远在朝鲜，无法回国参加。我不能坐在同志们中间，同大家倾吐我的快乐的、祝贺的心情。可是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你们，我在朝鲜的山沟里还仿佛听见你们的声音，看见你们的笑脸。让我在这个朝鲜的农家小屋里借着烛光写下我的衷心的祝贺。

筹委会要我在大会上发言，沙汀同志说："你留下一篇发言稿吧。"我没有留下什么。但是今天我写下了我想向同志们说的话。我想说的话很多，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我只能写出这么一点。

去年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间生活了七个月。现在我又到了他们这里。我的心始终忘不了这些人和这种生活。我想念这些人就像想念自己家里人一样。去年我离开志愿军的时候，一个兵团的政治委员对我说："你不要忘记你是这个兵团的人啊！"这句简单的话使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是莫大的幸福。隔了八个月我还记得那一句话，而且想到那一句话，我的心就激动。多年来我习惯了观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文艺月报》十、十一月号合刊。

察人和体验生活，多年来我渴望着认识人，尤其是新的人。新的人永远引起我的热情。他们永远是我在生活与写作两方面的鼓舞的泉源。我到志愿军部队以前就读过不少关于这个部队的通讯报告。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在中国人民中间流传得很广。每个人都凭自己的想象描绘志愿军战士的面貌。我也有我的想象。我一直以为我跟战士们的中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可是一旦走进他们中间，跟他们接触，我马上就发觉过去的想象的错误。他们先向我伸出手。他们的心向我的心接近。我很自然地伸手去紧握他们的手，我的心也被吸引过去了。在最初的两三句话之后，我们谈起来就像很熟的朋友一样。在我跟他们中间很自然地发生了兄弟般的友爱。我说不出这是怎样发生的。不过我觉得这友爱好像早已存在，只是现在我才发觉罢了。

我就这样地在志愿军的部队中间住下来。我从上到下跑过好些单位，从兵团一直到连队，我都住过。我也曾在坑道里跟战士们一块儿生活过。跟我的预料完全相反，我不论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把我当客人看待。我自己常常说我到部队来向同志们学习。可是他们全把我看做从祖国来的亲人。他们给我一切的方便。我要看什么，他们就让我看什么；我想知道什么，他们就让我知道什么。他们陪我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到前沿阵地去。他们对我谈战争，谈他们的战斗生活经验，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希望。他们也要我给他们谈祖国的最近情况，祖国的建设，祖国儿童的幸福生活。有时候我跟战士们一块儿听指导员上课，我参加战士们的小组讨论会，听每个人用

激动的声音说出他的真心话。有时候我跟着带路的战士或通讯员爬山，跳交通沟，从灌木林中找路下山，在半路上休息的时候，闲谈一些生活小事。有时候战士们在休息时间里谈得很高兴的时候，我也在旁边跟他们一块儿笑。我也有机会跟一个功臣同坐在朝鲜老百姓家的廊下谈几个钟头，听他兴奋地叙说他的惊人的英雄事迹。……我有一种感觉：我的心跟他们的心越挨越近。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渗入他们的生活。我越来越了解他们。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没有一点勉强。并不是我有好的办法去认识他们。他们自己不断地把心显露给我看，他们在我面前什么都不隐瞒，他们把我看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了。"都是自家人"，战士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干部更常常对我说这样的话。一句简单的话多叫人感动。

这样我就在志愿军中间交了朋友了。的确在各级指挥员和战士中间，在通讯员和炊事员中间都有我的朋友。他们的一切都牵引着我的心。我越跟他们接近，越认识他们，就越爱他们。我常常听见人说起志愿军的崇高品质。这四个字里面应该包含着千万个感动人的故事：我亲眼看见过他们，也听见无数人谈到他们。我在去年四月某日的日记里写过："我真愿意多看这些年轻的、健康的、淳朴的脸。"我后来又写："他们的确是最可爱的：不仅他们的内心，就是他们的面貌也可以打动人，吸引人。"我提到的并不是少数特殊的例子。我说的是整个部队的战士和干部。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看见那种"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忘我的精神。不管我遇着什么人，我都在他脸上看到对祖国的爱，而且每个人都准备随时为这种爱牺

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们认为能够用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爱是最大的幸福。每个人都争着接受最艰苦的任务，谁也不愿意为着自己去损害集体的利益。在需要谁牺牲生命保卫集体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把这个任务当作最大的光荣，带着幸福的笑容去接受它。

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文工团的年轻女同志讲起她的感情。在一次小战斗结束之后，她正在那个连队里，第二天早晨她在一条小溪旁边给一个胜利归来的负伤战士洗血衣，她想起前一晚的战斗，她想起战士们回来以后的兴奋的谈话和脸上的光彩，她觉得她非常爱他们，她觉得能够为他们做一件小事情就是难得的幸福。她望着阳光下面满山的迎春花，她对自己说，"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我了解这个女同志，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情。我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情。

我在志愿军部队中间七个月的生活，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上和在创作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生活在新的人中间，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在我的周围每天都在发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每天都受到那种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的感染。我自己的感情也逐渐在改变。我当时曾写过这样的话："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动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所以每逢我背着人的时候，我总觉得心里翻腾得厉害，有许多感情在那里翻腾，我必须把它们全部倾吐出来，才能够得到心境的和平。在这种时候我就拿起笔来写作。我不断地写。可是我仍然不断地受着这个思想的折磨：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我没有写出堆

积在我心中的爱，我没有写出我接触到的那些崇高、伟大的心灵，我没有写出像朝鲜遍山遍野的花一样多的志愿军新人的面貌。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而感到苦恼。尤其是在全世界人民为着朝鲜停战而感谢那些用血肉保卫和平的和平战士的今天，我的心，我的爱又把我引到朝鲜来。只有长期地生活在他们中间，只有在我写出了新中国的新人——保卫和平的志愿军战士的伟大的面貌之后，我的心才能够得到安宁。

入朝散记*

鸭绿江

太阳刚落下去，西边天空还挂着红霞，我们的车子绕了几个弯，才走上江桥。桥头耸立着庆祝停战协定签字的红色牌楼。我伸出头去看江水。宽阔的江面起着微波，江水是灰白色的。除了车轮下木板的响声外，我没有听见别的声音。对岸新义州的烟囱里冒着黑烟。车子缓缓地驶过江桥。我很激动。车子在英雄的朝鲜国土上停下来的时候，我感到一种严肃的尊敬的心情。

我下车来，把江那边安东的镇江山望了好一会。车子要开动了，我上了车，伸出头去，最后一次朝江那边望，轻轻地说一声"再见"。

车子向前跑着。七八个朝鲜的小孩走在路旁，唱着《金日成将军之歌》。

……鸭绿江水曲曲弯弯漂着血痕……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文艺月报》十、十一月号合刊。

小孩望着我们的车子微笑，他们欢迎地招手。

鸭绿江把中朝两国人民的心多么贴近地拉在一起！

防　空　哨

路旁紧偎着山坡，一间用松树干搭成的小屋，露了一半在地面上。屋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看见它，我就想起去年常见面的那些熟人：防空哨。我的眼前马上现出他们的面影。

我怎么能够忘记他们呢？从飘着雪的寒冷的冬夜到雨季结束后的有月亮的秋天的凉夜，我都在公路上听过他们的哨子声和枪声，见过他们手里拿的红旗和白旗。他们永远站在小屋前面，挥着旗吹着哨子，给汽车指路。不管有多少架敌机整夜在公路的上空盘旋，不管敌机投下的燃烧弹在山上燃起多少堆火，不管有多少吨炸弹在公路近旁爆炸，我们的公路上始终没有断过车辆的来往。三年来我们的司机同志们在朝鲜的钢铁交通线上赤手空拳跟美国的所谓优势空军战斗取到胜利，除了靠他们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外，还得感谢防空哨的援助。我看见好些司机同志谈起防空哨来，眼睛发亮，脸上浮出感谢的微笑，我觉得我能够了解他们的心情。

把美丽的朝鲜城市变成一片废墟的美国空中强盗永远不会明白这一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远远的一片光亮，许多条火龙在公路上飞腾，然而在一眨眼的功夫，什么也没有了，留给强盗们的是一片黑暗。强盗们即使在天空盘旋一夜，也不会找到一个目标。

可是我们的司机同志常常闭上车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一大段路以后，也不知道敌机还在不在这附近，车子走过防空哨面前，看见白旗一挥，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没有飞机，开大灯走吧！"这对他们是多大的安慰！他们会开着大灯放心地向前跑去，一直到他们听见防空枪的时候，才闭上灯光，减低车子的速度。

在朝鲜的凉夜里，棉大衣挡不住天明前的寒气，可是防空哨的亲切的声音给了我不少的温暖。司机同志有时疲倦得睁不开眼，在路旁停下车休息片刻。那些拿着红旗和白旗的防空哨却整夜睁着眼睛，笔直地站在岗舍前面，保卫着来往车辆的安全。

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这些年他们也够累了，的确应该得到休息。望着空的岗舍，我想起过去艰苦的战斗的日子，我对那些在朝鲜的寒冷的夜里守卫在交通线上的防空哨同志充满了感激的怀念。

平　壤

夕阳给平壤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红色。我们的车子穿过人群开进这个美丽的英雄城市去。那些充满生机的碧绿的小山和稻田都留在我们的后面了。一长串头上顶着衣包穿着颜色鲜艳的衣裙的女人走在路旁。商店门口悬着彩色的招牌。小孩们在矮小的木屋前面唱歌。

车子缓缓地向前驶着。平壤的街道上现出来活跃的景

象。它永远充满了声音和颜色。瓦砾堆旁边有几个小女孩在跳舞。断墙上贴满了彩色招贴画和电影、歌剧的戏报。好几处废墟上面整整齐齐地堆了高高的一大片红砖；它们在告诉人重建的工作马上要开始了。从一间搭在瓦砾堆上一半藏在地下的小屋门口，一个小女孩的清脆的笑声送到我的耳边来。这个年轻的、快乐的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荡漾。它搔着我的心。车子驶近大同江桥的时候，我忽然忍不住偷偷地笑起来。

在桥头我看见了几辆载着战俘的嘎嘶车。车子走在我们的前面。战俘们穿着干净的蓝色衣服，脸上都现着健康色，他们愉快地在车上谈笑。过桥的时候，一个二十岁光景的美国战俘忽然带笑地弯下身去看绿色的江水。

车子在长的行列中过了桥，我们到了曾经是工业区的东平壤了，许多工厂的高大建筑物只剩下一些红色砖墙。然而墙内充满了生命。长得多好的高粱和苞谷，在微风中摇着头。深蓝色和紫红色的牵牛花，黄色的倭瓜花开放在一片繁茂的绿叶中间。

美国的千万吨的凝固汽油弹和重磅炸弹并没有毁灭平壤。这个英雄的城市仍然坚定地立在朝鲜的土地上。在这里到处都是生命。

这一夜我们寄宿在东平壤附近一个农家的防空地下室里面。睡前我还站在田坎上眺望平壤的灯光，这灯光是和平力量战胜战争的信号，我诚心地为它祝福。

孩子的礼物

就在东平壤附近，我们的车子停在高粱地的路边。夜色降下来，罩上了路，罩上了庄稼，罩上了汽车，也罩上了人。

我站在车外，手里拿一只电筒。一个穿白布短衣的朝鲜小孩走到我面前，伸手摸了一下电筒，说一声："给我看看。"我把电筒递给他。小孩拿着电筒照了照我，又照照自己的脸，一张剪光头发的圆圆脸，一个低的鼻子，两片厚嘴唇，一对漆黑的眼珠。眼睛眨了一下，孩子快乐地笑了。

"很好，"小孩说，把电筒还给我。

"你的家在哪里？"我问他。

"那边，"他回过头指着后面的小山坡，从那里有灯光射下来。我知道那个地方：先前我看见司机同志们提着米口袋走上那个小坡去。他们现在正在那里做饭。

"到开城去？"孩子问我。

我点了点头，虽然我们去的地方并不是开城。

"火车通了，"孩子兴奋地说。

"你看见了火车吗？"我问他。

"我看见了。每天都有来的和去的。"孩子回答。

"你坐过火车吗？"我顺口问一句。

"没有。不过我要坐火车。"

"去上学吗？你几岁了？"

"我十一岁。"

"几学年？学校远吗？"

"四学年，学校就在那边。"孩子指着平壤的方向。

"那么你要坐火车去哪里？"

"我想到开城去，"孩子用激动的声音说，停了一下他又解释道："我要去看那些叔叔、哥哥。他们为着和平，为着我们的幸福生活，一直在那里跟敌人作斗争。我要去代表我妈妈我姐姐感谢他们。"

他刚闭上嘴，一转身就溜走了。我用电筒去照他，已经看不见他的影子。车子旁边两个年纪更小的女孩低声笑着。一阵晚风送过来苞谷的香气。

我跟小女孩讲话，她们笑着不回答。我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臂问她的年纪。她忽然说了一句中国话："志愿军顶好，"就挣开跟另一个小女孩一块儿跑开了，远远地望着我笑。

我刚要用电筒去照他们，忽然一只手伸到我嘴边来。一个熟习的孩子的声音说："请吃啊！"我闻到煮熟的苞谷的香味。

"我不饿，不要吃，谢谢你，"我说着推开孩子送过来的那只又热又香的煮熟了剥了皮的苞谷。

"请吃啊。请吃啊。朝鲜的'杠耐以'，中国的玉蜀黍（窝树数），长得多好。欢迎你们。"孩子笑着，用恳切的声音接连地说，终于把苞谷塞在我的手里跑开了。

我慢慢地嚼着又热又香的熟苞谷，我好久没有吃到这样可口的食物了。我在泥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了许多趟。凉风吹透我的单衣。可是朝鲜土地上生长的苞谷和朝鲜孩子的友情

暖了我的身体，也暖了我的心。

这夜我就没有再见到那个孩子。第二天清早，天刚亮，我们的车子离开了平壤郊外以后，我才想起我忘记问孩子的姓名。

胜利的节日

八月十五日我在沙里院市参加了黄海道五万四千人的群众大会：苏军解放朝鲜八周年纪念会。

大会在上午十点钟开始，照北京时间说是上午九点。

主席台是利用旧建筑物的废址搭成的。它面临着一条宽阔的马路。跨过这条马路是一大片草地。在这片草地上面原先立着华美的高大楼房。现在左右两面还剩下一些断残的高墙，瓦砾堆上却长满茂盛的野草了。

今天站在台上望过去，眼睛里没有一点绿色，眼睛里只有红的旗，黑的头发，白的衣服，眼睛里只有仰动的头，挥舞的手，眼睛里只有苏、朝、中三国的国旗和巨幅的领袖像。马路的那一面全是人，不是人山人海，却是很整齐的行列，秩序很好的队伍。在晒得人眼花头晕的大太阳下面，每个人都很有精神地笔直地站着，听道（省）党委员长和道（省）委员长的报告。

十二点钟以前，示威的游行开始了。这是朝鲜人民在停战以后对战争挑拨者的示威，这是朝鲜人民表示他们重建祖国的决心的示威。劳动人民抬着机器，拿着工具，一队一队地

在台下走过，唱着歌，喊着口号，充满信心地向前进。铲土机开过去了，大汽车开过去了，各种技术工人走过去了。每一个人到主席台前来表示他献出全部力量的决心。农民高举着镰刀，收割的时候快到了，男男女女敲着乐器跳着庆祝丰收的舞蹈。中学生们穿着制服用整齐的步伐严肃地走过台下。小学生们拿着花唱着歌走来，举起年轻的手向台上敬礼。……

人像水一样地不急不徐地流过去，载着颜色，也载着声音。台上和台下的喊声响成了一片。所有的人被一个共同的决心团结在一起：拿出一切力量来重新建设祖国。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自由、独立、统一的朝鲜。今天我在每个朝鲜人的脸上都看到这同样的光辉。

正午的太阳射下来灿烂的光辉。朝鲜人的脸上也射出来灿烂的光辉。今天是朝鲜人的节日，胜利的节日。朝鲜人不仅用决心来迎接这个节日，他们还用歌、用跳舞、用快乐的笑声来迎接它。在一点钟光景示威行列过完以后，我还听见快乐的歌声和笑声。

我们走下台去。在这所旧建筑物的废址里面还布置了一个展览会。两个中年的朝鲜妇女看到海州托儿所建筑的美丽的模型，看到长得很好的大南瓜、苞谷和苹果，不禁几次地笑了。这样的衷心愉快的笑声送我离开了沙里院。

1953年8月26日追记。

忘不了的仇恨*

"说起来每一桩事情好像都在我眼前，我一辈子都记得，"吴同志皱紧眉头说，两眼发出憎恨的光望着我。他张开两腿坐在一片薄薄的石头上，左手拿一小块碎砖在砂土上划着。我坐在他对面。我们的头上罩着一棵松树的绿荫。

"我们最先给关在釜山第一休养所。十二个铁棚子里头关了一千多人。铁棚子周围有铁丝网。铁棚子旁边有一座大楼房。开刀房就在那里。每隔三个月换一批实习医生，有美国人，南朝鲜人，也有日本人。他们拿伤员做试验品，小伤治成大伤，小病医成大病。手上有一点伤，就把你整个胳膊锯掉，脚趾头打烂了，就把你一条腿锯断。我在休养所的时候，就知道那座楼房里死了三千多人。我的伤不是治好的，是自己养好的。"他说到这里，把右手伸了过来。这只手从手腕起向里弯着，四根手指也向里曲着伸不直了。"如果有好医生，我这只手也不会残废的。我这里还有一块炮弹片没有取出来。"他挽起右边裤脚：右边小腿、腿弯附近伤口已经长好了，一块像大拇指一样大小的黑肉突起在外面。他用左手的两根指头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文学》十一月号。

按住它。“我不愿意让敌人的医生开刀取炮弹片，我怕他们一狠心就把腿给我锯断了。”

他腿上有不少的小伤疤，浅红色，黑黄色，白色……可是跟这块突起的黑肉比起来都不显眼了。我忽然注意到他脸上那种忍受痛苦的表情，就问一句：

“现在还痛吗?”

“不按它的时候就不痛。”他说着就拿开指头，把裤脚放下了。

“回到祖国就可以把炮弹片取掉，这很容易，”我安慰他说。

“是啊，回到祖国就好了。”他笑了笑，黑黄色的长脸上一对黑眼睛发出光，皱紧的双眉也开展了。“可是在敌人那边，想到祖国，好像隔得多远一样！起初伤口痛得睡不着，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什么消息也不知道。心里只有恨，只想拿命跟敌人拚。可是走动不了，睡在铁棚子里铺稻草的地上，又黑，又冷，又潮。一天吃点带皮的大麦糊，喝点辣椒汤。总算没有让敌人折磨死，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了。”他抬起头吐了一口气，左手拿起小碎砖在砂地上划了一阵，又埋下头，眼睛朝着地继续说：

“有的同志熬不过给折磨得发疯了，晚上跑出铁棚子，敌人看见就开枪打死。我们听见他的叫喊声，真想跑出去替他报仇。去年五月我们拒绝敌人来进行‘甄别’，敌人七天不给我们吃东西，有的同志饿得没有办法，吃破布，吃棉花，有的把胶底鞋烧起来吃。我们始终没有屈服。

"去年七月我们离开釜山，第二天就到了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一个营分十个号。每号住五百人，每个帐篷住五十个人。帐篷周围有两道小铁丝网，两道大铁丝网。敌人除了武装守卫，还有十几辆坦克。我们初到的时候没有水喝，有人用铁锹挖井，敌人看见也要开枪打，我亲眼看见打死一个同志。敌人不准我们唱歌，我们坚持要唱，敌人打死了我们一个同志，我们还是要唱歌。敌人再残忍凶狠，还是拿我们没有办法，他不能把我们杀尽杀绝。我们不知道吃了他们多少毒气弹，可是他们只能够伤害我们身体，伤害不了我们的精神。敌人越残酷，我们越坚强。"

吴同志突然闭了嘴，抬起头来，眼睛发亮，脸色发红，眉毛往上竖。从这个大院子的台阶上送过来别的同志的笑声。两个回来的同志在那里下象棋，旁边围了好几个人。左边一棵树下坐了几个同志在乘凉。院子的正中摊开一片金黄色的阳光。台阶上庙堂般的大厅子里，有不少的人躺在床上午睡。吴同志把眼睛掉向台阶，看了看这和平安闲的景象，然后又回过头来，用激动的声音对我谈起铁丝网里面帐篷中的黑夜。

"敌人一两个人不敢随便跑进铁丝网里面来。有时候在晚上我们都睡了，他们打电棒进来抓人出去。他们压迫我们，虐待我们，杀我们，打我们。可是他们又害怕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组织起来了，他们就害怕我们。十月一日国庆节那天，早晨七点钟吹过升旗号以后，我们十个帐篷里同时升起来十面五星红旗。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敌人看见我们升了旗，惊动起来，马上开来十几辆坦克和一个营的军

队，还戴上防毒面具，配备了各种武器，把我们的帐篷包围了，要我们降旗。我们不肯，他们就用一个连的兵力向第七号帐篷冲锋，又用各种武器向我们射击，机关枪、卡宾枪、手榴弹、毒气弹一齐来。他们一连冲锋四次，才冲进铁丝网。我们徒手抵抗，牺牲了五十六位同志，还有一百多人受伤。可是敌人始终没有抢到我们的国旗。国旗挂了一个半钟头，最后我们的两个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把它降下来，自己烧毁了。以后为了纪念烈士，我们每个帐篷都开过追悼会，我们还捧着烈士灵位在铁丝网里游行了三圈，向敌人表示抗议。”

他歇了一口气，微微一笑。我在他脸上看到的不是愉快’却是坚强的信心。他咬了一下牙齿，接着用力说：“这一回敌人认识了我们的力量，他们说：‘你们都是硬骨头。’的确我们这些硬骨头是他们的枪弹打不垮的。”他又笑了笑。

“有了组织就好了。大家都有了信心。敌人弄来的蒋介石的特务也打不进来。敌人在每个帐篷里装的扩音器，经常放送蒋介石特务的广播，也没有人听它。我们自己还组织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都有。”

“这真不易啊，”我惊讶地赞了一句。

“是啊。我们到外面去作苦工的时候，用罐头盒刮了些锅底烟灰回来，又把罐头盒的铁皮削成笔尖，蘸着锅底烟灰写字。在这种时候学习祖国文字，大家特别用功，环境虽然困难，进步倒并不慢。我们知道人民军同志们做出了漂亮的五角红星的帽徽，我们做笔尖倒容易多了。”他说着，左手不自主地用碎砖在地上写起字来。我埋下眼光去看他写的什么。他

写的全是这样的几个字："祖国，自由。"

他掉转头朝四面望了望，忽然站起来，说一句："请你等一下。"他转身朝一个刚从台阶上走下来的身材矮小的同志走去，对那个同志讲了两句话，又跟那个同志一起走回来。他向我介绍：

"这个是陈同志，他住过巨济岛战俘营。我们这一批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给敌人刺过字。让他跟你谈谈。"

陈同志笑笑就蹲下来。他开始说：

"巨济岛战俘营里的生活跟济州岛战俘营、釜山战俘休养所都差不多。敌人对我们的手段很凶、很毒。穿的是又破又旧的衣服；吃的也不是给人吃的东西，而且从来没让你吃饱过。睡的是潮湿的土地，上面就只铺了薄薄一层草，湿气重得很，叫你觉得浸到你骨头里来了。铁棚子很小，住六七十个人，大家只能够侧起身子挤在一起睡，想翻个身也不行。每天还要出去做苦工，一群一群的，跟奴隶一样，让敌人押着，看守着，动不动就要挨打、挨刺刀，常常没缘没故地给敌人打死、打伤。"

陈同志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用他右手的第二、第三两根指头夹住旁边地上的草叶使劲地往上拔，拉断了就丢在地上。他右手的大拇指齐根断掉了，只剩下一个圆圆的大伤疤。他那张三角形的脸上一对不算大的眼睛特别亮。

"我们当初没有好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容易受到敌人的迫害，特务们也常常跑进来活动。"这个从四川眉山县出来抗美援朝的翻身农民说话说得很快，好像一开口就要把肚里的话

讲完似的。"敌人对付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刑罚。有一样叫做'坐水牢'。水牢是用洋灰做成的，跟老乡喂牛的槽差不多。上面盖住带刺的铁丝网，旁边有一个放水的龙头。在我住的七十二号战俘营的西北角上就有一个水牢。人在水牢里头只能够睡下，坐都没法坐。下头是冰冷的洋灰地，上面是刺骨的冷风，冬天在里头睡久了，冻都会把你冻死。如果敌人再打开龙头放出水来，水就会在你身上结成了冰。冬天'坐水牢'，很少有人保住性命出来。

"在闹'甄别'的时候，敌人强迫我们在身上刺字。我们不让他们刺。他们就把我们的人杀的杀，打的打。有的杀了还剜心，有的死了还把头割下来挂在铁丝网上。去年四月八号那天，敌人对我们进行了大屠杀以后，特务们就把杨文华烈士和林学普烈士的心用刺刀挑着，到每个铁棚子去，一边大声喊：'你们来看这颗心！这就是要回国的心！你们哪一个要回国，就把他拿来照这样办！'第二天九号开始正式'甄别'。这是在一个大帐篷里头进行的。我们一个一个地从一道门进去。帐篷另一头有两道门。美国人坐着，问你：'愿意回哪里？'你回答以后，他就指给你：回台湾走这道门出去；回祖国走那道门出去。在回祖国去的门口，有很多的美国守卫和特务拿着刀子棍子把守着。他们凶神恶煞地站在两边。我们的人走出去，他们不是用棍子打，就是用刀子砍。他们就是这样凶，这样恶，还是吓不倒我们。我们死也要从这道门出去。我们大家拚着性命从这道门冲出去。我们受了伤流着血，可是我们冲出去了。我们现在到底活着回来了。"

陈同志停顿一下，他用力拉断两片草叶，扔在地上，把右手上那个伤疤在膝头上擦了两三下，又接着往下说：

"我是在去年三月下半月让敌人刻上字的。我们很多人都是给敌人打得晕过去了，抬出去刻上字的。我醒过来，看见膀子上刻了字，就说：'好吧，你们能够在我身上刻字，你们不能在我心上刻字。刻了字我还是要回祖国。'……"他忽然伸出左手去挽起右边的袖子。在他的右胳膊上离肘拐一寸半的光景，有一块大伤疤，浅黄色中间有两三条黑印。他把胳膊送到我眼前。我费了力才认出来分写成两行的"反共抗俄"四个字。

"我自己用刀片把字割掉，涂点碘酒，后来就成了这个样子。留下这个伤疤也好。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仇恨。"

陈同志一直蹲着，到这时他突然从地上站起来，慢慢地把袖子拉下盖住了这一块大伤疤。

第二天陈同志、吴同志和别的几百个同志一起坐火车回祖国去了。就在他们动身的这个上午，我坐车到我们管理外籍战俘的地方去。没有铁丝网，没有坦克，我远远地就看见外俘们在花园里散步，在运动场上打排球，在小河沟中洗澡。我还没有走到外俘们跟前，就先听见他们的笑声。在一间相当整洁的洋房里，外俘们分成几组坐在床铺上玩扑克游戏。一个年轻的美国战俘光着胳膊伸出手在摸牌。他的胳膊动一下，刺在那上面的一个裸体的夏威夷少女也跟着扭一下腰肢。有人问他在什么地方刺上这个人像，他笑着回答：三年前在夏威夷刺上的。在靠里的那张床上，一个戴眼镜的人因为赢了

牌发出来愉快的笑声。

两个宽大的饭厅里摆好了桌子在等待他们。穿白衣的炊事员们在厨房里为他们蒸馒头，用大锅的油炸马铃薯片。

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还回头望一下山坡上的洋楼和花园，陪我来的同志指着那里说："我们把这么好的地方给他们住了……"在我的眼前突然现出来吴同志和陈同志的发光的眼睛，残废的右手，和带着憎恨表情的面颜。我想：要是他们看到这里的生活，听见这里的笑声，他们会怎样想呢？他们会怎样说呢？……

我没法追上他们，要他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对这里的一切不会有另外的意见：他们愿意听到这里的笑声，愿意看到这里的笑脸。

因为我们的文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敌人的是完全两样的东西。

1953年9月2日在开城。

金刚山上发生的事情*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我们站在黄海道平泉郡杜峰山上，站在吕玉久、张明禄两位烈士坟墓后面的山坡上。右面是杂树丛生的小山。左面山下有几间茅屋，一条白带子似的公路，一片收割了的田地，还有远远近近的山，远处的山头正罩着灰白色的烟雾。

我凝望着坡下方形空地上两座隆起的新坟。雨打着我们头上顶的雨布，我听得清楚那一点一滴的声音。雨打着坟，把坟头枯黄的衰草打得紧贴在黄土上面。

我的眼光在坟上停留了好几分钟。雨下得更急了。我看见许多滴水珠落在黄土上，我担心朝鲜深秋的雨水打湿了那两颗安息在坟里的伟大的心！

我们顺着山坡走下来，绕回到烈士们的坟前，向伟大的死者告别。我最后一次看了刻在黑大理石墓碑上面的红字，然后沿着墓碑前新修过的斜路一直走到山下，走过两三棵栗子树和两三家人家。朝鲜小孩站在树下，用友好的眼光望着我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新观察》第二十四期。发表时题为《志愿军战士吕玉久和张明禄的故事》。

吉普车开动以后，我伸出头去望山坡下松枝扎的牌楼，墓碑的灰白色顶盖从半山上露出来。我在心里念着碑上的中国字。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张明禄、吕玉久永远不灭，英名千古……黄海道平泉郡全体人民一同。十月二十五日。

我来得太迟了：我错过了今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追悼会，我又错过了三天前在这里举行的隆重、庄严的纪念会，一千三百人参加的墓碑揭幕典礼，我没有看到英雄的朝鲜人民在这样的大会上充满热情地献出他们真诚的心。

第二天是一个没有风的大晴天。上午，十七岁的朝鲜少女李贞淑同志陪着我们从她的村口走上金刚山。她穿了一身干净的白色衣裙，迈着孩子般的快步子，穿过红叶树、长绿的松树、正在褪色的落叶树，和一些烧得焦黑的枯树，到了半年前她遇见那两个志愿军同志的地方。这块小小的空地上以前草木丛生，树叶繁密得遮住天空，现在只剩下枯枝、断桩了。李贞淑同志的胶鞋踏在一堆小石子上面，石子旁边还有两根烧黑的枯枝。手指指着山头，红红的脸颊上带着激动的表情，灵活的眼珠时而朝上看时而又朝下看，她向我们叙说半年前在这里发生过的火灾。她讲话比翻译人讲得快，讲得有感情。她越讲下去，越激动，好像她逐渐走进了半年前的大火中间，那些使她心惊的、那些使她感动的情景，又在她的眼前重现了。我望着她那张健康的、孩子似的脸，听着她的激动、紧张的叙述，我也渐渐地进到另一个环境里面了：我看见松林中冒

起烟来，我看见一片火光，在火光和浓烟中间走出来两个志愿军战士。一个身材高大，有一张黑黑的长脸，这是二十二岁的青年团员吕玉久，另一个是小个子，圆脸上常带笑容，这是二十岁的青年战士张明禄。两个人都穿棉衣，拿铁锹，高个子的腰间还插一把斧子。他们在火中间穿来跑去，用斧子砍树，用铁锹打火，用铁锹铲土盖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背着人、拖着人从烈火中冲出来，最后大火吞食了他们。

这是今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事情。那天上午十点钟光景，平泉郡的金刚山上发生了火灾，整整烧了四个半钟头，火烧的面积有一万二千坪地。五十几个当地老百姓和四百多个志愿军战士参加救火工作，这中间有吕玉久、张明禄和他们救出来的八个朝鲜妇女。李贞淑是八个女性中年轻的一位。

火灾是美国飞机投下的燃烧弹引起来的。燃烧弹烧着北面山下一座独立草房。风把火苗吹到山坡，坡上是一大片松林，地上有一尺厚的枯叶，还有不少断残的树枝和枯草。火烧起来，火苗就往各处乱窜，风又不断地狂吹，把火苗带到更远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里，火就蔓延开了。火先是在地上烧，后来树枝、树叶都着火了。横在东、西山中间的那条沟里又没有多少水。救火的人大都用铁锹铲土盖火，或者用别的东西打火，也有人用斧子把树砍倒，用镰刀把草割掉，来隔断火路。可是风一直不停，火苗又窜得快，一个地方的火扑灭了，另一个地方的火又燃大了；过一个时候，刚扑灭的火让风一吹又重燃起来。烟雾把附近的天空都遮住了。

吕玉久和张明禄都是志愿军某部担架营三连五班的战

士。头天晚上他们那个班有别的任务，同志们一夜没睡觉，起火时他们才睡了三、四个钟头，排长没有叫醒他们，就带着其余的两个班上山救火去了。不多久五班长醒来，听说起火，便叫醒同志们起来救火。吕玉久睁开眼，看见天很暗，便问别的同志："天下雾吗？"那个同志答道："失火啦！"吕玉久马上就说："快起来救火去！"他们出去拿了救火工具便朝山上跑。山坡很陡，一个同志跑不上去，吕玉久就在后面推他说："快走嘛，你看火烧得好大啊！"张明禄跟在后面，边走边喊口号鼓动大家。他大声喊："我们快上山打火，不然朝鲜人民的仓库就要受损失了。"吕玉久也跟着喊："同志们，加油打啊！保护朝鲜人民的仓库，保护朝鲜的一草一木！"他们所说的仓库在南山东南坡上松林里面。那是平泉郡人民的仓库，一共有一百七十多个，仓里堆的都是装满粮食的草袋。要是火灭不了，延烧到整个南山，那些仓库也就难保全了。当时的情况是很紧急的，所以排长看见吕玉久穿着棉衣满脸通红地跑上山来，关心地对他说："看你多热，我脱件单衣给你。"吕玉久回答："热出点汗不要紧，不要耽误了救火。"没有一个人愿意耽误一分钟的时间，志愿军的战士们一直在烈火中间冲进冲出，不顾一切地跟遍山的大火搏斗。吕玉久和张明禄表现得最勇敢：哪里火大，他们就到哪里去打火；这里火刚灭，他们马上又跑到另一个火场去。脸熏黑，头发烤焦，棉衣烧破，他们也不去管。他们扑灭了南山梁第二个山头的火，把刚扑灭的火堆交给旁边四个年轻妇女看守，他们又朝另一个地方跑去。他们跑开不久，忽然听见叫声，便站住回头一看，只见大股的浓烟直往

上冒，刚扑灭的火又燃起来了。他们连忙从山头跑回去，冲进火圈里，看见那四个年轻妇女乱成一堆哭叫不止。他们一个人背一个，分两趟把她们全救出来，放在一块大岩石旁边。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风又送过来下面半山上朝鲜妇女的叫声、"救人啦！"吕玉久和张明禄马上朝叫声来的方向跑下去了。

李贞淑同志说，她也听见了叫声。她就是这一次被吕玉久和张明禄救出来的，另外的三个是十六岁的少年团员郑景南，十七岁的少女申善花和二十七岁的吉熙子；吉熙子已经迁居到七十里以外了。据李贞淑同志讲，她们四个人被救出来以后，头发晕，全身发热，眼睛给烟熏得睁不开。她们只看见那两个志愿军同志往下跑冲进火里去，却始终没有看清他们的面貌，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们。李贞淑同志回到自己家里，等着那个寄住在她家的二十二岁的军属李浩世回来，谈起救火的事，才知道"救人"的叫声是李浩世喊出来的，才知道那两个志愿军同志已经牺牲。接着她就看见志愿军抬着他们的尸首走过村子。担架上盖着雨布，她看不见脸貌，可是她知道就是那两个救命的恩人。她对母亲讲起，母女俩都哭了。

李浩世和另外三个妇女崔春凤、金善玉、郑玉男正在南山梁下东面一个斜坡上救火，风不停地向她们这面吹，火越来越大，火从她们头上、从她们的四周烧过来，浓烟把她们包围在中间。她们割草的镰刀没有用了，她们还在火里坚持着，跟火斗争，终于被烤得、被熏得头昏了，眼睛看不见了，只是半昏迷地嚷着"救人"。四个人挤在一堆，抱得紧紧的，准备死在一起。忽然间她们听见了人声。两个志愿军同志冲进火圈里

来，用朝鲜话大声喊："火太大，快跑啊！"每个同志背上背一个，手里拉一个，一口气跑出二十多公尺，把她们救出了火场，放在沟西边半山上防空洞里面；不等她们完全清醒过来，两个同志又往东跑去。李浩世只看见两个同志的乌黑的脸，听见他们在问："还有人吗？"她连忙用朝鲜话在后面喊道："那边火里面没有人！"可是他们已经过了沟听不见了。从防空洞向东望，烟雾中隐约现出那块将近一个人高的大青石，在救火人的眼睛里倒像是一个白衣白裙的朝鲜妇女。

这以后就没有人看见吕玉久和张明禄了。李浩世她们在防空洞口等着两个志愿军同志回来，可是一直没有消息。火越烧越大，等到火灭了，她们跑进还在冒烟的火场去找那两个同志，却只看见两个死尸，一个伏在大石头上，另一个侧着身子躺在地上，相隔三、四公尺。她们守在死者旁边伤心地哭着，等到志愿军同志们来到这里，她们才含着眼泪回家。五班的一个战士在沟边拾到一个笔记本和一只口琴，交给排长。笔记本封面烤焦了一点，上面有张明禄家里的通信处，还有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刘胡兰烈士们的简单事迹，都是张明禄亲笔抄录的。排长知道这是张明禄烈士的遗物，可是这两样东西怎么会落在沟边，就没有人知道了。

李贞淑同志先前陪着我们到过防空洞，而且从那里望过沟东面的大青石，现在她又领我们顺着一条少有人走的小路去看那个大石头。她的脚在下山的路上跑得更快，我几乎追不上她。我们到了这个光滑的大青石跟前，李贞淑同志不瞬眼地望着它，一句话也不说。我也默默地把石头望了好久。

这附近有许多矮树，椭圆形的小树叶已经发黄了。较远处也有碧绿的松针，夹杂在花似的红叶中间。太阳照在山梁上，我抬头一望，蓝天下一片金光，鲜明无比。只有这块大青石冷冷地躲藏在阴处。在它的脚下，四面都有烧残的树桩，几乎是齐根砍剩下来的。这个见不到阳光的大青石就是烈士们牺牲的地方。我想他们怀着怎样的心情熬过最后的痛苦，我的心颤抖起来，我的眼眶也湿了。这时候在我的耳边很清楚地响着连队里战士们的话："多看几眼吧，以后就看不着了。"半年前同志们把烈士的尸首从这里抬下去收殓的时候，许多人都流着泪围着尸首不肯走开。今天我们却只能够在这里看到这块大石头。对于烈士的死亡，这块石头也有责任。他们把它当作了人，才又冲进火里去，而且扑倒在它上面。我了解李贞淑同志望着石头不讲话的原因了。

离开金刚山，我们又去稼洞里。李贞淑同志在阳光下脚步轻快地把我们带到她家里去。她让我们坐在李浩世的屋子里。我们刚走进小院子，就看见李浩世的倒塌了的茅屋，茅草顶还盖在地上。李浩世由邻居而变成房客，现在又是李贞淑同志的好朋友了。李浩世正在地里劳动，说是不久就回来。院子里有一个小男孩，摇摆着笑脸走到房门口晃两下，又不见了。我知道这就是李浩世的四岁的孩子，也知道她的丈夫今天还在人民军工作。看见孩子，我就想起李浩世那天离开火场回到家里搂着孩子讲过的话："孩子，要不是那两位志愿军叔叔救了我们，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孩子今天幸福地笑着，他也许不知道这个院子以外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他会了解

他的幸福生活跟那两位志愿军叔叔有什么关系。

我正在用眼光找寻孩子的时候，从临街的小门进来了一位白衣蓝裙、身材短小的少妇，圆圆的脸上现出亲切的笑容。这就是李浩世同志。她紧紧地握过了我们的手，就在我们对面坐下来，身子靠近临街的小门。她向我们谈起四月二十一日的事情，说起她们为了纪念两位志愿军同志组织的生产突击队，谈起她们今年的生产成绩。在她谈话的中间，李贞淑同志捧着大碗开水进来了，孩子似的郑景南同志进来了，身材细长的申善花同志进来了。接着从临街的小门走进来十七岁的郑玉男同志，从通院子的房门进来三十四岁的崔春凤同志和三十二岁的金善玉同志。她们坐满了这间屋子。这两个中年妇人尝过了生活的苦杯：崔春凤同志的丈夫因为是劳动党员在后退时期被敌人杀害了，只剩下两个女孩在她身边；金善玉同志是从外乡来的，一家人在后退时期中失散了。她至今不知道丈夫和儿子的生死存亡。另外的几位妇女，也都有各人的一段惨痛的经历，现在一个共同的纪念把她们连在一起了。她们组织了“吕玉久、张明禄生产突击队”，用忘我的集体劳动和优良的生产成绩来纪念伟大的死者，来报答伟大的死者。

“吕玉久、张明禄生产突击队”是在今年五月十四日正式成立的。突击队除了耕种原有的一万三千坪水田和两万五千坪旱地外，还开荒一千三百坪旱地。生产成绩比去年多百分之八十。稼洞里这个村子在生产上原是全郡(县)最落后的一个，今年由于这个突击队的带动，生产成绩已经上升到全郡的第五位了，而全郡的生产成绩又是黄海道全道(省)的第一位。

郡里负责人说，这个成绩是跟吕玉久、张明禄两位烈士的纪念分不开的。两位烈士的遗体起初由他们连队的同志们安葬在石水里。后来平泉郡人民向志愿军部队要求改葬在杜峰山的墓地。在日本统治的时期，杜峰山上曾经建立过“神社”，现在平泉郡人民就在这个庙宇的旧址上埋葬他们敬爱的志愿军烈士，黑大理石墓碑还是从两百多里外运来的。两位烈士的灵柩从石水里移到杜峰山的时候，曾经在稼洞里停了一夜，由李浩世、李贞淑、金善玉、崔春风、郑玉男、郑景南、申善花七位女同志轮流守灵。十月二十五日在杜峰山上举行的墓碑“揭墓式”的大会上，这七位女同志还献出她们各人珍爱的物品，托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代表转给烈士的家属。全郡人民还向朝鲜中央政府建议把杜峰山改名“吕玉久、张明禄山”。在过去某一次的招待会上，稼洞里全体村民送给两位烈士的连队一面锦旗，上面只有一个“亲”字，他们说：“我们再想不出更好的话来感谢你们了。”

李浩世同志简单地讲过生产突击队的情况以后，又说：“我们的工作是困难的，我们缺乏劳动力，缺乏牲口，我们还要依靠换工。可是我们的决心是很大的。我们愿意自己少休息，多劳动，迟睡早起，比别人多做工作。我们的力量小，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只有尽力做。我们工作得很快乐，因为我们七个人一条心，团结成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是那两位志愿军救出来的。我们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情，只有把我们的力量完全献出来，献给我们的祖国，献给和平的事业。”李浩世同志说话的时候，她那微带红色的圆脸，稍稍偏向门外，

一对小眼睛带着幻想的表情朝上看，她好像在看门外的蓝天，好像在看远方，好像在看未来的远景，声音低而清楚，略有一点颤动。这些简单的话，显然都是从她的心灵深处出来的。申善花同志说了："吕玉久和张明禄两位同志对我就跟我的亲哥哥一样，其实比亲哥哥还亲，我的亲哥哥还不见得就会牺牲自己生命来救我。"李浩世同志接下去说："心里的话是说不完的。没有吕玉久、张明禄两位同志，今天也不会再有我们。他们牺牲了，我们还活着，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们呢！"她停了一下，让联络员用中国话解释她的意思。我看见她的眼睛发亮，泪水已经浮到眼眶来了。可是她没有哭，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她想了想又说："我只有一个希望，我希望能够见到两位同志的母亲，像对自己母亲一样地对她们说一说我心里的话。我要告诉她们：志愿军在朝鲜的生活；告诉她们：她们的儿子怎样救活我们；告诉她们：我们怎样报答她们儿子的恩情。我只想见一见吕玉久、张明禄两位同志的母亲，哪怕见一面也好。"

不用联络员的翻译，我也懂她的最后这一句话，声音里带着深的感情，像是哀求，像是申诉，像是愿望。它直接地打进人的心，它一直在空中荡漾，它等待着回答。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李浩世同志一个满意的答复。当我们在村口上车向这七位女同志挥手告别的时候，我的眼光触到李浩世同志那对带幻想的小眼睛，我马上想起她的要求，她的希望。那个微带颤动的声音一直搅动我的心，一直折磨我的心。就是今天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还不能够

使我的心平静。这个朝鲜少妇的小小的要求究竟会不会得到满足呢？我不能说。但愿有心的读者把这个消息带给四川省荣昌县荣隆乡凉风村吕玉久烈士的母亲，带给河南省伊阳县三屯镇张明禄烈士的父亲（张明禄烈士自小就失去了母亲）。让他们知道在朝鲜乡村里有人朝夕盼望跟他们见面，愿意用女儿的爱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来报答他们儿子的恩情。

1953年11月3日在朝鲜。

魏连长和他的连队*

初秋夜晚的微风吹起一丝凉意，弯弯的上弦月让一片白云盖住了。雄壮的歌声响起来，给人们带来一股暖流：

我是志愿军
名字真光荣
三八线上打胜仗
吃苦也高兴
都因为祖国爱我，我也爱祖国……

在一块新平出来的长方形的黄土高地上，志愿军连队的战士晚会正在进行。高地的四周有一圈树干细长的落叶树，枝子细，叶大而圆，我叫不出这种树的名字。战士们坐在树下围成一个大圈子，在他们前面，还有一圈同样的落叶树，不过长得稀，长得不高，树叶不密，但枝叶交叉，天然地编成一个顶盖。树干上留得有一些光秃的断枝，尖子朝上，插上蜡烛倒是很好的烛架。烛光照亮着场子的中央，十几个战士正挺起胸膛站在那里唱歌，另一个战士在旁边拉手风琴伴奏。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文艺月报》十二月号。发表时题为《魏连长和他的英雄连队》。

一个歌子接着一个歌子，唱暖了战士们的心。好些人微微张开口，在心里跟着唱。跳舞开始的时候，手风琴奏着曲子，坐着的战士们用手打拍子，在最后一个跳舞节目宣布以后，参加跳舞表演的战士们，马上分成三组，每组起初一个人跳，其余的人站在场子中央，围成一个小圈，跳舞的人一转身站到另一个同志的面前，敬一个礼，那个同志还一个礼，就跟在他背后跳起来，再一转又变成了三个人，到了每组变成八个人以后，三组很自然地一下子合成了一股。曲子奏到最后，跳舞的人站住了，二十四个年轻的战士站成两排，带着愉快的笑容敬礼。

晚会结束了。战士们分队地从三个方向走下高地，回他们新建的营房里去。随便朝下面一望，就可以看见许多支手电筒的光像火龙似地在摆动。

夜很静，镰刀似的月亮刚从云里出来，又隐进云里去。手电筒一下子就不亮了。刚才还很响亮的脚步声也完全听不见了。我站在一间由掩蔽部改造的住室前面，注意地望山下，只看见一片朦胧的夜色。公路旁边一家老百姓屋里亮着灯光。我望着灯光，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地站了许久。可是在我眼前晃动的却一直是那些唱歌跳舞的战士的年轻的笑脸。我喜欢这些年轻人，他们笑起来像小孩，打起仗来像雄狮。就是他们，在五十几天前李承晚释放战俘破坏朝鲜停战协议的时候，打败了美国侵略军的精锐部队"陆一师"，占领了阵地，活捉了五个俘虏，就是他们，使得美国俘虏胆战心惊地说："你们志愿军是打不死的，我打着机关枪，你们还是接连不断地冲上来，

吓得我手发颤不敢打了，就让你们捉住了。”

我又看见那一对长在黑黄色脸上的亮眼睛，盖着浅黑色短须的厚嘴唇带笑地张开，这个高身材的年轻人正举着手踏着不熟练的舞步。这是二等功臣朱一钧同志，一个二十六岁的湖北庄稼人，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战士。他在那一次战斗中，带着一个更年轻的四川新同志冲向主峰，一个人一连气炸毁了敌人的四个地堡和三个火力点。他自己回想起来说：“我炸第一个地堡时候挂了花，醒过来又朝前走，走不到两步就听见班长在交通沟里头喊：‘同志们，我负伤了，大家替我报仇。’”他回转去要背班长，班长说：“不要背我，先去把敌人地堡炸掉！”他心中燃着复仇的怒火，暗暗地对自己说：“我就是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便拿起爆破筒，避开敌人的火力，猛冲到敌人地堡的侧后，把地堡炸毁了。爆破筒和手榴弹用完了，他就到烈士身边去找，冲锋枪子弹打光，他借用四川新同志的手雷继续打，一直到他冲上主峰，完成了全班的任务。战斗结束以后，他向同志们谈他当时的心情：“我想起祖国的可爱，想起敌人的罪行，我就什么也不怕了。见到敌人不消灭，我是不甘心的。”他离家不到一年，家里有十四口人，我问他：想不想家。他说：“怎么不想？我越想家，就越爱祖国，越觉得应当拚命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个脸上常带笑容的年轻人，当他背着冲锋枪，打着电筒走回山下跳舞训练班去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他也许在惋惜他没有能够为祖国人民立下更大的功劳吧，他也许在想学跳舞比打仗更麻烦吧，他也许在想念跟他一起战斗、后来牺牲了的四川新同志张德

新烈士吧，他也许在回忆过去艰苦的坑道生活吧。这些他可能都想过，不过他想得更多的一定是：怎样完成今后的任务，不让战争贩子们来破坏朝鲜的停战。

在朱一钧同志后面现出来周礼大同志的青年农民朴实的宽脸。这个二十一岁的湖南战士身材不算高，但身体结实，眼睛不大，跳舞的时候脸上带一种严肃的表情，他在人前谈他的立功事迹，总是多讲他的班长，少讲他自己。他的班长张义全烈士在战场上接受了任务，毫不犹豫地抱起十五斤的大炸药包，跟母堡内的三十九个敌人同归于尽，用自己的生命保障了整个战斗的胜利。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周礼大同志的心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四班长张义全的崇高的品质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他将来受到更大考验的时候，他也会做出可歌可泣的惊人事迹。事实上他在上一次的战斗中已经显露出英雄的姿态了。就在那一天晚上他把冲锋枪给了班长，看不见班长以后，一个人带着手榴弹横跨交通沟奔向主峰。在路上碰到了敌人，他想捉活的回去，不怕敌人比他身高力大，他把敌人拦腰抱住摔起跤来，一个新同志唐益督从后面赶上，用爆破筒打昏敌人，生擒回去。他却继续奔向前面，用手榴弹炸毁敌人的地堡，看见战斗的胜利结束。

我记得团结舞跳得正起劲的时候，黄生达同志张开嘴笑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团员今天刚从打马草的地方回来，第二天大清早还要到班里去继续执行打马草的任务。他先前在晚会上讲话显得笨拙、胆小，可是在前沿阵地的地堡里拿枪口对着敌人时，他却是一个沉着、勇敢、机智、灵活的英雄。当打

冷枪运动还没有在这个部队里展开，敌人时常摇摇摆摆对着我方阵地乱比划的时候，这个二十岁的南方战士下了决心要为祖国争光。他夜间拿起铁锹和洋镐，修好一座暗堡，白天就躲在暗堡里等候敌人。第一天打不着，等第二天，第二天打不着，等第三天。一枪没打准打第二枪，第二枪偏右了，再打第三枪。打倒了第一个又打第二个，两个全打倒了，还准备打以后出来的。敌人用坦克炮打他的暗堡，暗堡打垮了，他马上就修好，敌人天天打炮，却始终没法打掉他的暗堡。敌人又在半山腰添修一条交通沟，跟原来山脊上的长沟成了交叉的两条路，以为在交通沟里活动可以躲避冷枪。可是黄生达同志仔细地研究地形，找到三个固定的目标，想出了三角封锁的办法。正中是丁字形的道岔，它前面有一棵大树，左边交通沟有一个大缺口，右边有个小坟包：这三个都是打靶的好目标。他在坟包那里没打着敌人，就等着在大树后面道岔那儿打，再打不着就绝不让敌人逃过缺口。这样他一天就打死五个敌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一共打死了二十九个敌人，打得敌人提起志愿军的冷枪手就落魄丧胆。

山下面唯一的一星灯火突然灭了，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脚步声，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同志，早点休息吧。"我回过头看见年轻的张副指导员的亲密的笑脸。夜并不黑，我看得见他脸上的表情。我笑着点头说："我就睡。"为了不让他耽心，我马上回到住室去睡了。

在这个有光荣称号的英雄连队里，我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二十四岁的副指导员。一连好几天都是他一个人当家。一天

从早到晚我没有看见他休息。电话铃响，就有人找他。我常常看见他把手伸到帽子下面搔着头带笑说："这真抓瞎。"可是他脸上从没有露过愁容。高兴时候他会哈哈大笑几声，吃起饭来，至少是四五碗。大馒头可以吃五六个。班里、排里难得断过他的脚迹。有一天我看见他跟排长和战士们在一起为某个班新建的住室搭炕。他搬着石板、石块和石片，一层一层地砌着。他听见跳舞训练班的手风琴奏的曲子，忽然孩子似地自言自语："我听见跳舞就着急，我学过。"中秋节夜间相当冷，我睡到半夜醒了，他正打着电筒进来，把一件棉大衣盖在我的被子上。我问他："副指导员，你还没有睡？"他回答："我来查铺，看见这个住室很冷，委屈你了。我送件大衣来。"他自己身上穿的还是单军服。我告诉他，我不冷，他一定不肯把棉大衣拿回去。第二天傍晚李指导员学习完毕从师里回来了，正坐在住室前面小小的空地上喝水，他从下面走上来，远远看见指导员，加快脚步跑到指导员跟前，紧紧握住指导员的手，亲热地大声说："指导员，你回来了！"

就在这个晚上，在月光下面，营教导员对我谈到张存志同志，他说："这个年轻同志品质很好，提升副指导员还不久。以前在国内立过大功。"教导员同时还用表扬的口气谈到另一个年轻的副指导员，那是从本营的另一个连队来帮助工作的闻祥言同志。他给全连干部和战士讲授形势教育的课。课堂就是那天开晚会的地方。小组讨论会也在那里进行。十几个小组分别在同一个高地上开会讨论，战士们争先发言，并不妨碍彼此注意力的集中。闻副指导员一直在"课堂"主持，从不缺

席一次。我跟他同住在一个住室里，我看见他每晚都爬在他睡的那个小炕上写字，搜集材料，准备功课，常常写到深夜，有时大清早就出发到团部开会或去营部汇报。晚饭后我有机会跟他谈天，谈到他过去的经历。他以前一个字也不认识，参加革命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后来下了决心，不休息，少睡觉，才学会了看书写字。他谦虚地说：自己尝够了没有文化的痛苦，所以常常写信给他的爱人、他的妹子和他的外甥女，鼓励她们学习文化。听到外甥女升学的消息，他把自己的津贴费寄给她买自来水笔。他自己的学习精神应该是她们的好榜样。几年前他为革命事业负过伤，可是今天他还是一个活泼健康的年轻小伙子，他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精力。

在这个长方形“课堂”较窄的一头，一个土台上，两棵树中间拉开一块绿色雨布，雨布上面贴着连队俱乐部的墙报。报头用的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像，还是新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墙报出到第二期了。写稿的人不少。吕绍清同志就写了三篇。有天上午我站在土台下面看墙报，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短小的同志，我偶尔掉过头一看，这个读者就是吕绍清班长。我说：“你写得不少啊！”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一句：“我写不好。”我还想再说话，一排副吹起了哨子，讨论课又继续进行了。吕绍清同志坐在一棵树下，向几个年轻的同志发言，声音低，吐字不清楚。他讲话不像他打仗。这个二十一岁的湖南湘乡穷孩子打起仗来赛过一只猛虎。他是最近提升班长的。他的二等功在几天前才批下来。在上一次的战斗中，他跟着一班长朱少林烈士冲上敌人阵地，打掉敌

人的两个地堡和许多暗火力点。他的左小腿挂轻花，未经包扎，又继续打击敌人。一班长右腿负伤，晕倒后醒过来，也不肯让抢救员背下去。等到战斗结束，他们仍在阵地坚持，准备打退敌人的反扑。敌人攻上来，他们用手雷打下去了。敌人的炮弹打垮了防炮洞，就隐蔽在敌人抛下的尸首堆里，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深夜友军上来接防的时候。他们在待避洞里休息了三个多钟头天还没有大亮，又奉命上阵地去。就在这天下午一班长给敌人炮弹打中牺牲了。吕绍清同志现在谈起一班长还要红眼睛，他说："我真想念他。"我还听见另一个战士说："一班长对我实在好，我想起他心里就难过。"朱少林烈士牺牲了，可是活在战士们的心上，活在吕绍清同志的心上。吕绍清同志到现在还记得一班长的最后的话。当他听见一班长在喊："救人哪！"跑过去抢救的时候，一班长对他说："我不得活了，去把一般情况告诉队长。"英雄就是在牺牲的前一刻都不曾想到自己。英雄活着也是为了给人民争取幸福。当吕绍清同志隐蔽在敌人尸首堆中、敌人的坦克炮接连打了三个钟头、一班长对他说"无论如何我们要固守阵地，不能因炮火厉害就把阵地放弃"的时候，当后来情况更紧急、一班长说"阵地是我们同志用血换来的，就是炮打在我们头上，我们也不能下去"的时候，这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心里想些什么呢？面对着死亡，他讲不出假话，他回答一班长说："我是青年团员，我也绝不下去！"他心里想："我就是牺牲了，也是为了祖国人民。"他没有牺牲，他守住了阵地，完成了任务。国庆节前夕军里报社记者来访问他。谈起入朝作战的感想，他说出了心里的话："保卫

朝鲜就是保卫祖国。过鸭绿江的时候看见敌人轰炸破坏的情形，很难过。心想如果敌人打到边境，我们祖国情形就难说了。"最后他说出个人的志愿："学好文化，学好技术当一个和平战士。"

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烈士是这个连队里人人熟悉的名字。在这个"课堂"上人们常常提到他。可是人们更喜欢讲他们自己的英雄，更想念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过的英雄。那就是这个连队的三排副谌木森烈士。他这个不寻常的姓名使人听到就不容易忘记，他这种不寻常的英雄事迹更令人景仰终身。他并没有死，他左手抓住敌人机枪、右手高举手雷、屹立在地堡前面的英雄姿态一直在鼓舞着他的连队。整个连队因为有这样的英雄而感到骄傲。这个三十多岁个子高大的福建庄稼人，是一个经过构筑工事和阵地防御作战各种情况锻炼成功的和平战士。在那一次战斗中他带一个班扫除了铁丝网和地堡等障碍物，消灭了敌人，冲上主峰，在离主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又高又大的地堡，敌人用重机枪、自动步枪和卡宾枪组成火力网死守顽抗，封锁了同志们前进的道路。谌木森烈士大胆地跨上前去，接近敌人枪眼，迅速打进一颗手榴弹。手榴弹打死了一些敌人，可是大地堡里还有敌人用火力向后面上来的部队扫射。谌木森烈士看见情况紧急，为了减少同志们的伤亡，为了保证继续打上主峰完成任务，他来不及拔开手雷的插销，就扔下冲锋枪，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枪眼，阻止敌人火力的射击。他的胸前被子弹打穿了一个大窟窿，然而，他的英雄气概吓得残余敌人不敢放枪，都从地堡里逃出来，被后面上来

的同志歼灭了。同志们胜利地攻占了主峰，结束战斗以后打扫战场，还看见烈士站在地堡前面，左手紧紧抓住从地堡里伸出来的机枪杆，右手高举着的手雷一直没有放下。地堡里还有五个敌人的尸首。

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人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来表示对祖国、对和平、对中朝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国侵略者的憎恨，像这样伟大的战士，在这个连队里，除了三排副谌木森和四班长张义全外，还有人们常常谈起的爆破组三勇士。他们的姓名是郑子清(组长)、潘林生、徐安生。他们在执行任务的前两三天看见朝鲜老百姓在田里工作，一位老大爷被敌人炮弹打死，他们含着眼泪表示决心要为朝鲜人民报仇。在战斗打响以后，他们照预定计划奔向目标：这条坑道在敌人母堡后面，炸掉坑道，就断了母堡里敌人的退路。头一个战士给打倒了，第二个接着冲上，第二个倒下去，第三个拉开导火索，抱着炸药包往坑道里跑，在轰然一声巨响之后，烈士倒在二十几个敌人尸体的中间，而朝鲜的黄土也因为受到英雄的热血的浸润颤动起来了。

三勇士看见朝鲜老大爷被炮弹打死，回去马上表示决心，这段故事是魏国钧同志告诉我的。魏国钧同志就是这个英雄连队的英雄连长。我听见他两次带着痛苦的表情谈起朝鲜老大爷的死亡，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个惨剧。朝鲜人民的苦难不知道多少次激动着魏连长的良心。他曾经对报社记者吐露他的心情：“入朝以来越走离三八线越近，看见朝鲜老百姓的艰苦困难，心想他们生活这样苦，我个人还顾惜什么呢?”这几

句简单的话里含蓄着深厚的感情。他接着又说:“炮火打死了老大爷,老奶奶直哭,我一捉摸炮是从敌人阵地打来的,心里很难过,我想一家人就靠老大爷生活。美帝好霸道!老百姓不能报仇,应该志愿军来报仇,我亲眼看见,我更应该拚命打击敌人,为他们报仇。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他再往下说:“出发的时候我向团营首长表示决心。我说:请首长不必顾虑,我个人也没有顾虑,我保证一定指挥好。”他没有说一句假话。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他说得到就做得到。他一上战场,就表现了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这几个优点。突击部队被敌人炮火打乱了建制,他就带一架步行机先冲到前沿,等在突破口,一边观察敌人的地堡和火力点,一边联络突击上来的战士,把他们组织起来,交付任务,还详细给他们指示突击的方向和目标。等到地面工事大部分被解决以后,主峰上还有一个大母堡正向外面发射猛烈的火力。他看见大母堡不解决,战斗就不能胜利结束,而且还会增加部队的伤亡,他十分着急,拖着一包炸药,站在交通沟口,左脚踏在外面,右脚踏在沟里,俯下身子侧头朝母堡望。他打算自己冲上去把母堡炸掉。卫生员拉住他的衣服,不让他上去。四班长上来了,他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班长。他看见四班长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任务。在二十分钟这样短的时间里面战斗就结束了,阵地占领了。为了打退敌人的反扑,他又布置兵力,准备再战,督促大家构筑工事,向大家宣传胜利。战士们都说:“连长不只是腿动,而且嘴也动。他走到哪里说到哪里。我们看到他,听到他的声音,胜利的信心就更大了。”敌人一次接着一次地反扑上来,坦克炮打

得特别厉害，情况非常紧急；他总是挑最紧急、最困难的地点去。在两天两夜的中间他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十八次反扑，守住了阵地。就是在这样地实践了他的诺言，替朝鲜老百姓报了仇，为祖国争了光以后，他还谦虚地对人说："我个人到朝鲜只参加过这一次战斗，没有立下大功，对不起祖国人民。"在魏连长，这并不是虚伪的客气话，这是真情的流露。他随时准备着把生命献给祖国，献给和平事业。战士们都说："连长是阵地上最活跃的人。"营长说："他在阵地上到处跑来跑去，没有挂一点花。第二天下午他下来的时候眼睛都红了，正发着高烧，走几步就摔觔斗。我要他休息，他几次要求再上去。第三天拂晓我又让他上去了。"连队的文化教员告诉我："我们连长在阵地上晕倒过一次。"那个年轻人谈起他的连长，就露出敬爱的表情，声音里也带着感情。魏国钧同志正是拿这种不顾惜自己的忘我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获得全连同志的敬爱的。

我到这个连队以前就听见人谈起魏连长的英雄事迹，来到这个连队以后，我又听见更多的人谈论他。连队里的人想念他像想念亲人一样。那个时候他正在别处参加人民军某军团的庆功会，作一个特别邀请的客人。我在他的连队里住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我们刚吃过晚饭，他意外地回来了。他从山下面走上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看相貌，看动作，他都像一个忠厚老实的庄稼汉。我起初没有想到他是魏连长，可是我看见副指导员、文化教员、卫生员和通讯员眼睛发亮、脸上露出喜色，我便知道上来的是什么人，接着就听见在场的

几个人用万分高兴的声音一齐喊"连长"。他点点头非常和蔼地笑了笑。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他抱起炸药包打算自己去炸母堡的事情。我觉得我更了解他了：他爱他的战士，他爱他的同志。

我和魏国钧同志相处的日子虽然不多，可是我越跟他接近，越觉得了解他，也越敬爱他。他在战士们中间，脸上总是带着和蔼的微笑，就像在一个和睦的家庭里一样。要是他静下来，我就会看见他抽着烟、弯着背、仰起头思索，他在考虑问题，想办法。在"课堂"上，我也看见他：他听形势教育的课，参加小组讨论，认真学习，一本正经地坐在小凳子上面。他是一个再忠厚老实不过的人。然而他虚心，他肯学习，所以他在战斗上有办法，在工作上也有办法。

我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离开这个英雄连队到另一个英雄连队去。这是很好的晴天。战士们刚洗好衣服、缝好被子，正在擀面皮包饺子。跳舞训练班的战士还在"课堂"上练习国庆节晚会的节目。指导员在连部主持会议。魏连长送我到修建营房的地方，还有一堆工作在等着他。中年的炊事班长送我到半山上水井旁边。两个年轻的副指导员一直把我送到山下上汽车的地方：我忘记跟闻祥言同志告别，他气咻咻地从后面赶下山来送我。在那里还有几位我一直在怀念着的同志。他们不多讲话，只是热烈地跟我握手，特别是那两位副指导员，两只手握着我的一只手，一次两次地紧握。谁说我们这个民族不会表示感情？我上了大汽车，又想打开车门跳下来。可

是车子忽然开动了。

车子已经转到公路上去了，我还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朝那座山的方向看。我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每个人的面容都清清楚楚地现在我的眼前。我充满感情地轻轻说一声："再见！"我觉得有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我兴奋，我骄傲：因为我认识了这么多的英雄人物。

1953年11月追记。

一个连队的生活*

我的笔记本上写着这样的诗一样的"誓辞"：

祖国人民啊！
"不作英雄归来，
便作英雄死去。"
用我们的鲜血，
把到处是瓦砾焦土的朝鲜，
灌溉出一个美丽的花园，
用我们的怒火，
把战争贩子烧死在朝鲜的土地上，
用我们钢铁的意志，
保卫祖国像铜墙铁壁一样。……

这是我从志愿军一个连队"墙报"的国庆特刊上摘录下来的。我每次翻开笔记本读到它，就会想起我在那个英雄连队里过的日子，那些忘不掉的面孔，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给我唤起了许多亲切的回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解放军文艺》二月号。

于是我听见了吹哨声。我知道这是北京时间的五点钟。一道灰白光从草门帘旁边的空隙射进这个不到一人高的矮帐篷里。接着许多人的脚步从山坡上跑下来，跑过帐篷往远处去了。我穿好衣服走出帐篷。只见一片白雾。公路仍然横在我面前，公路的那一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对面山脚操场上战士们早操的声音透过浓雾传到我耳边。我沿着公路散步回来，太阳刚升起，雾已消散，对面几个灰白色帐篷安安静静地摆在山脚，铁匠炉的茅草棚里有人在生火。一部分战士掮着枪刚踏过小河里的高石墩，朝这里走回来。住在对面帐篷里的战士们正拿着洗脸用具朝河边走，有的已经穿过灌木野草跑到沟边，弯下身子在洗脸了，住在这面山坡上的一个排的战士回到各个班的帐篷里，放好武器以后，也拿起洗脸用具往河边，往沟边跑去。伙房就在这附近，是一个简单的茅屋，炊事员们已经忙了好久了。开水打过不久，就听见开饭的哨声。战士们拿着搪磁盆和铝桶到伙房打饭、打菜了。

这是一天生活的开始，每个帐篷里响过一阵快乐的谈笑声以后，又静下来了。一部分战士有的扛锹、镐，有的扛钎子、拿铁锤，排成一条线到山上去。从我们这面的帐篷口望过去，对面那座山相当高。可是战士们很快地就到了主峰了。我看见一些人钻进了山上那个大洞，另一些人翻过了山头。山脚下铁匠棚里送出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两个临时铁匠在臭炮弹筒改做的砧子上打钎子，另一个孩子似的四川小战士站在炭炉前面拉风箱。离铁匠棚不远，在几个矮帐篷前面，就是那个新平出来的操场。国庆节的早晨，全连战士在这里举行

过升旗礼，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高高地升在临时旗杆上，迎风飘扬。现在一部分战士带着自己做成的小木凳坐在操场上，用心地听卢副指导员讲课。卢副指导员站在一块挂在两根柱子中间的雨布前面，用他那响亮的声音解释“团结朝鲜人民的四个原则”。这块雨布就是平日贴“墙报”的地方。每逢连队上“形势教育”课的时候，雨布上面又贴出了别的“挂图”。在上课的日子里，卢副指导员一天要在这个操场上讲两次同样的课，才能够使每个战士都听到他的讲解，有时候还得为少数补课人讲第三次，但课堂就不一定在操场。每次上课的时间不过两个钟点，上完课以后，休息一会，就开始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是在各班的帐篷里进行的，每个帐篷里都是一片细语声。卢副指导员住在我那个帐篷的对面，文化教员、文书、通讯员跟他住在一起。在小组讨论的时间，文书、卫生员、通讯员、理发员都坐在卢副指导员的帐篷里认真地发言。照规定，讨论比上课的时间多，上一天课总要讨论几天，在讨论的中间常常听见值星排长吹着哨子大声叫：“休息十分钟！”接着就看见战士们从每个帐篷里跑出来。这时候又听得见笑声，又有人在高声讲话了。讨论课结束后不久，就听见叫“打饭”的声音。伙房里又热闹了一阵子，各班的打饭人都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了。吃过午饭以后，留在家里的战士们便动身到山上去。他们有的空手，有的扛着新打好的钎子。我又看见一些人钻进对面山上的大洞，另一些人翻过山头，要是我不掉开眼睛，一直朝对面山上望，我还会看见人们从山洞里出来或者从山的另一面翻过来，接着就顺着山间小路走下来了。他们做完了

六个钟头的工作，回来吃中饭、上课、休息。

晚饭以后便是游戏的时间，大部分的战士都在操场上。有些人练跳舞，有些人学唱歌。从军文工团里下来的三个同志做了临时教员。他们中间有一位还拉手风琴，给唱歌跳舞的战士伴奏。还有些战士就带着球到山背后友军修筑的大球场打篮球去了。这应该是一天中间最快乐的时刻。年轻的战士们跳得多活泼，唱得多高兴！在快乐的游戏中时间过得特别快。夜幕降下来。歌声停止了，战士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铁匠炉里的火也早灭了。剩下一个空阔的操场，静静地承受秋夜的寒气。

战士们在自己的班里继续讨论。每个帐篷里都射出来温暖的烛光，送出来激动的人声。战士们在讲朝鲜老大娘热爱志愿军的故事。每个人讲他自己亲身的感受。到点名的时候，又听见尖锐的哨声，接着值星排长叫“点名啦！”于是一阵脚步声从山坡上跑下来。对面山脚亮起一连串手电光。手电光像一条线似的向我们这面拉过来。“看，真像一条火龙一样！”连部的通讯员忽然惊喜地说，他也背起枪到公路旁边草地上站队去了。部队到齐以后，战士们先唱歌，大家喜欢唱：《我是志愿军》。歌词是本师的文化科长写的。晚点完毕，各班的战士都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帐篷里又亮起烛光，响起谈笑声。再过半个多钟点，值星排长吹起哨子大声叫着：“熄灯啦！”四周突然静下来。我吹灭了帐篷里的洋烛，躺在铺了干草和雨布的地上，只听见几只小虫在帐篷角上寂寞地叫着。

这是一个连队的一天的生活，简单、有规律、而且愉快的

生活。我听见战士们赞美这个革命大家庭的和睦的气氛。在这里住下来，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对这个家庭的依恋。有一天我对连队的卢副指导员说："我觉得这里就像我的家一样。"我说出我心里的话。我指的是人，不是眼前这十几个矮帐篷。帐篷只是临时的住处，不是这个连队的"家"，"家"还在后面，离这里有十几里地，一位副连长留着"看家"。我也曾走过那个地方，望见那些战后修建的漂亮营房，还有几间屋刚搭好架子，战士们正忙着上草、涂墙。那是留在"家"里的少数战士，他们紧张地工作。为了让大家过一个舒适的冬天，安好家，大家好安心地学习文化。连队在这里执行修补工事的任务是短期的。帐篷在公路旁边的草地上搭起来，不过三个星期的光景，据卢副指导员说，再过三四个星期就可以回"家"去了。他们有把握按期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卢副指导员提到他的连队，脸上就现出满意的笑容，每一个战士也因为自己参加了这个连队而感到自豪。这是一个著名的英雄连队，连敌人也知道它的光荣称号，战士们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连队今年刚上阵地的时候，敌人就在前沿广播要跟我们的连队较量高下。三天以后敌人果然上来偷袭。我们一个加强班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连的三次冲锋。从此敌人再也不敢上来"较量"了。一百多天以后，李承晚匪帮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强迫扣留战俘、叫嚣"北进"的时候，我们的连队在一个晚上向敌人发起反击，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战斗，把敌人全部歼灭，取得了胜利，就在那一大张"国庆特刊"的墙报上我看见一张"功臣榜"，上面写着两位一等功臣，八位二等功臣，和二三十位三等

功臣的名字。还有一个十八岁的湖北战士在两次战斗中都立了三等功。我认识这个年轻人。他去年十二月才参加抗美援朝来到这个连队，现在他是一个班长了。三班长李伦宣同志还是个文娱骨干。每天在游戏时间里我都看见他跟几个年轻同志一块儿跳新疆舞，他边舞边唱："我们快乐的迎接，这美丽的春天……"脸上一直带着年轻人的天真愉快的笑容。有一天，我跟他一路翻过帐篷后面的小山，到他那个班正在工作的地方。一个战士刚拖着一辆用木箱改做的小车，从洞里出来，把满满的一车土倾倒在洞子前面的坡上。李伦宣同志从战士的手里接过拴在木箱上的带子，拖着小车走进黑黑的洞口去了。过了一忽儿，从洞里送出来一阵子轱辘的声音，三班长拖了一车土跑出来，把土倒出以后，又匆匆地跑进洞去了。脸上仍然带着笑，好像还在愉快地练习新疆舞一样。他出来几次，我注意地望了他几次。我赞美这个圆圆脸、孩子似的瘦小年轻人：在连队里，他是一个爱兵的好班长，在文娱活动中，他是一个活泼的好青年，在阵地上又是一个英勇顽强的英雄。"英勇"和"顽强"这两个常用的字眼，用在这个跟地主放过八年牛的穷孩子身上，并不是普通的称赞话。我再也找不到更恰当的形容词。就在今年三月十九日打垮美军陆战第一师三次进犯的战斗中，第一次他用十六颗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两面冲锋。右脚给打穿了两个孔以后，他又用冲锋枪打垮了第二次上来的敌人。敌人的炮弹片把他的右腿打了两个洞，他走不动，立不起来，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敌人第三次冲上来了，他当时的班长董庆过来支援他。工事高，董庆身材矮小，没法打枪。李

伦宣同志就爬到董班长脚跟前，说："班长，你踩到我肩膀上打吧。"班长董庆流着眼泪，站上他的肩头，端着冲锋枪，对准上来的敌人猛扫，子弹打完，他又把手榴弹揭开盖子，递给董班长，一颗一颗地打下山去。他伸出四处挂花的右腿，把身子靠着工事，让董班长在他肩头站到打垮敌人保住阵地的时候。他自己说："我们班长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的伤处还在流血，伤口也痛。不过我很高兴，我挂了花还能帮忙班长完成任务。我觉得就是再长的时间我也受得了。"最后战斗胜利结束，李伦宣同志爬回坑道。三天以后担架队把他抬到营部，四月他回祖国休养，六月下旬他回到连队同志们的中间，不到两个星期他又在一次反击战斗中冲上敌人阵地，一个人打死六个敌人，完成任务。第二天晚上他重上阵地，冲到敌人前沿，他用手雷，另一位北方同志陈启富用冲锋枪，两个人一起打掉敌人两个火力点。谈到阵地上的情况时，他睁大眼睛兴奋地说："我们的炮打拦阻线很准，消灭了不少敌人。"又说："敌人的照明弹打得亮堂堂的。"陈启富同志闪着眼带笑说："打仗还有人打灯笼，跑一只兔子也看得见。"陈启富同志现在是连队的三班副，李伦宣同志的好助手。看相貌他比他班长年纪大得多，其实他跟他班长一样，都是活泼、好动、讲话有风趣的人。在反击战中他奉命送饼干上去，走到中途，左手手掌挂花，他把饼干送到后，发现一个敌人的暗地堡，他在烈士身边找到手榴弹，打进暗堡，消灭了敌人，以后一直在阵地上坚持，到天亮的时候，马副指导员叫他下去通讯联络，第二天夜晚，他又上阵地杀敌立功。陈启富同志手掌上的伤口已经治好了，现在他

在洞子里抡铁锤打钎子，要在土夹石的洞壁上打出眼来埋炸药，洞子的深处摇晃着烛光，两个人掌钎，两个人抡锤，在上下两个地方打眼。除了这两根锤响，我还听见从洞壁的另一面传来的打锤声。陈启富同志光着头，白衬衫上有几处黄土印，他满脸流汗，打一下锤，"嘿"一声。忽然听见对面人声，"喂，喂！"又听见人说："抓住钎子啦！"大家马上停了工作快乐地笑起来。陈启富同志高兴地大声喊："腰宝[1]！"别的同志也跟着叫。对面的同志嚷着："不要再打眼了！"我分享了战士们的快乐以后，又顺着山腰的交通沟绕到对面那个洞口去。在那里同志们一面装炸药埋雷管，一面还在谈刚才抓住对面打过来的钎子的事情。对面讲话的声音也听得清楚了。等到炸药埋好点导火索的时候，我们都到洞外去。爆炸以后，同志们在洞子里忙了一阵。我再进洞去看。洞里还有烟，同志们用铁锹铲土，装进小木箱。往里有几支蜡烛摇摇地发着昏黄的光，地上土堆得像一座小山。还有几个战士用十字镐在两边洞壁上刨土。"打通了？"我带笑问道。"打通罗，"旁边一个年轻的四川战士得意地回答。我正要转身退出去，四川战士笑着问我："你要不要走这儿过去？"我又听见陈启富同志在对面说："过来啊！"他们让我爬过这座小山从对面洞口出去了。

我回到帐篷跟前，看见一班长姚湘源同志，我告诉他："你们的坑道刚才挖通了。"他愉快地笑答道："我们这条坑道土多石头少，比较好挖些。那一条，"他抬起头指着对面高山上那

---

① "腰宝"：朝鲜话，"喂"的意思。

个大洞说，"就难多了，是坚石，每天进展不了一公尺，又容易坏钎子。"他说的是实在的情形。第二天早晨我就爬上那座高山，钻进石洞，三排的战士在那里掌钎打眼。两个眼都打得不深。铁锤下得勤，可是钎子老是在石头上转，不肯进去。"加油啊！"一个年轻的战士在旁边笑着鼓动说，"不然这个月完成不了任务。"打锤的战士身上穿一件衬衣，头上还在冒汗，他一边下锤一边说："包你按时完成。石头硬总没有我们的决心硬。现在每一班增加了两个钟头的作业时间①，你还怕完成不了任务？"他说着兴奋起来，就更用劲把铁锤朝钎头上打，打了一阵，钎子尖碎了一小块，掌钎子的战士拔出钎子来，另外换一根新的放进去。

我走出洞子，顺着山路，翻过山头的缺口，走到对面那个洞口去。我刚走到由碎石堆成的小小平台上，就看见秦连长拿着指北针和一根细木棍从洞里出来。一个滚圆脸的胖小孩拖一个带轱辘的木箱跟在他后面。接着又走出来一个从团里来的干事。秦连长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干事就坐在他旁边另一块石头上。干事掏出笔记本，拿出自来水笔，向秦连长问一些坑道作业的情况。胖小孩不断地把碎石拖出来。还有一个年轻的四川战士在后面推车。秦连长谈完话看见干事把笔跟本子放回袋里去，便对胖小孩说："你休息一忽儿吧。"胖小孩顺口回答："俺任务没完成，不休息。"秦连长温和地笑了笑，问一句："你多大？"胖小孩答道："俺十九！"秦连长站起来说："我替

① 最初每班的作业时间是四个钟点。

你拉一忽儿。”胖小孩摇摇头笑着说：“不，不！”他们又把木箱拉进洞里去了。后来在他们休息的时候，我跟四川战士谈了一阵话。他今年二十了，刚订过婚，未婚妻在村里工作。他本来决定今年春天结婚，后来参加抗美援朝就把婚事搁下了。他未婚妻赞成他来朝鲜，他母亲不同意，两三天不讲话，他耐心劝他母亲：“妈，你想想看，我们从前过的什么日子，吃的什么？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吃的什么？你还有什么说的，我的心在朝鲜，你把我留在家里有啥子好处？哥哥嫂嫂在家，有人照应你，家里又不缺劳动力，你还愁啥子？你还是让我高高兴兴地出去，我会好好工作，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将来立个国际功，不单是为祖国争光，也是为你争光啊。喜报寄回家，看你高不高兴……”他母亲终于同意了，并且亲自送他到区政府去。最近她还寄信来告诉他一家人生活很好，要他放心，并且鼓励他努力工作，争取立功。

我和秦连长一路下山，回到连部。我又上坡去找姚湘源同志。太阳把帐篷晒得十分暖和。姚湘源同志正在班里跟战士们讨论节约问题，记录战士们的发言。我没有打扰他；在铺上坐一阵就走了。我一直忘不了他那种用心记录的样子。这个从湖南农村出来的青年班长也是今年七月初反击战中的二等功臣。冲上敌人阵地，他真像俗语所说的“生龙活虎”！他打掉两条盖沟，炸掉两个地堡，抓住一个俘虏，替伤员包扎，又执行通讯联络任务，在阵地一直坚持到天明。他安全地回到同志们中间，敌人的榴霰弹连他的皮肤也没有挨到。他自己常说，他没有值得提说的功劳，没有把任务执行得更好，对祖国

人民的支援和关怀感到惭愧。像这样有荣誉感、有责任心、朴素、谦虚、立功不骄傲的人在连队里是很普遍的。住在我对面帐篷里的连部通讯员李启成同志就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跟他见面的机会最多。我常常看见他挑水、送信，担任勤务和其他的工作，空下来就拿一本小书坐在帐篷前面小茅棚里默读，或者伏在小木桌上写字。有时候他背起枪去出操上课，有时候他坐在帐篷口接电话，看家。国庆节晚上部队到友军大操场上去看本军战士演出队表演节目，回来的时候，我先到“家”，看见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连部帐篷前面。我想起白天他在同一个大操场上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作为本连的代表讲过话，就问他：“怎么你先回来了？”他亲切地答道：“我晚上没有去。我看家。”这个湖北建始县的农村青年今年刚满二十，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世界和平，离开自己温暖的家，离开新婚的妻子，来到朝鲜前线，在第一次的战斗中就很好地完成了上级所交给的任务，立下了二等功，参加了停战协定签字后全军召开的功臣代表大会。他觉得他得到的荣誉已经远超过了他为祖国贡献出的力量，在国庆节大会上对着友军首长和七百多个同志讲话，他显得非常拘束，可是他讲得简单诚恳：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他愿意献出他的一切。他不会说假话，他头皮上那块伤疤就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证据。我相信他以后会用更多的事实来表示他的深厚感情。

李启成同志提到那一次战斗，就想起他过去的杨连长和马副指导员。那一个夜晚他跟着杨连长冲上阵地，杨连长给

他一个联络任务，等他完成任务以后回去向杨连长报告，就失去杨连长的踪迹。后来他找到了马副指导员才知道杨连长已经牺牲，他记得他离开杨连长以后还听见杨连长在交通沟上喊："同志们！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另一个功臣刘达才同志也听见杨连长的叫声："……同志们冲啊！"刘达才同志说，连长在经过洼部上主峰的时候，腹部挂重花。他看见连长一只手掐腰，一只手指挥战士往上打。到了主峰，连长看见上面还有敌人，就打出两颗手榴弹。过后站在坡上喊鼓动口号，被流弹打中牺牲了。一营陈营长曾经向我们谈过杨万忠同志，他惋惜地说："这是一个经过锻炼的很好的指挥员，打仗很勇敢，可惜一时大意牺牲了。"文工队的同志说："杨连长比较瘦，中等身材，出发的时候，我们在坑道口欢送他们。那天下着一阵一阵的小雨，他穿着雨衣带着出击部队宣誓，我还记得他那种英雄的姿态。"师政治部一位科长说："他带着部队出发的时候，唱着：'炮火震动着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中朝人民亲如兄弟，并肩作战打击敌人。'那个场面真叫人感动。"

马玉臣同志，被选为志愿军功臣代表，参加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回祖国去了。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不仅勇敢，而且灵活，有办法。在战斗中他担负指挥攻打敌人坑道的任务。他不仅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还跟一个挂轻花的侦察员一起，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敌人的武器，打掉了敌人九个地堡，知道杨万忠连长牺牲以后，他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在人员很少的情况下，他意志坚强，沉着果断，把剩下的人马上组织起来，明确地

交代任务，并且教会战士们使用敌人的手榴弹，指挥他们搜索前进，炸掉三个暗地堡，打掉两条盖沟，最后又指挥战士们掩护五班副岳鸿发同志炸塌敌人最后一个大母堡，把指挥所的敌人全部歼灭，完成了最后的胜利。马玉臣同志在战后被提升为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他是这个连队的一面旗帜。国庆节后的星期天，战士们擦过枪刚在小河边洗好了衣服，陈营长带着全营三十几个文娱骨干从十几里外到这里来慰问这个连队的同志，他告诉卢副指导员：马玉臣同志的一等功已经批准了，还得到"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全连队把这个消息当作一件大喜事。

除了马玉臣同志，连队里还有一个一等功臣，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岳鸿发。岳鸿发同志不仅炸塌敌人阵地上最后一个大母堡，而且在这以前，在部队冲向主峰，敌人的一个用钢板枕木和沙袋筑成的大母堡用五挺机关枪组成交叉火网封锁道路的时候，他一只手捏紧手雷，另一只手拿着爆破筒，弯着腰，穿过炮火跑到大母堡跟前。一个敌人端着枪守在母堡门口。岳鸿发对准敌人把手雷扔过去，在手雷爆炸的硝烟中，他连忙跳进交通沟，立刻把爆破筒塞进母堡里面，同时解决了三十几个敌人，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功臣的名字太多了，英雄的事迹在连队里普遍地传播着。

文娱骨干在操场上表演了十一个慰问节目，歌的、舞的、唱的全是连队的生活。全连战士看得非常高兴，不断地拍手欢呼。节目完毕以后，战士们纷纷地跑过去跟自己的阶级弟兄热烈地握手。伙房已经把晚饭作好了。战士们殷勤地招呼

客人吃饭。

晚饭后师部来的大车到了，放映队的同志们下了车，忙着搬运机器。陈营长拉着他那匹枣色大马过了小河，看见文娱骨干在操场上集合以后，他才跨上马沿着公路，朝太阳下落的方向慢慢地去了。文娱骨干们敲着锣鼓跟在他后面。

战士们又在谈论晚上的电影。他们已经知道片子的名字是《两个世界》。他们很兴奋，都说这是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在这一天全连的战士都得到休息，连那三个整天在铁匠灶旁工作的年轻战士也换上干净衣服，在操场上看慰问演出，现在又准备看电影了。

我盖上了笔记本。门外飞着雪片。在坡上初一级教学班的教室里，战士们正在学习注音符号的三拼音，"己于举，举恩军"的声音穿过漫天雪花进到我的屋子里来。两个月中间我走了不少的路，我又在另一个英雄连队安了家。这是一个三等功臣连，在工作上、在战斗中都得到过荣誉，现在又准备在学习文化上创造新的荣誉了。在这个功臣连队里，我想起了马玉臣同志那个英雄连队。我知道马玉臣同志已经回到他的连队，连队也已经完成任务，拔掉帐篷，回到自己修建的新营房里去了。这个时候，在那些阳光充足的教室里，功臣、英雄和全体战士，一定坐在自己做的各式各样的小木凳上，专心地学习文化吧。我可以想象到那些年轻人脸上的表情。我仿佛听见我熟悉的声音在大声读书：李伦宣同志的声音，李启成同志的声音，姚湘源同志的声音，和别的许多"祖国保卫者"的声

音。读书的声音响成一片，冲破朝鲜冬季的寒气，给我的屋子里带来了不少的暖意。我忘记了门外的大雪，忘了泥泞滑脚的山路，我心里充满快乐，我心里暖得很。我跟这么多的好青年、好战士生活在一起，我为什么不快乐？

1953年10月9日追记。

范国金与何全德*

一

我住在××山的时候，常常绕一个圈子从营部到三连去。那些天连队里任务比较多，只有少数人留在家里修补房屋，作过冬的准备。连级干部中间也只有指导员一个人在“看家”。我去找一个叫做范国金的班长；我早就听见过他的名字，也有人向我描绘过他的面貌，谈过他的事迹。可是一连好几天他都不在班里，他出去执行修建新营房的任务去了。有一天，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他，但马上我就知道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人。我看见的是战士何全德。拿脸貌来说，何全德跟范国金相似的地方不多。然而在他们的脸貌、身材和态度上，我也看到好些共同之点。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没有那种使人一见不忘的英雄气概，他们都是忠厚老实的中年人。可是你跟他们在一起听他们谈过一阵话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已接触到他们的单纯、真诚、善良的心，那时候连他们脸上那种谦虚的微笑，也会把你抓得紧紧的，使你不能不喜欢他们，使你过了许久都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文艺月报》一月号。

不能把他们的面貌忘掉。

何全德同志坐在炕上对我谈他的战绩。外面山上刮着风，房门掩上了，屋子里还有三四个人在谈工作。可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搅乱何全德同志的思想。这个从陕西省西安市出来的贫苦人，今年三十六岁了，以前被国民党抓壮丁熬过不少的苦日子，全国解放后翻了身，参加抗美援朝当了二等功臣。瘦脸上一对高颧骨掩不住他那和善的笑容。他说话声音不高，但是说得急，好像想把他的心一下子就掏出来让你看个明白。他说得很简单，仿佛那只是一些极平常的事情：他和少数同志在阵地上坚持了一天两夜，一共打退敌人的九次反扑，守住了阵地，他自己还下来五次，完成了联络的任务。

"这是每个战士都做得到的，算不了什么。"他带着歉意似地解释说。他好像希望我不去想它们，可是并不要我去想，事情自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

我看见他和同志们奔上一个山坡。他跑得那样快，脚步那样灵便。敌人打过来的空中炸的炮弹好像在追赶他，不断地在他的周围爆炸。两个同志倒下去了，他还是不停脚地奔向目标。在路上他找到了班长，班长正带一个组往上奔。他跟着班长上去。离山头不远了，忽然一颗空中炸的炮弹在他们的上空炸开了，他连忙趴倒在草上。他再起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同志正往前跑。他听见班长的声音："何全德，我胳膊挂花了。你们不要管我，完成任务要紧！"他再看另一个同志，那个年轻人仰卧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牺牲了！他心里颤了一下。他匆匆地把班长的伤口包扎好，把班长扶到一个隐蔽

的地方，“班长，你安心待在这里，我去给你报仇，”他说完就跟着前面那个同志向山头奔去。他们跑得好快！敌人的炮弹连他们的衣服也没有挨着，他们就到了山头。一个人影晃出来，向他短短地问：“谁？”他听出来这是三排长的声音，马上回答：“何全德！”三排长声音温和地说：“这上头没有敌人了，你们到前面去。”何全德答应一声又往前面走了。没有走多远，旁边那个同志忽然低声说：“看，六班副在前头。”他已经看到了六班副的侧面，就高兴地唤一声：“六班副。”六班副问：“你们几个人？”他回答：“只有我们两个。我们班长挂花了。”六班副说：“好，我们不要分散了，三个人组织在一起，准备打敌人的反扑。”他说：“好，我们听你指挥。”他们一路走不多远，听见后面有响动，接着又听见他们二排副排长的声音：“你们是哪一班的？”何全德答：“四班的。”六班副答：“六班的。”二排副带着两个四川新战士走了过来，一面说：“你们三个都跟我走，要特别小心，注意敌人的暗火力点。”他们一面走，一面注意前头和左右两面。何全德心想：不要让敌人打伤副小队长才好。他忽然注意到前面左边树下有一个黑东西，马上火光一亮，他听见枪声，同时听见二排副的低沉的声音：“敌人的地堡！”枪声响了一阵，他们都趴在地上。何全德从地上略略抬起眼睛瞅地堡，他看见子弹从枪眼里出来。他并不害怕。他注意地瞅着地堡。心里在盘算怎样上去打掉它。枪声停了。他听见二排副低声说：“我挂了重花，你们赶快去把那个地堡打掉！”何全德呆了一下。愤怒真像一股火一样，烧得他浑身发烫。他从旁边爬向地堡的左侧，把手雷拔掉插销，朝着地堡门扔过

去。只听见一个大的响声，他的身子也摇晃了两下，一阵烟、一阵土向他扑过来，地堡马上塌了。他很高兴，他想：二排副一定听见了这个声音，一定也很高兴的。他走到地堡跟前，从一个缝隙打进手电光去照：两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兵倒在地下。“几个敌人？”六班副在旁边问道。他回答：“两个，可能没有死。”六班副说：“死了。你怕他们装死，我再打一梭子枪进去，”六班副端起冲锋枪朝地堡里一扫，接着又说：“我们再往前走。前面一定还有敌人的地堡。”他们顺着交通沟小心地往前走。他在前，六班副在后。他们竭力使自己不发出响声，一面提防着敌人的暗火力点。忽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他身边飞过。接着又一颗子弹向他们打来。他们马上闪开。何全德看清楚前面那个防炮洞，就拿出手榴弹朝那里打进去。过后他们走过那里，他用手电一照，两个敌人死在里面，大半个身子让土盖上了。“这些胆小鬼！平时只会欺侮老百姓，”六班副轻蔑地说。何全德不答话，他想：“这样的敌人再多来一点，我也不怕。你打不死我，我就要解决你。”这时二排副带的那两个四川新战士跟上来了，他们又继续向前搜索。前面远远地有一个黑黑的东西突然发出一闪一闪的火光，同时响起了枪声，枪弹带着啸声落在他们前面。他们扑倒在地上。“六班副，我们没有武器，拿什么来对付它？”何全德低声问道，他望着那个大地堡想不出主意来，他们的爆破武器已经打光了。六班副马上小声回答：“我们就等着监视它，不要让后面的同志吃它的亏。有了武器再来解决它。”他们退到上面找一个隐蔽地方待下来，一面监视地堡，一面留心着从后面上来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九班副带着三个同志上来了。当时九班副便是现在的八班长范国金同志，他和同志们是在另一个阵地上大破了敌人的地堡群以后转到这里来的。他们带的爆破武器也剩得很少。范国金上来以后，组织过一次爆破。执行任务的同志把手雷扔到地堡上，看见地堡炸坏了，可是过一会从那里又发射出火力，那个同志挂了花回来了。阵地上听见了敌人坦克的声音，范国金以为敌人要冲上来，就准备打敌人的反扑，派何全德下去联络。何全德接到命令毫不迟疑地下去了。敌人打过来的空炸炮弹没有伤到他。他到了待避洞，见到副教导员报告了情况。副教导员说："好，马上给你们送弹药去。你告诉他们要守住阵地，好好地打敌人的反扑！"何全德站在副教导员面前，红着脸用尽力气答道："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他心里很激动，声音不大，而且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他很快地就回到阵地上去了。这一次他并不是一个人回去的，同去的还有几个送弹药的炮排的同志。他在前面带路，把他们安全地领到阵地上，他们放下弹药又背着伤员和烈士下去了。阵地上还是先前的几个人，可是有了充足的弹药，大家的信心更大了。敌人没有上来，却不时地打过来一阵空中炸的炮弹。下面那个炸坏的大地堡里还不断地发射火力。范国金叫大家赶快挖防炮洞，一面组织爆破，要打掉地堡。两个同志带着爆破武器去了，一个同志没有挨到地堡就负了伤，另一个同志把地堡炸塌了，可是地堡通大母堡，非常坚固，不久敌人的火力又复活了。何全德还在挖防炮洞，一排副已带一个班上来了。他把兵力布置好，叫每人抓紧时间挖好一个防炮洞，准备天明

打敌人的反扑。天快亮的时候，何全德待在自己挖好的防炮洞里，他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他一双眼睛注意地望着山下，有时也掉头看一眼别的同志。他关心他们。他知道他们在他附近，他那一点紧张的感觉也就没有了。范国金离他近，从防炮洞里露出头来，好像在对他点头。他忽然听见一个同志低声说："敌人上来了。"一排副接着低声吩咐大家："准备好，等敌人近了再打。"他留神一看：灌木和野草丛中有一些钢盔在闪动，敌人果然慢慢地爬上来了。人数并不多，好像只有一个班。同志们沉住气，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只听见敌人的皮鞋声和树枝树叶的响动。大家眼睛也不眨一下，一直望着前面。等敌人爬到离他们二十多公尺的光景，一排副喊一声"打！"手榴弹和冲锋枪一齐打下去。敌人没有提防，一下子就给打乱了，他们还想抵抗，但终于受不了接连爆炸的手榴弹，连叫带喊地滚下去了。一排副说："打得好！大家要提高警惕，天要亮了，下一次敌人一定来得更多！"何全德暗暗地点一下头，心想："我也知道，再多我也不怕。"天空变成一片灰白色，四周的景物渐渐地现出来了。忽然雨点凉凉地打在他的脸上、手上。下雨了，但雨声掩不住坦克的履带声。每个同志都知道敌人来了。他们看下面，两部坦克停在大地堡后面，敌人上来了不少，队形很宽，从两边上来，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到处都响着枪声。同志们静静地等着。敌人到了二十公尺以内，大家用手榴弹、手雷和冲锋枪一齐打，敌人也打手榴弹上来。打了一阵，敌人没有站稳脚就下去了。何全德只听见敌人在哇哇地乱嚷乱叫，不知道他们在叫什么。他看见有些敌人往两边疏

散，有些死在坡上、有些往下逃。一排副负了轻伤，胳膊上流着血，他说："我不要紧，我还可以在阵地上指挥打敌人。"何全德听到这个坚决的声音，觉得心里一阵暖和，仿佛浑身添了一股力量。他想："我一定要学你的榜样。"雨已经住了，大家穿着湿衣在防炮洞内蹲着。接着敌人又分两路上来五六十个人，由三辆坦克掩护。一路向正面，一路向右面，冲到十几公尺光景，这一次打得厉害，但敌人终于被打下去了。不久又有三十多个敌人，由二辆坦克掩护冲上来，又让同志们打下去了。坦克炮打得更厉害，一排副负了重伤不能够指挥了。范国金就对六班副说："我把一排副背下去，你在这里指挥。"六班副答一声"对。"范国金背着一排副下去了。这时候不过早晨八点钟光景。过一个多钟头，敌人又上来四十多个。范国金已经回来了，看见在阵地的同志只有八个，他又把兵力布置一下，把观察哨放得远一些，他自己也当了观察哨带一个组守在左面，六班副带着何全德他们守右面。敌人分两路上来，你挤我推地走到三十公尺以内，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两面一齐打，手榴弹、手雷飞也似地打下去。一阵爆炸声和一阵烟雾过后，敌人大半倒在山腰，剩下的几个也连滚带跑地下去了。这次敌人的反扑打下去以后，一个同志挂了花，阵地上面的弹药也剩得不多了，六班副又派何全德到指挥所去联络。这一趟他又把送弹药的人安全地领上阵地，而且在路上捡了好些敌人留下来的手榴弹，一起带到上面去。弹药充足了，送弹药的人也留下来守阵地。到十二点钟，又下起大雨来。敌人从对面高山上打过来一阵机枪。雨还没有停止，敌人又过来一百

多人，大家注意地望着，一点也不害怕，没有人想到生死的问题。大家只有一个思想：坚决地守住阵地。忽然有一部分敌人钻进地堡下边一个大母堡里面去了，另一部分敌人冒着雨慢慢地爬上来，越往上，越慢。何全德看得清清楚楚，那些高个子满身是泥，仍旧你推我挤地朝上面爬。等他们爬到二十多公尺，先打下一个手榴弹，接着再甩下一个手雷，然后同志们一齐把武器朝下打。一阵激烈的战斗过后，残余的敌人退回到大母堡里面去了。六班副也负了伤，两个同志牺牲了。接着敌人又冲上来两次，冲得相当猛，但也终于被打下去了。这以后何全德又下去联络三次，三次都完成了任务。下午四点钟光景，雨已经住了，连送弹药的人在内，阵地上只剩了五个人，大家满身泥水，每张脸上只露出来一对带血丝的眼睛。他们看见公路那边小山上有两百多敌人顺着交通沟走下来，他们马上联络炮兵，等着敌人大摇大摆地走到公路旁边那片开阔地上，有的已经走上了马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打得很准，敌人没有提防，一下子倒的倒、逃的逃，剩下的一些全跑回交通沟里去了。范国金、何全德和别的三个同志看见敌人狼狈逃命的情形，在阵地上拍着手哈哈笑起来：他们不觉得疲乏，不感到饥饿，也没有想到贴在身上的湿透了的衣服，他们为了整个战斗的胜利高兴。敌人受到这次打击以后，就再没有过来，母堡里的敌人也没有什么动静。天刚黑的时候，敌人上来过一个班，攻一下就退下去了。这一夜范国金和何全德坚守着的阵地上就再没有上来过敌人。天一亮，友军上来接防，他们五个人才撤到下面去。

这应该是朝鲜停战前最后一次的战斗吧。停战协定的签字保全了躲在大母堡里面的几十个美国兵的生命。真正发生过的事比何全德同志所讲的更复杂而且更动人。有一天我在另一个连队里听两个排长闲谈，那个年轻的排长在停战后看见大母堡附近有好几位我们的烈士，他们中间有的是打了手榴弹进去以后给母堡里射出来的机枪打死的，有的爆破武器打光了，就扑上去抓机枪堵枪眼，英勇地牺牲在母堡前面。年轻的排长肯定地说："只要再多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把这个大母堡解决。"这个连队在那天早晨接了三连的阵地守到第二天晚上停火的时候。年轻的排长看见了许多事情。他谈了一些敌人的情况，最后谈到我们的战士，他脸上浮出亲切的微笑，说："我们的战士真好，真勇敢，真可爱。停战前一天我看见一个小家子①，腿打断了还待在上面，我问他'干啥'，他说：'我在坚持，在监视敌人。'担架员来抬他下去，他还不肯。"年轻的排长最后称赞道："这样的战士，只要干部带得好，一定打胜仗。"

何全德同志就是这样的战士中间的一位。虽然他的年纪不小了，可是干起工作来，他并不比一般年轻人差。我们谈到他快要上岗的时候，他领我到他的班里去。那个战后新建的茅屋里有一个容得下一班人的大炕，铺了好几张狗皮褥子。他在自己的铺位上面拿起折好的棉大衣，又取下挂在墙上的冲锋枪背上，然后朝前沿阵地走去。在交通沟里他还回头对

① 小家子：小孩子的意思。

我说："同志们给我评了功，上级给我记了二等功。其实我有什么功劳？我没有打好仗，对不起祖国人民的支援。"

他停了一下，从交通沟里走上几步土级，又走一小段路，到了岗位的近旁。何全德同志把棉大衣穿上，扣好钮扣，挂好枪，对我亲切地笑了笑，又说："打完仗下来，有人来访问我们，问我那个时候心里想些什么事，我实在讲不出。在阵地上我就只有一个念头：多打敌人，把仗打好。敌人来就打，有困难就想办法克服。看见同志挂花牺牲心里不好过，就更恨敌人。我们同志们都是这样，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实在讲不出什么。"他说完就走过去，跟那个年轻的岗哨讲了两句话，换了班，站上了岗位。他的上半身从岗位上露出来。风吹过光秃的山头，吹到他那久经风霜的脸上，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坡上几棵白头的茅草让风吹得摇来摆去。"非军事区北缘"的木牌，就插在坡下不远的地方。两架直升机飞到对面大山后看不见了。我从侧面看何全德同志，他端着枪笔直地立在寒风里，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两眼发光地注视着敌人的阵地。守卫在我们阵地最前沿的这座英雄山上，守卫在敌人炮轰了两年仍然屹立着的这座英雄山上，何全德同志显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我看到他这个侧面，我忽然想起他坚守在另一个阵地上的英雄姿态，我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尊敬的感情。

二

我住在××山的时候，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范国金同志。我

离开××山以后，有一天我冒着小雨翻过一座山，走了一个多钟头，回到我住过的地方去。我刚走到一连连部的坡下，就看见营教导员从连部的小屋里出来。他跑下坡来接我，我对他讲起我的来意，他不让我再绕一个圈子，殷勤地把我留在一连连部。他又用电话通知三连指导员，要范国金同志直接到一连来。

我在一连连部里坐了许久。王教导员和一连刘连长都是熟人。我上次跟他们分别的时候，王教导员正在为他自己预备过冬的小屋运坯、砌墙，现在他告诉我，小屋刚盖好，一两天就可以住进去。刘连长那个时候负责在营部附近为新来的连队修建营房，他刚做好一根两公尺半的木匠尺，得意地把它一开一阖，笑着对我说："有了这个方便多了。"我了解这个木匠出身的指挥员的心情。今天他手上还拿着那根尺子，但白木上已经划好红蓝线了。他们对我谈了些战斗故事。谈到范国金同志，刘连长说："他这个人就是有一个毛病：不喜欢讲话。"教导员接下去说："我们好些战士都是这样：打仗很勇敢，就是说不出来。"我有点耽心，我想：在这两位首长面前，范国金班长一定讲不出多少话。

我在一连连部等了将近两个钟头，还没有看见范国金同志的影子，教导员打电话到三连去催问，三连的电话机出了毛病，讲不通话。我以为这天我又见不到范国金同志了。忽然门口有人大声叫："报告！"教导员说一声"进来。"我看见一个身材短小的中年战士站在教导员面前举手敬礼。不用介绍，我就知道这是范国金同志。我觉得好像我早已跟他认识了。

我已经在何全德同志的身上看见了他。我知道他比何全德同志小两岁，可是看起来他比何全德同志老，虽然同是身材短小的人，他却显得比何全德同志有力量。他先说明他刚在山下打了马草回来。外面雨已经住了，我打算约他到山头上去谈话，教导员却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地方，那是一连郝指导员的住室。好几天以前，我看见郝指导员自己一手盖好了那间屋子，我还对他说过"盖得漂亮。"泥涂得匀，窗开得好，窗格做得工整。现在走进他的小屋，我感到非常舒适。屋里只有一张白木桌子和一个不算大的炕，凳子临时搬到别处去了，可是显得整齐、干净，而且阳光充足。我和范国金同志都坐在炕沿上，我坐的是靠近桌子的一头，为着便于记下他的谈话。他面对着教导员刚关上的那扇门，挺起身子坐着，从袋里掏出一包哈德门烟，一边抽烟一边谈起来。这个从贵州农村出来的班长讲话慢，声音低沉，不带一点激动，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我们出待避洞的时候，炮火还在上头打，等到我们出去了，炮火就离开了山头。我们一直上去。大部分的铁丝网已经被我们炮火打烂了。前面还有一道未炸开的铁丝网挡住去路。我回头一看，靠着敌人照明弹发的光，看见几个同志跟着冲上来了。我就举起爆破筒狠狠地把铁丝网打落下来，用脚踩住，指挥同志们跳过去。……我带第三组上去，一共是四个人。我喊他们，听不见，我用手一比划，他们就跟我上来，从左面插到敌人的工事后面，发现了敌人的地堡。敌人还在瞎打枪，自动步枪连发单发都有。我说：快点插过去，顺交通沟到地堡跟前。我们到了后面，敌人还不知道。我们甩了几个手

榴弹进去，我又叫战士陈光福用爆破筒把地堡解决了。我们解决了第一个地堡，又赶快向前搜索，走不多远，吴光衡又看见一个地堡，对我说：‘那里又有个地堡，’我马上甩了两个手榴弹进去，又扫了一梭子冲锋枪，地堡塌了。我们继续往下搜索。敌人打了好多照明弹，照得很亮。我看见下面还有很多地堡，我就说：‘我们分开成两组，我跟李先和一组，陈光福跟吴光衡一组，两支冲锋枪一个组拿一支。’我又说：‘我们打地堡要沉着，不要慌张。’我们分开以后，我带着李先和顺交通沟摸进了三十公尺，看到三个地堡。这三个地堡离得很近，成倒三角形，敌人正在里头乱打枪。我叫李先和运动到侧面去。我自己隐蔽好，用冲锋枪向地堡扫射，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不提防李先和从侧面跳上前去，用手榴弹把前面两个地堡炸毁了，我就趁着爆炸的硝烟，很快地冲到后面那个大地堡面前，顺着枪眼，投进一个手雷，一翻身刚躲开不远，轰隆一声大地堡立刻就炸塌了。我们再往下走，我看见吴光衡和陈光福没有消息，就叫李先和去联络他们。我说：‘我在腰部等你们。’他走了以后，我又发见下面两三公尺远还有两个地堡，我接连用三颗手榴弹和一个手雷炸塌了第一个。第二个地堡里还在放枪，我没有手雷了，便又甩了三颗手榴弹，都甩进去了，敌人打死了，地堡还没塌，我使劲把两根木头一扳，土一松就塌下来了。我在交通沟里走了几步，忽然看见一个敌人从沟里跳上去，我马上用冲锋枪把他打下来。还有一个敌人朝我打枪，没有打中我，我也把他打死了。我在腰部等到李先和把吴光衡、陈光福带来了。他们告诉我：两个人一共炸塌了七

个地堡。李先和也说是真的。他们问我班长排长在哪里，我说：‘他们在前头，我们快去找他们。’我们又朝前走……”

这样，范国金和别的三个同志就到了何全德同志的阵地了。范国金同志叫何全德同志下去联络以后，自己就和吴光衡、李先和两人把阵地上的三个伤员背到何全德同志先前炸塌了的地堡里面去包扎。范国金同志接下去说：

“我打手电照，看见里面有两个打死的敌人。我伸手一摸，有一个还有气，我打手电照他，用手一拉，就拉他坐起来了。我要他坐着检查，他腿上挂了花，在装死。给他一根纸烟，他笑笑，忽然讲出一句中国话：‘你们顶好！’大家给他烟抽，把伤口给他包扎好。他很高兴，我要别的同志好好看住他，后来让送弹药上来的炮排同志把他押下去了。……”

范国金同志讲的并不只这么一点。这个“不喜欢讲话”的人跟我整整谈了四个钟头。他不但谈到他的战绩，他还谈起他的身世，他还谈起他的爱和他的恨。他的声音变了，他的表情变了。他讲话更慢，中间停顿几次，他的眼里还有了泪光。

“我是个穷苦人，生下来没田没地，”他说。“家里有七口人，种地主的田，地主外号陈老虎，为人凶恶。我父亲欠地主租钱还不了。欠他二十块钱，他加利息算做一大堆，每年还他七八担谷子，还四五年，他还说没有还清。父亲没办法出去做长工，两年没有还地主的钱。地主说两年不还再加利息，又欠他好多好多，他要我父亲还他一条牛，十一担谷子。父亲说现在没有谷子，慢慢还他。陈老虎儿子当保长，他利用官方势力派人到我家里来把父亲绑起，送到区公所去，在那里吊起来

打，说不还，就杀头。陈老虎儿子又派兵到我家来要钱。我们看见兵来都跑开了，留一个十八岁的妹子看家。兵来要饭吃，到屋里去找米做饭，看见我妹子，打她一枪托，就拉进房去。我们一晚上不敢回家。天亮以后，母亲一个人从亲戚家回来一看，我妹子睡在地下，讲不出话，衣服也撕破了。母亲就出来找我们，一面哭一面讲家里情形。我说：我们横竖跑不掉就回去吧。我们回来，兵又来了，把我抓去当兵。他们说：'你父亲欠帐，你就要当兵。'他们把我们一百多人带到遵义新兵连，后来开到湖南编进工兵营，过了半年多，我不知道家里人怎样，一想起，我就流眼泪。国民党匪官说我想开小差，就打我，叫我挑担子，挑七八十斤到百多斤，挑不起又打我。我后来真的开了小差，半路上又给国民党匪官抓住，说我是八路军特务，把我押起来，强迫我当伙夫，又要我守仓库，后来游击队来了，我参加了游击队。这样我才算翻过身来了。……"

从游击队队员到志愿军功臣，范国金同志还走了相当长的路。但是这条路跟他过去那些充满血和泪、充满饥饿和寒冷的日子比起来，却是平坦多了。他的眼界逐渐开阔，他的心灵逐渐发展，他的力量逐渐增长，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和平事业。今天同志们尊敬他为英雄，给他评了一等功，他母亲还时常从贵州的农村里寄信来鼓励他立更大的功劳。而陈老虎父子和别的骑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地主，则已经偿还了他们的血债，在人民的力量下伏法了。

"家里来信告诉我陈老虎两父子给镇压了，我很高兴。他们父子把我们一家人害得好惨。我父亲死了，我妹子死了。自

已受过苦，更容易了解别人的痛苦。所以到朝鲜以后，听老百姓讲起他们家破人亡的情形，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起自己过去的日子，不由得更恨美帝。受苦的人是一样的心。有时候我也想过，不说为祖国，为人民，即使单是为朝鲜这些受苦的老百姓，我就是死了也甘心……”

范国金同志一直没有停嘴，他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连部的通讯员又来催我们去吃饭了。我们已经耽误了吃晚饭的时间，连部里桌子上还摆着我们两个人的碗筷。吃过饭的人围着屋角小桌子在下象棋。范国金同志一句话也不说，匆匆地吃完饭就告辞走了。我送他出来，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接连说：“我下次再来跟你谈。”我就站在外面，看见他几步爬上山去。太阳刚落在山头，把山上白砂土映成一片红色。范国金同志的矮小的背影，一下子钻进红光里面看不见了，好像他骑着红光飞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了似的。

1953年12月写于朝鲜。

三

两个月以后，××山上已经下过三次雪了，我又到那里去。这一次我就住在郝指导员亲手盖的那间漂亮住室里。晚上炕烧得很暖，我睡在郝指导员和刘连长的中间。指导员睡得最晚，他常常躺在炕上就着洋烛光念书看报，或者准备第二天上课的材料。连长睡在电话机旁边，熄灯后他还常常被电

话铃声吵醒。我偶尔也听见他拿起耳机讲话的声音：或者营部有什么指示了，或者排里来报告什么情况了。那些时候敌人常常在夜间演习，照明弹、信号弹、飞机……在这个山上什么也看得见。他们半夜起来查铺、查哨的时候，我也知道，因为总有人打着手电进屋来交班，把木牌放到连长或指导员的铺上。轮到这一班的人就得起来，出去，走半个山，把每一间营房，每一个岗哨都查遍。

就在这间小屋里早晚我都听见坡下操场上的点名声。讲话的人有时是连长，有时是指导员，有时是副连长。除了山上的岗哨外，战士们都带着武器跑到这里来集合，他们是从各个排里来的，有的要跑过很长的一段交通沟，而且上坡下坡地跑一大段路。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过新建的大课堂比操场还低几十级。这些路我都走过，起初走起来相当吃力，后来走惯了，就觉得容易多了。副连长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要到最远的一个营房去，他就睡在排里。

站在这座山的山头，我们望得见远处的战俘营，那是敌人囚禁我方战俘的地方。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坐在观察所那个小小的"地屋子"里面，听见从战俘营传来的锣鼓声。锣鼓响了一整天！敌方特务在那里活动得厉害。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解释工作的阴谋早已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了。最近他们好几次企图通过非军事区混到我们这里来，也没有能够进入我们守卫的地界。在这里我常常有机会跟战士们谈话。作为这座英雄山的守卫者，他们也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白天我也到营部去。营长和副教导员到师部开会去了。

王教导员住在他自己修建的小屋里。他在我重来的前两天骑马去二连把腿跌伤了。他听见我的声音，就披着羊皮大衣，用一只脚从小屋里跳出来，有说有笑地紧紧握住我的手，好像见到亲人一样，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他让我坐在他的炕上，喝着热茶，听他谈两个月中间发生的事情。他讲起范国金，讲起何全德，也讲起别人。他告诉我范国金入党已经批准了。他又说最近有几个年纪较大的战士，劝他们回家转业还不肯走，有一个老炊事员积极地要求把他留下。他送走他们的时候，也忍不住掉了眼泪。"我真舍不得他们，"他说，"可是他们也到了转业的时候了。说真话，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住惯了的人哪一个又愿意离开啊？……他们走了以后我难过了好半天。"

教导员留我在他这里吃了晚饭，叫一个通讯员带着武器送我回一连去。天已经变了颜色，夜马上就要来了。我们顺着山上新修的公路走；在这条路上好像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十八岁的通讯员跟我谈起祖国人民慰问团来到这座山上的情形，他到现在还很兴奋。那些年轻的歌舞团的同志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天，一起包饺子，一起唱歌，临走的时候，战士们追着车子跑了好些路欢送客人。女同志们还在车上流了泪。谁能够轻易忘却那些亲切、热情、动人的场面呢？

我们到了一连的操场，天全黑了。我打着手电往上走几十级，上了坡，回到住室，连长、指导员正在同几个排长谈话，排长们刚刚汇报了工作。

过了一天，吃过早饭，我和师文工队的一位同志在交通沟里绕了一个大圈子，到三连去。连部在一个小坡上，还是过去

那间小屋，不过为了挡风，正面的门给阻塞住了，在旁边另外开了一道门，又砌了一堵墙。坐在屋里，我感到比以前的确暖和多了。连长在理发。指导员不在屋里，通讯员说他在监督修课堂。我们又去找指导员，他正在一个搭好架子的大厅里，指挥战士们砌砖、平地，在屋顶上铺树叶、涂泥。他还没有忘记我。我们谈了几句话。他说："文化学习开始了两个多星期，我们到现在才把课堂修好。不过这样总比在班排住室里上课好些。中间用雨布一隔，两个大班上课没有问题。"他向四下看了看，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在这座炮弹片和炸弹皮满地的山上，没有木料，没有砖瓦，能够修起这样的课堂，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我不愿意打扰指导员的工作，就和文工队的同志一起出来。我们走了一段路，下了一个坡，看见二十多个战士在挖土平操场，他们已经在一个长满马尾松和野草的小坡上挖出一块长方形的空地来了。我们刚走到那个小坡上，文工队的同志忽然用手一指，说："那不是范国金？"我的眼光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范国金正举起洋镐来。他的黑红黑红的瘦脸，略微突出的嘴唇和嘴上的小胡子……一点也没有改变。文工队的同志招呼他。他看见了我们，点一个头，就放下洋镐走到我们跟前，行一个礼，笑了笑，跟我们握手。"你回来啦？"他短短地对我说。我讲了两句话，问他："你们在平操场？"

"对罗，今天就可以弄好了，上军事课要有操场才行，"他短短地答道。

"现在开始学文化了？"我又问他。

"对，要当国防军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不过学文化比打仗更不容易啊。"他谦虚地笑了笑。

我们在坡上蹲下来谈了一会，我想起何全德，就问何全德是不是在站岗。

"何全德在这里。那不是？"他一面说，一面指着下面一个拿铁锹的战士。我看看，并不像。可是他把何全德叫过来了。何全德刚剃过头，脸上光光的，而且在劳动中间放下工作，额上还有汗珠，脸上也现着红色，显得比上次年轻多了。

"你又来了，在我们这里过年吗？"他笑着问。

"不，我过两天就要走的。你们学文化了？"

"是，这一次要好好地学，我还是在初一级。有的年轻的同志已经学到初四级了，"何全德高兴地说。

我们谈了一会，我向他们告辞的时候，范国金同志告诉我，上次跟他在一起打过反扑的一个四川小同志，养好伤新近从祖国回到部队来了。那个小同志住在营部，名叫秦华生。

第二天我就在营部的卫生班里见到秦华生了：一个喜欢讲话、喜欢笑的小胖子。他回到三连以后不到两个月，因为工作积极，伤口又在流脓，教导员要他住到卫生班里治疗。教导员说：秦华生很勇敢。他挂了五处花，一个人拿两颗手榴弹爬下来，经过一个地堡，听见里面有人讲话，他喊口令，里面不作声，他又问谁，里面打出枪来，他就把手榴弹打进去，解决了敌人。那个时候他右膀已经负伤，他用牙齿咬掉手榴弹盖子，把右边下面一颗大牙咬掉了。

秦华生穿一身棉军装，坐在炕上，像对待熟朋友似地拿纸

烟给我抽，一面摇动他那张带孩子气的大脸，一面不停嘴地讲他的家庭，他参军的经过，和他的战斗经验。他爱说这样的话："挂花时候右面膀子觉得有点痒苏苏，想用手去抠，又有些不敢。""我们打敌人的时候还开玩笑，但忽然看见一颗炮弹，绯红，很大，嘶嘶地落下来，我们连忙卧下，就不开玩笑了。"

我看见他常常拿出烟盒来，就笑着问他："你这样年轻，为什么要抽烟？"

他摆着头笑了笑："不抽烟多闷！"

几个卫生员都喜欢他，把他当作小兄弟看待。他们告诉我，他在这里努力学文化进步很快。他常常吵着要回到三连去，他们因为他刚开过刀，不放他走。

我离开××山的前一天傍晚我在卫生班的小屋坐了一会。我和卫生员们坐在一个他们自己做的小火盆旁边闲谈。秦华生同志也在这里，我是来向他告别的。他跟我谈起范国金，他说："我喊范国金老头子。他是个英雄，他打掉大小地堡四十多个。他平日很老实，连话也不多讲。可是打起仗来，很有技术。我跟他一起打退一次敌人的反扑。我看见他把手雷、手榴弹一一摆起来，一一摆在面前，我也学他。他真是个英雄。"

这应该是对范国金同志的最适当的称赞了。

1954年6月补记。

记栗学福同志*

一

在师部新建的礼堂里举行的晚会上，宣传队为祖国来的实习团表演节目，其中有一个是“栗学福英雄班”。这个演唱节目在掌声中结束的时候，政治部主任忽然站起来向大家介绍：当时的班长栗学福就在会场里面，他现在是一排的副排长了。接着栗学福同志就站出来跟大家见面，行了一个礼。

这是一个身材矮小、举止灵活的年轻小伙子。他的脸发红，露出微笑，也现了一点窘相。我还在那张脸上看到一种好玩的表情。表演继续下去。他在这一排的一个偏右的座位上，我常常偏过头去看他。他注意地在看台上的表演，愉快地笑着，起劲地拍掌。

散会的时候，我走到栗学福同志身边，我跟他谈了几句话，他告诉我他是安东宽甸县人，今年二十三岁。我们出了会场，他走的比我快，在黑暗中一转眼就不见了。我打着手电一步一步地下了坡，见到跟我来的通讯员小周。我提起栗学福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日《解放军文艺》八月号。

的名字，小周说："他今天跟我们同车来的，说是明天一早要到开城去，参加捷克建军节的庆祝会。"我才想起来，这天下午师部派车到某地接我的时候，嘎斯车上已经站了好些人，栗学福同志也在上面，他们是从××山来的。我和另一位同志坐在司机台里面，在车上坐了将近两个钟头，车子在万山中间绕来绕去，等它开到师部停下车来，天差不多黑了。所以我当时没有记清楚栗学福同志的面貌。

这是我跟栗学福同志的第一次见面。

二

我在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了栗学福同志的事迹，师里副政治委员对我谈过它，本军的报纸上也介绍过它。在"三打马踏里"的反击战中间，栗学福同志带着他那个班上去增援，炸毁了敌人十多个地堡，占领了阵地，在阵地上打退敌人多次的反扑，最后在联络不通、弹尽援绝的情况下，用身边最后的武器与敌人同归于尽，栗学福同志埋在炸塌的地堡里死去复活，终于爬回了阵地。

报上介绍英雄事迹的文章是团政治处一位干事写的。文章结尾有着这样的话：

> ……栗学福心里明白，便紧握爆破筒伫立在地堡口上，敌人扔来一颗手榴弹，地堡剧烈地动了一下，接着又是一颗燃烧弹，喷射着火花，敌人轻手轻脚地逼近。栗学

福等到他们贴近，突然把爆破筒一拉，马上推出去，把它推到敌人中间，跟着一声巨响，地堡塌下来，他也昏过去了。

晚风吹进残破的地堡，栗学福渐渐地醒过来，枪炮声在附近继续的响着，他等到天黑尽了，才忍着痛，慢慢地拨开身上的灰土和断木，爬回阵地。

我和小周在黑暗中走到对面山上我的住处，已经是朝鲜时间十二点了。可是我还不想睡，我点起洋烛，找出刊载栗学福同志的事迹的报纸，重读了两遍，竭力想把人和文章联起来，并没有成功。我的眼前一直现着他那张孩子气的笑脸。

这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看见栗学福同志从一个破地堡里爬出来，一身都是土，脸上有血。我问他带得有急救包没有，又问他伤重不重。他不回答，却只顾往前跑。我在后面追他。他忽然在前面倒下来了。我刚要跑过去，一颗炮弹正落在他身边，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等我转过身去，他就站在我面前，带着一脸的笑容，完全是一个小孩子！

我醒过来，天已经亮了。我想想先前的梦，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走到小屋前面的平台上，管理科刘科长正弯着腰在那里洗脸。他告诉我去开城的人早已出发，副政治委员和栗学福都去了。

我在师部住了四天。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栗学福同志。副政委当天深夜就回来了。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副政委谈起开城的宴会，说栗学福很感到拘束，他不习惯热情的拥

抱，而且他不会敬酒，不会跳舞。副政委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怪他，就是我也不习惯这种场面。"接着又说："不过我也跟他说：'你得学学，不然以后应付不了。'他只是眨眨眼睛，红着脸笑笑。"副政委最后说："这班年轻人真有意思。"他高兴地笑了。

三

我离开师部的前一天，告诉副政委我想去××山。我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去过那座有名的英雄山，访问守卫在那里的战士，而且和他们在一起看过电影。那座山的名字我太熟悉了。一九五二年夏天我住在它附近，每天看见敌人不分早晚地用炮轰它。

"正好栗学福那个部队今天刚换上去。"副政委说，"你可以去找他多谈谈。"

"我也要去，我明天送你去吧，"参谋长说。

第二天早晨五点半钟我和参谋长一起吃了早饭。他的小吉普坏了在修理，我们临时改坐嘎斯车，到六点半才开车。车子走的是另一条路，但仍然是在万山中间飞奔。路不太宽，常常有绝壁耸立在车旁。到处都有树木。远远望去，真是一碧无际。红叶树杂生在绿树中间，就像是绿叶丛中的花朵。车上一共不到十个人，车子跑得快，也抖得厉害。有一个时候它的速度减弱，它慢慢地在往上爬。路旁的树木渐渐地稀少……我知道快到目的地了。

车子停在××山脚下，就是我上次看电影的地方。上山的公路正在修筑，说是很快就可以行车了。但这一天我们还得往上走一百几十级山路，到营部去。

我们一下车就由参谋长带路，往上走。他一口气走完一百几十级，我跟在后面，走得我不住地吐气，仿佛心也要跳出口来了一样。但是我终于走到营部办公室前面的平台上了。那几间茅草房没有一点改变，掩蔽部也是原样，可是人全换了。不过他们一样亲热地接待我。

教导员招待我在洞子旁边一个掩蔽部里住下来。白天我喜欢在山上走一个大圈子，到连部，或排里、班里去访问。早晚常常有机会跟教导员闲谈。他是一个爱说爱笑的人，身材高大，声音响亮。他高兴谈战斗的故事，谈英雄的事迹，谈他那一个部队里的英雄人物。有一次他在平台上跟我谈栗学福的事，他蹲下来用一个小石子在砂地上画地形。

"他带的那一个班从这个待避洞出发，"教导员说，"他们朝××高地冲上去，在路上一共打掉十多个敌人的地堡，才到达主峰。这个时候除了班长栗学福还有六个人，就是卫生员陈岱光，战士杨启明、胡根基、邓大信 高士均、全文奎。他派江苏战士全文奎下去联络部队，一面跟陈岱光研究，决定由陈岱光代理副班长，因为陈岱光是候补党员。他们互相鼓励，不管情况怎样紧急，坚决完成任务。到了半夜，敌人开始反击，一共十一次，头三次敌人用一个班的兵力，以后用一个排，最后一次是一个连的兵力。到天快亮，敌人上来一个连，栗学福号召大家守到最后。邓大信已经牺牲了，他们五个人分两组守

住两个地堡，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陈岱光带高士均、胡根基守右边地堡，栗学福带杨启明守左边地堡。敌人先从右面上来，陈岱光和高士均、胡根基跳出去用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了。栗学福只看见冒一股烟，什么也看不见。爆炸声他听得很清楚，他对杨启明说：'副班长他们已经跳出地堡跟敌人同归于尽了。'他话还没说完，杨启明就跳出去，跟着就听见很大的爆炸声。他知道杨启明牺牲了。敌人跟着又冲上来，打过来一颗手榴弹把地堡门口炸塌了。他等着敌人逼近，就拿起爆破筒，把弦一拉，顺着塌下的洞口小窟窿把爆破筒插到外面去。上来的七八个敌人都给炸死了，地堡也炸塌了。栗学福晕过去了。过了好几个钟头他才慢慢地醒过来，等到天黑，他慢慢地扒开洞口，顺着这条路爬回来了。"

教导员越讲越激动，手拿着小石子在砂地上画来画去。讲到一半他忽然站起来，丢开小石子，拍了一下手，继续把话说完。然后掏出一包"哈德门"，递给我一支，自己也取一支，点起烟来，默默地抽了一会。他取下烟连连地点头说："真是好同志。全是好同志。叫你不得不喜欢，叫你不得不想念他们。栗学福这个人看起来就像个小孩，谦虚，朴素，可是干起工作又很有办法。你见过他吗？"

我告诉他我见过栗学福同志一面，我还说，过一两天我要到他那个连队去。

"他这两天就在这里修补公路，你要见他，明天我叫人去把他找来，他现在可以讲几句话了。"教导员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看得出来他高兴他的部队里有这样的一个英雄。他

听见我接连表示愿意到栗学福同志的连队去住几天。他就换过语气说:“你高兴到他那边去住两天也好,反正路不远,你可以骑牲口去。你还可以搜集卫生员陈岱光的材料。他今年不过二十二岁，却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出发前在祖国人民慰问团送来的纪念册上写了几句很感动人的话。等到他牺牲了，连里同志们收拾他的行李，才看见那本纪念册，上面有他留下一笔钱作永久党费的话,才了解他为祖国献出一切的决心。栗学福能够完成任务，多少也要靠他的帮助。”他把烟头丢在地上踏熄了。

我连忙问:“他那本纪念册还在不在?”

“交到上面去了,不过他那连里看过的人倒不少。”教导员答道。

就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掩着的门突然打开了,年轻的参谋伸出头来,大声叫:“教导员,电话。”教导员便转身朝办公室走去。

四

我在营部住了六天，××山差不多跑熟了。晚上熄灯号吹得早。可是办公室里常常有人工作到深夜。有时我醒过来走出掩蔽部小便,还听见电话铃声。朦胧的月光下,在平台右面小坡上我看见岗哨的身形。我听见他问一声:“谁?”从那响亮的声音我知道这是通讯班的一个年轻战士。早晨我在掩蔽部的阴暗中听见起身号，屋子里真暗，只有窗洞口有一线光。

可是等我走到外面，平台上已经摊开一片阳光。我遇到一连几天的好天气。空气很新鲜，风吹到人身上，叫人起一种舒服的感觉。战士们一天忙着锯木头、运坯、搭房架、修建营房和礼堂，有说有笑，非常快活。上操的时候，大家也很有精神。傍晚游戏时间里，战士们在操场里打篮球。营部通讯员在平台上打康乐球，有时候营长或教导员也参加。我白天爬山访问，晚上在隐蔽部里点着洋烛写文章，记材料。

第七天吃过早饭，教导员正忙着运坯砌墙自己动手修建过冬小屋的时候，我出发到栗学福同志的连队去，教导员派一匹马，驮着我的行李，一个通讯员跟在我后面，我慢慢地走下××山，走不到一个钟点就到了连部。团部在这连部附近，所以我放下行李，就到团部去看政委。

我在几个连部都听见人说，政委的身体弱。他们都尊敬他，但是都喜欢叫他做“老头儿”。其实他比我年轻。有一天他到××山来找我，我们像捉迷藏似地，找来找去，都没有见到。现在见面真是所谓“一见如故”了。我在他的小屋门前等他，他开完会从山下跑上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热诚地留我在他这里谈几个钟头。他一口气谈了许多话。我看见他的眼睛发亮，看见他嘴角露出一点白沫，我感激他的好心。他告诉我他的一些体会，他讲出一些使他感动的事情，他谈战士们的英雄气概。他最后谈到栗学福同志，他说：“栗学福年轻，诚恳，不骄傲，肯学习，有办法，是可以好好培养的。一般人照他这种情形是活不了的。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回来。幸好那个地堡还有个内地堡，又没有完全塌，他不过给土盖住，所以后

来居然醒过来了。”政委接着又谈陈岱光烈士，说：“他亲笔写的决心书，很使人感动。他是准备死后给人看的，所以他的决心更大。那一张纸已经从笔记本上撕下来了，本来预备照相保存，没有来得及，就给上级要去了。很可惜，没有把它照下来。很可惜……”

我在政委这里吃过晚饭，谈到月亮上升的时候才告辞回连去。

五

在栗学福同志的连队里我和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睡在一张大炕上。他们跟我同时起床，可是比我迟睡。在熄灯号吹过以后他们还要研究工作。我睡过一觉醒来，还听见他们在谈话，而且好几次听到栗学福的名字。

第二天我和连长他们一起吃早饭，我们谈起栗学福同志，文书说：“栗学福下来的时候，脸肿成青紫色，脸皮破了，人也傻了，两天啥事也不知道。”副指导员说：“他后来才慢慢地把事情讲出来，讲得很老实。他认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我问：“他今天在家吗？”连长说：“他到××山去修路，不过上半天就会完成任务。”

果然在十二点钟以前我就见到栗学福同志了。他刚从××山回来，跟连长一路走。我正到一排的住室去。我们都在交通沟上面走，忽然碰上了。连长马上给我们介绍。我说我们已经早认识了。栗学福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用两只手

握我的一只。我们相对一笑。我说："到你们屋子去吧。"他点点头，说声："对。"就领我到他的住室去了。连长一个人回连部去，临走的时候，还嘱咐栗学福同志："你要好好地跟××同志谈，不要拘束啊。"

栗学福同志住在第一班的住室里，跟那个班的战士们睡在一张大而长的炕上。以前是一班长，现在升任副排长以后，仍然管理他那个班的同志们的生活。旧人只有全文奎一个。可是每个烈士都活在栗学福同志的心里。他们的名字常常在他的话中间出现。

"你要我谈啥呢？"他让我在矮凳上坐下来，喝了水笑着问我道。

"随便谈吧。你的事迹我已经知道了，我只想认识你，多见几次面，"我带笑回答道。我看见他谦虚地笑着不开口，便又加一句："你讲讲你自己的事情吧。"

"好，"他坐在我对面，点点头说，一只手在袋里掏笔记本；掏出来并不翻看，马上又改变语气说："也没有啥好说的。打仗的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不是我们打敌人，就是敌人来我们打。我说不好，你听起来也乏味。"

虽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把他的战斗故事讲出来了。他的眼睛始终不朝着我，他好像在看门外的山景。话讲得相当快，我没法全记下来。我记得最后的一段是：

"一共打了十八次反扑，弹药、手雷，还有捡来用的敌人的武器都打光了。第十次连黄药也用上了，可是黄药受潮没有响，战士有的挂花三次，血流得多，够呛。同志们说：'班长，

我只有两个手榴弹了,'有的说，只有一个了。我说:'有两个的留一个,只有一个的不许打了。'高士均挂花三次,胡根基挂花二次,杨启明二次,陈岱光没有挂花。我只碰上一点皮，没关系。最后敌人一个连兵力分三路上来。我说:'同志们，情况危急了，大家平日说，要学硬骨头，学黄继光，现在后撤不能，不勇敢就可能当俘虏。祖国需要咱们的时候到了。咱们要实现决心计划了。'大家说:'班长放心，我们决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我说:'留下的手榴弹决不能白响。'大家说:'班长放心,我一个手榴弹,一定要赚两个敌人。'我又跟陈岱光商量怎样打敌人这次反扑,因为只有他跟我两个是党员,他是候补党员,就出来代理副班长。我们分成两个组,他带高士均守在我的右侧,我离他十多公尺远。敌人先从右侧上来,我听见手榴弹响了三下,我探头出去看,只见冒烟。我知道副班长他们牺牲了。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看见胡根基倒在地上，一个敌人上来,他又跳起来抱住敌人,咬住敌人脖子死在一块儿。杨启明也拿一个手榴弹跑出地堡去，跑到敌人中间牺牲了。我在地堡里等待敌人,不一会敌人上来十几个,在下面时候是分散的，越往上越集中。敌人三路上来，十几个人集中在交通沟,我把爆破筒从枪眼里送出去,爆炸以后我昏过去了。当时天刚发白,我醒过来天已经大亮。地堡炸塌了,我就爬到里面那个地堡去。那里有木棒，有担架。敌人朝炸掉的外地堡扔手榴弹,没有伤到我。……

"等到天黑尽了,我慢慢爬出去,就往下滚,滚不到十几公尺.敌人就打起机枪来;我滚了一百多公尺,敌人不打枪了,我

就爬上指挥所，见到副连长，再去待避洞住了一夜。副指导员要我下去。到后面，我心里难过，要药吃，他们把我送下去。我到了营部，管理员看住我不让上阵地去，我想法走出去，走一里多路，参谋又把我截住了，到第二天就停战了。”

栗学福同志停顿了一下，他看见我放下记笔记的自来水笔出神地望着他，忽然笑了笑，好像他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一样。他眨了眨眼睛，接着又说：“我下来的时候满脸都肿了，只觉头难受，脸胖，脚发胀，耳朵聋了几天，到现在有时候右耳还有点痛。当时只有一个思想：我没有好好地完成任务。所以我一定要再到阵地上去。参谋把我截住了，我当时思想真有点搞不通。”

谈起他那几个牺牲的战友，他到现在还难过。他说：“同志们都不错。每个人都打得勇敢，顽强。一直到最后没有人表现右倾畏缩。全班都是年轻人，干部们常说这是个小孩班。杨启明尤其好，湖南人，二十岁，各方面工作都好，在战地上讲鼓动口号最多。我现在还想念他。陈岱光不是我们班里的。这个卫生员真了不起，在危急的时候，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听说他出发前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他的决心。”

我连忙打岔地问他：“你看见过没有？”

“没有，”他摇摇头，“我听见副指导员和文书这样讲的。听说上级要去了。”

我和栗学福同志谈到通讯员来叫他到连部去的时候，差不多谈了一个半钟头了。

下午三点前我又来找他。班里正在开“党群座谈会”，战

士们有的盘脚坐在炕上，有的坐在炕沿，班长站在炕前面主持会议。栗学福同志盘着脚坐在一个角上，有时偏起头注意地听着，有时埋下头在笔记本上写字，有时温和地说两三句话。

“怎么不讲了？有意见尽管提啊！”他笑了笑。“多给我提意见。”

我坐在靠门的矮凳上旁听了一会。我没有听见别人提他的意见。可是他一直谦虚地微笑着。后来他又说：“这次没有提，下次一定要提啊！平日也可以提的。”

下一天是星期日。营部的医生领着卫生员来检查住室卫生，在战士们的床铺上、被子上洒杀虫药粉。我跟着卫生员又走到栗学福同志那里。

“你们来啦！”他从一班住室里走出来欢迎我们，半开玩笑地捏住卫生员的手。这卫生员也是一个功臣，显然他们是很熟的朋友。他们谈了几句话，医生和卫生员就开始工作了。栗学福同志也帮忙把战士们的衣服收在一起，交给医生和卫生员用药水洗干净。

休息的时候，大家在露天里坐在用小木板和罐头盒做的矮木凳上闲谈。学生出身的卫生员蹇鸿章同志也参加了开城的宴会，他笑栗学福同志不会跳舞，怕喝酒，“他脸红起来就像一个大姑娘一样”。

“你瞎扯，”栗学福同志把嘴一歪，忍不住自己先笑了。

“你应当向陈岱光学学。他才是一个英雄！他多诚恳。”

“那么你是什么呢？”年纪不到二十的卫生员故意笑着反

问道。

"我?"他把头抬起来笑了笑说:"我是一个战士,我要做一个人民战士。"

医生和卫生员又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在栗学福同志的班里停留了一些时候。战士们有的出去洗衣服去了,有的在家里写信。栗学福同志摊开一封信在念。信是他哥哥栗学增写来的,告诉他家里的情形和他一个出嫁的姊姊的家庭生活。他哥哥说他父亲叫他放心,不要记挂家里。

"现在好多了,从前饭都吃不饱的,"栗学福同志望着我说,他满意地笑了。"现在我还有什么记挂的?我就只怕,我不能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一个同志来问他要打火机上用的火石。他慎重地折好信放在袋里,慢慢地对那个同志说:"我就给你。你说你要了多少次了!"他笑着爬上炕去,把那个当作枕头用的包袱拿过来。他打盘脚坐在炕上,把白布包袱皮打开,在衣服和书本的中间小心地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纸包,露出十几节红色小火石来。他珍惜地看了一眼,说:"拿去,"就把火石交给那个同志了。

"你不抽烟怎么会有火石呢?"我在旁边问道。

"这是上次朝鲜人民的慰问品啊,"他说,埋下头去把包袱包好。他动作慢,却很仔细,在这中间,他又拿起一本书来翻看了一阵。

我向栗学福同志告辞回连部去的时候,他殷勤地对我说:

“晚上来吃饺子啊。”

在晚饭前一个多钟头我又到栗学福同志那里去。在那个班的住室里有三堆人在包饺子。栗学福同志和三个战士都坐在矮木凳上，正在一块放在木箱上的黑板上面包饺子。他包得快，但并不太好。可是他非常感到兴趣地在认真工作。一个比他年轻的四川战士一面擀面皮，一面说笑：“我一顿最多吃十二个。要我吃饺子，我宁肯去打仗。”

“你还没有打过仗，才说这种话。照道理说：仗打得好，才有饺子吃。不然谁还有功夫包饺子！”栗学福同志眨了眨眼睛，看看自己包好的那些个饺子，带笑地分辩道。

“那今天这些饺子都该你一个人吃，因为你仗打的好，立了功。”四川战士笑起来说。

栗学福同志停了片刻才答道：“你真是个傻小子。单是一个人哪里打得好仗？我立功还不是靠了大家！……”别的同志还在讲话，他不作声了。

他们这一堆人先把面皮包光，大家主张把剩下的一点肉馅拿来打汤。包好的饺子拿到大锅里去煮了。栗学福同志和我一起走出来。我们走到交通沟上面，站在那里看四面的山景。

“这些山全挖通了，”他用手指指了一下，得意似地说。

“多大的工程啊！”我赞叹地说了一句。

“再有这样大的工程我们也办得了，”他用坚决的口气接着说了一句。过了一会他忽然改变了语调，用低沉的声音说：“看见这些年轻的小战士，我又想起杨启明来。他要是活着那

多好！”他掉转身子走下交通沟，又说一句：“前两天他家里还来了一封信！”

我们回到一班的住室，饺子还没有煮好。

晚上栗学福同志到连部来开会。他坐在炕沿的一个角上，手里拿着一支手电。他简单地汇报了工作。散会的时候他走出来，我追上他，递一个纪念章在他的手里。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接连说：“到我们班里来玩啊！”

第二天栗学福同志到师部听报告去了。再过一天师部派车接我回去。栗学福同志不在家，行前我没有见到他。连长学习条令去了，指导员上营部开会去了。我只有机会向副连长、副指导员、文书和司务长们告别。走出连部的时候，我朝壁上望了望，文件袋里还插着那封由湖南寄来的信。红白两色的旧式信封。中间一行写着墨笔字：“杨启明男亲收。”信安安静静地立在袋里，好像收件人还在连队里服务，不过出差去了似的。

六

后来我回到军部，在那里赶上“十·二五”，就是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纪念日。那天从上午起在新近开辟出来的球场上举行全军的体育运动大会。吃过早饭后我去排球场看女子排球赛，在观众中发现了栗学福同志。他虽然在看球，可是注意力并不在球上，他时而东张西望，过一阵又走开，一个人在

旁边走几步，用脚踢了踢草地上的小石子，自得其乐地微笑着。我朝着他走过去，唤一声。

“栗学福同志，你也在这里？”

“你也来了？”他非常亲热地握着我的手。

“你来参加运动会吗？”

“我没有资格，我不会，”他觉得好笑地答道。“上级要我来参加授勋典礼。”

“很好，我应该跟你道喜，”我很高兴地说，仿佛我自己也得到了勋章似的。

“听说朝鲜政府首长先到兵团，所以改到二十八了。还要等三天。我在这里住不惯，我想回到班里去，”他说，脸上仍然带着笑容，不过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参加授勋典礼多光荣，我想你一定很高兴，”我安慰似地对他说。

他望着我笑笑，眨眨眼睛，想了想，答道：“光荣当然光荣。可是功劳小报酬大也叫人不好受。我只希望多担任工作，多执行任务，最艰苦的，最繁重的，最危险的，我都愿意。让祖国人民知道栗学福就是为祖国流了最后一滴血，不要一点报酬，也甘心。”他把头掉开不看我了。

我把手伸过去，紧紧地捏住他的手，过了半晌，才做出一个笑容，温和地对他说：“你放心，祖国人民已经知道了。”

他望着我，忽然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这时球场上起了一片掌声。我回头去看：女子排球赛已经结束。在另一个球场上男子的篮球赛开始了。

“你喜欢打篮球吗？”他问道。“要不要去看看？”

“我不会。去看看也好，”我回答。我们便做了一场激烈的球赛的观众了。

七

过了一个月光景，在回国之前，我又到××山去。我去向守卫在这座英雄山上的战士们告别。我到达营部的时候，听教导员说，最后一批祖国慰问团的代表马上就要到了，营长在一连连部等着迎接他们。教导员在前一天骑马跌伤了脚不便多走动，他叫通讯员送我到一连去。

我翻过山岗，顺着公路走去。吉普车和嘎嘶车已经上山了。它们在我前面停下来。战士们穿着崭新的军服，佩着亮晃晃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站在公路两旁拍掌欢迎。慰问团代表们下了车，战士们上前献了花，然后拥起代表们走了。两个战士扶一个代表走下一个很陡的坡到礼堂去。我走在最后，站在坡上，举步往土级上踏下去。前一天下过雨，地相当滑。忽然两个战士从两边把我挟住，一口气就跑到了礼堂门口。我已经知道了这两个熟人：栗学福同志和卫生员蹇鸿章同志。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的时候，栗学福同志说：“老朋友了，还要客气！”

礼堂中长桌上有花，有糖，有水果。大家坐下来。代表和战士混杂地坐在一起，营长站起来致词。他介绍功臣事迹。他第一个介绍栗学福同志：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栗学福

同志站起来，向代表们举手敬礼。代表们不停地拍掌。代表们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把他看得不好意思了。……

代表团离开××山的时候，战士们排队欢送，一部分代表把栗学福同志拥上嘎斯车，请他到军里去看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我知道他一定喜欢这个戏，他原是一个东北农村的孩子。

嘎斯车开动起来，车上许多只手一齐在挥动。这中间有栗学福同志的手。栗学福同志面带笑容亲切地向我点头，我不转眼地望着他的笑容，一直到车子弯下山去看不见了的时候。

八

这以后我在朝鲜就没有再见到栗学福同志了。

这次在××山上我住在一连连部（从礼堂上去，爬两个高坡便到那里），可是每隔一天我要到营部去一趟，去看教导员的脚伤。教导员的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有一次我向他问起陈岱光烈士的事迹，他忽然说："你到卫生班去问问看。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陈岱光的材料，特别是他在笔记本上写的那段话。"

我马上到卫生班去，卫生班就在教导员自己修建的小屋隔壁。果然我毫不费力地在那里找到了陈岱光烈士的"遗嘱"，这是另一个卫生员抄录下来的：

一、坚决争取立功保功。自己是候补党员，争取提前转正。

二、这里人民币四万元① 作为我永久的党费吧。

我默默地把这个二十二岁青年的“遗嘱”念了几遍，最后把它抄在我的笔记本上。我认为这个意外的收获是我从××山带来的最可贵的东西。

1954年7月6日。

① 指旧币。合今人民币四元。

后　　记

这是我的第三个关于朝鲜战地生活的集子，也就是我第二次入朝的一点小收获。

我第二次到达朝鲜，正是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后的半个月。我在城市和乡村中一共住了一百五十天。我一方面看见美帝国主义者违反协定阻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一连串的阴谋，另一方面看见朝鲜人民不辞劳苦重建家园的忘我的劳动。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部队中间，我感染到他们对朝鲜人民的热爱，对祖国人民的热爱，我更了解他们的由这种热爱发展起来的保卫和平的决心。他们的决心常常引起我的感激的心情。

我每每到了有话想说偏偏辞不达意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写下一些类似通讯报道的东西。我不敢称它们为“文章”。因为它们只是一些试作。我当初原本想写英雄，也想写朝鲜停战后志愿军战士们的生活。可是我没有写出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我的笔只写下一些简单的真人真事；我没有写出停战后朝鲜的情况，我的笔只触到一些战士的日常生活。

倘使热心的读者想在这本集子里找寻一点可取之处，也

许就是一个“真”字。哪怕就是试作吧，它们也可以多多少少反映一点保卫和平的人们的心，而且从那样的心得到温暖。

1954年7月6日在北京。

谈 契 诃 夫

《谈契诃夫》，一九五五年由平明出版社初版，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由新文艺出版社排印新版。

前　　记

这里的五篇谈契诃夫的文章并不是什么专家的研究报告，不过是一个学习写作者的一点肤浅的体会。我喜欢契诃夫，也读过他的一部分作品，但是我始终不曾作过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也就没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写一些个人的印象、感想和回忆。这些虽然浅薄，但里面有我自己的话和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契诃夫是谈不完的。对于我们，他的作品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们必须更好地向他学习，也应当更多地读他的作品，谈他的作品。

我把这本小书献给我去年在苏联认识的几位朋友：著名的作家康·费定同志，苏联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的阿卜列钦同志，麦德威节夫同志和卡巴克切维亚同志，齐娜以达·傑格佳列娃同志和亚历山大·何黑罗夫同志。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写不了这本《谈契诃夫》的小书，我愿意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的谢意。

巴　金 1955年3月。

印象·感想·回忆*

——赴苏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琐记

一

八月四日的夜晚，飞机在细雨中上升，莫斯科的千万盏灯火落在后面了。从玻璃窗望出去，机翼上那盏明亮的绿灯刺痛我的眼睛（另一只机翼上亮着的是红灯）。夜气渐凉。我把脸贴在玻璃上想找寻那些繁星般的灯火，三个星期的生活，使人感动的友情……我要在这个不眠的夜里细细地回忆它们。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我的眼光射在正对面的书报架上，在那里立着几份新杂志，里面有一册新出版的《火星画报》，封面上印着一幅彩色人像。架在鼻子上的眼镜，深透的眼光，忧郁而带善意的微笑。我好像看到一个熟朋友。他一直没有离开我。这是契诃夫！我默默地望着他，我自己也微笑了。我的心非常暖和。我的回忆又活动起来，它一直围绕着契诃夫的名字在活动。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他的名字引着我走了多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文艺月报》十二月号。

里路，从北京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克里米亚。我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契诃夫纪念馆的开幕典礼，从莫斯科回国的前一天我又赶到那个纪念馆去。在过去三个星期的中间那个伟大作家的面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脑子。我到处都看到它，想到它。八月三日我赶到契诃夫纪念馆去告别，离闭馆的时间只有十分钟，站在那么多的照片和绘画前面，我才感到我对契诃夫的认识是多么地浅薄，我才知道我多么爱他。可是管理员都换上了皮鞋准备走了。楼上陈列室里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对着《海鸥》的剧照在讲话。他们也准备走了。我走到楼梯口正要迈步下楼的时候，我还回过头去。我真愿意把这里的一切全收在眼底，印在心上。

二

我的回忆就是从这个纪念馆开始的。那一所杏红色墙壁、蓝色屋顶的小洋房和入口的黑色铁栅门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告别的那一次，我从纪念馆出来，和招待同志齐娜、翻译同志沙夏散步到斜对面的动物园去，站在门口等车。纪念馆门前没有一个人，只有几个带笑讲话的少女在人行道上走过。可是纪念馆开幕的那一天，我跟德国小说家勃赖特尔和罗马尼亚诗人别纽克在门前下了车就只见万头攒动。人们不仅塞满了铁门里的巷子，连铁门外人行道上也站了不少的人。苏联作家协会的一位工作同志领着我们走进铁门穿过人丛中走到楼房侧门的阶前。四周是一片嘈杂的人声，每张

脸上都露出兴奋的表情，各种颜色的衣服在我眼前晃动。我听见有人低声说："好热！"到了四点钟，苏联文化部长亚历山德洛夫走上讲台，人们马上静了下来。所有的眼睛都向着那个活动的小讲台。这是庄严而朴素的典礼的开始。讲话的人一共有四个。除了最后的一位，他们全用简单而有力的句子说明契诃夫对苏联人民和苏联文化的贡献，说明契诃夫纪念馆的成立是苏联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最后讲话的是苏联人民演员克妮碧尔—契诃娃，她是伟大作家的妻子，在他的最后的岁月中给了他无限温暖的人。她今年八十六岁了。她在一个女同志的扶持下踏上了讲台。她把两只手压在桌面上，激动地望着台下的人群，声音颤抖地说了两三句话。她说出了她的感动和感谢。好些年以前我就看过她的照片：她带着愉快的笑容跟玛利亚·契诃娃一起站在契诃夫和他母亲的背后……还有《万尼亚舅舅》中的叶林娜，《三姊妹》中的玛霞，《樱桃园》中的朗涅夫斯卡雅……契诃夫的中国读者中谁不爱这个天才女演员呢？我刚读过她那篇讲她跟契诃夫同游雅尔达的回忆。那是一八九九年（她认识契诃夫的第二年）的事，契诃夫正在雅尔达修建他那个朴素的别墅，他邀请她到雅尔达去度假日。这应当是他们的爱情开始的时期。今天她还戴着旧式的帽子，穿着旧式的衣服，她望着眼前无数充满朝气的青年男女（他们全是让那一个人的纪念引来的），她怎么会不感动呢？这个慈祥的老太太比照相上那几个想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却没有力量脱出庸俗圈子的少妇或中年妇人显得龙锺了。可是我注意地看那一对眼皮起皱纹的眼睛，我看到了爱

的光芒，我看到了喜悦的光芒。她吃力地走下了讲台，还是那个女同志搀扶她。她慢慢地挥着扇子。天气太热了，苏联同志说，几十年来莫斯科没有像今天这样地热过。

人好像愈来愈多。拿这个小院子来说，人的确太多了。我没有看见亚历山德洛夫揭去盖在门墙上那块纪念石上面的布，可是我后来看见了灰白色花岗石上的刻字："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〇年中间曾经住在这里。一九五四年立。"正门打开了。人们兴奋地拥进去。橡木门上钉着一块铜牌："安·巴·契诃夫医生。"我们的作家生前还在这里行过医。里面地方不大，房间不多。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仿佛回到了鲁迅纪念馆。自然，两个纪念馆的布置有相似的地方，而且两个伟大作家的生活的朴素和简单也相差不远。楼下的房间里全是人，楼上的房间里也挤满了人。每个人都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触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我没法在一张照片、一幅画或者一个陈列柜前面停留多久。照片的大部分是我们熟悉的，还有书籍、报刊、信件和一些小东西：它们说明了一个作家的成长。在那个挂满小说插图原稿和剧照的房间里，电影厂的摄影师正在工作，水银灯发出强烈的银光。我在那里遇见契诃夫纪念筹备工作委员会主席康·费定，他像欢迎熟朋友似地跟我握手。我第一次看见《初欢》的小说家。他那亲切的笑容，潇洒的态度，有风趣的谈话和魁梧的身材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和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站在摄影机前面，等到摄影师"发命令"的时候，他把我也拉到他的身边去。他告诉我年轻人是契诃夫的侄孙。还

有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和我同来的翻译同志沙夏告诉我，他是契诃夫的侄儿。这两位“契诃夫同志”都是画家。后来在墓地上、在纪念大会上我都看见他们，可是我们没有交谈的机会。我想，中年人应该是好几幅铅笔画（雅尔达故居写生和契诃夫像）的作者吧。再后，在契诃夫诞生地大冈罗格的中学校里参观伟大作家的纪念室，我看到了一张契诃夫的侄孙描绘的画像。

从楼上我又回到楼下，走过陈列室，进到作家生前的工作室了。房门口贴着墙放了一张极普通的写字台和一把椅子。靠壁有沙发，屋角有书架，架上歪斜地立着一些旧书。齐着写字台向外的一头拉了一根绳子到对面墙上，把沙发和书架都拦在里面。书架旁边还有一道门通到临街的小屋，我站在绳子前面，伸出头去，可以望见那间屋子的一角。女管理员也给拦在绳子里面。我问她小屋里有什么。她说这是契诃夫生前的寝室。现在还没有布置好。我站了一会儿又朝前走去。前面也是一间临街的小屋，屋子里有一个陈列柜摆在正中，柜子里放得有契诃夫好友列维坦的绘画用具。这间小屋跟契诃夫的寝室是同样形式，同样大小的。站在小屋门口，我可以想象契诃夫的多么简单、多么朴素的生活。

三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是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上午十一点钟我们坐车到“新圣母修道院”去扫墓。我们（勃赖

特尔、别纽克、我、再加上保加利亚作家斯托扬诺夫夫妇)在寺院前门就下了车，等我们走到公墓的入口，人已经排了一长列了。我们走进坟场，穿过小径，到了契诃夫的坟前。坟墓四周都是人。人们更集中在一条顺着墙的路上。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熟面孔，都是在这两天里面认识的。一张熟面孔对我微笑，我记不起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老人的和善的笑容。他过来跟我握手的时候，翻译同志沙夏向我介绍：诗人马尔夏克。哦，我见过他的照片，我太熟悉他的名字。我不久以前还反复地阅读他关于译诗的谈话，向人介绍他那精确的见解。他今天扶病到这里来向他热爱的前辈致敬。我看见马尔夏克转过身，慢慢地走开，在人丛中不见了。我想起他最近写给中国孩子的一首诗：

莫斯科离开上海很远很远，
可是让我的一行一行诗
像一群飞快的燕子那样，
飞向千百万中国的孩子……①

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他一定回到疗养院去了。没有能够把中国孩子的关心和感谢带给他，我感到万分遗憾。

仪式马上开始了，正是在十二点钟。主持的人是费定。他第一个到墓前去献花圈。许多大花圈一个接着一个地安放到墓前铁栏外面。我和勃赖特尔、别纽克、斯托扬诺夫四个人

① 引用《儿童时代》上的译文。

抬着一个带架子的大花圈走到契诃夫的墓前，那座深灰色大理石墓碑已经隐在鲜花中间了。让更多的玫瑰花装饰他的坟墓吧！它们使人想起雅尔达别墅的花园。契诃夫仍然睡在他喜欢的玫瑰花的芬芳里。

费定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还记得他最后的几句话："我们聚集在这座坟墓跟前，在这个朴素的纪念碑跟前，怀着感激的心情向我们的永远活着的契诃夫致敬，感谢他用来使我们生活丰富的一切。"接下去是谢·格拉西莫夫代表全苏保卫和平委员会，俄罗斯人民演员符·阿尔洛夫代表莫斯科艺术剧院，院士维·维诺格拉多夫代表苏联科学院，诗人别纽克代表外国作家向伟大的死者致敬。

典礼结束以后，我和沙夏走到契诃夫墓前去告别。克妮碧尔在铁栏杆里面，契诃夫的侄儿在她的旁边。我站在栏外。她正转过身来，看见了我，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和蔼的微笑。契诃夫的侄儿向我点头，她向我伸出手来。我握了她的手，我说我是从北京来参加这个典礼的。她迟疑一下，契诃夫的侄儿在她的耳边把我的话重说一遍。她亲切地说，她看见我好像看见亲人一样。可惜她没法到中国去。我告诉她，契诃夫的中国读者都知道她，都爱她，又说我从中国给她带来一件礼物。她笑着，点着头说，她听到这个很满意，而且她高兴接受从中国带来的礼物。她住在乡下，参加了纪念会就要回去。塔斯社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过来给我们拍照，我和克妮碧尔—契诃娃又握了一次手。然后契诃夫的侄儿扶着她从半开的铁栏门走出去了。我把那个小屋似的墓碑望了一会儿，还有屋

顶似的碑盖和上面那三根矛尖似的东西。墓碑还是作家的妹妹设计的。对于疏忽的眼睛，这多么不像一个伟大作家安息的地方，可是这样朴素的装饰又多么适合契诃夫。就在这近旁一根黑色圆柱上，立着另一个俄罗斯伟大作家果戈理的崭新的胸像。我想象着两个现实主义的大作家在静寂的墓园里交谈。他们的坟墓隔得这么近。契诃夫一定高兴有“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①做他的邻人。作为一个作家，契诃夫继承而且发扬了果戈理的传统。

四

晚上七点半钟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的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又见到了克妮碧尔—契诃娃。她穿一件黄色的新衣服，现出非常兴奋的样子，坐在主席台上，注意地倾听报告和发言，偶尔也点头回答旁边一位女同志的低声问询。大会结束后还有盛大的音乐会。会一直开到一点多钟。可是不等发言完毕奥尔加·莱奥纳尔多夫娜让人扶着走了。我以后也没有在莫斯科再看见她。后来听说她回到乡下去了。我动身去南方的时候托人带了口信给她。从雅尔达回来，我知道口信已经带到，可是我不久就动身回国了。

大会还是由康·费定主持。这是一个庄严隆重的纪念会。灯光辉煌的厅子里坐满了人。从台上望下面，这个厅子

---

① 契诃夫在一八八九年给苏瓦林的信中说：“他（指果戈理）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

真长，人也不少。可是我听不见私下谈话的声音。眼光全集中在主席台右角的讲台上，《契诃夫传》和《契诃夫的剧作》的作者符·叶尔米洛夫在那里作了一个多钟头的关于契诃夫的生平与创作的报告。报告的要点跟最近译成中文的那篇《契诃夫论》差不多，不过讲得简单些，讲得浅些。他说出了我们大家心里的话："契诃夫的名字对于全体进步人类是很宝贵的。……"他的报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接着是各国的来宾讲话，他们把各国人民热爱契诃夫的心带到会上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向俄罗斯伟大的作家致敬。我说，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心由于这个伟大死者的纪念而更贴近地连在一起了：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景象。

音乐会占去了相当长的时间，可是节目都很精彩：有彼得·柴科夫斯基和谢尔该·拉黑马尼诺夫的乐曲和短歌，有契诃夫的戏，有契诃夫小说的朗诵。表演和歌唱的人都是人民艺术家和功勋演员。拉黑马尼诺夫当时是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和钢琴家，他是雅尔达别墅的常客，还在饭厅里弹过钢琴。柴科夫斯基则是契诃夫敬爱的前辈友人。契诃夫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小说集《阴郁的人们》就是献给他的。契诃夫还写信给朋友说："我很喜欢他的音乐，特别是《奥涅金》。"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人民演员伊·科兹洛夫斯基就在会上唱了《奥涅金》歌剧中连斯基的咏叹调。另一个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人民演员伊·伊林斯基朗诵了契诃夫的小说《变色龙》。他是沙夏很喜爱的表演家。他真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他把整个厅子的观众都引笑了，坐在我前面的满头白发的老作家，新近发表

了《作家的道德》的革拉特科夫和他的小孙女（？）都几次发出了笑声。独幕剧《房客》更引起了普遍的大笑。在实现了普遍的幸福的今天，看到那些庸俗的小人物的悲剧，仿佛又听到契诃夫的责斥的声音："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谁也无法制止对契诃夫的感激之情。

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这里演出了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的第三幕。这是非常精彩的演出。没有布景，只有几件简单的道具，但是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生活。这一幕是全剧的高潮：万尼亚舅舅看穿了自己一生崇拜的偶像，索尼雅泄露了她的痛苦的秘密，阿斯特罗夫向叶林娜表白了爱情，教授当众宣布要卖房产，最后万尼亚舅舅带着悔恨和愤怒向教授开枪……沙夏在我旁边不绝地称赞扮索尼雅的黑罗莫娃的演技。其实哪一个演员又不出色呢？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B.阿尔洛夫扮的万尼亚舅舅。

第二天晚上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里我又看到《万尼亚舅舅》的第三幕，这一次的演出用了布景，而且演的是整个戏。我带了焦菊隐同志的中译本去看戏，所以我了解全部的台词。从一开始，戏就抓住我，我跟戏中人一块儿生活下去，一幕接着一幕，到最后房产留下来，教授同万尼亚舅舅和解了。他答应继续为教授工作。教授夫妇回到城里去了，万尼亚舅舅交出了他从医生那里偷偷拿走、打算用来自杀的吗啡，阿斯特罗夫医生也走了，索尼雅拿着蜡烛送他出去，万尼亚舅舅俯在写字桌上面写了两行字，又停下来，听到外面传来的马铃声，现出无可奈何的痛苦的表情，我差一点也跟着他流出了眼泪。再

没有比这个为着虚假的"偶像"浪费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更令人痛心的了。"你可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啊！"万尼亚舅舅对他的外甥女（教授前妻的女儿）索尼雅说。那个爱着人而得不到回答的索尼雅声音激动地答道："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充满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就会终于尝到休息的滋味了。……我虔诚地、热情地这样相信啊。"她跪在他面前……拥抱他……幕在她的"啊休息啊"声中慢慢地落下。

接着是片刻的静寂。然后突然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跟着是接连的谢幕。

我没有像高尔基那样地哭过。但是走出戏院我很兴奋，我觉得我的心灵里充满了好的东西，我的身体内充满了生命力，我需要为着别人献出它们。契诃夫的作品有着鼓舞人的力量。它不仅揭露了在当时社会中占上风的"庸俗"的丑恶面貌，责备人"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它还加强人们对于未来、对于人类美好前途的信心。契诃夫的善良的主人公在任何艰苦或者悲惨的情形下都没有失去信心，而且也没有失去对工作、对劳动的热情。万尼亚舅舅说："工作吧……赶快来工作吧！"四年前我在这个戏院里看过契诃夫的另一剧作《三姊妹》，在闭幕前女主角之一的伊里娜也说："我们应当工作，只有去工作！"

但是《海鸥》中男主角特里波列夫却失去信心自杀了。隔了一天我在瓦赫坦诃夫剧院里看了《海鸥》的演出。我仍然把中译本《契诃夫戏剧集》带在身边。特里波列夫是被庸俗势力

杀死的。年轻的女主角"海鸥"妮娜虽然经历了受侮辱被践踏的无名女演员的悲剧，她却"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在一天比一天地扩张"。她仍然"有信心"。

《海鸥》被称为"契诃夫作品中最复杂的剧本"，有人说它难懂。我走出戏院以后一直不能把它忘记。后来有一天我们访问了契诃夫的故乡大冈罗格以后，坐船在列宁大运河上航行，我和二十五岁的沙夏躺在甲板上两把并排放着的帆布椅上，望着沿岸美丽的景物，我们谈起契诃夫的戏来。我手里正拿着刊载《契诃夫论》的《译文》杂志。我们谈起《海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叶尔米洛夫的说法："《海鸥》中的主题是事业。只有有事业心的人才能在艺术中取得胜利。"我认为它的主题是：青春，被庸俗势力摧残、毁灭了的青春。"海鸥"一共有两只：两个纯洁的热爱艺术的外省青年，妮娜和特里波列夫（单想象看他有着什么样的环境和多么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母亲，那个名演员在银行里存着七万卢布，却让儿子连一件外衣也没有）。他们怀着同样的渴望，飞向天空找寻新天地。庸俗势力接连不断地向他们射出明枪暗箭。一只海鸥带着创伤抱着更大的信心继续往前飞，另一只受伤很重跌下来死了。他自杀，因为他没有坚强的信仰，没有行动的力量。可是难道妮娜就有行动的力量？难道另一个成名的小说家特里哥林就有行动的力量吗？我不相信妮娜就是"一只自由的鸟高高地飞向太阳"。契诃夫的剧本里还没有这样积极的人物。我更不相信那个承认自己"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意志"的"特里哥林的形象跟契诃夫自己的不少思想结合着"。固然契诃夫借特里哥林

的嘴说过他的写作生活的甘苦(契诃夫常常把他想说的话借小说或戏剧的主人公的嘴说出来)①，可是他也把他的好友列维坦射杀海鸥和自杀未成、拉掉绷带的故事写在特里波列夫身上了。我想他一定更同情有自己的意志的特里波列夫。契诃夫素来喜欢青年作家，而且在特里波列夫身上至少看不到庸俗的成份！

从《海鸥》又谈到《万尼亚舅舅》，我还是不同意叶尔米洛夫的说法：叶林娜是猛兽。"她自己毁了，还要毁掉别人。……凡是一切美的、伟大的、富有人性的东西，只要被她碰到都要被她毁掉。"我说："《万尼亚舅舅》的主题倘使是'白白地毁灭的美'，那就是说：庸俗势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毁灭了人生的美。"叶林娜(我看到苏联人民演员塔拉索娃两次出色的表演！)绝不是一只猛兽。她自己就是被庸俗势力的一个代表(那个教授)毁掉了的。她连弹琴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她已经看穿了她过去那个"偶像"。她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你简直叫我忍耐不下去了！"可是她有行动的力量吗？戏上写得很明白：她跟着她并不爱的教授丈夫回到城里去了。所以在这里我又听到了契诃夫的责备："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要是她能够改变生活，她还可以救出自己来。

沙夏不一定赞成我的见解，但是他也没有明白地反对。他只是笑了笑。

我想起了契诃夫自己的话。契诃夫在临死前两年曾经对

---

① 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这一段话，认为它是这本戏里最好的东西。他说：契诃夫应该把它单独发表，或者放在信里。他认为这段话是契诃夫的自述。

大学生亚·吉和诺夫说："您告诉我有人看我的戏在哭。我也听见别人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写它们的时候用意并不是这样。使我的人物变成哭哭啼啼的婴孩的是亚列克赛也夫①。我想老老实实对人说的话就只是：'看看你们自己，看你们过得多糟，多无聊！'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应当知道这个，因为要是他们知道了，他们一定会为他们自己创造出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来。我不会活着看到那种生活，可是我知道它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跟我们现在生活完全两样的东西。只要是这种不同的生活一天不存在，我就要不断地反复对人说：'您得明白您的生活很糟而且无聊！'这有什么可哭的呢？"

契诃夫自己解释得多清楚。

五

我去瓦赫坦诃夫剧院看《海鸥》演出的前一个晚上，参加了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的晚会。请帖十四日就送来了。晚会预定于十七日下午七点半钟在高尔基文化公园露天剧院里举行。十七日是阴天，到我们动身去公园的时候忽然下起雨来了。我们披着雨衣走进了剧院的后台，那里已经到了不少的人，有坐的，有站的，他们一面躲雨，一面商量办法。费定拿着手杖出现了。他笑着问我："你不怕雨吗？"我说："不怕。"他笑笑说："这样大的雨不会久。雨住了就开会。"一个身材高

① 亚列克赛也夫：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ий，1863—1938）。

高的人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在我旁边坐下了。沙夏很热心地给我介绍：这是作家楚科夫斯基。我读过他的《好医生》。他用英文跟我谈了几句话。雨一直不停，他安静地打开文件夹翻看稿子。有几位同志在旁边商量改期或者改换地点。也有人主张静候雨住。可是雨声愈来愈大，更多的人打着伞进来了。后台地方狭小，容不下许多人，他们又退了出去。费定着急地踱来踱去，他也还没有打定主意。但是到九点钟光景雨终于住了。一个同志说："开会吧。人给雨赶走不少。不过还有一两千人。"沙夏告诉我：这个剧院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楚科夫斯基说："留下来不走的都是契诃夫的忠实读者啊。"

主席台上照得通亮。地板还是湿的。可是铺着红绒布的长条桌子上没有一点雨迹。下面的听众都穿着雨衣。天上的黑云逐渐在飞散，夜相当凉了。晚会的主席仍然是费定。阿尼西莫夫致开会辞。接着有几位加盟共和国的作家发言。楚科夫斯基也讲了话。他走上讲台就得到一阵热烈的鼓掌声。他说，他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读到契诃夫的《弗罗嘉》，他觉得那个中学生就是他。他喜欢契诃夫的作品。他常常放下书就看见那些"小人物"在窗上晃动。他在生活里到处都碰到他们。欧美资产阶级的批评家故意歪曲地宣传契诃夫的悲观和厌世主义。但是契诃夫的读者都知道契诃夫对他的小人物是怀着热爱的。契诃夫警告他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契诃夫不是在谴责他们，却是在谴责那个使他们日趋毁灭的现实。……

我想起了高尔基在某一个时期对契诃夫作品的评价：契诃夫首先谴责的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产生他们的社会制度；他悲悼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祖国的命运。

会开得短，一个钟点就结束了。接下去是星期六晚上的夏季音乐会。我们退到后台去的时候，音乐家们已经拿着乐器进来了。告别的时候，费定拿起斯托扬诺夫夫人的手到嘴边吻一下，说："今晚上您讲得短，到雅尔达请再讲一次。"她在今天的晚会上也讲过话的。对别纽克和我，费定说："希望你们有一次愉快的旅行。"

我们搭七月二十一日的夜车离莫斯科，特别为我们挂了一节"国际卧车"。勃赖特尔飞到捷克参加国际电影节去了。斯托扬诺夫夫妇留在莫斯科进疗养院，到雅尔达去的只有别纽克和我两个，齐娜和沙夏担任照料我们的工作。

六

二十三日晚饭后我和沙夏在雅尔达海滨散步。我第一次来到黑海边，呼吸南方的夜气，我感到非常愉快。海滨马路相当宽，路灯照亮得像在白天一样，可是行人却比在白天多。人们穿得整整齐齐、三五成群地来来往往，有说有笑，或者低声唱歌。微风吹动了路旁的马樱树，送过来手风琴的快乐的声音。在斯大林铜像下面，三四对青年男女在跳舞，他们的脸上闪着幸福的光。一对中年的夫妇带着一个十岁上下的小孩，

走过我身边，男的笑着向我打一个招呼。我记起来，下午我在列瓦狄亚宫总工会休养所里见过他。

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路灯渐渐地少起来。沙夏向一个在树下休息的人问路，问他契诃夫的铜像立在什么地方。我用从容、闲适的眼光望着街心彩虹似的衣服的颜色，和光辉灿烂的笑脸，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在“这个有着许多回忆的半岛”上我想起的不是关于可汗和英雄们的古传说，却是已经实现的人间的幸福，和在五十年前预言了这种幸福的到来的伟大作家契诃夫。这一大段路上一定有过契诃夫的脚迹。可是今天的美丽的雅尔达已经不是契诃夫时代的雅尔达了。

契诃夫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山城里度过了他最后几年的光阴。他的别墅就在这里。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钟我和别纽克一块儿到契诃夫的别墅去访问伟大作家的妹妹。苏联作家协会克里米亚分会秘书长米海洛夫和我们同去。

车子停在别墅门口，我们转进院子里去。这是一个空旷的草坪。门半掩着，门前两把木椅和右边树下一个长凳上都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台阶两旁的栏杆上。院子里右边有一张桌子，好些人围着它在买画片和说明书。房屋的左面突出来那个有玻璃窗的阳台。这就是小说家库普林所说的“雅尔达的最别致的建筑物”了。一个馆员出来了，她和米海洛夫谈了几句话。我正在桌子前面挑选画片，沙夏来告诉我：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在等我们了。

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在门内迎接我们，把我们引到饭厅

里去。这饭厅也就是契诃夫生前接待客人的地方。饭厅里一头放着食具橱和钢琴，另一头放着两把沙发，沙发旁边还有一张长躺椅，上面放三个靠垫，屋中间放一张长餐桌，除了靠食具橱的一面外，还放得有几把椅子。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在沙发上坐下来，她坐在别纽克和我的中间，我坐在她左面长躺椅的一个角上，沙夏坐在我旁边。同来的人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站在餐桌前翻看我带来的书报、剧照和木刻像。

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兴奋地和我们谈了几句话。她无论如何都不像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太太。她看起来年轻得多。她的面貌像她的哥哥：椭圆形的脸，和善的表情。可是在她脸上看不到那种忧郁的微笑。她的助手叶令娜·非立波夫娜，一位中年的太太，把剧照和木刻像一一递给她看，沙夏在旁边翻译我的说明。她很满意这些从中国带来的东西。她很高兴中国人民也知道她的哥哥，也爱她的哥哥，她嘱咐叶令娜·非立波夫娜马上把书报陈列起来。

玛利亚·巴甫洛夫娜亲自领我们到每间屋子去参观。她先到那间跟饭厅相连的阳台去。阳台上装了玻璃，盖上屋顶成了一个美丽的厅子。里面有一张铺着台布的小餐桌。夏天，契诃夫一家人和外客就在这里喝茶，休息，常常一直坐到天黑。窗外便是花园。一园子的绿色从玻璃窗映到厅子里来。契诃夫一生喜欢花，喜欢树。他在一片荒地上盖起这个别墅，种起这个花园。可是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看到绿叶成荫。当时雅尔达的常客库普林就这样描写过："花园小，一点也不茂盛。"

"这一棵柏树，"玛利亚·巴甫洛夫娜指着窗外一棵显得特别高而尖的茂密的柏树对我们说，"是我们得到哥哥死的消息以后栽的。现在它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哥哥死在德国南部的巴登维勒尔。只有奥尔加·莱奥纳尔多夫娜在他身边。我、母亲还有伊凡和米海尔，我们后来到莫斯科去参加他的葬礼。哥哥临死前三天还写信给母亲和我，说打算从海道回来，要我们打电报告诉他轮船的航期和船上的情况。可是他竟然永远不回来了。"她的声音颤得更厉害，她的眼圈也红了。我不敢看她眼睛里包的泪水。五十年前的旧事还使她这样地激动。

我们又走进饭厅隔壁的书房。第一眼就看见对面那个拱形大窗。房间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可是小说《在峡谷里》和剧本《三姊妹》、《樱桃园》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就在那张现在罩上了玻璃的写字台上，我仿佛还看见契诃夫俯下头写字的身形。他坐在写字台后面一张长榻上，背后还有三个靠垫。长榻刚好放在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写字台上有一对烛台，还插着四枝燃过的蜡烛。其中的一枝只剩下三分之一了。据说契诃夫喜欢在烛光下面写文章。他一定对着它们构思、沉吟。可惜不会说话的蜡烛不能告诉我们他的写作的故事。两个烛台的中间有一个较大的墨水盒。墨水盒前有四只小象，两只黑象身子比白象大一倍，这是契诃夫从库页岛回国经过印度时带回来的纪念品。另外还有一只小小的短腿狗。一根里面插了四枝钢笔的笔筒，一个医生用的日历，和一束还没有拆开的邮件，那里面还有园艺方面的报刊。契诃夫喜欢在园子里工作，自己种树栽花，想"在自己那块小小的土地上做他所能够

做的事”来使土地美化。的确，从拱形大窗的三面玻璃窗望出去，外面是一片多么美丽的土地。写字台的左端靠着矮矮的窗台。早晨拉开齐地的窗帷，阳光就照到他的书桌。书桌右面紧靠着一张铺了桌毯的小方桌，桌上放一个花瓶。方桌旁边有一张沙发，契诃夫吃过午饭后喜欢坐在这里读报、休息。这张沙发正对着一个用棕色荷兰砖砌的壁炉。一幅小小的风景画嵌在壁炉的上半部：“月夜里的干草堆。”这是列维坦画的。这里有一个故事。契诃夫非常喜欢俄国中部的大自然。他搬到雅尔达以后很怀念北方的景物。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底画家列维坦到他家里作客。有一天晚上列维坦坐在这张沙发上，契诃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他在雅尔达见不到北方的景物，很感寂寞，列维坦就掉头对当时在场的玛利亚·巴甫洛夫娜说：“玛霞，请给我拿张图画纸来。”她把纸拿来了。他裁好纸，钉在壁炉上，不多不少在半点钟里面就画好了一幅画。第二年正月二日契诃夫写信给克妮碧尔说：“列维坦在我这里。他在我的壁炉上画出了割草时期的月夜。草原，草垛，远处的树林，月亮照在这一切的上面……”可惜几个月以后列维坦就去世了。

壁炉旁边一张小桌上立着金次堡雕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全身像。契诃夫非常尊敬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很喜欢他。有一天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着：“契诃夫来看我们，我喜欢他。他很有才能，而且他的心一定善良。”托尔斯泰喜欢契诃夫的文章，称他做“散文中的普希金”。

书房里还有很多过去的照片，一部分是契诃夫和他家族

的，它们展开了一个大作家的四十四年的生活。更多的一部分是他的友人的照片，在那些照片上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格里戈洛维奇、柴科夫斯基、柯洛连科、高尔基、夏理雅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签名。

靠窗的一个角落还有两扇镂花的门，通到睡房去。门内角落里墙壁上装得有一架老式电话机。契诃夫常常用它跟高尔基、托尔斯泰和别的在雅尔达附近的友人通话。别人打给他的电报也由电话机转过来。《万尼亚舅舅》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次上演的时候，契诃夫得到了祝贺的电报，他自己写过这样的话："……二十七日晚上电报来的时候，我已经上床了。这是由电话机转来的。我给惊醒了，光着脚挨着冻在黑暗中跑到电话机跟前。后来刚刚睡着，电话铃又响了，接着又响了。我自己的光荣妨碍我的睡眠，这还是头一次……"

睡房更小，更简单。靠壁一张小小的铁床上，铺着白床单，一个白枕头压在上面。床前放一张带抽屉的桌子，桌上有一本一九〇四年的《历史通报》，还有一只带绿色玻璃罩的烛台，插四枝蜡烛。契诃夫身体不好的时候，就穿着睡衣坐在床上看书，写文章。床对面放一个十九世纪的老式衣橱。这是从大冈罗格搬来的母亲婚前的衣橱。在契诃夫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母亲常常把糖果藏在这里面，孩子们只有在吃过饭以后才得到糖果吃。契诃夫很喜欢这个衣橱，他把它写进《樱桃园》里去了。《樱桃园》第一幕中加耶夫说的"非常可爱、非常可敬的衣橱"就是它。

玛利亚·巴甫洛夫娜还领我们到楼上陈列室去。玻璃

柜、玻璃镜框、照片、画像，还有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医科毕业时全班同学的照相，还有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绘的风景画……这一切具体地说明了契诃夫各个时期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的道路。还有一个玻璃橱，里面挂了一件皮大衣，这是他一八九〇年去库页岛调查流刑犯和苦役犯的生活时穿的。在他的睡房里还有他去库页岛时候用的提包。库页岛的旅行是非常艰苦的。长途马车中的生活，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候对他的身体会有不利的影响。可是他终于坚持地完成了这次旅行，带了一本充满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报告《库页岛》的腹稿回来了。

"库页岛的旅行可能使他的肺病发展。可是我哥哥是个富于同情的人，他很容易感受别人的痛苦。他知道什么不合理的事情，绝不能沉默。他观察锐敏，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当时库页岛上还没有学校，他回来就寄书到那边去。那边有好多人一直记着他……"玛利亚·巴甫洛夫娜激动地说。

最后我们回到楼下装了玻璃窗的阳台上，别组克和我先后感谢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对我们的亲切的接待。她又告诉我们："我们在莫斯科参加了哥哥的葬礼以后，回到雅尔达的荒凉的宅子来。嫂嫂奥尔加·莱奥纳尔多夫娜跟我们一块儿回来，她交了一封哥哥在一九〇〇年写好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准备在他死后用的。在信里他指定我做他的管理人和遗嘱执行人，他还把雅尔达的别墅送给我。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别墅用来纪念我的哥哥，使它成为俄罗斯伟大作家契诃夫的纪念馆。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现在，每年有八万以上的人

到这里来参观。”

比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年轻许多的叶令娜·非立波夫娜在旁边插嘴说：“玛利亚·巴甫洛夫娜为了忠实地表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生活，不使他的房间的陈设改变，她宁愿住在三楼，忍受上下的不方便。”

玛利亚·巴甫洛夫娜接着解释道：“我非常爱哥哥。我愿意把我的一生献给哥哥的纪念，献给他的事业，这不是为我自己，这也是为那些爱好他的作品的人，就是为着人民啊……”她的眼圈又红了，她微微低下头来。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她不仅在她哥哥生前照料他，她还在他死后编印他的书信集，成立他的纪念馆，现在她还是雅尔达契诃夫纪念馆的馆长。

我们静了片刻，我声音略带颤动地安慰她：“全世界善良人民会感激您，为了您对于这个伟大作家的纪念所作的一切。这种感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不止是您一个人爱您哥哥，我们都爱他，全世界善良人民都爱他。”

沙夏把我的话翻译给她听了。她感谢地点一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今天我很高兴。中国人来了，罗马尼亚人来了。我哥哥生前想到中国去，他没法去，现在您来了，以前还有中国儿童来为我跳舞唱歌。您回去替我向中国人民问好啊……”

别纽克接着谈罗马尼亚人民热爱契诃夫的情形。齐娜像对着亲爱的老祖母讲话似地对玛利亚·巴甫洛夫娜谈了一些像她那样的年轻女子的感想。

最后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在小餐桌前面坐下来，从叶令

娜·非立波夫娜手里接过两张她自己的照片，慢慢地动着笔签好名送给我们。给我的一张是她在园子里玫瑰花下坐在铺着中国挑花桌布的小桌前面照的。

她把我们送到门前台阶上，恳切地握手行礼，接连地说："我感谢你们。"我走到院子里回过头去，还看见她站在台阶上招手。

我们在雅尔达一共住了三天。动身去罗士托夫的前一天下午参观了阿尔杰克儿童夏令营回来，我和沙夏又坐车赶到契诃夫纪念馆去告别。

我们跟着一群年轻的读者在各个房间走了一转，听一遍讲解员的解释。后来我和沙夏走到那个由阳台改建的玻璃厅子。叶令娜·非立波夫娜正坐在小餐桌前面，她站起来，亲切地欢迎我们。就在这间契诃夫生前常常和熟朋友聊天的厅子里，她向我们谈起契诃夫的写作生活。在楼上陈列室的玻璃柜里我们看见用细绳捆成一长叠的同样的旧邮票，一共有好几叠。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告诉我们：契诃夫写作中构思的时候，常常把邮票一叠一叠地解开又捆起来。叶令娜·非立波夫娜不大同意这个说法。她说："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个邮票的爱好者。"她又告诉我们："契诃夫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写得很快，洗澡的时候也写了一篇小说。以后他就写得越来越慢了。他身体好的时候通常总是从早晨八点写到十二点。他说：在工作中灵感自然会来的。契诃夫是个非常好客的人。雅尔达别墅里来往的客人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大家喜欢在这里玩、吃饭、聊天，全由他的妹妹照料。他有时候想到要写

什么就一个人关起门来写东西。园子里有一个清静的角落，那里有一把很简单的木头长椅，契诃夫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思索。高尔基来的时候，他常常和高尔基躲在这个角落里谈话，免得有人打扰他们。”

叶令娜·非立波夫娜陪我们到园子里走了一趟。她把我们带到那个清静的角落去。树荫里，有着用七根木条、两块木板、三条木腿钉成的两把连着的长椅，背后是石头矮墙。这长椅现在称为“高尔基椅”了。我怀着尊敬的感情把这古老的椅子望了一会儿。

对着满园的枝叶繁茂、开花结果的绿树，叶令娜·非立波夫娜感动地说：“这都是安东·巴甫洛维奇亲手种出来的啊。他来的时候，这里连一根草也没有。”旁边有一丛粉红的玫瑰花，开得正好。她摘下一朵递给我：“你带回去吧，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的花。”

我向她道谢，也向她告别，已经过了闭馆的时间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你再来，希望还有中国的朋友来。”我请她替我问候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她说：“可惜她今天没有下楼，她昨天太兴奋了。”

我们的汽车顺着平坦的山路往下拐弯的时候，我还回头想从后面小玻璃窗去望耸立在绿树丛中的白色小楼，沙夏看着表说：“我们已经迟了二十多分钟了。”接着他又带笑问我一句：“你看够了吗？”我摇摇头，我惋惜地说：“再看十天我也看不够。”我心里想：“单靠这么两次匆匆地一看，我究竟了解多少呢？”

沙夏好像知道我的思想似的，接着安慰地再说一句："不要紧，我们就要到大冈罗格去看契诃夫的故居，就是他在那里诞生的老屋。"

七

二十七日上午八点钟，我们，别纽克和我，齐娜和沙夏，从罗士托夫到大冈罗格去。我们是前一天坐飞机来到这个顿河岸上的大城市的。小汽车在路上走了两个钟头，陪我们同去的罗士托夫的诗人阿列尼奇—格涅宁科坐在我的车子里，一路上对我解释这几年来的变化和建设。车子开得很快，也颠得厉害。四周的景物都是一瞬眼就过去了。我们必须在下午两点前后回到罗士托夫，因为四点钟我们就得从旅馆动身去码头，搭轮船到斯大林格勒去。

十点钟光景我们的两部车子在大冈罗格市政府门口停下来。我们在那里耽搁了二十多分钟。我忽然想起了契诃夫在中篇小说《我的生活》里带着深厚的感情写的那几句话："我爱这个小城。它在我眼中显得那么美丽，那么温暖！我爱这一片绿树，安静、明媚的早晨……"

市政府的一位女同志陪着我们坐原车到契诃夫剧院去。这是一个不很大的两层建筑物，朴素的门面没有一点建筑上的装饰，门柱上钉了一块牌子，刻着这样的字："大冈罗格剧院，安·巴·契诃夫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在这里看过戏。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剧院在一九四四年改称为安·巴·契诃夫

剧院。”

剧院的负责同志出来接待我们，陪我们进去。我们参观了剧场。这个剧院是在一八六六年修建的，离现在八十八年了，可是看起来剧场还是像新的一样。场子不十分大，有三层半圆形的包厢座，连池座一起可以容纳九百个观众。契诃夫从十三岁起进剧院，他在这里三楼上看过不少的世界名剧：《哈姆雷特》、《钦差大臣》、《聪明误》……在那个时候中学生看戏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契诃夫的同学维西涅夫斯基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回学监维诺格拉道夫（就是那个当了学监马上剃掉胡子的人）在休息的时候站起来，背朝着舞台仰起头向顶楼上找寻我们的面孔。不用说我们都没有穿制服。第二天在学校里维诺格拉道夫把契诃夫叫到面前去，说看见他穿便服在看戏。契诃夫不承认，说学监弄错了。学监坚持说，他认得契诃夫。‘那是我的双生弟兄，’契诃夫这样说。”

我们在工作室里见到一位年轻的导演，他正在和演员们讨论《海鸥》的演出。他们今晚就要在这里重演《海鸥》，据说内容略有改动，可惜我没法在大冈罗格住一个晚上，我也来不及听到导演的修改意见了。

我们离开剧院立刻到契诃夫图书馆和契诃夫文学博物馆去。这两个机构设在一个建筑物里。革命前并没有文学博物馆。文学博物馆还是在一九三五年契诃夫诞生七十五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的。

这是一个朴素而又美观的建筑物。门前人行道上有一排绿树。正面门楣上突出来三行字：“安·巴·契诃夫图书馆与

博物馆”。下面是一排五面长格子玻璃窗。门在旁边，也是长格子玻璃门。我们进去，先到博物馆。管理员出来道歉说，陈列室里正在布置契诃夫的展览会，东西刚运到，乱得很。我们走进大陈列室，果然地上到处是木板、纸片，靠壁放了不少镜框，木匠在工作，人们在搬东西。在屋角我看到契诃夫的全身石膏像。在屋子的另一头有一面用布盖着的大木板，管理员把布揭开，我们看见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的艰苦日子里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提到的十六个伟大的名字，是用金字钉在木板上面的，另外还配上十六个人的彩色像。在这苏联人民引以为骄傲的十六个名字中间就有契诃夫。

管理员把我们引进另一间屋子，在书架上取下来几本契诃夫亲笔签字送给图书馆的小说集，还有一本高尔基签字送给契诃夫的《三人》。这些书为数不少，都是契诃夫生前送给图书馆的。契诃夫在十六岁时候开始进当时的市立图书馆，以后便常常去借书。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塞万提斯以及别的许多作家的著作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契诃夫从这个图书馆得到益处，所以他离开大冈罗格以后还不断地送书来，不止是他自己的著作，他还买了许多书寄到大冈罗格。他帮助大冈罗格图书馆成立了外国图书部，他还为它买了不少的书，例如，一八九八年三月九日他从法国尼斯写信来说：“为了打好外国图书部的基础，我把法国古典作家的著作都买齐了，日内就寄到大冈罗格来。一共七十个作家，三百十九册。”我们在他给高尔基的信（一九〇〇年十月）中也看到：“现在寄上达——的书，读完后请寄下列地址：大冈罗格市立图书

馆。寄件人请写：安·契诃夫。”在这些书中契诃夫本人签名的著作和友人签名送给他的书现在都转到博物馆来了。图书馆藏书在一九一三年只有一万三千多册，到去年却增加到十二万九千多册了。

走出博物馆，我们就到了图书馆，先参观了书库，然后到阅览室。阅览室中有好些人俯在长条桌上看书。我望着那些拿着笔动得很快的手，望着那些现出专心的表情的脸，我忽然想起八十年前的少年契诃夫来。我还记得他一个中学同学特洛西写的一段回忆：“在星期天和休假日我们很早就跑到市立图书馆，连续不断地看几个钟头，连午饭也忘记了……”

接着我们又到契诃夫中学校去，那就是契诃夫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九年肄业的大冈罗格中学校。学校里有一间契诃夫的纪念室，墙上挂着契诃夫各个时期生活的照片，屋子中间那些台子上有书报，有用玻璃匣子盛着的模型。照片和书报都是我们熟悉的。模型我却是头一次看见：有契诃夫出生的房屋；有他念书时候的那个学监（学监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外监视学生）；还有普里希别也夫中士和教员别里科夫……他们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按照大家熟悉的库克雷尼克赛的插图做的，看起来，跟有血有肉的人差不多。

这个纪念室里还有一部分珍贵的陈列品，就是从这个学校出去的英雄和烈士的照片或遗物，他们在革命中、在卫国战争中，有了贡献或者牺牲了生命。他们跟契诃夫一样都是学校引以为骄傲的学生，学校还用他们的事迹来教育后代。

八

最后我们到了契诃夫在那里诞生的小屋。街名已经改作契诃夫大街了。在从前它是称为警察大街的。契诃夫小的时候，大街上常常是一片泥泞，猪群自由自在地散步。现在我们的汽车顺利地驶过清洁、平坦、宽广的林荫路，到了那所藏在树荫深处的白色小屋的外门。我们走进木栅门，一直往里走。左面有一个小花圃，有花有树，还有一座契诃夫的胸像，立在一个不很高的石座上。像座前还放着颜色鲜艳的花圈。这里原先是一片作市场用的空地，现在成了美丽的小花园了。路旁还有让游人休息的靠背长椅。

白色小屋隐在樱桃树中间。屋前左面樱桃树下有一张小圆桌和两根长凳，据说少年契诃夫喜欢坐在这里。他很喜欢樱桃树，他常常怀念这个樱桃园，终于把樱桃园写进戏里去了。

一群小学生正在参观这个契诃夫的故居。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进去，却比他们先出来。一共只有三间小屋子和一间小小的厨房。一间“厅子”同时兼有饭厅、会客室和书房的三种用处，屋角有一幅神像，神像前面点着长明灯。屋子里还有祷告书和别的这一类的书本。屋子里还有一张桌面活动的餐桌，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饭厅隔壁是大人的睡房，有一张双人木床，从睡房出去便是儿童室，儿童室里有一张木头的摇床。三间屋子的墙上都挂得有家里人的照片和一些并不高明的图画，图画上表现的是《圣经》上的故事。这就是当时一个

笃信宗教的古板的小商人的家庭了。

饭厅里还有一个玻璃的陈列柜。不用说这是后来添上的。我在柜子里一张纸上看到一段话:"契诃夫的祖父叶哥尔·米海洛维奇原是地主契尔特科夫的农奴。在农奴解放以前他在一八四一年赎回了自由。他付出三千五百卢布赎回自己夫妇和三个儿子的自由……"契诃夫的祖父当时找不到钱来为女儿赎身,他要求地主不要把她卖出去,等到他存了七百卢布来赎她。后来契尔特科夫免费给了她自由。所以契诃夫有一次讲到他自己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农奴的儿子。"

我们走出这所白色小屋,我又把那块写着"安·巴·契诃夫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①]生在这里的小屋"的牌子望了一会儿。契诃夫出世的时候,他的父母搬到这里来还不到两年。他的童年就是在这所小屋里度过的。虽然他母亲很喜欢他,他一生爱着她,可是他父亲的专制和严厉,给他童年的生活罩上了一层极浓的暗影。他后来写信给他的哥哥亚历山大说:"专制和谎话把我们的童年毁坏到这样的程度,叫我想起来就不舒服,极害怕。你该记得每回父亲在饭桌上因为汤里盐太多发脾气或者骂母亲做笨蛋时我们感到的厌恶和恐怖吧。"所以他讲到他的过去时还愤慨地说过:"我小时候就不曾有过童年,"从这句话就可以想到他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挨打、挨骂,守铺子、送货物,晚上给吵得睡不好觉……就是这个小杂货店老板的儿子的生活了。"

---

① 指旧俄历。一月十七日即公历一月二十九日。

一个星期以后，我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银行里遇见费定。他过来跟我和沙夏谈话。他问我："到大冈罗格去过了？"我答道："去过了。""看到契诃夫诞生的地点，那所小屋了？"我又答道："看到了。"他笑笑说："伟大人物常常是生在小屋里面的。"我请沙夏翻译给他："穷苦的生活更容易培养人的同情心，也更容易增加人对不公平的愤恨。"他点点头。"不过拿纪念馆来说，大一点倒可以多容纳一些人啊！"他愉快地笑了。他告诉我他在写《不寻常的夏天》的续篇《篝火》，又说：明天要到捷克去休养。要不是看到他手里捏的那根手杖，我无论如何不相信他是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

九

飞机动得厉害，我的心好像也在往下沉。我觉得不舒服，就闭上了眼睛。……飞机忽然不动了。我睁开眼。服务员告诉我们：气候不好，不能再朝前飞，请大家下去休息。我看表，才飞了两个多钟点。这么短的时间！我想了那么多的事情！事情是想不完的：我带了那么多的东西回国。可是我的思绪给打断了。我忽然想起三个星期来一直跟我在一起的沙夏，我还以为他坐在我的旁边……

我站起来，抬起眼睛，契诃夫还在那里对我微笑。这个伟大的作家并没有离开我，他要陪着我回到北京。不，他的光辉的形象永远现在我的眼前。

1954年11月在上海。

向安东·契诃夫学习

——在莫斯科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今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愈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一小撮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保卫人类的文明和幸福、并且努力促进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时候，我在这里看到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景象：苏联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向他们敬爱的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大作家安东·巴甫罗维奇·契诃夫致敬，为了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深厚的爱，为了他对于俄罗斯文化和人类文化的贡献，为了他对于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定不移的信心。

这个庄严隆重的纪念会上有各国的来宾。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尊敬与感激的心情来向伟大的先辈致敬。他们带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因为契诃夫不单是苏联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他的著作已经成了优秀的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他的影响广布于全世界，他的名字是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雨果、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文化巨人的名字并列的。

我能够坐在这些来宾中间，能够把新中国人民对俄罗斯伟大作家的敬爱的心带到这个盛大的纪念会上，我感到无限

的幸福和光荣。今天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也在举行纪念契诃夫的盛大集会。中国人民熟悉契诃夫的名字就像熟悉自己的先生和朋友。近四十几年来他的作品不断地译成中文。他的小说的译文经常在北京和上海两处的报刊上发表。他的剧作也有几种中文译本。小说选集先后出版过三套，最后的一套在一九五〇年刊行，现在已经出到第二十一册，选载小说一百五十七篇。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中间，契诃夫是作品译成中文最多的一个。他的《万尼亚舅舅》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在上海演出，但上演次数最多的是他的独幕剧。

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也是契诃夫的爱好者，他在一九三五年翻译过契诃夫的几个短篇，他的译文是公认为最能传达契诃夫的精神的。

中国的读者热爱契诃夫，因为他们曾经感觉到契诃夫的作品好像就是为他们写的，而且描写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契诃夫通过他的人物和人物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症，也写出当时一般人的思想感情。那个时代是十九世纪俄国历史上最黑暗、阴郁的时期，也就是暴风雨前的阴暗、沉郁的时期，正和过去中国的社会相似。所以中国的读者曾经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看到了他们的病症。中国的读者也听到了契诃夫的责斥的声音："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中国的读者也懂得了契诃夫的预言："人类是朝着最高的真理前进的，是朝着人间还没有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幸福前进的。"中国人民的确踏着苏联人民的脚迹朝"最高的真理"、朝"最大的幸福"前进了。

契诃夫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相信进步，相信未来。他是医生，所以他擅长诊断。他在反动势力发展到近于顶点、庸俗和虚伪在社会中占了上风、一般知识分子对进步和改革感到幻灭、他们中间充满着绝望的时候，契诃夫不倦地用他的笔写出当时社会的病史，他用诗人的崇高的语言，医生的精细、周到的诊查和幽默家的讽刺的微笑描写了那些丑恶的生活。他不停地责斥，不断地嘲讽，他不留情地让人们看见自己的真实生活情形，只为了使他们生出奋发向上的心，只为了使他们变好。契诃夫一生最恨庸俗。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个仇敌的斗争，而且他还在斗争中得到了更多的勇气和信心。在他的最后一个短篇《未婚妻》里面，契诃夫不再说："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他借沙夏的嘴说："主要的是改变生活，其余的一切都不重要。"这句话对全世界反抗压迫、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是多么大的鼓舞。

今天在这个盛会上我听到了用各种语言表示的对契诃夫的尊敬与感激。在这一刻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心由于这个伟大人物的纪念而更贴近地连在一起了。因此我更想到契诃夫在五十一年前的伟大的预言："一切都要彻底改变……那时候这儿会有富丽堂皇的大楼，美好的花园……还有优秀出色的人……"

契诃夫的伟大的预言已经实现了。不仅在契诃夫诞生的伟大的国土上出现了无数优秀出色的人，遍地开满了美丽的鲜花，人们正在用忘我的劳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且在别的许多国家中，庸俗也在逐渐消灭，美好的生活也已开始实现。

不管战争挑拨者在绝望的挣扎中进行怎样恶毒的阴谋，但是在我们这个日趋光明的世界里，美的、善的、进步的东西一天一天地在生长，而丑的、坏的、腐朽的东西则逐渐在消灭。

今天在这里纪念安东·巴甫罗维奇·契诃夫，我仿佛还看见他的谦虚的、好心的微笑。想到他，我们对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勇气，对我们的前途增加了信心。作为作家，我们比契诃夫有更好的环境，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更勤快地使用我们的笔，为人们工作。是的，为人们工作。我们的伟大的前辈，现实主义的大师契诃夫已经谈过作家的责任了：

> 我爱祖国，我爱人民，我觉得，我要是一个作家，我就有责任谈人民，谈他们的苦难，谈他们的前途……

今天我们应该谈人民的欢乐，谈他们的力量，谈他们的无限美好的前途。因此我们更应该向安东·巴甫罗维奇·契诃夫学习，用他那支深刻而尖锐的讽刺的笔把一切阻碍人类前进的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摧毁干净。

1954年7月。

我们还需要契诃夫*

——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

听见人提起安东·契诃夫的纪念，我就想到五十年前停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绿色货车，车厢里放着契诃夫的灵柩。车皮上用大字写着“蠔”。丹青柯说：这是契诃夫的最后的一次幽默。高尔基说：这一次“庸俗”对我们的诗人报了仇，把他的遗体用运蠔的货车运到莫斯科。

据说契诃夫生前给一个医生朋友写过一封诙谐的信：“我惋惜的是没有可以……把我吞掉的蠔。”他的仇敌“庸俗”真想把他吞掉，可是它没有那种力量。契诃夫的名字今天还放射着万丈光芒，而那种肮脏的绿色货车早已在他的国内绝迹了。

在这个时候我很想谈谈契诃夫。可是拿起笔，想了半天，我又觉得我知道他太少。契诃夫写了那么多篇短篇小说（还不提他的中篇、独幕剧和多幕剧），他的作品接触到的面又非常广，早在一九〇四年就有人称他为“近二十年史的最有权威的历史家。”据说：“社会学者单单根据契诃夫一个人的著作，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人民文学》七月号。发表时题为《纪念契诃夫的话》。

也可以绘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生活与其背景的一幅大画面。”因为契诃夫不仅写得多，而且他写得深，而且他写得真实。他留下来的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俄国社会的缩图（他描写得尤其出色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没落的外省地主、小职员等等）。因此，在三十年前，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我读过的不只一篇（那个时候他的短篇译成中文的为数也不少），我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我不能怪译者，本来要从译本了解契诃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转述他的故事并不困难，难的是把作者那颗真正仁爱的心（高尔基称契诃夫的心为“真正仁爱的心”）适度地传达出来。要是译者没有那样的心，要是读者不能体会到那样的心，我们从译文里能得到什么呢？我在那个时候不能接受契诃夫的作品，唯一的原因是我不了解它们。这不是奇怪的事：一个年轻人第一次面对着茫茫大海，他什么也不会了解的。

以后我仍然常有机会接触到契诃夫的作品。于是又来了一个时期：我自以为我有点了解契诃夫了。可是读着他的小说，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读得越多，我越害怕读下去。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些人就顺从地听凭命运摆布，至多也不过唉声叹气，连一点反抗的举动也没有？我好像看见一些害小病的人整天躺在床上、闲谈诉苦、一事不做、等待死亡，我恨不得一下子把他们全拉起来。尽是些那样的人！尽是些那样的事！有时候我读得厌烦起来，害怕起来，我觉得一口气憋在肚子里头快要憋死我了，忍不住丢开书大叫一声。那个时候我已经开

始写小说了，我也选择了这个职业。我的主人公常常是一些在学校内外的青年，他们明知道反抗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不幸，他们也要斗争到底。我的年轻主人公需要的是热情和行动。而这些东西我以为和契诃夫小说里的那种调子是不一样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当时我并没有了解契诃夫。有人把契诃夫看做一个厌世主义者，我当时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从 C. 嘉纳特的英译本读了契诃夫的大部分的作品，英译者并没有帮助我了解它们，更不用提热爱了。使我逐渐喜欢契诃夫作品的是我的长时期的生活。

现在我是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这是我读契诃夫作品的第三个时期了。我走过了长远的路才来到这里。我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卑鄙”的层层包围才来到这里。我也曾跟那一切“庸俗”的势力斗争过，在斗争中我更痛切地感觉到它们那种腐蚀人灵魂的力量，同时跟庸俗斗争了一生的作家契诃夫的面貌也更鲜明地在我眼前现出来，我也就更了解高尔基那几句话的意义：“他嘲笑了它（庸俗），他用了一支锋利而冷静的笔描写了它，他能够随处发见庸俗的霉臭。”固然契诃夫写的是当时俄国社会的面目，可是在他笔下出现的人物也常常在我们中国社会出现。像姚尼奇、阿伦加、阿希尼叶夫、别里科夫、库希金、宁娜（名字太多了，我只能随便举几个），过去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没有碰到过？契诃夫开始写作的时候，俄国反动势力的凶恶、残暴正达到高峰，据说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末期和亚历山大三世在位的十三年是十九世纪俄

国史上最黑暗、阴惨的时期。因此在我们这里特别是旧社会开始崩溃、反动统治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到处都发见契诃夫所谓的“霉臭”，到处都看见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他们哭着，叹息着，苦笑着，奴隶似地向人乞怜，侥幸地过着苟安的日子，慢慢地跟着他们四周的一切崩溃下去，不想救出自己，更不想救别人。他们只是闲聊过去的美好的日子，或者畅谈将来的美满的生活。我跟这样的人在同一张饭桌上吃过饭，在同一个戏园里看过戏，在同一家商店里买过东西，在同一个客厅里谈过天。我们的那些资产阶级，那些知识分子，那些小市民……我跟他们接触越多，我研究他们越深，我越无法制止我的厌恶，我好多次带着责备的调子警告他们："你们不能够再像这样地生活下去。"在这些时候我不能不想到契诃夫，不能不爱契诃夫。我翻开他的著作，就好像看见他带着忧虑的微笑在对一些人讲话，我仿佛听到他那温和而诚恳的声音："太太、先生们，你们的生活是丑恶的！"贯串契诃夫全部著作的就是这种忧虑，这种关心，这种警告，这都是从他那颗仁爱的心出来的。

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厌；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他本来是医生，医生的职责是跟疾病作斗争，医生的职责是治好病人。作为作家，他的武器就是他的笔，他的药方就是他的作品。一个人倘使相信疾病是不可战胜的，他就不会去念医学。契诃夫的主人公常常是厌

世主义者，可是他本人绝不是，而且恰恰相反，他相信进步，他相信美好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实现的。有一次他给一个熟朋友写信，就明白地说："从做孩子的时候起我就相信进步，因为拿他们常常打我的时候跟他们不再打我的时候比起来，这中间的区别实在太大了。"

因此他不断地跟社会的一切疾病作斗争。对于庸俗的势力，对于不合理的制度和生活，对于一切丑恶、卑劣的东西，他不断地揭露，不断地嘲笑。他怜悯地然而严肃地警告人们：你们要不改变生活方式，就得灭亡。

时间证实了他的信仰。他战胜了他的仇敌。在他诞生的土地上应该灭亡的已经灭亡了，美好的新的生活也已经出现了。今天重读契诃夫留给我们的东西，我还感觉到他那颗仁爱的心在纸上跳动，我感觉到他的爱与憎。他的爱与憎引起了我的共鸣。这个伟大的小说家并没有死，好像他就坐在我面前，用他那温和的眼光望着我，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告诉他们，这样不行啊！"

我们不会忘记他的警告。我们今天还需要他那支笔，因为在我们这里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看不到在他笔下出现过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也终于会像肮脏的绿色货车那样地绝迹的：他们不得不把地位完全让给新的一代人！

1954年6月。

谈契诃夫*

——纪念契诃夫诞生九十五周年

关于契诃夫，一年来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的话，可是我觉得要了解契诃夫，最好多读他的作品。他的朋友丹青柯说得很对："只要读者专心读他的作品，就会爱上他的。"

有人说契诃夫的著作难懂，美国的戏院老板说契诃夫的戏没有"票房价值"，资产阶级的批评家诬蔑他为"阴郁的诗人"。事实并不是这样。凡是了解生活、忠实于生活的人就会了解契诃夫，爱契诃夫。他的作品不但不难懂，而且写得入情入理、明明白白；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或剧本，里面都充满着爱和恨。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接触到作者的仁爱的心。

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一样，契诃夫一直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恨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不断地抨击和无情地鞭挞它们。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他同情、鼓励、援助它们。他待人亲切、谦虚，但是他严正、不妥协。左拉维护正义替犹太军官德列非斯辩护的行动得到他的支持（一八九八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年)。他和柯洛连科联名声明放弃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来抗议科学院因沙皇干涉撤销高尔基当选荣誉院士的决定(一九〇二年)。在作品中，随便举几个例：他鞭挞骗人的偶像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鞭挞蛮横骄傲、欺压人民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他鞭挞“装在套子里的人”、保守的教员别里科夫。靠剥削人生活的教授卖房子的计划没有能实现；喜欢干涉别人生活的中士“明白这个世界已经变了”；“把学校控制了十五年”的教员终于让人推下楼梯，生了病死了。这些人我们过去在中国社会里也常常见到，因此我们更容易了解契诃夫的憎恶。读了描写疯人院生活的小说《六号病房》，我没法制止我的颤栗。青年时代的列宁在一封信里说出他的读后感："可怕极了。……我觉得好像自己也关在‘六号病房’里面了。”主持疯人院二十年的医生拉庚关着门看书喝酒的时候，别人并不惊扰他，可是等到他认识了真理，看清楚他四周的真实情形以后，别人却把他当成疯人，关进了“六号病房”。后来他和一个病房同伴起来反抗不合理的待遇，挨了痛打，中风死了。这篇小说是契诃夫从库页岛旅行回来以后写成的。它不仅写出契诃夫对流刑犯和苦役犯生活的体验，它主要地暴露了十九世纪末期帝俄专制的“警察国家”的黑暗。它告诉读者：沙皇统治的俄罗斯是一个大监狱，他借一个人物的嘴说："我们给关在铁窗里，受折磨，被虐待，"这样来激发人们的斗争心。

资产阶级的批评家常常强调契诃夫的“不问政治”的倾向，这是不对的。他的作品中没有一篇不跟政治有关，没有一篇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脱节。契诃夫只活了四十四岁，在他的

二十五年的写作生活中他一共留下了五个多幕剧、几个独幕剧和两百多篇中、短篇小说。有一个社会学研究者曾经写过一本叫做《契诃夫和他的俄国》的书，因为契诃夫在他的作品中忠实地反映了二十多年中间俄国社会的生活。他通过他那些“小人物”写出了他那个时代和当时社会的病史。在他的作品中，他无情地鞭挞，无情地嘲讽。他从不间断地进行着对不合理制度的斗争。高尔基说过：“庸俗是他的仇敌，他一生都在跟它斗争。”契诃夫攻击庸俗，就是攻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就是攻击整个沙皇的统治：它产生了那一切的病症，使得俄国人民全过着悲惨痛苦的生活，使得那么多的俄国人都害了病。契诃夫本来是一位医生，也曾挂牌行医，在雅尔达他还为找上门来的穷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他说出病情，写下病史，就是为了来治疗的。他在每一篇小说中都用斥责和警告的口吻告诉人：“你们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甚至在最阴暗的篇页中我们也没有看到“绝望”，我们却更强烈地感染到作者的爱与憎。作者把那些软弱无能、自私自利、欺世害人、忍辱苟安的人物鞭挞得最厉害的时候，他自己也激动得最厉害，他在大声疾呼警告人们：不要走这样的路！必须趁早治病。我们用不着在那些篇幅很少的短篇中去找寻正面人物，也可以了解高尔基在五十五年前的意见：“契诃夫的每一个新的短篇都越发加强了那种勇敢的和热爱生命的调子。”更可以同意别尔德尼柯夫的说法：“契诃夫是向前看的，他号召读者跟着自己走。”

契诃夫的创作道路跟所有伟大的作家的创作道路一样，

是不断地追求真理的道路。他越来越接近他所追求的东西，他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全部生活彻底改变的时代逼近了。在他去世前一年（一九〇三年），他对一个朋友（叶耳巴季也夫斯基）说："难道您没看见从上到下都动了吗？社会和工人都动了！……"那个朋友后来回忆道："他当时完全钻到政治里面去了。"就在这时候他写了他最后一个短篇《未婚妻》。在这篇小说里女主人公娜嘉终于摆脱了婚约的束缚，脱离了寄生和剥削的生活，勇敢地向着"宽广辽阔的新生活"走去。这篇小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的一个新的时期。可惜这只是一个开端，正如他那个朋友所说："这个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契诃夫不久就逝世了。"

契诃夫喜欢借他的主人公的嘴讲他自己的话。这些话里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的爱，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强的信心，例如《三姊妹》中的威尔什宁说："我们应当认识，天边已经在发亮了，整个光明的日子绝不会远了。"奥尔加说："幸福与和平会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来的。"《万尼亚舅舅》中的索尼雅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樱桃园》中的大学生说："整个俄罗斯是我们的一座花园。全世界都是伟大而美丽的。"安尼雅说："我们另外再去种起一座新的花园来，种得要比现在这一座还美丽。你会看得见它的。"像这样的话在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中不知道有多少。现在读到这些句子，我们还感觉到这个伟大作家的深厚的爱。

今天他的愿望已经开始实现了。他所预言的光辉美丽的

生活已经成了事实。他生前最亲近的人——他的妹妹和他的妻子也已经见到了他所梦想的“美好的花园和优秀出色的人”。在他所热爱的祖国，人们的确把生活完全改变了。

去年七月的一个上午，我参观大冈罗格契诃夫的故居。我站在白色小平房的窗外，望着钉在墙上的牌子：“安·巴·契诃夫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生在这里的小屋。”一群小学生鱼贯地走近小门去。我跟在他们后面。孩子们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用快乐的声音在讲话。在契诃夫诞生的时候，在契诃夫做孩子的时候，这所小屋里绝不会有这么多的孩子的快乐的声音。契诃夫自己愤慨地说过：“我小时候就没有过童年。”小学生们好奇地睁大眼睛在听讲解员的这样的解释。在一些孩子的眼光里，我看到多么深的同情和多么深的爱。这不是对契诃夫仁爱的心的最好的报酬么？

今天，契诃夫的故居小平房上一定已经压着雪，他所喜欢的屋前樱桃树，它们的枯枝上一定挂满了雪，那条林荫路也会被雪封住了。可是一定有不少的人踏着雪走来。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会把鲜花放在契诃夫的胸像座前，会把温暖和热爱带进契诃夫九十五年前在这里诞生的小屋。苏联人民不仅把契诃夫当作他们的光荣和骄傲，他们还像爱自己最亲近、最忠实的朋友那样地爱他。

1955年1月。

安东·契诃夫的生平*

——读书笔记

一八六〇年　一月二十九日(旧历十七日)安东·巴甫罗维奇·契诃夫生于罗士托夫省的大冈罗格。祖父叶哥尔·米海罗维奇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契尔特科夫将军)的农奴。叶哥尔早在农奴解放以前在一八四一年用每人七百卢布的代价向地主赎回了一家五口人的自由,可是还差七百卢布,不能把女儿亚历山德拉一起带走,后来还是地主免费放走了她。这一家人从伏若涅次省搬到南方。叶哥尔在普拉托夫伯爵的领地上当一名总管,这领地离大冈罗格不远。安东·契诃夫的父亲巴威尔是叶哥尔的第二个儿子,由父亲送到大冈罗格一家大商店学生意,后来在一八五七年自己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巴威尔在一八五四年十一月(旧历十月)跟叶夫格尼亚·雅科夫列夫娜·摩洛左娃结婚。叶夫格尼亚当时只有十九岁,是一个布商的女儿。她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安东是第三个儿子。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女人。她的儿女都爱她。

一八六八年(八岁)　安东进大冈罗格古典中学读书,念

---

* 本篇于收入《谈契诃夫》前未在报刊发表过。

预备班，第二年一八六九年升入第一班(即一年级)。当时公立中学的修学期一共是八年，可是安东在学校里念了十年，因为他在第三和第五学年年终考试不及格，共留级两年。安东在家少有温习功课的机会。他的父亲常常对他说："你还不如到店里去，守着那儿的事情。学学生意！"他只得含着眼泪，丢下功课，到他所讨厌的店里去了。常常在冬天的夜晚安东挨着冻看守铺子，偷暇做点功课，把手都冻僵了。

一八七六年(十六岁) 父亲巴威尔的商店倒闭了，他害怕坐牢，便带着全家人搬到莫斯科去(安东的大哥亚历山大和二哥尼可拉已经在莫斯科念书了：亚历山大念大学，尼可拉念绘画学校)，留下安东一个人在大冈罗格修完古典中学的课程。

父亲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个差使，可是他没法接济安东。从这一年起安东得自寻生路，靠教家馆来维持自己的求学生活。

一八七九年(十九岁) 安东·契诃夫在古典中学毕业后，八月到莫斯科和家人团聚，考进了莫斯科大学医科。

一八八〇年(二十岁) 三月出版的《蜻蜓》上发表了安东·契诃夫的第一篇文章：《顿河地主司节潘·弗拉及米洛维奇·伊给有学问的友邻弗利特里黑的信》(后来改称《给有学问的邻人的信》)。

父亲的收入不能够养活全家，安东不得不设法替父亲分担一部分的责任。他开始写起文章来。从这一年一直到一八八四年他经常用各种不同的笔名如安·契一节，安契，安特·契洪节，安多夏·契洪节，我哥哥的哥哥，没有脾脏的人等给

《蜻蜓》、《闹钟》、《断片》、《观众》、《蟋蟀》等幽默刊物投稿。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有《小公务员的死》、《胖子和瘦子》、《勋章》、《外科医术》、《变色龙》、《假面具》等等。

一八八四年(二十四岁) 大学毕业考试五月考完。六月署名阿·契洪节的短篇故事集《梅尔帕米纳① 的故事》出版,这是安东·契诃夫的第一本小说集。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就到莫斯科附近一个小镇渥斯克列辛斯克(即现在的伊斯特拉)去过夏天,他的弟弟伊凡正在那个地方当教员。同时他开始担任了医生的工作。他在这里的地方医院和离渥斯克列辛斯克十五里光景的兹威尼哥洛德医院里服务了一个时期。他得在医院里照料病人,到外面去验尸,出席法庭当医务鉴定人。这些职务帮助他直接接触到小乡镇的生活,使他得到一大堆短篇小说的丰富材料。

就在这一年他身上现出了显著的肺病的症象。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断片》的主编勒伊金说:“这三天里面血不断地从我的喉咙流出来。吐血妨碍我写作。”

一八八五年(二十五岁) 契诃夫一直想逃出那个埋没他的才能的幽默刊物的圈子,可是勒伊金始终把他抓得紧紧的。然而到这一年勒伊金终于不得不让步,把他介绍给《彼得堡日报》的老板和主笔苦德科夫,要他每星期一在《彼得堡日报》上发表一篇小说。“稿酬每行七个戈贝克。”

从这一年到一八八七年,每年夏天契诃夫都同着家人到

---

① 梅尔帕米纳:悲剧女神。

渥斯克列辛斯克附近的巴勃金诺去避暑。这两个地方对契诃夫有很大的影响：作家在文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成长的重要阶段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在这里培养了契诃夫对俄罗斯中部大自然的热爱，在这里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都在作家的眼前展开了：农民、地主、军官、乡村教师、医生和小公务员等等。契诃夫认识了当时住在这里的画家伊·伊·列维坦。他们的友谊继续了十几年，一直到列维坦去世。这一年年底契诃夫到当时的首都彼得堡去了一趟，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

一八八六年（二十六岁） 契诃夫的小说引起了著名小说家狄米特里·格里戈洛维奇的注意。三月格里戈洛维奇写了一封二十页的长信给这位二十六岁的小说家，说："您有真正的才能，那种为这一代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才能。我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可是我对文学的爱好还是十分热烈，我还是非常热心地注意文学方面的成就，我发见一点有生气的、有才能的东西就高兴得不得了，因此我忍不住要给您写这封信，伸出两只胳膊来拥抱您……"契诃夫谦虚地写信告诉朋友说："不用说，我很高兴，不过我总觉得他做得有点过份。"格里戈洛维奇还亲自去见当时彼得堡一家大报《新时代》的主笔和发行人A.C.苏瓦林，要苏瓦林邀请契诃夫经常为《新时代》写稿。从这时候起年纪比契诃夫大二十六岁的苏瓦林就成了小说家的朋友。苏瓦林尊敬契诃夫为一个天才的作家，他又是契诃夫的祖父和父亲的同乡，契诃夫的许多重要作品都发表在他的刊物上。可是由于苏瓦林的反动的政治观点，契诃夫后来终于跟苏瓦林断绝了关系。

五月契诃夫的第二本短篇集:《五颜六色的故事》出版。

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七年三年中间契诃夫在《彼得堡日报》和《新时代》上面发表了《马姓》、《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痛苦》、《苦恼》、《万加》、《弗罗嘉》、《幸福》、《卡希旦卡》等等小说。

一八八七年(二十七岁) 四月中旬契诃夫到故乡大冈罗格住了两个星期,继续到附近城市旅行,五月下旬回莫斯科。顿河草原上的旅行产生了他的杰作《草原》,这篇高尔基称为"发香的"小说是在第二年一月才动笔的。

第三本小说集《在黄昏》和第四本小说集《天真的话》在这一年里面先后出版。

契诃夫会见了小说家弗拉及米尔·柯洛连科。他写信给柯洛连科说:"我很高兴跟您认识了。第一,我非常钦佩而且喜爱您的才能……"

秋天契诃夫写完了"四幕正剧"《伊凡诺夫》,十二月一日由莫斯科科尔席剧院作第一次演出。

一八八八年(二十八岁) 契诃夫第一次在"大型"刊物《北方导报》上发表作品,就是那篇著名的《草原》(副标题是《旅行的故事》)。前辈小说家谢德林和三十三岁的小说家迦尔洵都很推崇它。现代批评家甚至赞美它为"描写祖国及其命运的壮丽的诗篇"(叶尔米洛夫)。迦尔洵在前一年发狂跳楼自杀,本年四月死在医院里面。契诃夫在《迦尔洵纪念文集》上发表了小说《发病》。他写信给朋友说"像故迦尔洵那样的人我是全心爱着的。"

十月他因《在黄昏》获得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金"。

第五本短篇集《短篇小说集》由苏瓦林在彼得堡刊行。

十二月契诃夫认识了伟大的作曲家彼得·柴科夫斯基。他在一封信里说："我真愿意整天整夜站在彼得·伊里奇住的房屋的大门口当仪仗队——我尊敬他到了这个地步。要是谈到等级，那么在俄罗斯艺术界中他占的位置是第二，第一位是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很早就占着第一个位置了。"

这年夏天契诃夫同他的全家到乌克兰去住了一个时期，他们住在哈尔科夫省苏米附近，就在风景如画的普宿尔河畔的鲁加。南俄美丽的大自然使他沉醉。他在这年五月写信给柯洛连科，邀请柯洛连科到乌克兰去，跟他一块儿过夏天，他说："大自然好极了，到处都很美……人也很好。"他写信给苏瓦林说："天气美极了。样样东西都在唱歌，都在开花，都露出美来。"

一八八九年（二十九岁） 二月十二日（旧历一月三十一日）《伊凡诺夫》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公演，得到成功。夏天契诃夫仍同家人去乌克兰，在友人林达里约夫一家的鲁加田庄上避暑。

六月底（旧历六月十七日）哥哥尼可拉在鲁加病故。契诃夫写信给友人说："可怜的艺术家死了。在鲁加他像蜡一样地溶掉了……我趁着大哥到来可以代替我的机会，想休息几天换一换空气；我约司瓦波金和林达里约夫一家人跟我一块儿到波尔塔瓦去访问西玛金家。……半路上下起大雨来了，我们在夜里赶到，又湿又冷……第二天早晨天气还是很坏。我一生都不会忘记那泥泞的路，灰暗的天，树上的泪珠；我说我不

会忘记，因为早晨从城里来了一个农人，他拿着一封打湿了的电报：尼可拉死了。你可以想到我的心情。”

十一月他的短篇《乏味的故事》在《北方导报》上发表。这篇关于老教授和少女卡嘉的故事后来被认为“俄罗斯文学的一篇优秀作品”。

“四幕喜剧”《木精》在匆忙中写成，交给前科尔席剧院演员沙罗夫左夫在莫斯科演出大失败。契诃夫把原稿锁在抽屉里，一八九八年才找出它来重写一遍，改名《万尼亚舅舅》。

一八九〇年（三十岁）　一月到三月契诃夫在莫斯科作旅行库页岛的准备。库页岛是一个“充满难忍受的苦难的地方”，沙皇时代的流刑地，契诃夫在动身之前阅读了各种关于库页岛的材料。他写信告诉人：“我整天坐着，读书，做笔记。脑子里和纸上就全是库页岛。”这次旅行非常艰苦。他的路线是这样的：从莫斯科坐火车到雅洛斯拉夫尔，从那里坐船到柏尔姆，然后坐火车到久敏；从久敏坐马车到贝加尔湖，坐船过了湖再坐马车到斯列井斯克，然后坐船沿黑龙江到尼古拉耶夫斯克，最后到库页岛。当时契诃夫的肺病并没有完全好，他在动身以前还吐过血，可是他还是毫不迟疑地认真完成了他的计划，因为他早在一八八八年一月就说过：“文学家不是糖果制造者，不是美容师，不是解闷人，而是被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所约束着的人。”

契诃夫四月底从莫斯科动身，在路上写了一篇《寄自西伯利亚》。他沿途看到祖国的雄伟壮美的风景，很兴奋地写信回家说：“我的上帝，俄罗斯好人真多啊！”他七月中旬到达库页

岛，在那里住到十月中旬，然后坐船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回国。从香港到新加坡的途中船上病死了两个人，举行了海葬。他把海葬的场面写进了他的小说《古谢夫》，《古谢夫》是他回国以后脱稿、在《新时代》上面发表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旧历十二月九日）契诃夫回到了莫斯科，当天写信给苏瓦林说："我在库页岛住了……三个月零两天。"在那个期间他走遍了全岛，他在信上说："在库页岛找不到一个没有跟我谈过话的流刑犯或苦役犯。"

一八九一年（三十一岁） 契诃夫三月出国旅行，游历西欧，先后到过维也纳、威尼斯、佛罗棱斯、罗马、拿波里、尼斯、巴黎等地。他远离祖国，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他跟祖国和人民中间的联系。他在罗马写过这样的话："我们都是人民，所有我们做的最好的事全是人民的事业。"他虽然喜欢风景美丽的意大利，他虽然关心西欧的文化艺术上的成就，可是他也很厌恶西欧资产阶级的庸俗。他因此更想念祖国，他写信给妹妹说："我要回家了。我想写作。"

五月契诃夫回到俄国，开始写他那本关于流刑地的书《库页岛》（到一八九三年夏天写完），同时他还在写别的东西。他在一封信里说："星期一、二、三我写库页岛的书，其余的日子（星期天除外）我写长篇小说，星期天我写小故事。"长篇没有写成，大概作者不久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不过他写了中篇小说《决斗》。

一八九二年（三十二岁） 在上一年俄国许多省份发生了大饥荒。契诃夫很热心地参加救济的工作。本年初他到尼日

尼一诺伏哥洛德和伏若涅次去帮助灾民，他还筹款为灾民解决牲畜的问题。

二月他在莫斯科省、谢尔布何夫县、梅里霍伏村买了一个小小的田庄，三月全家搬到那里去了。这次搬到梅里霍伏固然是为了契诃夫的健康。可是契诃夫自己一直想着参加社会活动和到人民中间去生活。在搬家以前他写信说："如果说我是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说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生活在小德米特洛夫加①。我需要一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即使一点点也好。"

契诃夫到了梅里霍伏，马上就替乡下人治病。夏天他还接受邀请参加谢尔布何夫县的扑灭霍乱病的工作，他管二十五个村子、四个工厂和一个寺院。他说："我到所有那些村子去，而且发表了演说……"

契诃夫在梅里霍伏一直住到一八九九年。这中间他也曾到过莫斯科、彼得堡和雅尔达，还出国去休养过。梅里霍伏的时期（一共七年零几个月）是契诃夫的精神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的创作力开花的时期。克妮碧尔后来说："作为作家，契诃夫在梅里霍伏找到了观察生活的巨大泉源。这泉源使他在创作上不断地得到营养。"

他的重要作品之一《六号病房》在这一年写成，在《俄罗斯思想》十一月号上发表。这篇被称为"惊心动魄的"小说是库页岛旅行的一个收获。这是对于专制、黑暗的沙皇统治的最

① 小德米特洛夫加：在莫斯科。契诃夫从库页岛回来以后就住在这里，现在改名契诃夫大街。

露骨的抗议。从这时候起他跟一天一天趋向反动的《新时代》断绝关系了。

一八九三年（三十三岁） 在梅里霍伏，契诃夫除了参加医务工作外，还热心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并从事人民教育的工作。几年中间他在梅里霍伏、诺伏谢尔克、达列什等村子创办了几所学校：他亲自设计，亲自买材料，亲自监工。农民对他表示了真诚的谢意。

他在夏天完成了他的《库页岛》，在《俄罗斯思想》十月号上开始连载。这一年他还写了小说《无名氏的故事》和《大小弗罗嘉》。

一八九四年（三十四岁） 从去年冬天起他的健康又恶化了。他曾写信给苏瓦林说："我的咳嗽厉害起来了。"三月中旬他听从医生的劝告到克里米亚去休养。九月他出国休养，先后游历了维也纳、威尼斯、米兰、尼斯、巴黎等处，十月下旬回到莫斯科。

契诃夫在尼斯住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在那里他写了他的中篇小说《三年》的一部分。《三年》就在这一年里脱稿，发表在下一年一月号的《俄罗斯思想》上面。

一八九五年（三十五岁） 六月《库页岛》单行本出版。八月到亚斯那雅·波立阿那去拜访列夫·托尔斯泰，在那里住了一天半。这是两个大作家的第一次会见。契诃夫后来写信给友人谈这件事，他说："印象很好。我觉得很痛快，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跟列·尼·① 谈话也很痛快。"可是从亚斯

① 列·尼·：即 L.托尔斯泰。

那雅·波立阿那回来，他却开始写那篇反对托尔斯泰人生观的小说《有阁楼的房屋》。这是契诃夫的一篇“最精彩的作品”。小说里的主人公说：“人给一盘大练子缠得紧紧的，你不去弄断练子，却只顾替它加上新的环去。”

契诃夫又从事剧本的创作，十二月初在梅里霍伏完成了“四幕喜剧”《海鸥》的初稿，带到莫斯科去读给朋友们听。

一八九六年（三十六岁） 一月中旬契诃夫去彼得堡，交涉《海鸥》上演的事。从彼得堡回来，在二月下旬他又去拜访托尔斯泰。他写信告诉柯洛连科：“我同他愉快地过了两个钟点。”这次拜访的结果产生了中篇小说《我的生活》。在这小说中契诃夫写出了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拿来实行的人的悲剧。

秋天，契诃夫在剧本《海鸥》经检查官审查通过以后，便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去作短期的休假旅行。

十月底（旧历十月十七日）《海鸥》在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演出，“第一场就遭遇了惨败。”戏刚演完，契诃夫便离开了剧院。他在日记里写着“我的确逃出了戏院，不过我是在戏演完了才逃走的。”他对朋友说：“我在街上走来走去，我就不能把这次演出从心上丢开。”第二天上午他就一个人动身回梅里霍伏去了。在动身之前他留下一封信给他的妹妹说：“我就动身回梅里霍伏；……昨天晚上那回事情并没有叫我吃惊，也没有使我十分难过，我在排演时候就料到了——我并不觉得过于狼狈……”

一八九七年（三十七岁） 契诃夫的肺病又转厉害了。一月俄国进行全国户口调查，契诃夫不顾他的病也参加了谢尔

布何夫县的农民户口调查工作。在工作进行中他更看清楚了农民的痛苦。他写信给友人说："……在我们县里每一千个儿童中间只有四百个活到五岁，在乡村里，在工厂内，在我们城镇的背街小巷中，你就找不到一个健康的女人。"

二月中托尔斯泰的信从者契尔特科夫（契诃夫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契尔特科夫的祖父的农奴）的住宅被警察搜查，他印发的同情杜诃波尔教徒①的小册子被没收，本人受到驱逐出国的处分。契诃夫写信给朋友说，他懊恼自己不能够到彼得堡送契尔特科夫坐船去伦敦。他还说："我对契尔特科夫没有感情，可是他们那样对待他，使我的血沸腾。"

小说《农民》发表在《俄罗斯思想》四月号上。这篇小说写出了当时农村生活的阴暗面。检查官坚持要删除一整页的文字，还恐吓说要逮捕作者。

四月初契诃夫的肺病加重，吐了不少的血。六日他住进阿斯特鲁莫夫教授的医院。九日托尔斯泰到医院去探病。四月十三日契诃夫写信给外面的朋友说："《六号病房》的作者已经从十六号病房移到十四号了。这是一间很宽敞的屋子，有两堵窗；有煤气灯，还有三张桌子。咯血很少。在托尔斯泰和我在一块儿（我们谈了很久）过的那个晚上以后，早晨四点钟又厉害地吐起血来了。"他的病还没有好，却在四月二十二日出院了。

九月契诃夫出国养病，到过比亚利斯、巴黎、尼斯等地。

---

① 杜诃波尔教徒：旧俄基督教派中信奉共产主义的一派，因拒服兵役，备受政府迫害，后得托尔斯泰的帮助，移往加拿大。

他常常在寄回国内的信函中诉苦，说他远离了祖国就不能够创作。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许多主题在我的脑子里生锈了。我很想写，可是离开家写作，简直是罚苦工，就像用别人的缝纫机缝衣服一样。"

他发表了"四幕乡村生活即景剧"《万尼亚舅舅》。《海鸥》失败以后他说过几次：以后决不再写戏了，可是过了一年他又完成了这部辉煌的杰作。

一八九八年（三十八岁） 一月契诃夫在尼斯读到法国小说家左拉写给法国总统的那封著名的公开信：《我控告》，很受感动。他说："左拉是一个心灵崇高的人，他的战斗使我非常高兴。"他写信给另一个朋友说："我们唯一的谈话题目是左拉和德列非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左拉一边，相信德列非斯是无罪的。"苏瓦林和《新时代》对"德列非斯案"① 的态度引起契诃夫的反感，甚至激怒了他。他一再地说："《新时代》只叫人厌恶。""《新时代》在左拉案中的态度很可恶，不过我还是跟老头子② 写了几封信谈这件事，语气很温和，后来两方面

---

① "德列非斯案"：此案的主角阿柏尔·德列非斯上尉是一个法国籍的犹太军官，在法国参谋部供职，被控告出卖军事秘密给德国人。军事法庭依据伪造的证件，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判决德列非斯终身监禁罪，流放在可怕的魔岛上。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因比加上校的检举，伪造证件的艾司德拉齐少校出庭受审，结果判决无罪。左拉便发表公开信控告参谋部和陆军部渎职。可是公开信发表以后，左拉反倒因此受审判，一共审讯了十七天，终于在二月二十三日以诽谤罪被判处徒刑一年。左拉一度逃亡到伦敦，继续战斗。德列非斯案在一八九九年重审，一九〇六年平反冤狱，德列非斯被判无罪，恢复了军职。

② 老头子：指苏瓦林。

都沉默了。我不想给他写信，也不想收到他的信……”契诃夫早已不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从这个时候起他跟苏瓦林也疏远了。

五月契诃夫回到梅里霍伏，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办人之一、杰出的导演聂米诺维奇—丹青柯来信，接洽上演《海鸥》的事。契诃夫起初拒绝，可是丹青柯继续来信要求《海鸥》的上演权，契诃夫终于答应了。九月契诃夫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看《海鸥》的排演，认识了剧院的演员们，其中有女演员奥尔加·莱奥纳尔多夫娜·克妮碧尔。克妮碧尔回忆当时的印象说：“我们都被他的人格、他的单纯、他那种不会‘教’、不会‘指示’的稀有的敏锐魔力所迷住。我们在他面前不知道怎样说话，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望着我们的时候，有时微笑着，有时忽然又摆出一副极严肃的神气，有时又显得很局促，可是老是把夹鼻眼镜取下来，用手捏着他的小下髯。……”① 她没有想到三年以后她就做了他的妻子。

契诃夫在莫斯科住了五天左右，就动身去雅尔达，准备在那里长住，这是遵照医生的嘱咐决定的。他那病弱的身体忍受不了莫斯科的冬天。他正在计划购买地基修建房屋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因割治疝气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契诃夫写信告诉妹妹：“我觉得父亲死了以后梅里霍伏的生活再不会像从前那样了……”妹妹玛利亚十一月上旬去雅尔达，契诃夫一见面就告诉她：“我已经买了一块地。”

---

① 借用焦菊隐的译文：《文艺·戏剧·生活》(丹青柯著)。下同。

十一月契诃夫接到署名“阿·贝西科夫”的作家从尼日尼一诺伏哥洛德写来的信，这是他和高尔基通信的开始。

十二月二十九日《海鸥》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公演，“大成功。”第二天契诃夫在雅尔达收到了从各方面拍来的贺电。

这一年里他写了《装在套子里的人》、《亲爱的》、《姚尼奇》等小说。托尔斯泰很喜欢《亲爱的》，还发表了赞美的文章。

一八九九年（三十九岁） 一月彼得堡大出版商阿·玛克斯写信到雅尔达，要求购买契诃夫著作的出版权。谈判结果，契诃夫以七万五千卢布的代价把全部著作的出版权让给了玛克斯，后来因此发生许多麻烦。他的妹妹写信劝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契诃夫需要这笔钱在雅尔达修建别墅，并且安排以后的生活。

三月三十日高尔基到雅尔达拜访契诃夫，这是他们第一次的会见。高尔基在雅尔达住了三个星期，差不多天天跟契诃夫见面。高尔基回到尼日尼一诺伏哥洛德以后写信给契诃夫说：“跟您见面，在我真是太快乐了。”契诃夫也写信告诉人：“高尔基外貌像一个流浪人，可是内心却是一个高尚的人——我非常高兴。”他告诉妹妹：“高尔基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人。”高尔基成了契诃夫最后几年中间文学与生活两方面的一个知己朋友。

高尔基离开雅尔达以后，契诃夫也就动身去莫斯科。他本来想为他的母亲和妹妹在莫斯科买一所房屋，可是他已经没有足够的钱了。他说：“倘使我买一所房屋，我就空无所有了——没有著作，没有钱。”因此他不得不卖去梅里霍伏的产

业，把整个家搬到雅尔达去。

克妮碧尔到梅里霍伏去住了三天。接着她到高加索去度假期。契诃夫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六月给她寄出第一封信："作家给忘掉了——啊，多可怕，多残忍，多不讲信用！"克妮碧尔马上写了回信，答应将来回莫斯科时到克里米亚去看他。八月他们一块儿回到莫斯科。契诃夫到莫斯科去看《万尼亚舅舅》的排演，可是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就因病回雅尔达去了。

十一月七日《万尼亚舅舅》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公演，成绩很好。

高尔基来信替《生活》杂志拉稿。十二月契诃夫把他新写成的中篇小说《在峡谷里》寄去，在《生活》一九〇〇年一月号上发表。这是他的一篇非常出色的作品。《带狗的女人》也是在这一年写成的。

一九〇〇年（四十岁） 一月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柯洛连科同时由科学院新成立的文学部选为荣誉院士。

三月契诃夫邀请高尔基到雅尔达游历。他在信里说："艺术剧院定四月十日至十五日（旧历）在塞瓦斯托波尔、十六日到二十一日在雅尔达公演，剧目有《万尼亚舅舅》、《海鸥》……请您务必来吧。您应该更多地接近剧场，为了写戏而多加观察。"①

契诃夫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看过《万尼亚舅舅》的演出。艺

① 借用适夷译文：《契诃夫—高尔基通信集》。

术剧院在雅尔达公演结束，旧历四月二十二日(公历五月四日)还专门举行一个“文学晚会”为契诃夫创办的肺病疗养院募集基金。

五月下旬契诃夫和友人高尔基等同游高加索。

夏天和秋天契诃夫为艺术剧院写“四幕正剧”《三姊妹》。他给克妮碧尔写信说：“我正在动手写的这本戏，早晚我会把它写完的——也许在九月也许在十月，或者甚至在十一月。”他写《三姊妹》从八月写到十月，病和客人常常打断他的写作。可是他终于在十月下旬写完了它，自己把原稿带到莫斯科去。他没有等到《三姊妹》在莫斯科公演(他认为导演和演员都不了解这个戏)，就因健康的关系在十二月下旬出国休养去了。

一九〇一年(四十一岁)　二月初契诃夫到意大利旅行，本来要去拿波里，后来因气候突然变冷改变了日程。莫斯科艺术剧院给他拍了一个电报到拿波里，告诉他《三姊妹》的成功(《三姊妹》于二月十二日在莫斯科首次公演)，可是他没有收到。他一直耽心着这个戏会失败。他害怕听见人谈起它。他以为《三姊妹》真的失败了。事实上正如丹青柯所说：“《三姊妹》因为优美的整体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精美的导演设计，成为艺术剧院最好的演出。”

二月底契诃夫回到雅尔达。四月上旬克妮碧尔到雅尔达来看他，住了半个多月。

六月七日契诃夫和克妮碧尔在莫斯科一个小礼拜堂里结婚，“完全没有举行公开仪式。”新婚夫妇开始蜜月旅行，先坐

火车到尼日尼一诺伏哥洛德，拜访当时正受到“室内监禁”处分的高尔基，然后坐船到乌发，再坐马车到阿克谢诺伏疗养院。

高尔基得到内政部的许可住到克里米亚来了。十一月下旬高尔基到雅尔达，在契诃夫家里住了几天就搬到阿列斯去。契诃夫写信给克妮碧尔说：“阿·玛·来了，住在我家中，身体很好，到后报告了警察局，今天警长来了。”在高尔基来雅尔达的前十天，契诃夫曾到加斯卜拉去访问当时在那里养病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夫人苏菲亚在日记里写着：“契诃夫到了这里，我们全家都喜欢他的诚朴。他在精神上像是跟我们很接近。他那可怕的病（肺病）已经在他身上留下显著的痕迹了。”高尔基到后，契诃夫又和高尔基一块儿去看托尔斯泰。十二月十九日托尔斯泰打电话给契诃夫说：“我今天很快乐，因此我希望你也快乐。特别是你。你是这么一个好人——这么一个很好的人！”

从一八九九年开始出版的契诃夫自己编选的第一套全集（十卷集）在这一年出齐了。

一九〇二年（四十二岁）　从去年十一月到本年五月这半年中间，契诃夫常常到加斯卜拉去拜访托尔斯泰。

去年年底契诃夫得到消息：高尔基当选为科学院文学部的荣誉院士。他马上把这个消息转告高尔基。可是本年三月下旬报上刊出了科学院撤消高尔基当选的决定。契诃夫写信给柯洛连科，邀请他来雅尔达商量共同辞去院士的事情。柯洛连科六月来雅尔达，同意了采取共同行动，两个人都向科学院

辞去荣誉院士的头衔。契诃夫给科学院的信是九月七日发出的。文学部的另一个荣誉院士托尔斯泰告诉契诃夫说："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一个院士，"因此他不去管这种事情。

这一年克妮碧尔患病三次。她起先在莫斯科医院里施行手术。四月下旬回到雅尔达，她的病又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契诃夫家的饭厅做了病人的寝室，契诃夫像一个最负责的护士那样看护她。"六月上旬柯洛连科来访后的第二天，契诃夫陪他的妻子同去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克妮碧尔的病又发了，而且很厉害。契诃夫早晚都不离开她的病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契诃夫在妻子的病中变得很瘦、很弱了。"六月底契诃夫才离开莫斯科，到艺术剧院的赞助人莫洛左夫的别墅去。他在那里认识了大学生亚·吉和诺夫。

吉和诺夫后来成了作家，他曾经痛苦地回忆过当时的情景：

吉和诺夫睡在契诃夫的隔壁的房间里。他听见了契诃夫的用手帕蒙嘴的咳声，咳得很久。半夜他被雷声惊醒了，电光照亮了他的房间。从契诃夫的房里送过来一声拖长的呻吟。吉和诺夫跳下床来，侧耳倾听，又听见契诃夫的呻吟。他以为契诃夫快要死了，便赤着脚，跑到契诃夫的睡房，打开门，床前一张小桌上燃着一枝正在淌烛油的蜡烛，契诃夫躺在床上，扭着上半身，脸俯在床边咳嗽。他咳得很厉害，每咳一次，浑身都抖动，血从他那大张的嘴里吐出来，吐到蓝色搪瓷痰盂里去。

"安东·巴甫罗维奇！"吉和诺夫唤了两次，契诃夫才睡下

来，把头放到枕上。

"我很抱歉，朋友，我——我——"契诃夫忍住咳嗽，透不过气似地答道，一面揩着胡须上的血。雷声掩盖了他以后的话，吉和诺夫只看见契诃夫的嘴唇在他的黏了血的唇须下面无声地动着。

契诃夫一步一步地逼近死亡。可是他一直坚持着跟死亡斗争。他回到雅尔达以后，还是照常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上午在书房里读报写信，下午接待客人。小说家亚·库普林仍然是一个常客。

十月二十六日他又去莫斯科住了六个星期。

年底他续写他在这年春天开始的最后一个短篇《未婚妻》，但是三个多月以后他才写完了它。这是一篇充满希望、绘出光明前途的小说。叶尔巴季耶夫斯基说："这篇作品发出了对契诃夫说来是新的声音。"①

一九〇三年（四十三岁） 二月他开始写他的最后一个戏《樱桃园》。他的病妨碍他写作。他写信告诉朋友："我一天写四行，就是这样我也感到难熬的痛苦。"

他写完了《未婚妻》，在这小说里他预言将来"会有富丽堂皇的大楼，美好的花园……还有出色的人，……到那时候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活着……只求那种光明的新生活快点来才好……"② 后来在看校样时他又把它改写了一次。

---

① 借用陈冰夷的译文：《契诃夫》（叶尔米洛夫著）。

② 后面两句借用汝龙的译文：《新娘集》。

五月契诃夫到莫斯科。他从玛克斯那里拿来的那笔钱已经花光，他日后生活的保证也没有了。七月底契诃夫夫妇回到雅尔达。契诃夫接着续写《樱桃园》，到九月底克妮碧尔回莫斯科时，剧本尚未脱稿。十月下旬他写信给丹青柯说："好了，终于我和你的忍耐得到胜利了。戏写完了，整个写完了……"

"后来他又把这一篇最后杰作，这一首最精彩的诗，略略更动了一点，"（丹青柯这样说。）这是俄罗斯最后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大师的最后一篇作品。

"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万岁！"从契诃夫的垂死的身体中发出来这么响亮的欢乐的声音。

一九〇四年（四十四岁）　一月，契诃夫的生日的晚上，他的"四幕喜剧"《樱桃园》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首次公演。这一场演出也算是庆祝契诃夫文学活动的二十五周年。这一个晚上照丹青柯的说法："莫斯科全文艺界、戏剧界，……都集在剧场里向他们爱戴的作家致敬。我们打电话给契诃夫，要他来。最初劝不动他……"后来契诃夫还是由演员维席涅夫斯基跑去拉来了，那时候戏已演到了一半多。第三幕闭幕以后观众向剧作者祝贺。"契诃夫站在舞台上显得又高又瘦，找不到一个地方放他的手。"①献给他的祝词都是很恳切、动人的。丹青柯代表剧院向他说：

"我们的剧院必须感谢你的天才，你的温柔心肠，和你的纯洁灵魂，我们受你的恩惠的程度之深，竟可以使你就说：'这

① 根据作家司基达列次的描写。

是我的剧院，是契诃夫剧院'。"

三月初契诃夫最后一次回到雅尔达，在那里住到五月中旬，替报刊看了不少的稿子，也接待了不少的客人。

五月中旬契诃夫到莫斯科。他本来打算去莫斯科乡下过夏天，可是他一到莫斯科就不能起床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他还替《俄罗斯思想》文学部看新作家的来稿。六月十六日克妮碧尔陪他到德国巴登维勒尔去疗养。

七月十六日（旧历七月三日）丹青柯接到克妮碧尔一契诃娃的电报：

> "巴登维勒尔，十五日八点十二分。安东·巴甫罗维奇突因心脏衰弱症病故。奥尔加·契诃娃。"

八点十二分是发电报的时间。契诃夫是在上午三点病故的。

七月二十二日契诃夫的灵柩运到莫斯科，安葬在新圣女修道院内，他父亲的遗体也埋在这里，这是他生前常去的地方。

1955年3月。

大欢乐的日子

《大欢乐的日子》，一九五七年三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

一提起笔，我就好像看见你们的充满朝气的脸，发光的眼睛和响亮的、快乐的声音。亲爱的青年同志们，你们是新中国的希望，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根支柱。我想到你们几年来在各个战线上、在各个岗位上对祖国的贡献，我想到从你们中间不断地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就没法制止我的感激和敬爱。我想到你们，就增加了我前进的勇气和信心。这几年来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沙漠到高原，从农村到工厂，从草原到森林，从高山到雪地，从边疆到海防，哪一个地方没有你们的踪迹？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你们，只要是有你们的地方，就有快乐的歌声。你们用青年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劳动给祖国的河山增添了多少美丽，给我们的国家增添了多少财富，给我们的时代增添了多少光彩！你们中间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教育了千千万万的人。全国人民因为有你们而感到无限骄傲，祖国的建设计划因为有你们更得到充分的保证。今天你们已经是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新民报晚刊》。发表时题为《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发射夺目的光芒》。

可缺少的力量了。

你们是幸福的，因为你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多么羡慕你们：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不是白白地浪费了生命，就是横遭摧残、憔悴死去，或者关在黑暗的监牢里受尽苦刑，或者为革命奋斗一生，却等不到看见胜利就英勇牺牲，还有一些人一直摸索到今天才见到光明。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可以说是多数都不曾有过青春。你们却得到国家的培养和爱护，你们却有充分发挥智力和才能的机会。你们可以去到需要你们的地方，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在锻炼中不断地成长。祖国的富饶的土地和美丽的山川在你们的眼前展开，等待你们去献出你们的智慧、你们的劳动和你们青春的力量。每一项改变祖国面貌的建设都需要你们。

两个多月以前，我接到南通女子师范幼儿师范科首届毕业生的来信，一百八十二位"将要走向生活"的同学在信里说："我们渴望着为祖国效劳，为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一块砖瓦，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块坚强的小石子，铺在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上，我们热望着走向生活，走向这充满了劳动、斗争，充满了欢笑和愉快的生活。……我们会勇敢而愉快地走向祖国召唤的地方。"

这以后不到一个月，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消息公布的时候，我收到北京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寄来的信。他们说："我们是学习电机、无线电、土木、水利和动力机械的学生，就要作为祖国工业建设的干部而投身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紧张的时刻（第三个年头）的建设中去，我们内心非常激动。……我们年

轻人要勇于克服困难，攻克科学堡垒，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

这都是多么响亮的声音，多么伟大的抱负！

不用说，这并不单是一百八十二位女青年的“坚决为幼教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书，也不单是六百多个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庄严的誓言，这是成千成万准备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年轻人的不可动摇的意志。而且每年都有无数这样的年轻人走上工作岗位，每年都有无数年轻的工作者在工作岗位上有了卓越的成就，得到了光荣的称号。你们已经给全国青年，给全国在校的大中学生立下了很好的榜样了。全国各地报纸上哪一天没有关于你们的记载？哪一个读者没有见到那些连续不断的激动人心的文章！在朝鲜的志愿军青年英雄时时刻刻在为祖国忍受最大的艰苦，在海防前线的解放军青年战士为祖国的安全献出了最大的力量。在戈壁滩上“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的年轻的石油普查队员愉快地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用勇敢迎接困难，用愉快送走困难。……我们将努力去完成任务。”两年多中间由于密切联系群众在上海查出了五十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户籍警马人俊同志热情地对记者说：“我愈来愈爱自己的工作……人民把生命、财产交给我们保护，对我们是最大的荣誉，最高的奖赏。”发明水箱散热片自动联合机、把工作效率提高三十五倍以上的青工陈修林同志，为了他的这个创造花费了九个多月的心血，他曾经病倒，但是在病中仍然在考虑他的“创造”，经过几次失败，他并不灰心。成功以后他公开说：“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同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又说：“我一个人绝不可能发明水箱散热片自动联合机，这是靠

了大家的力量。”他保证要更好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为国家节省了不少财富的裔式娟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保证:“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为祖国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例子是举不完的。只要不是聋子，谁都会听见这种使得地动山摇的英雄的声音。全国的优秀青年正以齐整的英雄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大踏步地前进。正像裔式娟同志所说的“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贡献出一切力量”,你们的确很好地利用了你们的青春了。

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召开，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会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不久召开，更有重大的意义。一千五百位青年英雄模范的大会师，一千五百位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大集会,对全国青年,对全国人民都将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这一股铁流般的巨大的新生力量，让全国青年看清楚这许多值得学习的光辉的榜样。亲爱的青年同志们，让你们的模范事迹传遍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让你们创造的工作经验推广到全国,让你们的献身精神鼓舞全国青年、全国人民一同前进。全国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大会的会场，没有一颗心不在热切地希望大会的成功，因为你们的胜利是和祖国的前途分不开的。我的心也在为你们未来的更大的胜利激动。在大会召开的前夕，请接受我的诚恳的热烈的祝贺。

我为你们过去许多辉煌的成就欢呼过。但是我相信你们是不会以过去的成就为满足的，而且祖国需要你们献出更大

的力量。你们一定听见了祖国的召唤。通过这次的大会，你们一定会更进一步发挥中国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你们会带动全国青年创造更多的英雄事迹，勇敢地克服更大的困难，更虚心地学习各种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艺术，更深切地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爱惜祖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更坚决地打击国内外的敌人，保卫祖国的建设，更紧密地把全国青年团结在一起，团结成一个无比强大的力量；全心全意投身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去。我今天刚听见从你们中间发出来的雄伟的声音："我们不单是做一次、做一年的积极分子，我们要做一生一世的积极分子！"你们说得多么好！全国人民相信你们，热爱你们，支持你们。让每个人的青春都开放美丽的花朵，发射夺目的光芒。让祖国的各项大建设、大工程、大计划里都有你们的心血，让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里有你们的面貌，让社会主义的美丽的远景早日变为现实，让全国人民念着你们的亲爱的名字。那么，你们为祖国建设所经历的一切辛苦，所遭遇的一切困难，所贡献的一切劳动都会在祖国的光芒万丈的前途中得到极大的报酬了。

1955年9月。

充满敬意的祝贺*

听见人们用兴奋愉快的调子谈起就要到来的我们的节日，听见人们欢欣鼓舞地谈起六年来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辉煌的成就，我就想到一年一度的全国欢腾的景象。亲爱的教师同志们，你们一定会听见一年比一年更响亮的幸福的歌声和笑声。这些声音一定会使你们感动，给你们安慰和鼓舞。你们应当比别人更懂得这些声音的意义，因为这些幸福的声音里有你们，全国人民的幸福里有你们。多少年来你们在教室里说干了嘴唇，费尽了心思，为着青年学生熬过了多少漫长的夜晚，贯注了多少的关切和爱护。你们使多少年轻的心灵得到发育，你们让多少文盲的孩子见到光明。你们愿意把你们所知道的一切，把使你们的心激动的，你们所认为最美丽、最崇高的东西，完全交付给那些需要阳光和雨露的年轻的心灵。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所作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新中国有这么多的值得夸耀的好青年，不能说不是你们的成绩。千千万万的年轻人怀着感激在思念你们，把你们当作他们最亲近的人。每一个年轻人都因为有两三个这样最亲近的人，而更能发挥青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文汇报》。

的力量。好比一棵树，它能够长成，能够开花结果，得感谢最初给它浇水、添泥的园丁；好比一只鸟，它要养到羽毛丰满、学会飞翔，才能够飞向天空，年轻人也需要教给他们各种知识、帮助他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的教师。在你们谦虚的心中，你们也许早已忘记了你们给过年轻人多大的助力，但是在今天还有不少的人想起过去从你们那里得到的一切，特别是在他们感到幸福的时候，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最亲近的人。我在我们第六个国庆节的前夕，也充满感激地怀念那些给过我温暖、帮助过我的智力发展的教师，我希望他们接受我衷心的祝贺。我不过是无数的人中间的一个：我们为自己感谢教师，也为我们的孩子感谢教师，新中国的年轻的一代正由你们在培养，你们不会忘记国家交给你们的这个神圣的任务。

过去有多少热诚的教师在年轻人的灿烂的笑容中感到幸福，愿意为纯洁的年轻的心灵贡献出他们的一切。过去有多少忠诚的教师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自己鞠躬尽瘁地死去，或者在穷困中度过一生。他们所热爱的"平凡的工作"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过去有多少舍己为群的教师看见年轻学生横遭打击，不得不离开讲坛和年轻人站在一起参加改造社会的艰苦斗争。这些教师的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一代一代的青年送到生活中去，让年轻的力量来改变社会和国家的面貌，创造美好的生活。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就是自由、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有着强大工业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也是你们的理想，你们的目标。现在目标就在面前，理想已经变成现实。新中国

正以一种不可拦阻的巨大的力量走向社会主义。它的前进的声音里面有你们的脚步声，你们不但跟新中国一同前进，你们还在为新中国培养新生力量。你们有机会亲眼看见你们的平凡的工作产生辉煌的成绩，你们有机会亲眼看见你们送到生活中去的年轻人怎样起着巨大的作用。跟过去的教师比起来，你们是幸运多了。你们的工作关系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发展祖国的工业建设需要更多的人材，完成五年计划需要更多的干部。新中国公民的道德品质必须在初级学校里打下基础。饥饿的年轻的心等待着你们的食粮。你们在那些天真、发亮的年轻的眼睛里会看到多大的信赖，你们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本光彩夺目的大书里会找到多么切实可靠的路标。你们的每一滴心血都可以用在最适当的地方，你们克服困难的一切努力都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学生们的家长愿意诚心诚意地跟你们合作。全国各地英雄模范的光辉事迹正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你们绝不会忽略你们的职责，你们绝不会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不要说你们中间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在你们的平凡的工作里哪一个角落不发出耀眼的光芒！今天再不会有人在孤寂中摸索了，今天再不会有人把教师看作只可以勉强糊口的职业了。我仿佛看见你们站在年轻人的面前：亲切的笑容，诚恳的态度，充满热情的声音。你们热爱你们的工作，你们把教育青年看作神圣的事业。你们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就像守卫在国防前线的普通一兵；你们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

亲爱的教师同志们，倘使我这些话不算是过分的恭维，倘

使我真的说出了你们的平凡的工作和伟大的抱负，那么请接受一个新中国公民的充满敬意的祝贺。不仅作为公民，而且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都应当感谢你们为祖国所做过的事，和今后祖国需要你们做的更多的事，更好的事。我常常想，能够像你们那样把无数优秀的学生送到祖国的广大的土地，把无数未来的新生活的建设者送到各个工作岗位，让你们用心血所培养出来的美丽的青春花朵开遍祖国的原野，让祖国的河山充满着欣欣向荣的青春的朝气，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多么光荣的事情，多么值得人羡慕的事情！那么你们可以说为着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以后的五年计划尽到最大的努力了。我们都能够亲眼见到社会主义的太阳普照在新中国土地上的时候。到了那一天，全国人民会更加尊敬地唤着你们亲爱的名字。全国人民的普遍的幸福，新中国的光芒万丈的前途，这就是你们的最大的报酬！

1955年9月底。

大欢乐的日子*

辉煌的灯火映红了半个上海的天空。欢乐的歌声仿佛震摇了晴空的皓月。彩色的焰火像童话中冉冉下降的星星。幸福降落在人间，降落在中国，降落在上海。四十多万人在人民广场上欢欣地歌舞。六百几十万上海市民在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的节日。六万万中国人民在欢度这个伟大的节日。

今天生活在这个国土上的中国人能够在记忆中找到像这样的大欢乐的日子么？今天生活在中国的这个大都市上海的人能够在记忆中找到像这样的大欢乐的日子么？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数不尽、说不完的痛苦的回忆。一九二五年"公共租界"的外国巡捕向游行的市民开枪，中国人的血流在南京路上的时候，谁曾想到这样的一天？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帝国主义者以及流氓、恶霸勾结屠杀革命者的时候，谁曾想到这样的一天？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军队用大炮和炸弹毁坏中国民房、杀害和平居民的时候，谁曾想到这样的一天？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队攻占上海、把闸北和南市烧成一片焦土的时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文艺月报》十月号。

候，谁曾想到这样的一天？那些坐过“西牢”、进过“捕房”、在公园门口见过“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的人，那些听够“五分钟热度”和“一盘散沙”等等冷嘲热讽的人，那些受尽“三道头”和巡捕欺压的人，那些受够汉奸、流氓、恶霸的敲诈、剥削和欺凌的人，那些看够蒋介石特务横行、看够美军坐着吉普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的人，那些在白色恐怖下面憔悴呻吟的人，那些献出了青春、为祖国的前途奋斗、在监狱中受尽苦刑的人，他们跟勤苦耐劳、终身劳动的全国人民一样，盼望过这一天，相信过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所殷切盼望而没有敢想到它会实现的。这一天像空中彩虹一样地给过多少代的中国人民以希望、幻想和勇气……这一天终于来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灾祸和苦难以后，中国人民终于得到了这一天！只有今天的大欢乐，只有今天的响遍全国的幸福的歌声，才能够抵偿多少年来被奴役、受践踏的人民的辛酸的眼泪和痛苦的呻吟！

六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觉醒起来、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以不可阻挡的排山倒海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以我们的祖先所梦想不到的空前的速度，奔向社会主义的美丽的前途。六年来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辉煌成就不过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我们子孙万代的无限美好的未来，还要等待我们努力争取。我们要建设一个高度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还要走

较远的路程。但是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宽广的、光明灿烂的前进大道”。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既然依靠着团结的力量在几年中间做出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做不了的事情，那么在以后的几年和十几年的中间，不是会完成更多的惊天动地的“河清海晏”的事业么？

六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用接连着的一个一个的胜利来庆祝我们的国庆节。今年在国庆节的前夕，又正式公布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伟大的计划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的拥护。在我们国家的广大的土地上，只要是住人的地方，就有欢呼、赞美的声音，全国人民的手都在为它鼓掌，全国人民的心都在为它激动。它成了一盏指路的明灯，一座海上的灯塔，一支振奋人心的乐曲，一首万人传诵的诗篇。这一本包罗万象、光彩夺目的计划，不但总结了过去六年间的成就，它还绘出了未来幸福生活的蓝图。它不单是科学的图表，它还是“数字的音乐”，色彩鲜明的图画。它不单让我们看见烟囱林立的工厂、一望无际的棉田，它还把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轮船、汽车陈列在我们的眼前。它使我们看见波涛滚滚的长江上架起第一座行驶火车的大桥，它使我们看见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变成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良田万顷。它给我们绘出了用人力改变大自然面貌的壮观，它给我们唱出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雄壮的凯歌。

在今天的大欢乐的日子里，“五年计划”像太阳一样地照亮了我们的幸福生活，“五年计划”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地为我们的更幸福的前途射出万丈红光。在尽情欢笑中的六百几十

万上海市民，在尽情欢笑中的六万万中国人民，都从这个伟大的计划得到了鼓舞，听到了号召，都把它当作更可靠的幸福的保证，都准备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的确，人真正感到幸福的时候绝不会是自私的，他绝不会为自己保留什么。他毫无条件地献出了自己的一颗心。

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欢乐把六万万颗心团结得那么紧！难道还有一颗心愿意孤单地关在一个小地方！

在这个大欢乐的日子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感到自豪，因为今天全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声音都在为我们的成就欢呼。今天，有多少从远道来的各国的朋友们跟我们在一起欢度这个节日！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伸出友谊的手，打开友谊的心，让我们知道，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那么多的亲密的朋友！

焰火应当放得更多，歌声应当响得更高，灯火应当像朝霞一样把上海的夜空映照得更红。让我们尽情地欢笑！因为幸福已经降落在人间，降落在中国，降落在上海。

1955年10月1日在上海。

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

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的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他的母亲走过来望着他漆黑发亮的眼珠微笑。孩子的十岁的姐姐练好钢琴上楼来了，一进门就亲热地唤“妈妈”。母亲转过身去照料女儿，带着她到浴室去了。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过路的青年男女的快乐的歌声，歌声不高，但是我们在房里听得很清楚。孩子忽然笑了笑，说：“爸爸，明年我要读大班了。真开心啊。”我顺着他的口气说：“对，再过半年你就进幼儿园的大班了。”孩子不作声，仍然睁着眼睛，好像在想什么。后来他又在自言自语：“我睡觉，一百个人都睡觉，全世界都睡觉。”他翻个身，闭上了眼睛。过一会儿，我就听见他的轻微的均匀的呼吸声。

我走到隔壁书房里，在书桌前坐下来，拿起笔，忽然想到了孩子先前说的那些话，想到了我周围的一切，想到了就要到来的一九五六年，我觉得全身充满幸福的感觉。我很想用笔把这种感觉传染给大家，就像我的孩子把它传染给我那样。孩子平日喜欢说“全世界”，在他的小脑子里全世界究竟有多大，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文汇报》。

他也弄不清楚。他常常以为一百就是最大的数目。但有一件事情却是很明白的：他从不单单想自己一个人的事，他快乐的时候，也愿意大家都快乐。这正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愿望。我们愿望各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在迎接一九五六年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望和平与建设给全世界带来幸福和繁荣，愿望各国人民依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共同为我们的下一代安排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

人在幸福的时候愿意把他的快乐分给大家，这是人之常情，正像遭逢不幸的人需要向别人诉苦那样。今天各国人民都知道这几年来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还有许多人忽略了这一个事实：在新中国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我们的孩子更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不会了解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的沉痛的话："我小时候就没有童年。"他们也不会了解我们大家敬爱的鲁迅先生在将近四十年前发出的惊心动魄的呼吁："救救孩子！"然而那些话却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的孩子今天接触到的是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整个社会改变了，整个国家改变了。孩子们知道自己生活在爱中间。的确，不单是在家里，而且在学校里，在社会里孩子们都被爱包围着。"一切都为了下一代"，这种爱在孩子们的身上培养了许多新的东西。

"一切都为了下一代"，这不是标语或口号，这是新中国人民的最深的感情。连在朝鲜的坑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用铁锤和钎子在大山上打通出来的）中，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们也会把刊登孩子们照片的中国画报贴在石壁上，在下面写着：

“保卫我们的孩子”或者“一切都为了下一代”。他们每天进进出出都会看到天真活泼的中国孩子们的笑容。有一次一个战士指着照片对我说：“只要我能够给这些小脸上添一点笑容，吃多大的苦我也情愿。”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自愿离开农村、离开家、离开未婚妻到朝鲜来，在部队同志们中间过集体的生活。他小时候讨过饭，替地主放过牛，当过用人，挨够了打。解放军来了，他得到了自由，分到了地，有了自己一家人住的房屋。他看到自己亲手插秧的稻子在田里长得多茂盛，他吃着用自己收割的粮做出来的香喷喷的白饭。他多么热爱他这种生活。可是他离开了这一切来到战争中的朝鲜，因为他认为他应当这样做。他自己说，唯其他热爱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他愿意帮助朋友们过这种生活。春天他帮忙朝鲜农人耕地插秧，秋天帮忙收割。他看到朝鲜母亲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非常高兴，他从这个又联想到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笑容，更想到这些笑容里有他的份，他感到了安慰和骄傲，因此更增加了他的工作的勇气和热情。他初到朝鲜时还是一个字都不识的农村青年，过了三年他回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可以掌握现代化武器的英雄了。回到农村，他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拖拉机手。他的变化是可惊的，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奇迹。他经过了一段所谓“苦学苦练”的时间。像这样的年轻战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是很多的。你要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过一个时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精神面貌非常丰富。他们怕你受凉，会在半夜查哨时拿自己的棉大衣盖在你的被子上；在交通沟里听见炮弹打来，他们会把身体压在你身上保护你。他

们平日会小心翼翼地种一棵小花，养一只松鼠。可是到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身体去堵枪眼，像中国人民敬爱的英雄黄继光那样。他们把这种事情看得很平常，为着所爱的人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句话全世界的人都能够了解。可是我仍然得在这里加一个解释：新中国青年所爱的人并不单是他们的未婚夫、妻，他们的妻儿和父母，他们的爱已经扩大到所有同命运的同胞身上，而且扩大到了下一代的身上；新中国的青年已经习惯了不单是用言语，而且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感情。

对我们所说的"对下一代的爱"，可能有一些所谓实际的人不大了解。那么请允许我引一句法国著名作家让·保尔·萨特的话。他最近谈到"对新中国的观感"时说过："我们时常非常感动地看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下一代不仅会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他们还要来完成我们已经开始而来不及完成的事业。而且正因为有着下一代和以后的无穷的下一代来继续做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的努力才有结果。

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不过是一个例子，一个可以说明新中国人民的变化的例子。志愿军战士来自新中国人民中间，他们并不是特殊的人。那些习惯了把中国人形容成"只顾自己"、"一盘散沙"的民族的西方人一定会因为在志愿军战士的身上找不到一点符合那些形容词的东西吃惊。这是不足怪的。连那些从香港、台湾回到大陆来的中国人也会找不到他们熟悉的朋友了。思想感情的变化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外表。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也更容易衬托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改变。但事实上中国人民的变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些因为这种变化而感到吃惊的西方人其实从来就不认识中国人民的真正面目。我并不想编造历史把屈辱、痛苦的日子从我们的“过去”中抹去：在我们的公园门口曾经挂过“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的同胞为了在自己的大马路上游行必须用自己的血染红路面；我们要通过自己修建的桥必须向外国的守兵行礼。我们有多少代人在专制政治下面憔悴呻吟，有多少代人忍饿受寒，像牛马似地劳动，受苦，死亡。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新中国人民挣断了绑住他们双手的铁索，甩掉了压在他们背上的大石头站起来了。没有经历过那许多屈辱、痛苦的日子的人不会很好地了解“站起来了”的意义。倘使允许我用比喻来说明，我想举出希腊神话中那位给绑在高加索山一块岩石上的“取火者”普洛米修斯。普洛米修斯一旦被解放了，大家想想看，他会做出多少事情来！每个人一生中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他想望了多年的东西一旦到了手，他会一心一意地爱它，保护它。谁了解这种心情，他就会了解今天中国人民的心情。中国人民想望了多年的东西就是：解放，就是做自己的主人，种自己的地，在自己的工厂里劳动，和自己的同胞亲密地站在一起，用全部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在多少年的梦想变为现实之后，中国人民中间还有哪一个人能够不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国家，而且用全部力量来为它工作！

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有更深的体会。因为今天各方面的读

者都把作家当作知己朋友向他吐露他们最深的感情，要求他给他们提供意见。从全国各地流向作家书斋的无数信函都说明一个单纯的共同愿望：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在这个由各民族组成的六万万人民的大家庭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爱藏在心底，没有一个人甘心不献出他最好的东西，没有一个人不像赴宴会那样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这个和睦的大家庭里，哪一个成员没有责任感？哪一个成员没有荣誉心？特别是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他们说："我们会勇敢而愉快地走向祖国召唤的地方，走向最需要我们的地方。"说过这种话以后，他们当真愉快地走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了。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以祝贺和鼓励。他们的确带走了不单是我的而且是全国人民的祝贺和鼓励。也许有人把这种祝贺和鼓励当作无用的空话，但是对于我们那无数走向生活的年轻人，它们却是不可缺少的支持。他们知道全国人民的心近在他们身边，他们做起工作来更有勇气，他们同艰苦与困难斗争时也会感到自己有更多的力量。我们的青年走向生活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并不是铺满玫瑰花的道路；深山、雪地、沙漠、高原、森林、荒野都是他们的目标。一方面这些地方最需要他们，另一方面选择最艰苦的地方更能够表示出他们最深的爱。每个人都有将沙漠改变为良田、把荒野建设成都市、使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雄心。为了表示对国家和人民的爱，年轻的妇女可以毫无留恋地离开生活舒适的现代化都市，结伴穿过积雪的高山到西藏工作。在一连几天看不到人烟的路途中，在冻得坚硬的地面上，她们甚至没法举火取暖或做饭。但是到达目的

地以后，她们愉快地写信给上海的亲友们说："我们很高兴，我们现在坚强多了，有用多了。我们在路上每逢遇到困难心中有点波动的时候，就想起你们，想起动身时大家对我们的鼓励，我们没有掉一滴眼泪，没有抱怨一声。"为了表示对国家和人民的爱，刚出学校的男女学生也可以在戈壁滩上"战胜一切疲劳和寒冷"，完成石油普查的工作。大风吹倒他们的帐篷，黑暗使他们迷了路，经过大半夜的摸索之后，他们和同伴们会面了。热情的拥抱、唱歌和跳舞使他们忘记了寒冷和饥饿。他们还兴奋地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用勇敢迎接困难，用愉快送走困难……我们将永远前进！"因电石爆炸受伤，左眼失明、只有两成视力的青年钳工罗木命，在一年中间改进和创造了十八种工具和操作方法，替国家节省了不少财富。为了改造机器，他常常每夜搞到十一、二点钟。有一次在星期天他一个人摸上废铁堆，想找旧机器来改装"切橡皮管机"。由于眼睛看不清楚，他经过铸坑时，坑上木板一滑他就跌了进去，腿从两块木板中间刮过，割开很长的伤口，一时鲜血直流，痛得他咬紧牙齿按住伤口流泪。他自己后来说："我虽然一个人掉在坑中，却感到坑里并不止我一个人，感到保尔和吴运铎在我身边，在坑里陪着我。我想：我只刮破这一点肉，比起吴运铎受了伤还行军几百里，差得远哩。"他继续摸上废铁堆，到处翻拣，终于找到一架破旧的小冲床，改造成了切橡皮管机。换一个时代，罗木命只好躺在家中等候死亡，或者靠别人的恩惠度日。今天在新中国却有许多像罗木命那样的残疾人坚持学习，坚持工作，获得惊人的成就。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每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不断地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鼓励和爱护。每个年轻人都是在这样的支持、鼓励和爱护下面成长的。每一个人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也都是在这样的支持、鼓励和爱护下面培养起来的。在整个队伍向前进的时候，谁愿意单独留在后面？谁不把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当作可耻的事情？我还想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老工人的例子，因为我手边正摊开一个年轻朋友从沈阳寄给我的短篇小说的原稿。小说中描写的是真人真事。主人公是东北耐火砖厂的一位老班长，他为了提高产量，并且完成紧急的任务，想出缩短凉窑时间提前十天出砖的办法。但是依照过去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期厂里的老规矩，缩短凉窑时间会使全窑的砖骤然受到冷风完全龟裂。所以他决定亲自钻进窑里去查看明白。小说里有这样的一段：

> 他穿着用水浸湿的帆布作业服，水一滴一滴地从裤筒里滴下来。他镇静地端详着抽去了炉条的缺口，那里的炉壁发着热气。他不慌不忙地把帽子放在水里浸湿，戴在头上，随后敏捷地跳下炉坑，用戴着湿帆布手套的双手往炉条上一搭，立刻丝丝作响，冒出了一股热气来。他往上一纵，上半身已俯在窑内，立刻一股火辣辣的热气扑到他身上，他觉得浑身好像被千万根热针刺着一样。他微微低下头把扬起的灰粉避了过去，然后用双手支着身子往上一挺，全身就都进到窑里了。一种雾一样的跳动的干砂包围着他，全身好像落在火里一样，呼吸也很困难

了。……他用手遮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观察。……冷风顺着他身边吹进来。火红的窑顶渐渐变成灰暗色。风直扑到窑顶上，反回来成了热风。他观察砖的变化，只见砖上面干砂像油锅里炒豆一样，必必剥剥地乱跳，砖本身连一点变化也没有……一分钟，两分钟……他觉得身上有些焦味，工作服已经烤干发焦了。有一两个地方还在冒烟。他连忙用手撇动了一块挨近风口的砖，仔细一看，一点裂痕也没有，是一块完整的好砖……

第一批耐火砖提前十天出窑的时候，何班长像抚摸他心爱的孩子们似地抚摸着砖面满意地微笑了。

这不是一篇出色的小说，缩短凉窑时间的办法在这里也不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普通工人的英雄形象。我没有引用描写何班长的思想感情的文字，我想，这是不必要的了。仍然是那一句老话：在新中国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同样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谁都愿意献出全部力量，而且也愿意忍受一切艰苦，冒一切危险。因为荣誉是必须争取的，责任是必须尽的。连我的五岁孩子也知道什么是光荣的事情，什么是可耻的事情。那么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一个不要荣誉、放弃责任、甘愿让自己的孩子唾弃的人呢？

找不到的！因为新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已经开始把自己融化在集体中间了，已经开始把自己的一颗心融化在六万万颗心中间了。

一九五六年是新中国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谁都可以想象到我们怀着怎样激动的心情去迎接新年。六万万人民步调一致地向着社会主义的美丽远景前进，谁听见过这么雄壮的脚步声？我们都知道一九五六年会给新中国带来些什么，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九五六年的更明亮的阳光和更美好的生活。每个中国人都在心里打算：怎样用自己的力量给一九五六年增添光彩，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祝望：愿母亲们得到更多的安慰，孩子们发出更快乐的笑声，地上开放更多的花，田里长出更多的谷物，书店中售出更多的书刊，剧院里容纳更多的观众，每一张餐桌上堆满丰富的食物，每一户人家射出明亮的灯光……想到这一切，我们中间谁不感到自豪？谁不愿意在祖国建设中献出全部力量？对于我们，难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么？……

我离开书桌，走进寝室，走到孩子的床前。孩子睡得很熟。我看见他小脸上的笑容，更增加了我对将来的信心。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不用说，他一定比我幸福，他会看见，甚至会做出许多我现在梦想不到的事情。我出神地望着孩子的笑脸：孩子忽然在梦中动一下手，笑出声来了。他并没有睁开眼睛，我想象不到他梦见了什么快乐的事情。不过我知道他的梦不会跟我的、我们大家的梦差得远，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新年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普遍的繁荣。

1955年12月在上海。

柏林一星期*

——记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

一

飞机不停地向东飞。窗外是白茫茫一片云海。柏林早已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可是我手边那束白色的丁香花还把我的心拉向柏林。立波感动地指着花束说："这是真的花，冬天里的鲜花很难得啊。"寒冬的鲜花在飞机中还在发散清香，还在预报春天的消息。我心里真暖和。我的手还感觉到德国友人温暖的手的紧握。我仿佛还看见刚才在机场见过的《东方红》的作者诗人库巴的充满青春的力量和热情的脸，《马可波罗冒险记》的作者儿童文学家迈因克的闪耀着友情的笑脸，和《毛泽东的思想》的译者贝喜发的长者般的和善的脸。这些脸上的表情是同样的：这是所有民主德国的作家的表情。每次看见这样的表情，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德国格罗提渥总理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中德两国人民，心是连在一起的。"我在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中也曾引用过这句名言。德国的朋友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五日《文艺报》第三号。

更不断地提到我们两国人民间的深厚的友谊和两国文学艺术的密切的关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到处听见友情的声音，在德国作家中间我更发见他们对中国建设事业的十分的关心。有一天，小说《爱国者》的作者波多·武塞忽然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发明了在旱地种稻子的办法”。他已经想象着我们普遍地使用拖拉机的时候了。他在一年半以前访问过中国，可是今天中国的一切还在他的思念中。我们离开柏林的斯大林大街才不过两三小时，我的心当然要飞回柏林去。

二

我好像又坐在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的会场里面了。我坐在那许多我见过几次面的和我只知道名字的同事的中间。在这里发言，人们喜欢用“同事”这个称呼，因为坐在这里的人虽然来自世界各地，说着不同的语言，可是大家所从事的却是同样的工作，我们都是为着共同的文学事业奋斗的。外国的来宾一共三十九位，有十八位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进步作家，其中还有从南美洲、澳洲和北欧来的客人。大家一致在大会上向民主德国的文学、作家和人民致敬，异口同声地举出过去和现代德国文学中光辉的名字，说明他们在世界各国读者中间的影响。二百二十四位民主德国作家的代表用不断的掌声、亲切的注视和热情的握手来欢迎客人。二十七位从西德来的作家和睦地坐在他们的同胞中间，跟代表们和一百六七十位列席者们一起鼓掌，一起谈笑。在德国剧院举行大会开幕式

的那个下午，皮克总统和他的战友们在剧院的包厢里出现的时候，从西德来的作家也一样热烈地鼓掌。在西德的作家中间，我看到了七十四岁的来翁哈德·弗朗克，我在二十五六年前就读过他的小说《卡尔和安娜》(1926)的中文译本，也看过根据这小说摄制的德国电影。他跟许多有良心的德国作家一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民主德国，找到他的精神的依傍了。我和立波常常在我们住的旅馆的饭厅里遇见他，我们离开柏林的那天早晨，在饭厅里他亲切地跟我们握手，并且请我们代他向中国人民问好。

三

大会开幕式是在一月九日下午举行的。这一天的主要内容是文化部长约·贝歇尔的报告。这是大会的两个重要报告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十日上午第一次大会上安娜·西格斯的报告。贝歇尔的报告题目是《论我们文学的伟大》。贝歇尔是诗人，又是小说家，他的报告很像长篇的散文诗，而且还是以一首诗作结束的。报告抓住了全会场人们的心。贝歇尔用雄辩的句子叙述了德国文学的过去和它的优秀的人道主义的传统，叙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德国工人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德国作家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艰苦斗争。他又谈到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的必要；谈到在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民主德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的无限可能性；谈到新的英雄人物和新的读者；谈到艺术家的

服务问题和党性；谈到作家“用最高的艺术技巧表现德国人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性的任务。最后他谈到“幸福的幻象和乐观的远景”。他引用了高尔基的一句话：“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已经建立了工农政权的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就有力量发见那些第一眼看不到的和刚刚开始成熟的东西。所以作家又是有着“幸福的幻象和乐观的远景”的先知和预言家。贝歇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德国文学的伟大的远景和德国作家们的崇高的任务。六十五岁的老诗人的平静的声音强有力地打动了全体作家的心。当他用尊敬的调子感谢那些去世的作家，感谢为解放德国而战死的苏联战士，感谢在集中营内牺牲的德国反法西斯的斗士的时候，全场一致地起立向死者致敬。

贝歇尔的报告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结束。报告的精神是跟在报告之前由库巴宣读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祝词以及前一天《新德意志报》的社论《文学与现时》的精神相符合的。

祝词说：“我们的进步的德国文学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内容的作品，它们都是德国民族文学的不可改变的财富。进步的德国文学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现在开始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我们多数的作家已经认识到只有用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才可能依照它（现实）的革命的发展来反映现实，指出我国人民的未来的道路，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劳动人民。”又说：“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们的作家在大会中得到鼓

舞和充实以后，一定能够发挥全力为我们工农政权的巩固服务，写出符合时代要求与符合未来要求的作品，写出为打击反动势力、拥护和平而服务的作品，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服务的作品。”

社论说：“作家有责任为着人民及其领导力量（工人阶级）的事业，立场明确地运用与发挥他的才能。他的著作应当有助于把一切德国的爱国者团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周围，由此帮助为民主、统一的德国的形成创造出基本前提。”又说：“我们的文学如果多样地、成熟地、真实地尤其是通过真实的人物描写，艺术地依照它（现实）的革命的发展来反映现实（首先是今天的现实），使人看到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今天的工作中的果实的话，它就能鼓舞读者，引起他们的崇高的感情和热情，并且在他们为争取我们的新生活与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鼓舞的作用。这样的文学不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且会在全德国发射光芒，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并且对于我们民族的每一成员所面对着而往往无法解决的德国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作出正面的、肯定的、战斗性的回答。显然这样的文学特别会给西德那些进步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以有力的支持，使他们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成为我们的盟友。因此对于只能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而存在的我们民族文学的发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家负着重大的责任。”

我觉得报告、祝词和社论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大会的内容、精神和任务了。

主席台上挂着一幅放大的比利时画家麦赛列尔的木刻《读书的工人》：一个工人靠在街头电灯杆上读书。木刻旁边是已故小说家亨利希·曼的一句话："今天的书籍就是明天的行动。"

木刻和字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四

十日和以后三天的大会都在部长会议大楼的礼堂中举行。麦赛列尔的木刻移到主席台对面的墙上去了。主席台墙壁上挂着一幅大的复合照片，是一个游行示威的场面，许多人在叫口号，一只放大的胳膊高高举起，手上捏着一本打开的大书，书上仍然写着亨利希·曼的话："今天的书籍就是明天的行动。"

在第一次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是满头白发的著名小说家安诺德·茨外格。他是第一天上午的大会的主席，他说"我们是自由的作家，我们是受到命令的，不过是受我们自己的命令，受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自由思想的命令的。"这是六十九岁的老人对西德的造谣者们的公开答复。据说西德统治集团用各种方法阻止西德作家来柏林参加大会。已经出席会议的西德作家也成了西德造谣者的目标。但是造谣中伤的手段只能引起人们的憎恶。茨外格在代表们面前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历史上"德国精神"一直是跟落后的思想不相容的。

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克劳狄乌斯接着宣读了威廉·皮克总统的贺信。德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信里说："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作家们有责任用艺术的语言，将一种新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思想深植在工农和一切干部的心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全德国的文学中将占领导的地位。同时它还要保存并且光大发扬人道主义的与进步的德国文学的伟大遗产……准备实现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的未来的德国的统一。要保存并且发扬德国文学的优秀的遗产就必须对在西德重新流行的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

皮克总统对"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的代表和来宾们"的祝贺得到了全场一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一股暖流进到我的心里，我记起了一年前德国文学史家康托诺维支在上海对我谈过的关于皮克总统的话：总统怎样关心德国文学的发展，他怎样在工作中不断地得到总统的帮助。

德国作家协会主席安娜·西格斯正在病中，没有能够出席大会，她的报告是由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赫穆林代她宣读的。报告写得非常亲切，就像作者在对亲友们谈家常一样。赫穆林的声音平稳，好像毫不激动，但是有深的感情。报告的内容是全面地介绍一九四五年以来的德国文学情况和德国作家怎样在作品中反映德国人民的思想转变的情形。她从战后她回德国讲起，她怎样经过西德然后来到民主德国，她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两种生活与两种思想；她看到德国人民怎样在废墟上重建他们的家，建设他们的新的国家。她谈到新的生活、

新的人物、新的题材、新的作品和新的读者；她讲到作家的立场，讲到批评家的任务；她讲到“公式主义”，讲到“现象的多面性”；她简单地评论了一些作品，也介绍了西德的文学情况。最后她叙述了她新近读过的日本短篇小说中的一个场面：一对住在广岛的少年男女隔着园子的窗户谈话。少年问少女，她的伤疤还痛不痛。他邻村一个漂亮的姑娘也有个同样的原子毒的伤疤，一个蝴蝶形的烧痕，她突然死了。少年说：“你我就跟我纸烟上的烟灰一样。现在它还有一个固定的形体，可是我只要动一下，就把它抖散了。你夜里梦见什么吗？像我们这样中过原子毒、一定要死的人夜里就会梦见白的东西：白帆、白鸟或者白花。你常常祷告吗？祷告毫无意思。只有一个无穷无尽的空间，在这个无穷无尽的空间里有一位上帝主宰着一切，那就是原子飞机——”

西格斯充满感情地说：“这一对代表所有活着的年轻人向我们讲话的少年男女，他们向我们要求的并不是单纯描写他们和我们的这个受战争威胁的世界，他们要求别的东西。……有什么办法使得恐怖不再发生？”她接下去说：“我们德国作家的责任特别重大。……我们所写的东西可能毫无用处，像成形的烟灰那样毫无意义，但是也可能促成另一种新的生活的产生。这个得由我们决定。”

安娜·西格斯最后说：“我谢谢你们的耐性。”但是全会场的人都站起来感谢她。她那像流水一样的流畅、生动的语言把我们带进一个广大的文学的新世界去。我们看到德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也认清我们作家对人民所负的重大

的责任，我们也看到放在我们面前的必须解决的重大的问题。她好像就坐在我们面前，她那对充满智慧的明亮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

五

休息的时候，我们走出礼堂，在书摊前面停留片刻，又参观了走廊上玻璃陈列柜中亡故的作家的手迹，便走下楼去了。楼梯口正面墙上挂着三个人的半身放大像。正中是安娜·西格斯，左右两边是贝歇尔和布列希特。他们都是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都是新德国文学中成就最大的作家。

下了楼，我在左边墙上看到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十二年(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中间牺牲的和在贫困中死去的九十三位德国作家的纪念碑。碑前的鲜花给人带来许多痛苦的回忆。没有人不惋惜这个重大的损失。拿今天的幸福跟过去的痛苦相比，我的确感到今天的作家责任的重大。

作为临时饭堂的大厅上有一面大屏风或广告板，上面贴了一些漫画。有一幅画是讽刺克劳狄乌斯的：一张空椅子的照片，下面写着："我们这边的人。"意思是：我们这边没有人。可是我听说克劳狄乌斯的小说《我们这边的人》写得很不错。另一幅画上有两个人背靠背地站着：一个是正确意识，一个是艺术技巧，下面有一句话：他们应当结婚。还有一幅画上有两匹飞马：大会前的马把两只翅膀垂下来，垂头丧气地站在那儿，大会后的马却展开了翅膀，而且下了不少的蛋。第二天

这幅画旁边又加上半幅新画，那就是一位文学杂志的编辑拿着盆子在接蛋了。在第三天贴上的新画中，有一幅把莱比锡文学研究所所长古列拉画成一个穿围裙的保姆，他面前有一个哭着的小孩(一张脸的放大像)，下面写着："古列拉阿姨，我不要吃。"

大会从十日开到十四日，上下午都开会。十二日是小组讨论会。不论是大会或小组会都开得很活泼，代表们发言非常热烈，而且自由辩论的空气很浓。《理性的眼睛》的作者斯·海姆的发言引起几个重要作家(如勃赖特尔和武塞)的反驳，像作家的勇气问题，现代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而且，海姆总耽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口少，文学发展的前途受到限制。最后一天的大会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作了报告，也曾对海姆的那几个论点加以反驳，海姆接着上台发言解释他的一些论点。乌布利希马上要求登台答辩，他举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众多的人口来反驳海姆的不正确的论点，在全场一致的大鼓掌声中，我看见海姆也连连点头称"是"。勃赖特尔也在发言中反驳了海姆的内容好形式不好的论点。他说这样提法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内容完全不同。我们作品的内容是完全新的东西。六匹马拉的金马车虽然好看，可是新制造的不好看的汽车却跑得更快。

另一个作家吉尔鲁斯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问题上又批评勃赖特尔的论点不对。他也批评了贝歇尔，他讲得很长，讲完以后，勃赖特尔还亲切地跟他握手，说：见解虽然不同，以

后还要保持友谊。

德国的重要作家、青年作家和少数民族的作家，西德的老作家弗朗克都发了言，他们自由地发表各人的意见。各国的来宾中都有代表登台发言。苏联的代表团人数最多，除了《阿拜》的作者阿乌左夫向大会热烈地祝贺外，费定还直接用德语谈了关于创作的两个问题："什么是文学?"和"我为什么写作?"匈牙利的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教授也在大会上谈了关于远景的问题，他还在会外作了专题报告。

六

克劳狄乌斯的工作报告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协会工作的成绩：上届大会闭会以后，一共有六位作家得到国家奖金一等奖，四位作家得到国家奖金二等奖，十一位作家得到国家奖金三等奖。他还举出了许多受人欢迎的好作品。可是他也批评了一些缺点，像作家缺乏学习、脱离生活、不参加会议等等。缺点自然不止以上这些，在《文学与现时》的社论中，在贝歇尔和西格斯的报告和作家们的发言中还指出了一些，例如，社论中所说的"把我们的生活写成毫无冲突地散步走进社会主义"啦，"在新的作品中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还少有或者甚至没有"啦，新的英雄人物描写得不够啦，轻视电影剧本的写作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没有能结合得很好啦。这些在德国文学中发生的问题在我们中国也存在着。一句话说完：文学落后于现实。现实跑得太快了！民主德国的工业水平和人民生

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战前，而且正在大踏步地向着社会主义迈进。所以新德国文学虽然拥有那么多有才能的作家，还是赶不上跑得更快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以上的问题和别的一些问题，如青年文学问题，翻译工作者的责任问题，青年作家的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都已经在大会筹备期间讨论过，而且在这次大会中印发了一些参考资料。在十册参考资料中，有一册是关于中国文学的论争的，刊载了郭沫若的《三点建议》和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有人说，这次大会开得好，就因为会前有充分的准备。

然而这只是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以前的情形。今后德国文学的前途更是光辉灿烂的。所以约·贝歇尔用一首充满对祖国和德国语言的热爱的十四行诗结束他的乐观的闭幕辞。

七

大会闭幕后，新的理事会成立了。安娜·西格斯又当选为主席，克劳狄乌斯仍然被选为第一书记。晚上，约·贝歇尔以文化部长的身份举行宴会，招待全体代表和来宾。

快到半夜我向主人告辞的时候，贝歇尔热情地向我谈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们的帮助。安娜·西格斯在她的报告中曾经两次引用毛主席关于艺术与现实的话。（这天早晨我们和斯·海姆夫妇同桌吃饭，他一再请我们回国后代他问候刘少奇委员长，他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对他的启发和帮助很大。）格罗提渥总理和他的夫

人还记着他们的中国之行，亲切地谈到中国，总理夫人非常清楚地讲着中国话："再见。"

这是我们在柏林参加的第三次招待会了。第二次是在一家国营饭店里面，不敬酒，不讲应酬话，德国作家姚贺夫妇把我和立波拉到一张靠壁的桌上，通过德国作协派来招待我们的那位年轻同志的口译，畅谈他们夫妇对中国的感情和第一届德国作家大会的回忆。第一次的招待会是在勃赖特尔家里举行的小酒会。那天晚上，每一位住在柏林的作家在家里招待十几个客人。勃赖特尔在门口等我，远远地举起两只捏在一起的拳头说中国话："你好，好！"他立刻拉我进房去，把他从中国带回来的礼物一一地指给我看。他还告诉我，他那本关于中国旅行的书已经脱稿，送到中国大使馆征求意见去了。

飞机从云海下降，我已经看到大雪封闭的道路了。我还看见小的村庄和人家。飞机就要在苏联境内的机场降落，我也应该结束我的柏林的回忆了。

八

飞机在维尔诺机场降落后，停了一个多钟点，又继续往东飞行。我的回忆并没有结束。在飞向莫斯科的途中，我还在飞机上重读了第四届德国作家大会的决议，并且把它翻译出来记在笔记本上。现在把译文摘录在这里：

我们的时代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我们要创造这种文学，为和平与人道服务，并且参加社会变革的工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一切狭隘、庸俗的文艺理论与思潮作斗争，因此它要求高的艺术性。它要求表现真实的生活与崇高的人。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才使我们今天能够充分表现生活中新的事物和新人。

每一个认定这个目标的德国作家必须努力掌握艺术技巧。在这样艺术家的身上人类爱和党性才会跟那种形象地把握与反映现实的才能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家必须同时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生活知识，必须掌握艺术表现的方法。

近年来的经验与大会的讨论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德国的新、老作家都应当努力反映现在发生的事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在这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出现的矛盾、人物和英雄都是我们文学的取之不尽的材料。它们的艺术的反映有助于我们同时代人和我们的后代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性的任务，并且改正自己的缺点，更好地完成工作。

强调这种主要文学题材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题材的限制。表现了作者自己喜爱的艺术题材的每本小说，每个戏，每首诗，只要可以作为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复活与拥护德国的和平统一的武器，都符合我们的特殊的要求。在许多德国人的头脑中法西斯思想尚未完全除尽，因此

根除人们脑筋中这种有害的思想残余乃是文学的急迫的工作。战斗的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大战中的)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斗士在新的文学作品中都应有充分的描写。

我们的文学倘使能够得到认真负责的文学批评的帮助，就能够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我们的作家也有责任通过文学工作来促成我们文学的发展，而且由此发扬我们的民主的民族文学的一个最优美的传统。

我们的大会加强了我们同所有西德的人道主义作家中间的友好联系。今后倘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德国堕落分子，以及军国主义、极端爱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的势力的迫害，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共和国找到有力的支持。

我们的大会在精神上加深了我们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一切进步作家中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在我们中间经常交换意见和作品对我们彼此的工作都有鼓舞的作用。(下略)

这个决议具体而扼要地总结了人们在这次大会上所谈到的一切。它给我们绘出了德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的简图，这样的文学不仅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作家奋斗的目标，而且还是西德的一切有良心的进步作家的行动的方向。

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所有的问题也一一得到了解答。德国的作家对这次大会都表示满意，大家都看得见自己面前

的康庄大道。德国人民为着这次大会的成就也万分高兴。他们迫切地等待着作家们的新作品，更多的、更好的新作品。

我和所有到会的外国来宾一样，我们以同事的身份，预祝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在全世界发射万丈光芒！

1956年2月3日追记。

秋　　夜*

窗外"荷荷"地下着雨，天空黑得像一盘墨汁，风从窗缝吹进来，写字桌上的台灯像闪眼睛一样忽明忽暗地闪了几下。我刚翻到《野草》的最后一页。我抬起头，就好像看见先生站在面前。

仍旧是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厚厚的上唇须，深透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右手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向空中喷着烟雾。

他在房里踱着，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抽烟，他看书，他讲话，他俯在他那张书桌上写字，他躺在他那把藤躺椅上休息，他突然发出来爽朗的笑声……

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平易近人。而且每一个动作里仿佛都有先生的特殊的东西。你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

不管窗外天空漆黑，只要他抬起眼睛，整个房间就马上亮起来，他的眼光仿佛会看透你的心，你在他面前想撒谎也不可能。不管院子里暴雨下个不停，只要他一开口，你就觉得他的每个字都很清楚地进到你的心底。他从不教训人，他鼓励你，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文艺月报》十月号。

安慰你，慢慢地使你的眼睛睁大，牵着你的手徐徐朝前走去，倘使有绊脚石，他会替你踢开。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还是那么安静，那么恳切，那么热心，那么慈祥。他坐在椅子上，好像从他身上散出来一股一股的热气。我觉得屋子里越来越温暖了。

风在震摇窗户，雨在狂流，屋子里灯光黯淡。可是从先生坐的地方发出来眩目的光。我不转眼地朝那里看。透过黑色长袍我看见一颗燃得通红的心。先生的心一直在燃烧，成了一个鲜红的、透明的、光芒四射的东西。我望着这颗心，我浑身的血都烧起来，我觉得我需要把我身上的热发散出去，我感到一种献身的欲望。这不是第一回了。过去跟先生本人接近，或者翻阅先生著作的时候，我接触到这颗燃烧的心，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不仅是我，当时许多年轻人都曾从这颗心得到温暖，受到鼓舞，找到勇气，得到启发。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发光的心仍然在他的胸膛里燃烧，跟着他到了窗前。我记起了，多少年来这颗心就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给人们指路。他走到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发光，生热。我知道多少年轻人带着创伤向他要求帮助，他细心地治好他们的伤，让他们恢复了精力和勇气，继续走向光明的前途。

“不要离开我们！”我又一次听见了这个要求，这是许多人的声音，尤其是许多年轻人的声音。我听见一声响亮的回答：“我决不离开你们！”这是多年来听惯了的声音。我看见他在窗前，向窗外挥一下手，好像他又在向谁吐出这一句说过多少

次的话。

雨住了，风也消逝了。天空不知在什么时候露出一点点灰色。夜很静。连他那颗心“必必剥剥”地燃烧的声音也听得见。他拿一只手慢慢地压在胸前，我觉得他的身子似乎微微地在颤动，我听见他激动地、带感情地说：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你们。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的？

“难道为了你们，我还有过什么顾虑？

“难道我曾经在真理面前退却？在暴力面前低头？

“为了追求真理我不是敢说，敢做，敢骂，敢恨，敢爱？

“我所预言的‘将来的光明’不是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眼前？

“那么仍然要记住：为了真理，要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

“勇敢地继续向着更大的光明前进！”

静寂的夜让他的声音冲破了。仿佛整个空间都骚动起来。从四面八方送过来响应的声音。声音渐渐地凝结在一起，愈凝愈厚，好像成了一大块实在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送来了火，它一下子就燃烧起来，愈燃愈亮，于是整个房间，整个夜都亮起来了，就像在白天一样。

那一块东西继续在燃烧，愈燃愈小，终于成了一块像人心一样的东西。它愈燃愈往上升，渐渐地升到了空中，就挂在天空，像一轮初升的红日。

我再看窗前鲁迅先生的身形，它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见了。

我连忙跑到窗前。我看出来：像红日那样挂在天空里的就是先生的燃烧的心。我第一眼只看到一颗心。可是我仰起头仔细再看，先生的慈祥的脸不是就在那儿？他笑得多么快乐！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

我笑了，我也衷心愉快地笑了。

我知道鲁迅先生并没有死，而且也永不会死！

我回到写字桌前，把《野草》阖上，我吃惊地发现那一颗透明的红心也在书上燃烧。……

原来我俯在摊开的先生的《野草》上做了一个秋夜的梦。

窗外还有雨声，秋夜的雨滴在芭蕉叶上的声音，滴在檐前石阶上的声音。

可是在先生的书上，我的确看到了他那颗发光的燃烧的心。

1956年9月。

一个秋天的早晨*

十月十四日的早晨，在万国公墓的礼堂中我和金仲华同志把复制的“民族魂”的旗帜献盖在鲁迅先生灵柩上面的时候，在虹口公园门前和同志们一起扶着灵柩缓缓地走向墓地的时候，在鲁迅先生新墓前面望着灵柩慢慢地落进墓穴的时候，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事情。依旧是带环的棺木，依旧是黑绒的字，依旧是无穷无尽的对先生的敬爱和永远不能忘却的纪念，依旧是数不清的年轻人的面庞。墓前平台上宋庆龄先生挽着许广平先生的胳膊站在一处，二十年前宋先生激昂地对六千送葬的群众讲过话，她曾经用“将来的光明”安慰过在她旁边哀哀哭着的许先生。今天她默默地扶着她的埋下头流泪的朋友，她的同情的注视中流露出怀念逝去的战友的心情。宋先生消瘦了，许先生的头发也花白了。可是墓穴封闭哀乐停止以后，她们抬起头看毛主席题字的鲁迅先生的高大的墓碑，看萧传玖同志雕塑的先生的坐像，她们脸上却现出二十年前所不曾有过的兴奋和欣慰的表情。多少尊敬和关心的眼光落在这两张脸上，多少人在这两张脸上看到激动他们心灵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解放日报》。

东西。二十年的风浪所不能动摇的对人间美好生活的理想在这两张脸上发光。

早晨的微风吹动墓前的花树，秋天的太阳漫天地撒下金光，空气清爽得好像要把人的心肺也洗干净似的。二十年前抬着先生灵柩到墓地时的沉重的心情，看见灵柩默默地落进墓穴时压在心上的石头一样的东西，墓穴封闭、群众散去后的一片荒凉的景象，二三十个人在初升的上弦月的照耀下走出公墓时那种透不过气的感觉……这一切好像都是一场噩梦，一下子就给温和的风吹走了。这一阵轻风还吹过来墓后的桂花香，和堆满在墓前的花圈上鲜花的清香，墓前两棵高大的广玉兰的茂密的绿叶跟着风微微舞动，明年春天它们会开出多少银色的花朵，紫藤将用无数的紫色小花装饰两旁的花架。先生安静地睡在百花中间。

我们在雕像前面站了一会儿，像座四周都长着一串红，花开得正繁，远远地望去，好像先生就坐在一幅红毡上面。我望着，望着，我觉得先生就坐在这里，拿着书在休息。他好像就要站起来一样。啊，倘使他真的站起来呢？……那么虹口公园里会响起一片多响亮的欢笑声！多少只手会向着他伸过去！……

这个时候多少人都幻想着先生会从那把“藤椅”上站起来。多少人都在盼望扶着先生出去，让他看看今天的新中国，告诉他这些年来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多少话要告诉先生啊。可是先生仍然坐在“藤椅”上，他不能够站起来让我们扶着走出去了。

望着这座栩栩如生的先生的雕像，每个人都感到遗憾和依恋的心情。许多向纪念馆走去的人还几次回过头来向先生告别。许多走出公园的人带着先生的纪念回家。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在悲痛的日子里先生没有离开我们，在欢乐的日子里先生也在我们的身边。先生的确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离开虹口公园的时候，秋天的阳光正照着鲁迅先生的雕像，白色的像身沐浴着金色光辉，更显得灿烂夺目，好像成了一个光明的象征。从这里射出的光芒牵引着千千万万人的心。坐在这个草绿如茵、花红似火的园子里，先生不会感到寂寞。先生过去是年轻人的朋友，以后仍然有成千成万的青年来陪伴先生。他们会把在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情带到先生跟前，他们会把自己心里的话向先生倾吐。

“先生永远是年轻人的朋友”，这个思想经过二十年的大变化以后，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

1956年10月16日。

纪念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的五十六年的光辉灿烂的生活中，先生为祖国和人民树立了不朽的功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生前，先生的一枝笔，一颗心把千千万万的青年引到他的身边；死后，先生的名字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三十年来先生的影响达到了广大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先生的著作被译成世界主要国家的文字。先生的全部作品已经成了优秀的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鲁迅的名字是跟文化巨人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名字并列的。

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在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封建政权疯狂地奴役人民的时期中，先生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甚于关心个人的命运，先生在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中看到了个人的出路。先生使用锋利无比的艺术武器进行思想革命的工作，带着不可抵挡的锐气开始他的文学生活。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夕，先生发表了第一个短篇《狂人日记》，向残害人民的封建制度

---

* 本篇系在上海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开幕词。

发动攻击。他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作为现实主义的杰作给中国新文学打下了基础。先生投身在中国革命的浪涛中，跟着奔腾的怒潮战斗前进。为了战斗的需要，先生创造了“杂文”的武器，用它来对国家和人民的敌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反动军阀、统治阶级、“正人君子”、“高等华人”、流氓买办、帮闲文人等等都是先生攻击的对象。先生称他的“杂文”为“投枪”，每一投掷，必中要害。先生的“杂文”短小精悍，战斗性强，不仅思想深刻，分析精微，而且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先生的十六卷杂文集跟他的小说、散文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的思想和艺术的宝库。

作为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的创作是跟他的生活的道路一致的。他一生就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追求。为了追求真理，他敢于面对一切的攻击、嘲笑、诬蔑、谩骂、通缉和暗杀的威胁。为了追求真理，他不惜“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为了追求真理，他终于从进化论走到了阶级论，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走到了共产主义，而且找到了他引以为光荣的“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同志。从此先生的信心更坚定了，先生的精神更焕发了，先生所使用的武器更成为得心应手的了，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咬定了真理，辨明了是非，铁一般顽强地战斗前进。”先生最后在上海定居的十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血腥统治和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甚至在这漆黑的暗夜中，先生也看到了“将来的光明”，为了迎接这光明，先生更勇敢地进行战斗，一直到他吐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鲁迅先生被称为"青年的导师"，也有人喜欢称先生做"年轻人的朋友"。先生始终生活在青年中间，跟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先生在培养青年的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真挚的爱：他的燃烧的心给多少年轻人带来温暖，他的光辉的榜样把多少年轻人教育成勇敢的战士。中国的人民文学由于先生的心血的灌溉，才枝叶繁茂、开花结果。先生一生热爱青年，年轻人的生活与前途一直牵系住先生的心。先生曾经充满感情地说过："他们应当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中国青年现在的确过着前人所未经生活过、而且所梦想不到的新的生活了。今天在先生所预言的新的光明普照中国的时候，中国青年不会忘记先生交给他们的"使命"，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所未经有过的"新的时代。

今天在这里纪念鲁迅先生，我们中间有先生生前所敬重的战友，有先生"引以为光荣的"同志，有在先生的关怀和教导下成长的作家和艺术家，有先生生前所期待而终于来不及见到的新的青年……我们怀着同样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来到会场，我们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在这里倾吐。一想到鲁迅先生，我们就无法制止内心的激动。我们仿佛看见了先生的慈祥的面容，我们好像听到了先生的温和的声音。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心跟先生的燃烧的心贴得多么近，好像先生就坐在我们中间一样。二十年前上海人民公葬先生遗体于上海西郊万国公墓的时候，称先生为"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绝不会死灭的。先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依傍。先生的纪念永远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了报答先生的深厚的爱，为了不

辜负先生的殷切的期望，让我们虚心地、认真地向先生学习，让我们的心也燃烧起来；我们大家献出我们所有的光，所有的热，所有的爱，用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鲁迅先生晚年所朝夕梦想的人间乐园。

1956年10月19日。

燃烧的心*

——我从高尔基的短篇中所得到的

高尔基的作品在中国有上千上万的读者，可是对他的作品，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感受不一定相同。然而谁也躲不开他那颗“燃烧的心”的逼人的光芒。我翻译他的早期作品的时候，刚刚开始写短篇小说，我那个时期的创作里就有他的影响。所以二十年前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我除了悲痛外，还有一种失望的感觉：作为读者，作为“初学写作者”，我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可是我永远失掉跟他见面的机会了。

我特别喜欢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不管在他早年的或者后期的作品中，我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作者的心跟读者的心贴得非常近，作者怀着真诚的善意在跟读者讲话。读者会喜欢他，把他当作一个真诚的朋友，因为他的作品帮助读者了解生活，了解人，它们还鼓舞读者热爱生活，热爱人。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读者感染到作者的十分鲜明的爱憎。

我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感觉：高尔基的每一篇作品里都贯串着作者的人格。他写了不少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体裁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报》第十一号。

小说。小说中的"我"并不一定是他自己。可是我每读完他的一篇作品，我就好像看见作者本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的人物喜欢发议论，可是他本人并不说教，他让你感染到他的强烈的爱和恨，他让你看见血淋淋的现实生活，最后他用他人格的力量逼着你思考，逼着你正视现实。他就像他的《草原故事》中的英雄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的"燃烧的心"领导人们前进。

在作家中间有着各种不同的人，有些人写出好文章，却不让读者看见自己；有些人装腔作势地在撒谎；有些人用花言巧语把读者引入陷阱。但是有更多的人，严肃地在创作的道路上追求真理。至于高尔基呢，他带着不可制服的锐气与力量走进文学界，把俄罗斯大草原的健康气息带给世界各国的读者。在列夫·托尔斯泰以后再没有一个俄国作家像高尔基那样地激动全世界的良心，也没有一个苏联作家像高尔基那样地得到全世界一致的尊敬。连他的"流浪汉"和"讨饭的"也抓住了资产阶级批评家的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不能够掉转身把背朝着作者，因为他正在凝神地望着你，他的"燃烧的心"一直在发射正义的光芒。

高尔基的生活面很广，他徒步走遍了半个俄罗斯，他干过各种各样当时一般人认为卑下的职业，他亲身经历过当时贫苦人们所身受的痛苦和压迫。他深深了解人们的痛苦，而且看出了这些痛苦的根源。他作为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昂然走进文坛，他受过多少次黑暗势力的迫害，可是他的控诉和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力。他不仅把他一生的精力贡献给人类解放的事业，他甚至把他文学方面的收入也用来

帮助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他从事文学事业的几十年中间，他一直是一个万人景仰的巨大的存在。他的每一篇作品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都起了战斗的作用，在培养新人的成长中都起了教育的作用。

一定有人不赞成我的看法。他也许在高尔基的一些早期作品中没有找到正面人物或者学习榜样，就低估那些作品的教育意义。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他可能认为《草原上》里的“兵”或《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里的祖父和孙子不是正面人物，不能吸引读者，也值不得人同情。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我自己翻译这两个短篇的时候，我很难抑制我心里的激动。我关心廖恩卡和他爷爷的命运，我喜欢那个在草原上流浪的“兵”。小说中的人物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活动，我不能够摆脱他们。我闭上眼睛就看见流浪汉满身有劲地在草原上大步前进，讨饭的爷爷慈爱地抚摸孙子的脑袋。平凡人的命运竟然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高尔基的艺术技巧是跟他的人格的力量分不开的。作者在他的每一篇作品里都高高地举起他那颗“燃烧的心”。我们大家都了解这样的说法：做一个好作家也必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大声疾呼地在控诉：旧社会的罪恶逼着阿尔希普和他的孙子走向死亡！在这里，作者的爱憎是多么地鲜明。的确，我越读高尔基的小说，就越觉得人和生活都值得我们热爱，也越觉得自己应当献出一切力量来改变生活，使生活变得可爱，使人们不再受苦。高尔基即使把受苦的图画展开给我们看，我们也看得见那一根贯串整个画面的爱的

红线。人们在受苦中相爱，互相同情，人们在受苦中保持着生活的勇气，人们在受苦中互相帮助、支持，共同前进。哪怕作者在《草原上》的最后写上一句“我们大家都一样地是——禽兽”，然而说这句话的“流浪汉”就是一个“善良的……家伙”，而且充满着对人们的同情。谁读了《因为烦闷无聊》，不同情麻子厨娘阿利娜呢？谁不愿意让她活下去，让她得到幸福呢？

不会有人讨厌小说或剧本中常有的一句话：“活着是多么地好”，或者“多么美”，或者“多么幸福”。可是这所谓“好”，所谓“美”，所谓“幸福”，决不是指“享受”美好的生活，而是指“有机会发挥和贡献自己力量创造或者帮忙创造美好的生活”。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带给读者的正是这样一种感情。不必提爱自由胜过一切的茨冈左巴尔，为同胞挖出自己的心的勇士丹柯，到死也要飞上天空的苍鹰，就是那个在秋夜里给人赶出来的娜达霞，给自己写情书的杰瑞莎，为父母牺牲、自己跑到马蹄下去的小孩科留沙……也用他们那种任何黑暗势力所摧毁不了的爱的力量增加我们生活的勇气，鼓舞我们勇敢地投入生活的斗争。

我的这些解释也许是多余的。高尔基的作品里并没有一点晦涩的东西。别的读者的收获不一定就跟我的收获不同吧。其实谈到高尔基的短篇，甚至谈到高尔基的一切作品，我觉得用一句话就够了。这是他自己的话，这是他在小说《读者》中对一个陌生读者的回答：“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

的确，在任何时候读高尔基的任何作品都会使人变得更

好。每一个高尔基的读者，在他的作品中都会看到他那颗“燃烧的心”，而且从那颗心得到温暖，得到勇气——生活的勇气和改善生活的勇气。

1956年5月在上海。

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

一

今年世界各国人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纪念他们所热爱的两部伟大著作:《草叶集》和《堂·吉诃德》。三十几年前,中国的读者通过不完全的译本认识了这两部著作的不朽的价值。三十多年来中国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介绍和研究它们的文章。郭沫若先生是惠特曼的爱好者和《草叶集》的最初的介绍者。林琴南在四十年前就翻译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这两部著作出版的日期虽然相差两个半世纪,可是它们却有着相同的遭遇:它们出版以来一直到现在不断地受到本国统治阶级反动势力的迫害、诅咒和歪曲,它们的作者一生过着贫穷的生活,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责难和嘲骂。然而它们却在反动势力的"围剿"中放射出越来越强烈的夺目的光芒,冲破一重一重的障碍和封锁,终于成为全世界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被译成各种文字,拥有越来越众多的读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解放日报》。作者曾自注为"在上海市纪念《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和《堂·吉诃德》出版三百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可以说是我的'读书笔记'"。

今天它们不仅是为着自己美好前途奋斗的全体进步人类和为着和平、友好、团结奋斗的各国人民所喜爱的读物，它们对于正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中国人民，也还有极大的鼓舞力量。

二

现在先来谈《草叶集》。

今年是美国大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出版的一百周年。

一八五五年印行的《草叶集》第一版只有十二首无题的诗，当时没有一个出版家愿意印这本书，作者只好自费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印出来的书没法传到读者的手中，却遭到资产阶级报纸不断的谩骂。像"疯子"、"色情狂"、"杂草"、"垃圾"这一类不堪入耳的攻击，并不能阻止诗人继续写作。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叶集》中，就有了三十二首长短诗篇。这部诗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经过作者不断地增订、改写、重编，到一八九二年诗人去世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长短诗篇的光辉灿烂的大诗集了。

《草叶集》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侮辱和谩骂，但是它也曾得到人们热烈的赞美和拥护。例如惠特曼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就非常喜欢它，说它有"鼓舞人、加强人信心的最好的优点"。有一个批评家还说："惠特曼是人类编年史中最高贵的人物"。

一百年来，《草叶集》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越来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爱。赞美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的谩骂和诅咒。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经照遍全世界，它的声音已经达到了每一个角落，正像诗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预言的那样：

哪儿有地，哪儿有水，哪儿就长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诗集《草叶集》中开门见山地写道：

同志，这不是书，
谁接触它，就接触到人。

《草叶集》的确是跟诗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开的。

瓦尔特·惠特曼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是一个"人民中间的人"，他自己认为这是值得骄傲的事。他于一八一九年生在美国纽约州长岛的项丁敦。他四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纽约附近的布落克林（当时是一个八千多居民的村庄）。他在那里念过五年小学，十一岁便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小杂役，第二年又到《长岛爱国者》报馆做排字学徒。在他的劳碌的一生中，他到处奔波，从事过好些职业。他做过排字工人，当过教师，做过木匠；他自己办过报，自己排字，自己印刷，自己骑着马到乡下去送报；他又做过新闻记者和报馆主笔；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在陆军医院当过三年护士，又在内务部当过小职员。这些时候，他一直在写诗。一八七三年他得了半身不遂症，从华盛顿迁到新杰西州坎姆顿他弟弟乔治家里休养。他在那里过了将近二十年的隐居生活，最后穷困地死去，像他自己所歌唱的那

样："把我自己遗赠给泥土，再从我所爱的草叶中生长出来。"

惠特曼诞生在资本主义正在美国发展的时期，他在一八九二年逝世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的强国，站在帝国主义的门槛上了。在他的壮年时期，美国还是黑人奴隶制度的中心。美国的南部各州拥护黑人奴隶制度，在那里生产关系的落后是非常显著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当时美国人的面前就摆着下面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任务：结束南方奴隶主的统治，消灭对黑人的奴役。不用说，反对奴隶制度最坚决、最彻底的是美国的劳动人民。北部资产阶级最有势力的集团始终害怕对种植园主进行斗争，他们推行了"妥协"政策，这反而帮助了南部的奴隶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但是"妥协"阻止不了社会的发展，解放黑人奴隶的南北战争终于爆发了。美国的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担当了反对奴隶主斗争的主要力量。战争的结果是：奴隶制度被摧毁了。然而资产阶级夺去了胜利的果实。一八六五年四月美国的内战刚结束五天，发布解放黑奴宣言的美国总统林肯就被反动分子暗杀了。从此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而且大踏步地走向帝国主义了。

惠特曼在这样的时期中生活了七十三年，他的作品忠实地、热情地反映了这个长时期中美国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当时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反映。在他晚年发表的论文《民主的远景》中，他已经看到美国资产阶级所

走的道路，而且提出严正的警告了。

惠特曼跟一般的美国劳动者一样，靠自己的两只手过活，靠自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他走遍了美国，熟悉美国的城市和乡村，田野和树林，河流和山陵。他始终跟劳动人民在一起。他后来对他的朋友说："我常常觉得我多么幸福，因为我自己是在普通的大地上出现——跟自己作斗争——在人民群众中（而不是在小集团中）生活；因为我始终跟普通人民一起亲密地生活。说实在话，我不仅在这中间受教育，而且在这中间生长。"

在人民中间生长起来的诗人惠特曼当然热爱生活，而且热情地投身在生活里面。他重视一切跟美国劳动人民的命运有关的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毫无顾虑地参加进去，并且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他拥护过"民主党"，可是他发现"民主党"并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他便拥护新成立的"自由土地党"（1847—1848），这是当时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城市劳动者所支持的"自由土地者"的政党。惠特曼还担任了这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政党①的报纸《布洛克林自由人》的编辑，一年多以后，"自由土地党"的领袖们同意在选举中和民主党联合行动，这种妥协政策使得他离开了报馆。美国发动对墨西哥战争的时候，惠特曼并没有马上看出这个战争的侵略性，可是他一旦认清楚了这个战争的性质，立刻在《布洛克林每日鹰报》上

① "自由土地党"反对在新并入美国的地区内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

发表社论，要求："这个战争必须停止。"他后来终于因为在《布洛克林每日鹰报》上发表反对奴隶制度的文章被老板解除了主笔的职务。他在内务部工作的时候，又因为被发现是《草叶集》的作者而遭撤职。

他坚决地反对奴隶制度。美国内战爆发以后，他毫不迟疑地参加了主张释放黑奴的北部军队。他到过前线，后来又在华盛顿陆军医院服务，《草叶集》中的《鼓声集》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美国总统林肯被刺以后，惠特曼发表了好几首悼念这个反对奴隶制度的斗士的诗，在《啊，船长，我的船长啊！》中，他把美国比作一只船，把林肯比作"从可怕的旅程归来"的"胜利的船"的"船长"。

惠特曼不仅关心美国人民的命运，他还关心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命运。他始终密切地注意并且同情欧洲的革命运动。他写了许多歌颂欧洲革命的诗，他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起义看作自由浪涛的象征。通过他这一生，他是一个进步的民主主义理想的斗士。

惠特曼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诗人，他用来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跟过去的诗体完全不同。他不仅尽量采用劳动人民的口语，他还把不少当时人们习用的外国字写入他的诗。那般习惯了传统的格律诗的人会把惠特曼的诗当作奇怪的散文，说它们无节奏、无韵律。惠特曼的确跟过去的诗人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但是广大的读者却能够欣赏惠特曼的独特的复杂的韵律结构。作为一个诗人，惠特曼非常注意诗句的发

音效果：他推敲韵律，选择能够最充分、最精确地表现他的思想感情的字眼。在他的诗里，他把诗人的最深、最真挚的感情传达给读者。

惠特曼喜欢在他的诗中写"自己"，而且一再指出他诗中的"我"或"惠特曼"只是一个普通人：积极、愉快、健康、活泼、豪迈、大度、正直、乐观……这都是他的主人公的特点。通过他的诗，我们看到了"人"的光辉的形象，我们听到了像这样的真可以使我们的血燃烧的句子：

我们活着，
我们鲜红的血液沸腾，
好像那消耗不尽的火焰。

惠特曼为了要表现美国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爱好自由的愿望，为了要从十九世纪美国现实生活的种种独特情况中去表现农民和城市劳动者，为了表现具有最重要意义的社会题材，为了使他的诗深入美国人民的心灵，把强有力的高尚的情感灌输给他们，他必须革新诗的表现方式。

他的诗的特色是语汇非常丰富，感情非常饱满，在他的诗里我们不断地看到生动、多采、鲜明的形象和画面，听到灵活的、充满生命力的语言，感到不屈不挠的战斗热情。

《草叶集》中最好的诗有《自己的歌》、《大斧的歌》和《大路的歌》等等。这些诗都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充满着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美国大自然的热爱。他的长诗《自己的

歌》的最初的题目是《一个美国人华尔特·惠特曼的歌》。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他在这个形象中表现出正在准备为自由战斗的进步人民的愿望。在这首长诗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诗人对黑人的歌颂。他生动地描绘了黑人的"安静而庄严"的形象。第十章最后一节所描写的诗人对逃亡黑奴的接待和兄弟般的友爱不仅表现了种族平等的思想，而且也体现了美国人民为解放黑人而斗争的愿望，更可以说是诗人对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的挑战。在《大斧的歌》中，他用最响亮的声音歌颂劳动，歌颂劳动人民的友爱和睦的家庭，并且把工人与农民所用的大斧当作民主的象征。在《大路的歌》中，他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生活，而且用燃烧着怒火的语言揭发了上流社会的虚伪、腐朽和绝望。

惠特曼自己说过："我这些歌不单是忠诚的歌，而且是反抗的歌。"的确，一切举起革命旗帜反抗不合理制度的人都会在惠特曼的诗里面找到同情和鼓舞。在一首题作《欧罗巴》的著名诗篇中，诗人满怀热情地颂赞了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尽管当时的革命遭到统治阶级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但是诗人却坚决相信革命还会再起，自由还会回来。诗人对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表现了无限的尊敬：

为了自由被杀害的人的坟墓，没有一座不生出自由的种子，从这粒种子又生长出新的种子，

风把种子带到远方再播种，雨和雪养育着它。

脱掉躯壳的灵魂是暴君的武器赶不走的，

它仍然无声无形地在大地上踏着大步，低语着、商议着、警戒着。

根据着这种相信人民终于会胜利的坚强的信念，诗人勇敢地唱出来大家所熟悉的响亮的歌声：

自由啊！让别人对你失望吧，我永远不对你失望！

后来在一八五六年写的《给一个遭到挫折的欧洲革命者》中，惠特曼首先宣布他的信念："我是永远为着全世界每一个不屈不挠的反抗者歌唱的诗人。"然后他用热情的诗句鼓舞欧洲的革命人民：

那么勇敢吧！欧洲的男女革命者！
除非一切都停止了，你们就不能够停止。

正如惠特曼在他的手记中所说的："诗人是一个招募兵士的人，他击着鼓走在前面。"他的诗是鼓舞人民，唤起人民进行斗争的战歌。

惠特曼称自己为"过分赞美生活的人"。他把他的一首长诗称为《欢乐的歌》。其实不单是这首诗，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诗里面都浸透了生活会带来幸福的这个深刻的感觉。《草叶集》的每个读者打开这本美丽的书以后，读了几页就会感到一种非常坚定而且是惊人地真诚的乐观主义。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他的诗篇中所表现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样地引人喜爱，不管是鸟或花，都充满了欢乐的生气；他的人物浸透了欢乐的朝气勃勃的精神，他们热爱祖

国的一草一木，欣赏海洋、山岭、草原上的空气、明媚的阳光。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会垂头丧气，他们对于未来和自己的力量充满着信心。

惠特曼的杰作《草叶集》中贯串着对民主和社会进步的热烈的追求，和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强的信心。他的诗篇到今天还充满着无限的生气。我们今天摊开他的书，看到那些贡献出自己的血汗和智慧使大地美化的劳动人民的庄严的形象，看到使人类生活丰富的大自然的壮丽的景色，听到反抗社会压迫和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号召，听到人类友爱团结的祝望，听到赞美生活的欢乐的歌声，我们会深切地感到惠特曼并没有死去，他还活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在一起，为着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奋斗。对于我们，《草叶集》永远保持着它们的鲜明的颜色和新鲜的气息，每一片草叶都像从前那样地青绿，每一句诗都使"我们鲜红的血液沸腾"。

三

现在再谈《堂·吉诃德》。

今年又是西班牙大小说家密盖尔·得·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第一版出版的三百五十周年。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不但是西班牙古典文学的最高峰，而且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也占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三百五十年来越来越深地打动人心。

就是在今天，全世界千百万读者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部描写拉曼恰骑士的冒险事迹的、充满智慧与博爱精神的小说。在一般字典中，《堂·吉诃德》已经成为与单凭幻觉行动脱离现实的狂热家同意义的字了。

塞万提斯是一个乡下医生的儿子。一五四七年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阿尔卡拉·达·艾纳勒斯县。他是七个孩子中间的一个，自小就跟着父母到处流浪。他没法受到较高的教育，全靠自己勤苦自学，广泛地阅读书籍。

一五七一年塞万提斯参加了西班牙对土耳其的战争。在勒班多海战中，他英勇地扶病作战，战争胜利结束，土耳其舰队全军覆没，可是塞万提斯的左手却受了重伤，残废了。

塞万提斯残废以后并没有退伍，他甚至参加了一五七二年拉瓦列诺海战和第二年攻占突尼斯的战役。

一五七五年塞万提斯从拿波里坐船回西班牙。船快到西班牙海岸的时候，遭到三只土耳其船的袭击，他和其他的西班牙人全被俘掳到阿尔及尔去了。以后的五年中间他被卖作奴隶，过着痛苦、屈辱的生活。到一五八〇年，他靠了家属筹款和同乡商人的帮助，才能够回到他离开十年的祖国，在那里他开始了他的文学的生涯。他曾经写过小说和一些剧本，可是都没有得到成功。后来他为了糊口，又当过替政府收购麦、油、酒等等的采购员，却因为别人拐款潜逃，被判处徒刑。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使他更清楚地认识了西班牙的真实的生活。据说《堂·吉诃德》的一些情节，就是他在监牢里想出来的。

一六〇四年塞万提斯写成了《堂·吉诃德》的第一部。这本小说在第二年年初出版，在西班牙得到了很大的成功，第一版在几个星期里面就销完了，这一年中间还重版了四次。正如十年后出版的小说第二部中那个年轻学士山孙·卡拉斯科所说，"孩子们拿着它不忍释手，年轻人读它，成年人了解它，老年人称赞它。总之，各种各样的人是这样地喜爱它，只要看到一匹瘦马，大家马上就说：'这是洛稷南提'……"而且在作者生前，《堂·吉诃德》第一部的英文译本(1612)和法文译本(1614)就已经出版了。

以后，塞万提斯又发表了一些别的作品。《堂·吉诃德》第二部一直到一六一五年才出版，可是第二年作者就病故了。

文学上的声誉并没有给塞万提斯带来安乐的生活，却反而引起了反动集团对作者的憎恨。塞万提斯一生受尽了嘲笑、辱骂和毁谤。一六一四年出现了一本冒牌的《堂·吉诃德》第二部，作者的署名是：阿伦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南勒达。这是站在天主教教会和贵族的立场写的。接着就有一些"批评家"出来捧场。甚至在一百多年以后(1732)，还有人把这本冒牌作品再版，并且在序文里说，塞万提斯抄袭了阿维南勒达，又说，假桑却比真桑却写得好。西班牙天主教教会是那样地憎恨塞万提斯，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塞万提斯在马德里逝世(英国的莎士比亚也死在这一天)，教会甚至不许人给他立墓碑。一直到一八三五年马德里人民才给这个伟大的作家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在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接着在十六世纪初征服了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它的势力伸展到南美、中美和北美洲的南部，而且越过太平洋到达了菲律宾群岛，它的舰队又在世界各大海洋横行，因此它曾经一度进入了富强、繁荣的黄金时代。可是到了十六世纪末，新兴的殖民主义的竞争者出现了，西班牙因此参加了一系列的战争，弄得国库枯竭，农业和工商业衰败，封建社会秩序开始崩溃，封建政权为了维持它的统治，便加紧它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继续跟统治阶级互相勾结，掌握着对全国人民的生死大权，更广泛地进行残害人民的活动。西班牙人民，尤其是农民，在这种残暴的统治下，在封建地主（就是大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的压迫和榨取下，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

这就是塞万提斯亲眼看见的，也就是他在小说《堂·吉诃德》中所描写的西班牙。

在当时西班牙的书刊市场上，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在那里泛滥着歌颂为国王和封建领主效忠、为美人争取荣誉的骑士文学，它那种虚伪、荒唐的惊险情节和装腔作势的恋爱场面把不少的年轻人引上了迷途。

我们知道，“骑士”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一种特殊产物。所谓骑士是一种不参加生产劳动，专门为国王或封建领主效忠的职业武士。他应当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同时还得挑选一位美女作他的“理想的情人”，这个美女就成了他的生命的主宰与生活的目标。他甘愿冒危险斩龙杀虎、参加战争，甚至牺牲性命争取光荣来献给她。常常有两个骑士为了争论自

己美女的美貌和德行，不惜战斗到死……当时的实际生活中早已没有这样的骑士了，可是荒唐怪诞的骑士文学还一直在西班牙和欧洲社会中流行。《堂·吉诃德》的最初七章就是对骑士文学的露骨的讽刺。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的一个动机可能是：消除这种文学在人民中间所产生的不好的影响，事实上他达到了这个目的。《堂·吉诃德》出版以后，西班牙就再没有出现过一部新的骑士文学作品了。然而这个并不是塞万提斯的主要目的。他的讽刺另有更重要的对象，还有更深的、更重大的意义。否则，塞万提斯决不会受到反动集团的那样的憎恨，而他的小说也决不会流传到今天了。我们都知道，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丰富的世界是从堂·吉诃德带着桑却·判沙第二次出征以后开始的。这也就是作者的真正意图开始实现的地方。从此作者有机会发挥他的卓绝的天才和他对于西班牙社会的广博的知识了。

小说《堂·吉诃德》忠实地写出了当时的西班牙的整个面貌，也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封建贵族中间的矛盾。小说反映了西班牙人民的思想感情，也提出了西班牙人民对封建政权的控诉。小说的内容是很严肃的。那无数荒唐的笑料中包含了作者的无限同情的眼泪。塞万提斯通过这个半疯狂的“堂·吉诃德”的形象，向西班牙的整个封建社会进行战斗。小说中的“磨坊风车”和“羊群”都是有所指的，盘剥农民的西欧企业主的磨坊和经营养羊业的豪门贵族的羊群不就是当时人民憎恨的对象吗？有些读者只看到半疯狂的“堂·吉诃德”，却没有想到在

那个“游侠骑士”的背后，就站着头脑清醒的作者。（我常常想：疯狂、滑稽的形象和言行都只是外表。倘使堂·吉诃德不穿上一件滑稽可笑的铠甲，不干那些类似疯狂的傻事，那么塞万提斯早就给宗教裁判所抓去烧死了。）

《堂·吉诃德》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五十左右、又瘦又老的穷乡绅（有人说，他的相貌和作者的相貌相同，他的气质有时也跟作者的相近）。他成天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下了决心要恢复早已衰落了的骑士制度。他找到祖先留下来的起锈的铠甲，又拼凑了一顶头盔，拿着一根长矛，骑着一匹瘦骨稜稜的老马，从后门溜出去。他偷偷地把邻村一个挤牛奶的姑娘当做他的“美女”；把小客栈的老板当做宫堡主人，跪在地下，要求老板正式封他为“骑士”。他得到“骑士”这个称号以后，就开始他的游侠生活，执行他理想中的骑士职务。他第一次碰了钉子，让人送回家去，可是伤一养好，他又说服了同村的帮工桑却·判沙做他的侍从，开始了第二次的出征。

堂·吉诃德幻想自己“命中注定要冒大险，成大业，立奇功”！他要“为受委屈的人报仇，为正义撑腰，惩罚一切不义的行为，征服所有为害的巨人，战胜天地间的怪物”。在他那种到了疯狂程度的幻想中，他把风车当成凶猛的巨人，羊群看作对敌的两边军队，把妓女当作闺秀，把上镣铐的犯人看作贵族，把理发师的铜盆当成魔王的头盔。他的幻想永远蒙住他的眼睛，造成他接连不断的错误，他受尽世人的辱骂和嘲笑，常常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他始终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他带着疯狂的幻想和疯狂的热情走遍他的祖国，等到他历尽

千辛万苦疲惫不堪，从自己的疯狂的幻想中清醒过来，他马上就死了。

"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典型。这个拉曼恰骑士的形象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他做那些疯狂的骑士行为的时候显得很可笑又很可怜，但是跟他生活在其中的庸俗无聊的社会对比他又显得很高尚了。例如，他们主仆两人在公爵家中作客的时候，虽然他们不断地受到公爵夫妇的愚弄，闹了好些笑话，可是在读者的眼里，他们却比公爵夫妇聪明而且高尚。别林斯基指出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的二重性格的时候，这样说："堂·吉诃德深深了解真正骑士的要求，并且正确而艺术地论述了它。但是在自己充当骑士的时候，就显得荒唐而愚蠢，可是一谈到骑士制度以外的事情，他就是一个聪明人了。"的确每个细心的读者都会看见小说中的主人公时而是个不可救药的狂人，干些荒谬绝伦的骑士行为；时而他又是个令人惊服的聪明人，时常发表卓越的见解。特别是在第二部里面，当他觉得"一切的苦难都要去解救，一切的危险都要去经历"，必须跟他心目中的一切的邪恶作斗争、必须保卫真理与正义的时候，他看起来是那样地伟大、崇高；可是他平提着长矛、骑着马、向着风车冲上前去惩罚那些"可怕的巨人"的时候，他就变得愚蠢可笑了。在第二部中作者把堂·吉诃德身上的贤明的和伟大的特点写得更明显。所以屠格涅夫说："第二部中的堂·吉诃德已经不是在第一部尤其是在开头出现的那个古怪可笑、饱受打击的堂·吉诃德了。"他不单是一个"样子很悲哀的骑士，一个专为嘲笑骑士小说而创造出

来的人物”，他是一个大热情家，是“理想”的忠实的仆人。固然他的“理想”是以他的疯狂的想象力从骑士小说的幻想世界中得来的，可是他完全为着自己利益以外的事情生活着，为了他人，为了同胞，想把“恶”铲除，他认为他是在对作为人类敌人的恶势力作战。他为了追求他的“理想”的实现，甘愿忍受千辛万苦。他还认为只为自己一个人生活是最无聊、最可耻的事。的确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所有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与庸俗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堂·吉诃德的侍从桑却·判沙。塞万提斯把这个来自人民中间的人物写得有声有色，非常动人。桑却·判沙是一个被生活的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西班牙农民。他有一大堆孩子和一个饭量不小的驼背老婆。堂·吉诃德答应将来让他做一个海岛的总督，许他种种的好处。他为了这些好处才肯跟随堂·吉诃德到各地去冒险。起初他一面咒骂主人的疯狂的幻想，一面希望随时碰到发财的机会。可是他渐渐地爱起他的主人来了。他重视堂·吉诃德的高尚的品质，重视主人的好心肠。虽然他始终没有得到半个工钱，而且陪着主人一路挨打、吃苦，可是他不肯抛弃主人。他那自私自利的打算和小心谨慎的态度都没有了。下面一个动人的例子把农民桑却·判沙的优良品质表现得非常突出：那位把堂·吉诃德请到家中作客的公爵拿堂·吉诃德主仆两人开玩笑，定出一系列的计划来捉弄他们。公爵就

派桑却·判沙做一个海岛的总督。所谓海岛不过是一个村子。桑却到任以后，非常认真地执行职务，审理案件，一切处理得十分公正。过了八天，由于公爵安排好的“敌人夜袭”的恶作剧，桑却辞职离开了“海岛”，临走的时候要他的下属去报告公爵：“我来的时候没有带一文钱，去的时候也不带走一文钱，跟别的海岛的总督完全不同。”他回去见到公爵夫妇也说：“承蒙好意……派我治理巴拉达利亚海岛。我去的时候是光光的一身，现在还是光光的一身。……至于我治理得好或坏，有见证人在，他们高兴怎样说，就怎样说吧。”

这段话完全说出了劳动人民的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的心地，也说明了西班牙人民对于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的控诉以及对于正义和幸福生活的愿望。作者不但严厉地谴责了整个官僚制度，而且让我们看见在普通农民桑却·判沙的身上有着多少宝贵的善良品质，有着多少健全的见识！

通过堂·吉诃德主仆两人在西班牙各地的游侠旅行，小说的作者给我们提供了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生活的一幅真实的图画。小说中穿插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小说中先后出现了将近七百多个人物，包括贵族、官僚、神父、地主、农人、牧羊人、骡夫、客店老板、医生、理发师、女佣人、妓女、江湖艺人、囚犯、强盗等等，全面地反映出西班牙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一面是宫廷贵族和教会人士的荒淫无耻，一面是农民和手艺人的贫困饥饿。作者用了高度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这一切。每个场面都很生动，每个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每个故事都强有力地打动读者的心。正如别林

斯基所说："他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具体的、典型的。""他是在描绘现实。"的确，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初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

这是一部西班牙人民的庄严的史诗，一部充满智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著作。它表现了广大人民对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的强烈抗议，对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的无限的同情，对自由与正义的热烈的渴望。西班牙人民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不止一次地受到这部作品的鼓舞；就是在今天对于为着社会的进步、为着民族的独立、为着和平与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的各国人民，这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仍然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塞万提斯的理想是一个普遍平等和幸福的"黄金时代"。他借堂·吉诃德的嘴，这样说过：

"幸运的时期，幸运的年代，古代的人叫它做'黄金时代'，并不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铁器时代中看得非常珍贵的黄金在那个幸运时期可以不劳而获，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你的'，什么叫做'我的'。

"在那些神圣的年代里，一切东西都是人们所共有的。

"在那时候，一切都是和平，都是和睦，都是融洽……"

塞万提斯所赞美的、所渴望的"和平"和"美好生活"，也就是今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全世界进步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所以这一部鼓舞人类前进的伟大的小说，将永远活在人民中间，与人类一同长寿。

1955年12月。

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

我两次入朝，也曾访问朝鲜的城市和乡村，在朝鲜家庭中作过客，常常因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厚的友谊感动得流泪。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生活过一年，认识了不少的英雄人物和平凡的战士。在坑道里，在掩蔽部里，在"地屋子"里，我跟志愿军的指战员们在炮声中度过多少夜晚，听他们讲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在某某山上我认识了几位侦察员，我不止一次地翻过山访问侦察班的住室，听侦察员们互相谈论战斗的经验。他们那种出死入生、视死如归、胆大心细、机警沉着……的特点，在每一个"平凡"的经验中都显得很突出。我跟他们越接近，越无法制止我对他们的敬爱。他们把我当作一个朋友，常常没有顾忌地说出心里的话。我也曾接触过各级指挥员，不断地受到他们的照顾。我住过指导员自己修建的屋子，睡过战士们搭的炕。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志愿军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从那里不仅得到温暖，我还得到勇气。志愿军部队还是我的学校，在那里我更深地懂得了爱和理想，我更深地懂得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人民文学》八月号。

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我在日记里写过这样的话："我真愿意多看这些年轻的、健康的脸。"我后来又写道："他们的确是最可爱的：不仅他们的内心，就是他们的面貌也可以打动人，吸引人。"

我离开朝鲜一年半了，可是我闭上眼睛还可以说出许多人的面貌。在朝鲜的时候，我也曾感觉到我的心跟他们的心挨得很近，我已经走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的边缘。可是到拿笔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并没有明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内心的东西，因此回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能写出志愿军新人的面貌，而且一直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感到苦恼。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是怀着欢迎的心情来读这篇小说的，尤其因为前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年轻读者来找我谈话，向我推荐了它，另一个朋友也在我面前称赞过这篇"出色的作品"。可是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以后，我得到的不是"感动"，却是失望和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洼地上的"战役"》是描写志愿军侦察员的生活和斗争的小说。路翎的"导师和友人"、他的"实际扶助者"胡风说："这一篇……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感动。由老作家到部队的战士和干部被这里面的人物感动了。在读者中间引起了一股热潮。……作家们有的说，从路翎的小说中才看到了真正的志愿军。"他还转述一个作家的话："路翎所写的战争生活和战争中的人们的思想心理有多少的真知灼见，……路翎把战士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宽阔而美丽的胸怀，朴实而忠诚的性格表现得多深入，多逼真。"

这种别有用心的喝彩也许会欺骗了一些人，但是并不能够改变朝鲜战场的真实。老实说，路翎所描写的“志愿军”和我在朝鲜看见的志愿军不同。我在志愿军战士中间就没有见到一个像路翎所描写的那种人。我也曾在路翎到过的那个军、那个师里生活过一个时期，在同一个大单位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不会差得那么远。不仅是人，连生活、连气氛、连作风都是两样。路翎不仅没有写出“真实”，而且撇开“真实”，写出了一大堆完全虚假的东西。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决不是他在朝鲜看见的那些活生生的“新的人”。他写出的所谓“真正的志愿军”，其实就是他自己。那些人虽然穿上志愿军的衣服，但思想感情却是路翎的思想感情，而且路翎的确写得“逼真”，写得“深入”①。

我读完《洼地上的“战役”》以后，我曾经设身处地揣摩过几个人物的“思想心理”。王应洪把金圣姬的绣花手帕放在胸前口袋里去参加第一次的战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手帕，最后这个纪念品又回到朝鲜姑娘的手里。这个简单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某一本外国书上的一段话：

---

① 在路翎的另一篇小说《战士的心》里面，那个“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出来，参军已经三年”的战斗组长吕得玉在战场上跟美国兵肉搏，中了敌人的“尖刀”，倒在地上快要死了。在他“面向着死亡”的时候，他居然会“觉得他的一生是满足了。他觉得，彷佛从一条狭窄而脏臭的巷子一下子走上了明亮的、清洁的大街，灯光辉煌，周围的人们都向他微笑并且亲切地喊着他……”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感情！我想，连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服毒的时候，也不会有这种“亲爱的情绪”，何况现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中世纪的骑士出发到远方去参加殊死的战斗的时候，照例要向他们心爱的小姐要一件纪念品放在胸前或藏在盔里，他们把这种永恒的女性的诗的象征放在心上或戴在头上英勇地战斗、英勇地死亡。

我在二十岁以前很喜欢这一类的中古骑士，我也读过不少描写他们的战斗和爱情的小说。那些故事里面有各种“不能实现的爱情”，也有各种人为的悲剧。它们很能够打动一般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或者对爱情充满幻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

但是刚从祖国出来的抗美援朝的青年战士，“身经百战”的侦察班长……怎么能有八九百年前欧洲中古骑士那样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呢？而且那些久经锻炼的指挥员怎么能像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主义者那样对“爱情”（或者一点点爱情的影子）那么感到兴趣，而且为它花费那么多的心思呢？

路翎说他所描写的“爱情”是“不论从军队的纪律或是从王应洪本人说来都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其实这只是“莫须有的爱情”。在朝鲜战场上的确偶尔发生过个别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但是它跟任何一个青年战士无关。至于像路翎在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爱情”，从来就不曾发生过。正如魏巍同志所说的：“在这篇小说里……在堆满了‘纪律’字眼的掩盖下抒写了纪律的无情，”所以许多批评路翎的文章都着重地提到爱情和纪律冲突的问题，这是对的。不过我也得指出：在朝鲜战场上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志愿军中间固然有不许跟朝

鲜妇女恋爱的纪律，但是对于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这条纪律并不是束缚人的东西。在朝鲜我常常听见志愿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赞美我们的战士的优良品质。的确，当战士们把朝鲜妇女当作自己的母亲和姊妹看待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那条不许谈恋爱的纪律，因为他们连做梦也想不到所谓“儿女私情”，哪怕是最纯洁、最高尚的爱情。过去有一个时期在朝鲜志愿军部队的数目相当大，我们的战士跟朝鲜妇女接触的机会非常多，他们帮助朝鲜妇女劳动，给她们挑水、舂米、打柴、割稻、春耕、插秧……他们也受到朝鲜妇女的照顾。他们跟朝鲜人民和睦相处，有如家人、亲戚。志愿军和朝鲜人民、朝鲜妇女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战士常常赞美朝鲜妇女的勇敢、乐观、活泼、热情、刻苦、耐劳；朝鲜妇女也像对待家人似地热爱我们的战士。我住过好些朝鲜人家，见过好些善良的朝鲜妇女，也受到她们的好心的照顾，我还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朝鲜妇女对志愿军战士的“同志爱和亲人爱的感情”的流露。倘使这种感情真如路翎所说“在一个年轻的姑娘身上就有可能发展到爱情的高度”，我们的战士“对这爱情发生了感情，就自觉地克制这种感情，拖着对人民的深刻的感情走向战场”，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爱情不像金达莱花那样开遍朝鲜呢？难道是纪律妨碍了它，还是真如路翎所写的我们的战士“献出自己的鲜血以至生命”来结束了这种“不能实现的爱情”？路翎还说：“这鲜血对人们说明，他是为了他的祖国，他的亲人，为了朝鲜人民，其中也包含着那个他虽然不能接受，但却感谢着的爱情。”这种说法是什么根据呢？在朝鲜有无数像金圣姬那样年纪的

姑娘，在志愿军里也有无数像王应洪那样的新战士，倘使他们的感情都“可能发展到爱情的高度”，恐怕连纪律都没法维护了，不然就只有让我们的年轻战士全走王应洪的路。事实自然完全不是这样。恋爱至上主义者所欣赏的爱情在朝鲜战场上就找不到。我们的战士都是阶级觉悟很高、品质优良的年轻人，他们有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他们有“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伟大抱负，所以朝鲜妇女爱我们的战士如一家人，朝鲜父老称志愿军为“王者之师”。

我还应该在这里特别提一提“英雄的妇女”这个光辉的称号。金日成元帅曾经对我们说过：“朝鲜可以引以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她们是在火和血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她们热情，但是坚强，她们能忍受痛苦，她们可以毫不顾惜地为祖国献出生命。据说她们在最伤心的时候也不哭，她们不愿意在人面前显露自己的软弱。在普遍地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惨剧以后，她们还用跳舞，用歌声，用笑语来迎接朝鲜的春天，用忘我的劳动使全朝鲜的后方充满了生命和力量。这样的妇女是得着志愿军指战员的普遍的敬爱的。我们的战士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妇女，所以他们的优良的品质更容易显露出来。

金圣姬母女不会是另外的一种人，她们应当是我们在朝鲜常常见到的母女中间的两位。她们让志愿军住在她们家里，她们抢夺他们的衣服去洗，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金圣姬“是大方而活泼的姑娘”，“唱歌跳舞都很好”，“参加过慰问战士们的晚会”，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她们母女喜欢志愿军，母亲

对待王应洪像对待儿子一样，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侦察员住在这两母女这里就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不平常和不可信的事情却接着在小说里出现了：金圣姬对侦察兵王应洪的感情却“发展到爱情的高度”，送袜套送手帕给王应洪，并且在这种一往情深的恋爱中，连她的性格也大大改变了，变得可怕的阴暗了。作者竭力去写一个朝鲜少女对志愿军战士的主动的爱情，他还否认这是“孤立的个人爱情”，他肯定地说：“金圣姬母女的感情表现着解放了的朝鲜人民在战争中对将来的坚定的、乐观的、毫不犹豫的信心。”这不过是用冠冕堂皇的大帽子掩盖见不得人的私情，并没有一点叫人信服的论据。

到过朝鲜见过朝鲜少女的人就没法把一往情深的金圣姬的形象和一般热情、大方、勇敢的朝鲜少女的形象连起来。宋之的同志把金圣姬比作“大观园里的闺秀”，虽然不能说是十分恰当的比喻，但是金圣姬的确像过去中国的某些千金小姐。至于在炮火下面成熟起来的朝鲜妇女，她们最大的愿望是寄托在战争的胜利上面，寄托在祖国的光辉的未来上面的。即使在她们个人“对于和平劳动的幸福生活的要求和信心”里面，也不单是“她烧火、担水，他在院子里收拾，然后一块儿到田地里去劳动”的这么简单的内容。像金圣姬那样“在炮火下成熟起来”的姑娘决不会像作者所写的那样“不懂得战争”，也不会像作者所写的那样，看到某一个志愿军战士的血，她的感情才受到了“锻炼和教育”。难道她嫂嫂被敌机炸死的惨剧，不曾引起她的眼泪和仇恨？当残酷的战争还在进行、美

国飞机把炸弹暴雨似地倾倒在朝鲜的城市和乡村的时候，朝鲜的少女（尤其是终年吃着酸菜和杂粮，连裙子都打了补钉的少女）不会在不能实现的爱情里去寻找安慰和鼓舞，她更不会因为感激志愿军战士帮忙劳动，就产生"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和想象"，而发展到狂热地单恋的程度。我们有这样一种体会：朝鲜人的感情是外发的，不是内向的。倘使朝鲜少女喜欢什么人，她会大方地说出来，不会脉脉含情装模作样，或者扮演佳人花园赠金的悲喜剧。而且志愿军帮助朝鲜家庭劳动是一种极普遍的群众工作，是众人皆知的我们部队的一个优良传统，并非个别的单独行动。这个优良传统是建筑在战士高度的阶级觉悟的基础上面的。在真实的朝鲜战场生活里，我们的战士并没有遇见过金圣姬，而朝鲜姑娘也没有遇见过王应洪。因为生活里并没有这样的人。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一个小通讯员跟着一位作家住在朝鲜村子里，他有时候帮忙隔壁人家做田里工作，或者舂米、挑水。那个人家只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孙女。有一天老夫妇把通讯员请去谈话，要把孙女嫁给他。他们为这件事已经在前一个夜里仔细商量过。姑娘也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当场一口谢绝。他对他们说，他喜欢他们一家人，可是他把他们看作爷爷、奶奶和亲妹子。他的光明磊落的行为终于得到他们的了解，因此在通讯员和朝鲜姑娘之间并没有产生不必要的悲剧；也没有人"向班长反映情况"，倒是通讯员自己严肃地向指导员"汇报"了。那个热河省的翻身农民在朝鲜也曾参加过小的战斗，对朝鲜老百姓有深厚的感情，他也曾跟着我跑过几个地方。他的故

事是别人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的。他在朝鲜生活得很勇敢，也很快乐。真实的王应洪应当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朝鲜我常有机会跟年轻战士谈话，或者听他们在休息时候闲谈。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始终找不到任何与“爱情”有关的线索。有些年轻战士有“对象”，有“未婚妻”，也有些已经结了婚，还有好些人根本没有想到“找对象”的事。万一接触到“爱人”、“结婚”、“对象”这一类的问题，从他们的诚实的谈话里，我也找不到什么隐秘的感情。他们把爱人看作能够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劳动、互相鼓励、互相帮助的伴侣。他们从来不离开集体去想望个人的幸福。即使在他们的未来的远景里，和平劳动的幸福生活也是跟祖国的繁荣富强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能够毫不迟疑地把婚期延迟或者离开新婚的妻子出来抗美援朝。

前年年底，在停战后的朝鲜，我和一个十九岁的山东战士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掩蔽部里谈过半天话。这个小通讯员跟着我跑过好些地方，我们已经很熟了。他谈起他的家，他说他有个“对象”，是他在一个讲习班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不错。他报名参军的时候，没有先征求她的意见，他耽心她会“拖他的后腿”。可是他出发前他们在一个地方遇见了。她已经知道了那个消息。她跟他谈了一阵就哭起来了。他却耐心地开导她。他讲到保家卫国，讲到国家现在需要他，讲到他们从前和现在生活的对比，讲到年轻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最后讲到：“你是团员，你应该因为我参加抗美援朝高兴，你应该鼓励我积极工作争取立功才对”这一类的话。终于讲得她满意地笑

了，他才送她回去。他在旧历正月初三离开家，在朝鲜不到一年，给她去过一封信，她没有回信，但是从他母亲的来信中，他知道他的“对象”过得很好。他没有带来她的任何“纪念物”，但是他工作得很好，他不断地从上级和阶级弟兄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我喜欢这个活泼、能干而且有点文化的翻身农民，参军前他在乡下也做了不少工作。他讲起话来眼睛非常明亮。他常常想念他的母亲。有一天谈起他要给母亲汇钱，他说：“她到天津我姐姐家去了。不然，今年她一个人在家过春节，她会哭的。”这个热情的青年爱他的母亲，也爱他的“对象”。他没有从“爱情”那里去找寻安慰和鼓舞。然而在一切与“荣誉”和“责任”有关的事情上，他总是争先恐后的。我知道有不少像他这样的青年，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的确是“为祖国”，并不是“为爱情”。在朝鲜，志愿军一提到“祖国”就充满了感情。“祖国”两个字里面包含了许多东西，但是并没有那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

然而那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却变成了《洼地上的“战役”》的主题。一群庸俗、自私的恋爱至上主义者穿上志愿军的衣服在小说里出现了。“团政治委员”会命令侦察员去摸二线阵地上自己人的哨。“钦佩和友爱的感情”会使“朝鲜战场上的一等功臣”让新战士缴了枪。“团参谋长”会根据“有点老交情”的理由把毫无战斗经验的新战士调去“增强”侦察排，这一切安排无非为了介绍十九岁的新战士王应洪和十九岁的朝鲜姑娘金圣姬见面，给他们的“爱情”准备条件。

难道真有不认真考虑问题只凭个人一时的爱好和兴致处

理事务的志愿军指挥员吗？在朝鲜的防御战中，哪怕是发动一次规模很小的反击战，也都要经过事前周密的计划和布置。一切都要安排得很好：要准确，也要有把握，因为只要有一点小小的疏忽都会给部队带来伤亡，招致失败。我们的指挥员都是爱兵的，他们把战士的生命看得非常宝贵；我们的指挥员都是爱国的，对于他们，任务高于一切，胜利高于一切。连一次十几分钟就解决了的小战斗，军长也会到师指挥所甚至团指挥所去亲自指挥。我认识的那位军长还带我去山头观战，他那种全心全意争取胜利的精神真叫人感动。有一次因为一个副连长传达命令有一点错误，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他和师长认真检查，终于查明了责任，等到布置了新的任务，取得了新的胜利，他才松了一口气。的确，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每一次的胜利都不是轻易得来的。我们对付的是装备优良的头号帝国主义的王牌军队，单凭战士们的勇敢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没有一个指挥员会在备战工作紧张的时期，调新战士去担任侦察员，除非已经到了无兵可调的地步。党委也不会同意这种调动。因为这样做无异乎拿战士的生命去冒险，拿人民的利益去冒险，万一任务不能完成，受到损害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单从这些细节来看，从一两个志愿军指挥员的作风来看，也可以明白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志愿军的不是一路，而是正相敌对的了。

我们再看路翎怎样描写王应洪的思想感情。我们单看这个战士对朝鲜姑娘金圣姬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班长怀疑他"可能不知不觉地对金圣姬流露了什么"，找

他谈话，他含着泪说："我真是对她一点心思也没有。"

金圣姬"不再和他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心里开始出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甜蜜的惊慌的感情"。

他把金圣姬偷偷塞在他衣袋里的袜套交给班长，班长要他退还给她。但是出发的那天他换衣服，又"发现了那双袜套，还增加了一条绣着他名字的绣花手帕"。"他顿时心里起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他"第一个念头是想汇报给班长"，但是后来"他想……等完成任务回来再说吧"。"当然这时候他是想留下那条手帕。于是他把它仔细折起来，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连长陪同团参谋长来看他们的时候，班长严厉地惊心动魄地喊了立正的口令。""……特别因为他怀里揣着的绣花手帕，这(口令)也才是他的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这绣花手帕又给他带来了他所不熟悉的模糊而强大的感情。""他现在也代表母亲，也代表那个姑娘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

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贴在路边上杂草中间趴着，紧握着他的枪"，"……他努力去想到连队、团参谋长、亲人们……后来他又想着母亲"，"于是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她在舞蹈。看见了她的坚决的、勇敢的表情，他心里有了一点那种甜蜜的惊慌的感觉，他说：'你别怪我呀，你不看见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吗？'"

第二天他已经受了伤和班长两个人留在敌人阵地上等待天黑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了。他"以他的全部的年

轻的热情梦见了金圣姬。”“金圣姬跑了出来，问他：‘我的手帕你留着啦？’他说：‘留着啦。’这时朝鲜姑娘们一起围上来了，……欢迎他唱歌，他很慌张，金圣姬说：我代表他吧！于是舞蹈起来。她是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母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

以上这些似乎写得颇有诗意，然而它们绝不可能是那个响应保家卫国的号召走上前线的翻身农民的思想感情。在贫穷和饥寒中过完了幼年和少年时代的王应洪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知识分子的恋爱，他来到朝鲜是为了保卫他那翻身后的幸福生活，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建设。但是到了部队以后，因为同志们疑心他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因为朝鲜姑娘两次把袜套偷偷塞在他的衣袋里（并且在出发时还增加一方手帕），他就居然会想到什么“明朗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课”，而且在敌人阵地上执行任务的时候，会想起那个姑娘，会想起她在舞蹈，会起了“甜蜜的惊慌的感情”，会自言自语：“我把你的手帕收下了。”会梦见朝鲜姑娘贴着他母亲的脸唤妈妈，说：“我是你的女儿！”……这就是说，他已经把金圣姬看作自己的妻子了。这种思想感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种爱情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作者笔下的王应洪突然从新中国的翻身农民和志愿军的年轻战士摇身一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美国少爷兵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谎话吗？

路翎在他的“反批评”里一再称王应洪为“优秀的人”，“优秀的战士”，“英雄的战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王应洪对

金圣姬的感情已经发展到了那样的“高度”，倘使他不英勇牺牲，却活着回到部队里，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不用说，他一定严重地违反纪律，堕落下去。他就只有这一条路走。按照路翎的安排，不但金圣姬母女会把他拖上这条路，而且他的班长，指导员，甚至团首长都会鼓励他，带着他朝这条路上走！

路翎笔下的王应洪的性格里并没有无产阶级的“崇高”、“宽阔”、“朴实”、“忠诚”，也没有我们的战士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因此他不得不用“英勇牺牲”来维护王应洪的“荣誉”了。路翎说，“王应洪的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小说的内容上所表现的思想意义”是“牺牲个人，为全体人类的幸福而斗争”，可是读者却不得不这样想：倘使没有那一条纪律，王应洪和金圣姬的幸福就不会被破坏了，王应洪也不必用“自我牺牲”来解决他自己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一了百了”了。魏巍同志把《洼地上的“战役”》看作“一本对革命纪律有血有肉的控诉书”，是完全对的。

其实王应洪的“自我牺牲”也是不真实的。在路翎的小说里，王应洪的班长故意单单叫这个年轻的新战士留下来让他有机会完成“自我牺牲”。班长为什么用新战士来掩护老侦察员撤退呢？作者自己说，班长“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单单命令王应洪留下来”，这就是说这个“威望极高的班长和代理排长”在战场上会发出连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的命令（朝鲜战场上居然有这样的侦察班长！居然有这样的一等功臣！）。作者却替他想出了三个理由①，其中有一个是他“想到了那件使他不安的爱情，金圣姬那个姑娘的眼泪。”路翎说：“也许他觉得

叫王应洪留下来从事这个绝妙的、但也是殊死的战斗，就会给那个姑娘，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带来一点抚慰，并且加上一种光荣。”路翎甚至肯定地说：“他是看见那个姑娘的那么辉煌的幸福表情的。”这就是那个挨着地主鞭子长大的出色的老侦察员的思想感情吗？为了给姑娘和那爱情带来“抚慰”，加添“光荣”，就命令新战士留下来从事“殊死的战斗”，这是什么一种思想感情呢？这和路翎所夸耀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感情”有什么共同点？这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有什么关系？不管作者用了种种好听的名词来掩饰他的企图，他却把这个庄稼人出身的身经百战的一等功臣，朝鲜战场上的老侦察员写成一个糊涂的个人主义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为了爱情他不惜把一个青年战士置之死地。要是他不留下王应洪，王应洪就不会牺牲，王应洪不牺牲，金圣姬的爱情就必须破灭。所以班长王顺故意安排了青年战士的牺牲来成全金圣姬的爱情，让王应洪永远属于金圣姬。难道作者看不出来这样的安排不等于“借刀杀人”么？可怜的王应洪就这样地给逼得无路可走了。

班长王顺第一个觉察出来金圣姬爱上了王应洪，开始为“这母女两个的动人的、热切的感情”“担忧”，“就时刻害怕他（王应洪）会出岔子”，而且疑心王应洪“可能不知不觉地对金圣姬流露了什么”。其实王应洪在这时候“什么也没有觉察出

---

① 头两个理由是：“想要锻炼一下这心爱的战士……想要叫这年轻人看一看、学一学他这个老侦察员怎样战斗。”这两个理由也是同样不能成立的。他当时应该考虑的是：怎样的安排对战斗最有利。

来”，这是路翎自己告诉我们的，而且路翎后来还叫王应洪亲口说：“我真是对她一点心思也没有。”那么事情显然是这样：班长首先注意到了朝鲜姑娘的“变化”，就把“爱情”派给他“特别喜爱”的新战士。“金圣姬的纯洁、赤诚的眼光使他困惑”。金圣姬的“一举一动”……“使他感到模模糊糊的苦恼”。他甚至对王应洪谈起“咱们房东那姑娘”①。话还没有谈完，“他又想起了金圣姬姑娘的那一对热诚的眼睛”。

在这次谈话以后，王应洪“才回想起这些时来金圣姬姑娘的神态，觉得果然是有些什么的，心里很不安了”。可见还是班长帮助王应洪认识了金圣姬的爱情的。

这还不够，王应洪把金圣姬送袜套的事向班长汇报了，班长叫王应洪把袜套还给金圣姬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一定会使那姑娘委屈，但是没有办法”。

在农村剧团的慰问演出结束以后，姑娘们欢迎王应洪唱歌，班长两次注意到“金圣姬的脸上闪耀着多么辉煌的幸福表情”。

侦察排离开村子的时候，班长王顺看见“姑娘哭着擦过他身边。他站下来叹一口气。‘这姑娘呀，我也不是没有妻子儿女的人，这叫我怎么才能跟你解释呢？’”

在敌人阵地上和受了伤的王应洪一块儿躺在小沟里的时

① 路翎说是班里一个战士向班长“汇报”，“认为王应洪可能有了超越了军队纪律所容许的行为。”除非王应洪真有这种行为或者暴露了这样的思想，他的阶级弟兄绝不会完全根据个人的揣度去向上级反映情况，可是根据作者所写的看来，王应洪最初并没有一点可指摘的地方。

候，班长问他的战士"你还想着金圣姬那姑娘不"，并且"把金圣姬姑娘也巧妙地拖到他的论据里面来"①。他说："咱们也是为她。……咱们回到家，再到村子看看，金圣姬跟她妈见到咱们可要多高兴啊。"他想用这个"打动青年战士的心"。而且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姑娘的闪耀着灿烂的幸福的面貌"。接着"他替这个……没有可能实现的爱情觉得光荣"。"于是他觉得他拖着王应洪在山沟里一寸一寸地前进……也是为着这姑娘"。因为"她曾经在那黄昏的山坡上掩面哭着从他的身边跑过，于是他觉得他是对她负着一种他也说不明白的道义上的责任"。他怜惜她不懂得战争②。"他觉得他真是甘愿承担战争里的一切残酷的痛苦来使她获得幸福"。

这还不够，班长"爬进栗子树林进入这条小沟，替王应洪裹着伤，要他吃馒头，拿纪律来强迫他，哄他，又对他小声地说着话"的时候，班长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一切动作都好像在对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说：你看，我是要把他带回来再让你看看的，你要知道我爱他并不比你差，我更爱他，而且，你看，我决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

这最后一句话不是赤裸裸地说明了班长王顺自己对纪律的看法吗？是不是真有一个朝鲜妇女因为我们志愿军遵守纪律就把他们当作"不通情理的冷冰冰的人"？难道作者在朝鲜

---

① 这是班长对战士的"教育"，还是"腐蚀"？还是班长自己爱上了那个姑娘？

② "在炮火下成熟起来"的金圣姬会不懂得战争，哥哥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嫂嫂被敌机炸死的朝鲜姑娘会不懂得战争！这是绝不可能的。

见过这样的姑娘?不然王顺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对他心里的金圣姬姑娘"道歉般地解释？路翎说"他心里的姑娘"，我们不知道指的是王应洪的心还是王顺的心？事实上班长王顺这些时候来心里就一直不停地在想着那个金圣姬姑娘！所以路翎接着就写道：

"说来奇怪，他所耽心，所反对的那个姑娘的天真的爱情，此刻竟照亮了他的心，甚至比那个年轻人自己都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个。"所以王应洪把绣花手帕交给他的时候，他"展开手帕来看了一看，想了一想"，就又塞回在王应洪的口袋里去了。

"这手帕此刻竟这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使他又想起了金圣姬的所有的美好的希望。……在将来他们终归会给这姑娘奋斗出一个和平的生活来，她将要结婚并生育儿女……"①

于是在他和王应洪之间产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 "你留起来吧。"
>
> "不，这违反纪律。"
>
> "我相信你，同志。留着吧。回去我汇报给连部，我想连部会同意你收下的……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哪个同志会批评你不对的。"
>
> "我要这个没有道理呀，"年轻的侦察员坚持地说。
>
> "你留着吧，"班长同样坚持地说。

这更说明了班长王顺对"爱情"和"纪律"的看法。

---

① 照这种描写看来，好像王顺自己爱上了那个姑娘，怀着这么深的爱情。

这还不够，在王应洪牺牲以后，班长还奉了团政委的命令去看金圣姬姑娘，把染了血的手帕给她，而且给了她“一张王应洪的照片”。

班长王顺为着他所念念不忘的“爱情”已经尽了他的一切力量，他不能够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他不但尊重这“爱情”，他还肯定了这“爱情”。他不把王应洪的照片寄给烈士的母亲，却把烈士的遗物交给了朝鲜姑娘，好像她是烈士的亲人，好像王应洪已经用“牺牲”打破了纪律似的。他甚至还想对姑娘说：“请你永远地记着他吧。”他还希望金圣姬永远地记着这“爱情”。

侯金镜同志说：“王应洪牺牲了，而同时‘鼓舞’他们前进的爱情也破灭了，故事结束时的感情就不能不是阴暗的。”路翎不同意这个意见。的确路翎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种结局：“爱情”并没有破灭，它反倒因为王应洪的牺牲而成为永生的了。金圣姬会永远记着它，班长王顺也会永远记着它。这爱情永远是“鼓舞”他们的力量。班长王顺苦心经营的就是这个结局。那个“看见姑娘的笑容就高兴、但也因了姑娘的忧愁而有些不安”的指导员，那个“像哄小孩一样对王应洪耳语、把面孔通红的王应洪拉出来”唱歌给姑娘们听的指导员一定会同意这个结局。嘱咐王顺去把染了血的手帕当作纪念品送还给姑娘的团政委也会赞美这个结局。因为这样的结局使得“爱情”战胜了“纪律”。金圣姬保存了王应洪的遗物，保存了染满王应洪最后的血的手帕，再没有人能把王应洪给她抢走了。笼罩着全篇小说的就是这样的使人丧命的“爱情”。但是

这样的"爱情"跟志愿军的指战员和朝鲜姑娘不会有丝毫的关系。在朝鲜战地上生活与战斗的人决不可能受这种"爱情"的支配。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感情中决不会搀杂有一点点这样的东西。但是通过这篇小说，路翎却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爱情"笼罩在朝鲜战场上，而且支配着我们指战员的思想感情！

这明明是睁起眼睛在撒谎！理由很简单：小说的作者敌视和痛恨那些真实的东西。因此他就按照自己的思想立场来"改造"现实生活里的人们，把作者自己的思想装在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身上，让那些人说作者心里的话，遵照作者的指示而行动。用卑鄙的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用腐朽的自由主义代替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思想感情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用颠倒黑白的办法来达到反革命宣传的目的——这就是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被揭露以后，作为这个集团骨干分子的路翎的"作品"，是在为什么人服务，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1955年5月底。

援救罗森堡夫妇*

美国政府在法律上大谋杀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两个正直、善良的年轻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朱利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夫妇在美国死囚牢中发出追求真理的信仰呼声。这两个人不但与美国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罪名无关，他们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就是在死囚牢中他们仍然保持良心的清白。他们跟每个正直、善良的人一样“忠实于正义和友爱”①；他们爱自己的生命；他们爱“和平与面包”，爱“玫瑰与孩子们的无邪的笑”。他们在做了“政治阴谋的牺牲者”以后，还不愿意“放弃人类的自尊”，不愿意“放弃为民主、为理想的道德的斗争”。他们在辛辛监狱的高墙后面，还相信“人性不可摧毁”，还相信“真理照亮一切善良的人们的眼睛”，还信赖“一切有足够勇气、善良和明智的人们”② 会帮助他们恢复自由。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这样的两个善良的美国公民，这样的一对彼此相爱的年轻夫妇，美国联邦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了他们的死刑，高等法院驳回了他们的上诉，美国总统艾森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①② 罗森堡夫妇自己的话，这些话都是从他们的非常感动人的信函里引来的。

豪威尔不顾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抗议，拒绝撤销对他们的判决。法律上的门就这样地关闭了！电刑已经在等着这两个无罪的人了！美国统治阶级又一次在全世界善良人民面前露出了他们的残酷嗜杀的狰狞面目。他们想用电椅来回答全世界善良人民的抗议，用血来维持他们的残暴统治。美国的统治阶级不止一次地触怒过全世界人民的良心，不止一次地面对着全世界的舆论无耻地发出“法律胜利了！”的欢呼。一八八七年伊利诺斯州因为绞死五个劳工运动的领袖得到“谋杀者”的称号。一九二七年马萨诸塞州因为杀害了两个意大利工人让全世界人民称为“凶手”①。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横暴地拒绝过全世界人民正义的要求和抗议的。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一个美国人写过这样的话：“今天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挂起美国国旗，就得找人保护；它(美国国旗)已成了大不义的象征了。”美国的法律上一直染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在芝加哥绞刑以后六年，伊利诺斯州的新州长曾经复查案件，发布文告，证实法官的受贿枉法，他甚至于承认“这样凶狠残酷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在波士顿电刑以后二十六年中间，马萨诸塞州始终无法洗去它的耻辱的称号，许许多多的文件不断地证明，法官完全依据阶级的和政治的成见枉法杀人。

现在又轮到善良的罗森堡夫妇来做牺牲者了。不管有多少事实证明他们清白、无辜，不管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善良人民

①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民族周刊》的封面上用大字印出一篇文章的标题：《马萨诸塞州，凶手》。

怎样要求重视他们的生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审判，美国统治阶级还是准备用法律的谋杀来维持它的法西斯统治。正如一个狂人决不会自己停止疯狂的举动，除非有人出来制止它们。

一九二七年萨柯和樊塞蒂在电椅上被烧死以后，第二天的巴黎《日报》上写着："罪恶完成了，文明世界反对不义的暴政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了。我们要求正义，要求宽仁……这些都是白费的了。没有人来听我们。至少没有人来答复我们。弗勒(州长)打高尔夫球去了，柯立芝(总统)钓鱼去了。这两个无罪的人为了增加美国官吏的更大光荣而牺牲了。然而我们在这苦痛的时候应当怎样想呢？"

这是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呼声。这样的呼声在二十六年前并没有把两个无辜者从电椅上救下来。但是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让新的无辜者死去。援救罗森堡夫妇，不仅是援救两个年轻有为的生命，这还是在保卫正义，挽救文明，这是在进行善与恶的斗争。这个斗争关系着一切善良人民的命运。我们不能因为远隔重洋而庆幸自己已经得到自由；作为人类一份子，我们就应当承认我们跟一切善良人民的休戚相关。正如罗森堡夫人所说，保卫他们也就是保卫我们自己；挽救文明也就是保卫人类的美好的将来。我们必须制止这个谋杀的行动。不然，在悲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袖手旁观，我们拿什么话来回答他们！二十六年前巴黎《新闻报》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悲剧的幕落下来了。刽子手的胳膊是拉不住的。"可是今天，全世界善良人民决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必须拉住刽子手的胳膊。我们有这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地伸出我

们的援救的手，发出我们的抗议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会送到美国人民的耳边。美国人民会伸出手来迎接我们的手。善良的人民决不能睁着眼睛旁观无辜的同胞的死亡。他们不会忘记历史的惨痛的教训，他们也应当记得祖先们维护正义争取自由的光荣传统。那么他们应当打开杀人场的门，从阴谋中救出他们的受难的同胞。这样他们不仅挽救了国家的名誉，他们也保卫了自己的幸福和孩子们的将来。

我们不要忘记，当示威群众的抗议声震动了美国驻外使馆和领事馆的门窗的时候，罗森堡夫人在阴暗的囚牢里给她的孩子们写信，她告诉他们："有一件事在苦恼着我，就是我永远找不到可以告诉你们我怎样热爱着你们的字句。"

母亲的心里永远充满着这种不能用言语说明的热爱。每个母亲都了解这样的爱。每个人爱家里的孩子，一定也愿意所有的母亲都爱她们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还有人袖手旁观，让一个善良的母亲忍受这种痛苦呢？为什么还有人肯让一种残暴的力量夺去那些孩子的幸福，使他们成为孤儿呢？为什么还有人视若无睹地让两个无罪的人在电椅的阴影下面苦苦地挣扎呢？

罗森堡夫妇并不是为着他们自己在挣扎。他们明白地说："我们不愿意死，我们还年轻，我们需要长而且有益的生命。"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一切社会责任"来换回生命。"没有活的权利，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为了维护"人类的自尊"，为了维护正义，为了"追求真理"，在进行这个"道德的斗争"。他

们确信“最后人们终于会明白我们斗争的意义并且和我们结合在一起追求真理”。

和他们结合在一起追求真理——现在不能再迟疑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应当记住他们的话："快快地行动起来"，用实际的行动来表示人类的休戚相关。

我们的休戚相关会把他们从刽子手的手中救出来么？会把他们送回到他们的美满的家庭，他们所热爱的孩子们那里么？会把他们送回到明媚的阳光，自由的空气，幸福的生活，善良的人民中间来么？

回答是在我们的口中。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必须显出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团结的力量。①

1953年3月。

① 罗森堡夫妇终于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被处死刑，死在电椅上。真是："法律上的大谋杀完成了，悲剧的幕落下来了。刽子手的胳膊是拉不住的。"但是无论如何，美国统治阶级杀不死罗森堡夫妇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斗争*

全世界的目光今天都集中在印度的领土果阿：印度的爱国者在自已的土地上继续不断地受到葡萄牙殖民当局野蛮统治的迫害。今年八月十五日(印度独立纪念日)，大批没有带武器的印度志愿人员高举着印度国旗，进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领的印度西海岸的土地果阿、第乌和达曼，支援果阿人民的和平抵抗运动。葡萄牙殖民当局却使用自动武器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印度公民进行血腥的屠杀，造成死伤两百多人的惨剧。印度人民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支持。全世界的舆论一致愤怒地谴责葡萄牙殖民当局的暴行，全世界的良心一致沉痛地悼念为祖国献出生命的印度爱国志士。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发出正义的呼声：葡萄牙殖民者应当马上离开印度共和国的领土。

果阿同第乌和达曼一样，都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领土。尽管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这三个地方霸占了四百多年，但是不论从地理、种族、语言、文化、经济哪一方面来说，它们今天仍然是印度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剥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文艺月报》九月号。

削和武力镇压，并不能征服果阿人民的心，也不能改变印度的历史和现实。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果阿的爱国者门尼塞斯·布拉甘查就代表果阿人民宣布：果阿决不放弃它的自由斗争的传统，和要求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印度的愿望。今天果阿人民的共同愿望仍然是回到自由、独立的祖国的怀抱中过和平、劳动的生活。获得自由的三亿五千多万印度人民也不能容忍外国殖民主义者继续占领他们的任何一小块土地、奴役他们的任何一部分同胞。几年来印度政府一直争取通过谈判的方式来和平解决果阿的问题，但是葡萄牙政府不但无理地拒绝这种合理的建议，反而加紧它的残暴的殖民统治，最后甚至用严厉的镇压和血腥的屠杀来对付印度人民的爱国运动，并且无赖地宣称印度人民"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权"，居然说这种镇压和屠杀是"保卫果阿的公民，保卫他们的生命、历史和文化"。

觉醒了的亚洲人民不会相信这种漂亮的谎话。正相反，跟殖民者打过长期交道的亚洲人民很了解殖民主义者口中的"生命"、"历史"和"文化"的意义是什么。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四百年的野蛮统治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果阿人的"生命"，但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土地上称王称霸的"历史"是一去永不复返的了。殖民主义者的那种侵略、剥削的"文化"，也跟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烟消雾散了。今年四月初亚洲国家的代表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公开地谴责了殖民主义，并且要求葡萄牙政府把果阿、第乌和达曼三个地方和平地移交给印度联邦。四月十八日亚非二十九国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公开宣布"殖民主义在它一切的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根除的祸害"。

亚非各国人民正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生命、历史和文化"，才发出这样庄严的宣言。他们有决心也有力量"保卫他们的生命、历史和文化"。尽管葡萄牙政府公然宣称果阿是"北大西洋联盟范围以内"的土地，尽管它还做着用武力维持殖民统治的好梦，以为"靠了某些大国的支持"，就可以长期霸占印度的领土，但是亚非十四亿以上的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不容忽视的。葡萄牙政府今天有什么理由来阻止印度人民收复他们自己的神圣领土呢？连葡萄牙国内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在征集签名要求葡萄牙军队撤离果阿。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过："如果中国政府为台湾而激动，那么你可以想象印度人民为一块印度土地会有怎样的感受。"我访问过印度，亲眼看见印度人民这种感情的表现，而且也深受感动。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印度人民曾经举行过"撤出台湾日"运动，支援我们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斗争也感到无限的同情，完全理解印度人民对殖民主义者的憎恨和对祖国的热爱，而且完全支持印度人民的正义的斗争。

印度人民是一贯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从来没有侵占过任何国家的领土。印度人民有着值得骄傲的、丰富的、古老的文化遗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一首题作《印度》的诗中说：

你教导战士们在正当的战争中

一再地宽恕敌人……
你教导管家人打开大门
欢迎邻居，朋友，客人和孤儿。

然而同时印度人民也有他们的长期斗争的传统。印度人民正在准备纪念一百年前的大规模的起义。用莲花和面包作信号的一八五七年印度人民反抗侵略的革命斗争，一直是印度作家和艺术家喜爱的题材，强西王后骑着战马前进的英雄形象，至今还鼓舞着印度人民①。印度报纸说："葡萄牙的镇压吓不倒我们。"的确，英勇的印度人民是任何武力所吓不倒的。

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各界人民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大会上充满信心地说："果阿和印度人民在收复果阿的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话。中国人民和亚洲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热烈同情并且坚决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正义斗争。印度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葡萄牙的殖民主义者要是不认识这个真理，要是不认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力量，要是不肯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移交的问题，要是不肯友好地自动撤离果阿，他们一定会狼狈逃窜地给赶出去！印度的领土——果阿，第乌和达曼，一定会回到印度共和国的怀抱！

1955年8月28日。

① 印度彩色影片《强西王后》，就是描写强西王后的英雄事迹和她最后的壮烈牺牲的。

一件万分愉快的事*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对那些健忘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说，应当是一声警钟。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城解放广场上对着几十万人民宣布把国际苏彝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说："我们收回应当属于我们的东西。苏彝士运河是由埃及的工人并且是用埃及的钱①开凿的。"他又说："在开凿苏彝士运河的时候，有十二万埃及工人死亡。"他还说："苏彝士运河的航道是公共的，是属于埃及国家的"。这些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连成天做着炮轰亚历山大城的好梦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没法改变它们。这一次埃及政府合法地行使主权，使埃及领土上的运河归还埃及人民，"消除了外国势力的最后一点痕迹"，这正是埃及人民九十年来朝夕想望的事，无怪乎健康的欢笑声会响遍尼罗河畔了。而且谁都可以想象到这样的欢笑声对那些刚刚获得独立与自由的人民和那些正在为着独立与自由斗争的人民有多大的鼓舞力量。谁也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新闻日报》。

① 运河开凿费一千七百万英镑中，一千六百万英镑是埃及负担的，可是运河公司股票大部分都给英法两国攫取去了。

可以想象到那些现代的狄斯累利①为了一本万利的生意的被迫停业，为了运河控制权的突然丧失而多么痛心，多么生气。

这些天来我们听惯了整个非洲的欢笑声，听惯了全世界人民支持埃及的正义的呼声，同时我们也听够了现代狄斯累利们的战争的叫嚣和“国际管制”的花言巧语；最近我们听到了关于伦敦会议的一些消息，也听到了纳赛尔总统的广播演说：“如果必要，我们将战斗到死来保卫我们的独立，保卫我们对运河的主权，保卫我国人民的生活与和平劳动的权利”，还听到了阿拉伯国家准备跟埃及并肩作战的庄严声明，更听到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支援埃及的公正的意见，现在我们可以这样地断定：那些外强中干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即使把他们的花招全部使出来，也没法把苏彝士运河的主权再从埃及抢走。他们正在装模作样，好像有决心把军队再送到埃及，可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两个多月前最后一批英国军队才从埃及苏彝士运河区撤走。在埃及领土上驻扎了七十四年的英国军队的最后撤退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景象。地中海口塞得港的英国驻军司令约翰·拉西在坦克登陆艇上没精打采地说：“这对于我们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回到“文明摇篮”的埃及，再在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金字塔下面昂头阔步了，他也知道像这样“不愉快的事”以后还有很多，很多。

---

① 狄斯累利：一八七五年花四百万英镑收买了运河公司一部分股票的英国首相。

站在塞得港海滨的勒赛卜斯的铜像一定看见了英国军队狼狈撤退的情形，要是铜像能够说话，他一定会同意约翰·拉西的意见吧，这对于他也该是多么不愉快的事！我了解这种心情。因为在约翰·拉西这一类人感到万分“愉快”的日子里，我曾两次到过这个地方。我曾经在勒赛卜斯铜像下面徘徊过一些时候，我看见那个法国人左手拿运河图，右手指红海，眼睛望着地中海的得意神态，我为埃及人民所流过的血汗和所牺牲的生命，感到万分愤慨。我第一次到塞得港是从苏彝士运河来的。我经过了红海的风浪以后，走过风景幽美、水明如镜的苏彝士运河，看到水面落日的霞晖，也看到深夜河口明亮的灯光，我很感谢埃及人民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幸福。勒赛卜斯铜像的石座上用拉丁文刻着这样的话：我开凿了这个地方。多大的口气！十二万人的白骨造成了一个人的光荣。开凿运河的十年中间埃及人民的苦难，我们可以从一部美国影片《苏彝士》中看出来。这部影片本来是为了宣传殖民主义者的“功绩”而摄制的。影片中的英雄自然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的勒赛卜斯。可是有心的观众一定看得出：历尽千辛万苦完成这件伟大工作的究竟是些什么人。那种可怕的沙漠上的旋风绝不会伤害到狄斯累利们的一根头发。千百万埃及母亲的眼泪给勒赛卜斯换来了法国政府的勋章。拿破仑三世的宇仁妮皇后参加豪华的开河典礼的时候，她一定以年轻的法国冒险家勒赛卜斯的“功绩”自豪吧。可是不到两年，连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也崩溃了。我想起了我国清末诗人黄遵宪咏“苏彝士河”的七绝的后面两句：

海客欢呼土民怨，
债台高筑与天平。

这两句诗说尽了殖民主义者的剥削、掠夺的罪行和埃及人民过去无处伸诉的痛苦。可是埃及人民的痛苦终于取得了代价。埃及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今天的埃及是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它在非洲有无数愿为它的独立战斗的盟友，在全世界中还有数不清的支持它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它所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它所从事的事业是光荣的事业。连埃及的敌人也不会怀疑埃及在这个斗争中的最后胜利，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叫嚣和活动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最后挣扎罢了。这对于约翰·拉西以及现代的狄斯累利们的确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件万分愉快的事。

1956年8月20日。

后　记

我在解放后所写的散文，除了收在《华沙城的节日》、《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三本集子里的二三十篇文章以外，还不止这么一些。这次我挑选了十九篇长短文章编印一本小册子，并非把它们看做可以传世的杰作，我不过珍惜我的拙劣的文字中所流露的一点感情。我的文章里虽然也常有别人没有说过的话，但是那一点感情却是大家所共有的。所以我决不是读者的教师，我倒愿意做读者的知己朋友，以便在读者面前毫无拘束地谈心。在“大欢乐的日子”里，人们的欢乐的感情是可以互相传染的。倘使这些文章能够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一点点鼓舞和启发，它们的作者就万分满足了。

巴　金 1956年8月24日。

附　　录



作家靠读者养活*

——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与徐开垒的谈话

徐开垒：巴老，传记（指《巴金传》）我已写完了上半部，《小说界》双月刊连载也已有一年，不知您是不是每期都看？这样写，行吗？想再听听您的意见。

巴金：我是个病人，没有精力按期翻看传记，也没有时间和你常交谈，很抱歉。书中个别情节与事实有些出入，以后最好修改一下。如有关成都老家三叔的记述，有些描写过头。文章中说，"在大家庭中，三叔则串通五叔或黄姨太，制造各种事端，使人感到不安。"其实，三叔不过是脾气不好，起初与我们兄弟相处得也还是不错的。我记得一到冬天，我和三哥还有濮家表哥常常到他的房里，围着火炉喝茶谈天，有时还看他写字吟诗。他与二叔都是日本留学生。二叔教过我读《春秋》、《左传》，未曾教过我日文。三叔在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事务所里还有一个姓郑的书记（秘书），吃过晚饭后我常去找郑下象棋，有时也和三叔下。郑是江津人，有一回郑请假回家，三叔写了一首诗跟我开玩笑："跃马人何在，争车愿又乖，电灯

* 本篇发表于一九八九年一月《文汇》月刊第一期。

光如雪，唯有四公来。”当时家人叫我“四公爷”。至于后来认识的三哥的朋友施居甫，和我们一起办《平民之声》，那是事实；但在此之前，与我一起参加过活动的，只有袁诗尧、吴先忧等人，并不曾有他，他年纪比我大。

徐：一九二三年五月，您从成都初次到上海，经过情况我在传记中写了一些，也可能有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您能够讲讲当时的情形吗？

巴：我和我三哥李尧林一起从成都到上海来，主要是李尧林先有这个主意。当时他比我有办法，他早就有离家读书的打算。我当时还不曾想到过要离开成都去读高中和大学。是他先向我提出两个人同去，我们商量定了，才由他向大哥和继母提出要求。我们从成都出发，先乘木船到宜宾，然后经泸州到重庆，再换长江上的大轮船，经过宜昌、汉口，到达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到了上海，旅馆的接客人上船来拉生意，给我们雇了马车（不是人力车）。哪知路上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触犯了交通规章，巡捕把车夫和乘客连同马车一起拉到四马路（福州路）的巡捕房里，罚了一元六毛钱。当晚，我们兄弟俩就住在“神仙世界”① 对面的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我们才在《新申报》社找到了那个叫李玉书的亲戚。他是浙江嘉兴人，曾到四川成都去过，二叔、大哥和他熟悉，在我们临行时给我们安排去看他。他见到我们后，便把我们介绍到与《新申报》社相近的申江旅馆住宿。后来我们又跟着他去过嘉兴，在一个年逾八十的伯叔父家中住了几天，因为嘉兴是我们李姓

① “神仙世界”：当时的一家娱乐场名。

家族世居之地，这里有我们许多远房亲族。回沪后，我们去见二叔的在海关工作的姓丁的朋友，他介绍我们住到武昌路一个叫“景林堂谈道宿舍”的学生宿舍里，与许多学生住在一起，准备过了暑假考学校。后来我们考进南洋中学，三哥尧林读三年级，我读二年级。当时我们都准备读理工科，打算重头学起。

徐：您在离开成都之前，曾在一九二二年郑振铎编的《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上发表过十二首短诗，这些作品可不可以称作是你在文学创作上的“处女作”？

巴：我不这样看。当时我们大家庭里的几个兄弟，读了“五四”以后的一些作品，受了一点影响。其中冰心等人写的诗如《繁星》等，我们都很喜欢，我就跟着也写了一些。还不止我一个人，堂弟李西龄也写。我后来还写过几篇东西，不成功，没有能发表，也就不写了。小说《灭亡》才是我的处女作，这些小诗原来我早丢失了，近年来由研究者从旧报刊找了出来，我才记起来了。

徐：上次我还问过你母亲的原籍……

巴：我这个人很奇怪。我竟从来不曾想到过我母亲是哪里人。接到你的信，我问了我的两个妹妹，才知道母亲是浙江人。但她们也说不清浙江哪个县。过去我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住，还是萧珊帮我查清的。至于我的出生时间，大概在午晌以后。

徐：研究作家的生平，看他们创作进程的顺逆与时代脉搏的起伏，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既可以看到作家的崛起与成熟，也可以看到作家的挫折与衰退，以及重振与复甦；同时更

不难由此窥测时代风云的变幻。当然，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作家之间既有相似的境遇，又有个性、才能、素质的差异。研究您的写作史，首先使我惊奇的是您一开始就出现的犹如排山倒海似的创作流量。显然，那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人们带来了自由创作的环境；但是您的写作才能，从文学基础上来讲，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巴：说实在，我并没有才能。我写小说，主要是小说看得多。童年时代我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少年时代还读了很多从欧美翻译的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丛书（《说部丛书》），后来又读英文版的外国小说。但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然，鲁迅的短篇集《呐喊》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好些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雨果、左拉……

徐：您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无疑也是您驾驭文字的基础。

巴：我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书，也无非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都是私塾时代的必读书。我确实在那时背熟了几本书，不但背熟，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后来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

徐：巴老，我们对无政府主义问题是否可以这样看法：它比共产主义更早传入中国，由于它反对权力和权威，主张个人

绝对自由，所以当时一些在旧中国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统治感到不满的青年，都欢迎它，许多人受过它的影响。但无政府主义既无严密组织，又无明确教义，各人对它的理解常不相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也不完全一样，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更是各人有各人的认识。我觉得你在青年时代对无政府主义的了解也仅仅从克鲁泡特金的一本小册子开始，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所以你那时虽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却从没有宣扬过无政府主义最根本性的实质问题，这就是厌弃工业化，向往手工业劳动时代，甚至要求回到农村自然中去。您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及所读的书，给您更多的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所以从您的作品中反映出来，即使早期，也还是这方面的思想感情多。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巴：这也很难说。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化，发展。我的思想不但几十年来在不断变化，即使最近十年来，在我写《随想录》开始时，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也有所不同了。所以，我总劝别人读《随想录》，最好能作为整体来看。我对自己的思想，一时也难用几句话来说清楚。我为自己思想做总结，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一点一滴来做。做一点，是一点。我总希望能把思想挖得深一些，看得深一些。比如我对国家的认识，就有错误、有改正、有发展、有变化，也有进步。我希望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好。但到现在，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是否成熟，是否已完全正确，那也难说。对无政府主义我信仰过，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

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的心头就没有苦闷，没有矛盾，没有烦恼，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去参加革命了。但是实际上不是如此。这样我才把文学创作作为我自己主要的工作，由此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在我的思想中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那是经过人们的分析，我才认识的。这些思想显然不是根据自己主观要求而出现的。比如爱国主义，过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爱国主义，但是我后来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并不是我要有爱国主义就有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实际，在生活的经历上，看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人民受到欺侮，自己也深受其害，才意识到原来中国人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这样就觉得要爱护自己的祖国，要反抗外敌的入侵。至于知识分子对解放后的态度，在《上海文论》上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

徐：那是陈思和写的，他认为《随想录》是你后期思想的一个总结。他对不少问题的分析很好；对我今后写这本传记的后半部将有所启示。他所说的在中国大陆刚解放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犹如"发现了上帝一样的惊喜"，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道路"。而你的思想发展，正典型地表明了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您的选择对您说来是很不容易的。他说当时许多人离开了大陆，而您留了下来，并说服别人如毕修勺放下疑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您以您的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向新中国献了一份厚礼。

巴：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劝过我离开大陆，我也有许多朋

友离开了大陆，但我看到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应该与人民在一起，我不能离开人民，这就留了下来。我说，我要改造自己，从头学起。我确也劝说过别人不要离开祖国，但我没有劝说过毕修勺。毕是朱冼劝他留下来的。朱冼同他住在一起。

徐：陈思和的文章还谈到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权成立后，他们看到人民生活安定，自己又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尊重，得到“莫大的幸福”，却又似乎潜藏了一种危机，作家不再作为一名浮士德式的永不满足的个体探索者，“歌颂性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取代了批判性暴露性的文学，而一种自‘五四’始就在知识分子中间养成了的，以个性为基点的现实战斗精神悄悄地衰弱了。”而事实上，“受过‘五四’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他们在满足了温饱之余，仍然需要更高的精神渴求，需要独立思考，需要为祖国的未来作出新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精神在当时的客观上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保护，相反，它的积极性却因各种缘故而一再受挫。”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这就是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特别是许多在解放前就成名，并有很高成就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禺、夏衍等，也包括老舍和您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

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写不好自己不熟习的生活。茅盾在解放后不是没有从事过创作，他也尝试过，甚至写电影剧本，但没有成功。曹禺写《明朗的天》效果也不好，大家都知道的。刚去世的师陀，解放初期写作劲头很高，但他的长篇连载被一家报纸腰斩；另外一篇小说题目叫《写信》，是他下生活后写的，我看了还不错，但别人对它不满，说描写农村青年给志愿军写信时态度不严肃。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

徐：我在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的《社会与教育》上看到徐懋庸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巴金到台州》，也谈到当时访问您的时候，您对作家"下生活"提出看法。当时他向您提意见，说您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您回答说："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后来他又要求您到农村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你回答说："这自然很好，但并非必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我认为您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对"题材决定论"进行了批判。解放前，您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您也还是多次到农村、到矿井，尽可能争取有扩大视野的机会。解放后更在党的号召下，去战场，去工地，不断"下生活"。

但您的主要作品还是《激流》和《寒夜》，而不是《砂丁》、《萌芽》和写朝鲜战场的小说。这就证明当年您对徐懋庸表达的关于作家“下生活”，提出“这自然很好，但并非必要”这样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巴：是的，我原是同意胡风所提出“到处有生活”的说法，但是解放后我就不敢说了。这也正是我在《随想录》中所说的，证明我在解放后“觉新性格”的存在吧。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他怎么写得出作品？怎么会成为真正的作家？有了生活，才有作品，才做作家。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这本来是个很浅显的道理。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写他最使他感动的东西。这是我的几十年经历所得到的教训。当然我并不反对作家到处去看看，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徐：当前文学批评界的思想活跃，确实使人振奋。过去写的现代文学史，确有许多不正确和不公平的地方。但我觉得“重写文学史”这样的提法，似乎还保持着过去那种只能独家写文学史的“权威”观念。其实文学史的写作，也应该百花齐放，谁都可以写的。

巴：是的，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各人都写各人的。夏志清的那本，就把沈从文与师陀写进去了。不像我们过去写文学史，要劳师动众，必须集体讨论，搭班子。

徐：师陀在解放前确是很有才华的。抗战时期柯灵同志编《万象》杂志，在“编后记”多次推荐过他的作品，我们都受过影响。当时他的文字的确很好。解放后，他“下生活”特别积极，后来不知怎么，衰退得厉害。在他离世前一个月，我曾到他的新居看他，主要也是为了写传记，因为我知道他也是你的老友。他说，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上海时，只认识一个靳以，第二天就由靳以介绍，认识了您和陈荒煤。荒煤还给他找了住的房子，您则在永安公司楼上请他吃饭，以后你们经常在一起。他说您是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巴：那时他很用功，他的作品受到重视。他的短篇集《谷》得到《大公报》文艺奖金。他在解放前写的几本集子，如《里门拾记》、《马兰》、《果园城记》、《大马戏团》等都是不错的。解放后他曾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电影剧本上。写电影剧本，七稿八稿，把他搞昏了。

徐：最近在《文艺报》上读到一篇题目叫《周扬现象》的文章，和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的李子云追忆周扬的散文，不知巴老看到过没有？那两篇文章基本精神一样，这就是我们过去的文艺政策折腾得连周扬同志都晕头转向。

巴：文章看了。我还记得一九六五年元旦中午，中国作协书记刘白羽邀请在北京出席“人大”和“政协”的作家吃饭，当时所谓“四条汉子”中的三个人已被点名，只有周扬还在位，饭后他还向我们头头是道地讲了一个下午。回想那时每个人心里战战兢兢，实际上周扬也不例外。

徐：所以我想我写的传记，解放后十七年的部分，如果只

从您在十七年中写的作品内容，来反映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那肯定是不够的。在解放前，或者可以说，您的工作、生活、思想感情大都反映在您的作品中了，而解放后十七年您的作品，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内容上，也只能是反映了您一部分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感情。类似周扬现象，我想在您的实际生活上有时也是有的。我记得萧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在北京紫光阁开会，他在自己的单位里已被点名，因而感到局促不安，当他一进会场，别人都不敢理睬他，只有您还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坐在您的身旁。我想知道那时您的心情怎样？

巴：不是他坐在我的旁边，是我坐在他的旁边。我后进会场，我也想对他讲话。他是我的老友，我心有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徐：我想我写的传记如果没有写出您类似的在这样境遇中的这种心情，我的传记就没有完成任务。

巴：那么请你多看看《随想录》……

徐：巴老，不知您对最近在京沪两地播放的《家、春、秋》电视连续剧怎样看法？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我所接触到的人，大都对这部电视剧的评论，觉得还不错。

巴：电视剧是一些年轻朋友的再创造，这样摄制出来很不容易了。当然还可以搞得更好些。我同意你在报上发表的那篇影评讲法，这就是《家》中的罪孽，不能把主要责任推在陈姨太、冯乐山身上。特别是冯乐山，他在当时当地不过是一个社会名流，至多是个帮凶。此外，关于觉新的自杀，我同意黄

宗江的说法，最好迟一点，把家中大事安排好了再走，否则他会死不瞑目。

徐：最近上海书市冷落，据说新华书店许多书卖不掉。

巴：书店书卖不掉，街头书摊倒是生意兴隆。怎么办？

徐：现在许多报纸期刊为了争取经济效益，都在找企业家赞助，所谓“赞助”，实际就是“资助”。他们还提倡“文艺家与企业家相结合”。像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法呢？

巴：对这样的问题我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毫无经验。我还是那句老话：作为作家，养活我的是读者，不是企业家。

徐：解放后我们曾将文艺从属于政治，现在有些人又把文艺从属于经济。但报纸期刊经济确不能维持，大家只好出此下策，找企业家帮助。据有些人解释，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我们搞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请企业家资助，是请社会主义的企业帮助。

巴：社会主义企业究竟怎么搞法还在摸索，要它与文艺结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加弄不清楚了。在海外，倒是有些企业家，完全出于热心于文化事业，他们资助文化单位，不提任何附加条件，也不要求你在文章中替他做广告，更不要求你替他写报告文学，或者在报刊上登他厂长、经理的言论。在我们国内，有几个企业家有那样的抱负？

徐：即使有，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允不允许这个厂长或经理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无偿资助文艺事业？税务局、财政局不向上面举报才怪呢。